聂锦芳 主编

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

第十卷 “资本一般”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1861—1863年手稿”再研究

王 嘉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6ZDA098）成果

聂锦芳 主编

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

第十卷 “资本一般”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1861—1863年手稿”再研究

王 嘉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第十卷．“资本一般”与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再研究/王嘉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5
ISBN 978-7-300-25476-0

Ⅰ.①重… Ⅱ.①王… Ⅲ.①马克思主义-研究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Ⅳ.①A81②F0-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27736号

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
聂锦芳　主编
第十卷　“资本一般”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1861—1863年手稿”再研究
王　嘉　著
Chongdu Makesi：Wenben ji Qi Sixiang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31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1770（质管部）
	010－82501766（邮购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010－62515195（发行公司）		010－62515275（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5 mm　16开本	**版　　次**	2018年5月第1版
印　　张	23.5 插页3	**印　　次**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367 000	**定　　价**	1980.00元（全十二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文本学研究与对马克思思想的新理解

聂锦芳

认真清理100多年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史，我们可以看到，那些随着时代问题的凸显和转换而生发出来的对马克思思想形形色色的解释，大都已经成为“过眼云烟”，反而是那些基于扎实的文本基础和严谨理性的研究态度而做出的理解，仍然具有恒久的价值。国内马克思主义的专业研究，曾经受到过苏联的巨大影响，但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并没有超越苏联的水准，特别是没有形成一支马克思文本、文献研究专家队伍，没有出现有世界影响的文本研究论著，反而文本、文献研究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最薄弱的环节。可能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反思，在近年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人们意识到文本问题的重要性，一些中青年学者也自觉地把研究重点转向这一领域。但从总体上看，或许是过去研究方式和路数的惯性使然，文本研究目前在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整体格局中仍然处于边缘化的状态，论者言说其重要性的多，真正实际介入这方面研究的少。很多人并没有把文本研究看作整个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础，是理解马克思思想最重要的途径，因而应该是每个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分内之事，反而把它看作少数学者的特殊兴趣和研究路向。甚至，当这一方面的研究才刚刚取得一定进展、涌现出一些成果，就已经引发出了不少负面议论，有的还颇为尖刻。我本人作为这一研究领域的一员，经常对照大家的评论，反省自己的研究工作。同时，为了保持文本研究的良好态势和应有生机，我也想在这里澄清一些误解。

误解之一：文本研究只是做版本考证而不研究思想

或许是受到一时表面现象的影响，新近国内发表的马克思文本研究成果中，考察和清理马克思著述的总体状况及其流传情形，介绍和评论国外“马克思学”界的研究成果以及 MEGA2 编辑的最新动态，梳理和甄别某些文本个案（如《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过程和版本源流等方面的著述占了比较大的比重，引起论者的关注。同时，也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即文本研究只是做版本考证而不研究思想。这种看法甚至引发了早几年前率先在国内开始系统地研究马克思文本的学者的“反叛”，指责我和同道们只做缺乏“思想”的“伪文献学考据”。

究其实，上述看法的形成可能是由于不了解我们对马克思文本研究工作的通盘考虑、阶段设计和完整构思所致。正是痛切地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迄今为止依然十分盛行的寻章摘句、断章取义的方式的恶劣后果和影响，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新一代研究者特别期望通过扎实的文本研究体现或建构起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规范和通行规则。按照我自己的理解，完整的文本研究应该包括前后相续、层层累积而又相互支持和融通的三个步骤，也即三个阶段：版本考证、文本解读和思想研究（每一个阶段又包含很多环节）。从中可以看出，版本研究只是文本研究工作的一个部分，并不是文本研究的全部内容，毋宁说，它只是更为重要的文本解读和思想阐释的前提性、基础性的条件，文本研究的意旨和归宿仍然是思想研究。与过去的研究路数不同的是，对于马克思原始思想的理解和把握绝不能再靠思辨和想象，不能离开对具体文本写作过程、刊布情形和版本源流等方面的考察和梳理，不能离开对构成文本的各个具体章节所进行的翔实的剖析和解读，不能单纯依据作品中的片言只语便对马克思的观点进行无限的概括和提炼，不能对其思想进行随意的阐释和评论，更不能天马行空地“制造”出一个“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我认为，不论研究者的个性多么独特，在介入某一项具体研究时，你必须遵循这样一种严格的步骤或程序。

版本考证的成果将为客观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思想提供扎实的文献基础，解构长期以来这一方面存在的“过度诠释”现象。以在我国影

响巨大、被约定俗成地命名为《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为例，迄今为止我们基本上都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1 版第 42 卷、中文 2 版第 3 卷（与 2000 年单行本一致）来阐释其思想的。这样的结果是，将只在其中第 1 部分手稿中阐发的“异化劳动”的观点抬升到这一文本核心思想的地位，进而认为这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巴黎时期”（即 1843 年 10 月—1845 年 1 月）的主旨思想。然而，通过版本考证的新成果就会发现，这种概括所依据的文献学信息是不全面的，因而在此基础上做出的结论也靠不住。

其一，流行的研究并没有还原马克思当时实际的写作情境。作为我们研究基础的文本，只是一部被后人将并不是连续写作的 3 部分手稿撺掇在一起的所谓“著述”。其实这一时期，除了这些手稿，马克思还穿插着写有 9 册经济学笔记。不仅如此，马克思当时还有一个编纂“一套社会主义史的资料汇编，或者毋宁说是一部用史料编成的社会主义史”的计划，因此，他当时直接阅读了与其思考主题有关的法国文献，并且通过德译本或法译本了解了英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并且都做了摘要。因此，研究巴黎时期马克思的思想，单独把《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从众多材料中撷取出来，没有完整地呈现马克思当时的理论视域，由此所进行的概括必然是片面的。实际上马克思所思考的议题很多来自他自己阅读和摘录的书籍和文献，“异化劳动”的思想不过是其中之一，只有把这些书籍和文献中所涉及的思想通盘考察，才能厘清马克思思想的实际状况，从而避免做出“过度诠释”。

其二，《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名称中所谓“经济学”“哲学”的提法割裂了马克思当时理论活动的整体状况。实际上，在马克思的研究活动中，没有我们后来习惯了的、作为现代学科分类的什么“经济学”或“哲学”的分野。第 1 部分手稿中所论述的“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是经济学议题吗？其实，马克思把它们看作当时的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三个阶层不同的三种收入形式，由此体现出他们差距悬殊的社会境遇，以透视当时森严的社会阶层结构、相互关系及其未来命运，这分明是属于哲学和社会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尤其是固守于马克思巴黎时期研究的所谓“经济学”领域，而把它们与他当时正在为甄别和了断与青年黑格尔派思想渊源关系而写作的《神圣家族》和随后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分开，这样怎么

能完整地勾勒出当时马克思思想的原貌呢？

强调文本研究中版本考证的意义，极容易被指责为“唯文本至上”，搞“本本主义”。然而，从以上的叙述中不难看出，研究者之所以下如此大的功夫梳理和甄别作者的写作情形、作品的版本源流，正是认识到，虽然我们把文本看成是作者思想的表达，但同时又必须保持警觉，即文本与原始思想之间其实不可能是完全对应的关系。也就是说，作者的思想未必已经完全通过文本本身表达净尽了。文本本身只是作者表述其思想的一个载体，它的表述有可能不恰当、不完备。按照文学理论中的“冰山原理”，作者的思想只有六分之一露出水面（是其自觉意识到的），六分之五则是处于形成过程中的或混沌状态的水下部分（自己也不明所以）。如此说来，文本只能是对其六分之一部分的描摹和表达，那么它与这些确定性的思想之间是否达到了自洽？作者的思想状态、写作心理与文本的表述方式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如此等等，就要求研究者借助文本之外的佐证、作者同时代的文献研究以及同一文本的不同版本做出分析、判断、推理和构想。这是文本思想研究中极其重要的前提步骤。

甄别思想与文本之间复杂关系的工作，对于作为我们研究对象的马克思本人的情况来说，显得尤其必要。尽管他从少年时代便开始写作，毕生最善于用文字表述其对世界的理解和看法，但回到他的文本世界就会发现，其生前发表过的论著不到其全部著述的三分之一。在他的著述中，已经完成的定稿也很少，大部分是成型稿之外的准备材料、先行稿、最初草稿、过程稿、修改稿、誊清稿、刊印稿、遗失稿以及其他相关材料。因此，要理解马克思、把握他的思想，单纯从那些现成的著述中概括是最方便的，但也是最不可靠的。因为马克思很多重要的思想就保留在那些杂乱的材料中，需要我们悉心梳理。还有一部分思想甚至没有形诸文字，需要我们借助他阅读过的书籍、与人的交往情况、当时人的回忆等材料做出推断。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国马克思研究的特殊性，他著述的原始手稿的复制件我们基本上没有收藏，于最新文献的掌握上很容易出现纰漏甚至差错。在具体研究中我们不占有优势，长期以来又不重视文本、文献材料的收集和研究，这些方面欠账很多。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必须放弃这一基础性的研究环节，可以凭空抽象马

克思的思想。科学的态度要求我们必须深入了解国外“马克思学”界在马克思具体文本、问题的探讨中所做过的工作及其最新进展，结合我们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做出梳理和评价。我们喜欢强调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国特色，但我认为这种中国特色应当是建立在具备国际视野、把握学术前沿动态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另辟蹊径，与国际马克思研究界互不了解、互不往来。

误解之二：文本研究只是复述原著的思想而没有理论建树

很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不愿意介入文本研究，还有一个观点作支持，就是较之于原理研究和现实问题探讨，文本研究只是复述原著的思想，谈不上研究者个人的见解和创造，因而属于“次一层次”乃至“低一档次”的研究。

其实，通过对经典文本的解读来建构了新的思想体系，在中外思想史上都不乏其例。在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注经”“解经”可以说是思想家、哲学家们表述和阐发其思想最普遍的方式之一。大多数思想形态的建构是通过注释经典来完成的，比如，王弼通过为《道德经》和《易经》撰注而成魏晋一代玄学大家，朱熹更是通过《四书章句集注》而成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在西方，柏拉图以苏格拉底的名义进行对话以阐述其思想观点而开辟了希腊哲学的新阶段，中世纪一大批《圣经》解读者建立起经院哲学的宏伟大厦，康德、黑格尔的后继者更是通过对先贤著述的解说、对其思想实质的揭示以及与时代关系的思考而提出“回到康德”“回到黑格尔”等口号，实际上发展出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等流派。不仅如此，在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中这种情况也相当盛行。

就马克思文本的解读而言，我这里特别想提醒国内的研究者不要低估了文本解读的难度。以《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为例，过去我们一般都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为蓝本，而在具体概括其思想时又仅仅以其中“正面阐述的自己的见解”的《费尔巴哈》章为依据。按照这样的选择所进行的解读，读出了什么？充其量是对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及其原理的一种领会和证明！现在可以说，这种理解远没有

达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本人的思想高度，而是处于“前马克思”的思想水准。理由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是根据俄文2版翻译的，而这一版本由苏联的维列尔准备、阿多拉茨基编辑，他们根据当时苏联流行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把马克思原始手稿中的编码打乱后重新进行了编排，“建立”起《费尔巴哈》章的结构；不仅如此，他们还把一部“事先并没有经过十分严密的通盘考虑和筹划，而是由多个事端引发，写作计划和框架结构几经变动、更改，由若干写法不同、篇幅长短不均的章节所组合而成的相当松散的，并且最终也没有全部完成并出版的著述”编辑成一部俨然是“完整”的著述！根据这样的版本所进行的解读怎么能不造成误读和歧解呢？

根据我自己的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结构并不能仅仅靠《费尔巴哈》一章来支撑，其中全书最难解读的是占了其中十分之七篇幅的《圣麦克斯》一章。如果不算《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先行稿”和第2卷中遗失的两章，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的版式，它有620多页，而《圣麦克斯》一章就要占424页！不仅是篇幅巨大，就其思想容量和深度来说，这一章阐述的很多观点也是《费尔巴哈》一章替代不了的。

《圣麦克斯》章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作为青年黑格尔派重要成员、其实在这一群体中显得非常另类的圣麦克斯·施蒂纳当时引起轰动的一部书《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所进行的极其详尽的考察和分析。他们基本上是按照施蒂纳原书的结构来进行论述的。这一部分的思考路向看似逻辑清晰，实则散乱，叙述方式经常转换，条分缕析的解剖和淋漓酣畅的揭露杂糅在一起。迄今为止，包括苏联和西方马克思研究界，都没有详细解读和研究《圣麦克斯》一章的著述发表，由此可见解读的难度。总括地看，《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所阐述的见解与马克思、恩格斯对它的解读和批判，可以说是观照和把握世界的两种方式的交锋和驳难，常常因为思考的起点、过程、倾向、意旨等诸多方面的不同，很容易将对方的观点看作充斥荒诞的谬见。现在可以这样说，如果我们承认世界不是一种存在、一种理解、一种诠释，那么就需要站在比论争双方更高的层次来分析他们之间的驳难逻辑与观点得失。可以说，这样一种不适宜于简单做出肯定或者否定的判断的解读，正是考验新一代文本研究者耐心、见识的地方。

篇幅所限，我这里只举贯穿这一章始终的一个重要问题：究竟该如何把握精神世界？

施蒂纳声称他的书意在“书写人生的历史”。那么，对人而言，什么最重要呢？他认为是精神。他特别注意到，对精神的追求和理解是一个非常复杂、艰难的过程。同样是精神，其中有层次、境界等方面的区分，诸如贫乏的精神还是丰富的精神，不完善的精神还是完善的精神，某个个体的精神还是“真正的和真实的”精神、“理想的、彼岸的”精神等，都是有差别的。精神探索史、追求史不可避免地就成为前者向后者嬗变、转换的历史。由此他认识到，任何世俗存在都没有力量驾驭精神，寻找这万能的精神的引导者、征服者——“唯一者”就成为人生的最高目标和归宿。对施蒂纳关于人的发展及其精神历程的煞费苦心的追求，马克思、恩格斯以极端挖苦的口吻称之为“思维的绝技”和种种“花招”，认为他探讨精神但根本没有触及精神本质，研究思想但“根本还没有触及这些思想，因为这些思想是表达现实关系的”。

那么，能不能据此就说施蒂纳的探索完全没有必要和价值了呢？恐怕不能下如此决然的断语。我们知道，精神、观念、思想诚然有现实的根基或依据，但同时它们的奥妙、奇异、诡谲确实又是超现实的、非逻辑的和非常规的。正因为如此，它们才值得人们去苦苦追索和反复深究。如果用一种外在于精神、观念、思想的规则、尺度、标准来衡量和探究精神、观念、思想，确实可以看到这一世界的荒诞和离奇，但据此而舍弃了对纯粹精神、观念、思想的研究，也将是极大的错失和遗漏。我们必须说，施蒂纳对精神世界探索的价值不是体现在本体论意义上的（这方面他的观点和推论确实有荒谬之处），但他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和思路推进了人对精神世界无穷奥妙的理解，这是不能一笔抹杀的。施蒂纳痛切地感到，“现在我们才知道，我们迄今根本没有用精神来观察世界，而只是对它呆望而已”。于是他做了非常曲折的思考和探索，他的错误在于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对世界的探索陷入纯精神的领域而离开了与现实的关联。恰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他“没有经过考虑和清点”，他不知道，精神离不开它之外的现实，不仅是根源上离不开，过程和归宿上都离不开，它们是一体两翼，共存于一个世界系统，相互规定、相互表证、相互否定、相互提升。

以上这样一种解读，能说只是在复述思想吗？

误解之三：文本研究有意回避现实问题因而体现不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

这里首先需要对什么是“现实问题”做些分析。其一，社会上存在的所有形形色色的现象和事件，彼此之间差异很大，重要程度各不相同，有的表征着时代的特征及其发展趋向，有的则与此关系不大甚至没有关系。因此，“现存的并非都是现实的”。其二，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该时代自己的“现实问题”，并不是说只有当代的甚至目前的问题才是“现实问题”。其三，不仅社会物质活动和实践领域的事件是“现实问题”，重要的思想潮流和理论动向也属于“现实问题”。

循此，我们看文本研究。由于我们选择的研究对象是马克思在19世纪写作的文本，特别是在具体研究中为了尽可能客观地再现和把握马克思思想的原初状况及整体面貌，我们力戒从当代（目前）发生的那些具体问题甚至事件出发，去马克思的文本中寻找解释、说明和答案。因此，在文本研究的第一阶段即版本考证中，的确没有触及这些当代的问题和事件。但马克思的文本本身不是抽象的空论，甚至也不完全是他本人生命历程和人生体味的记录，而是他对自己所属的那个时代重大的社会问题、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的反映和剖析，更是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考和探究。因此，在文本研究中，特别是第二、第三阶段的文本解读和思想研究中，我们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回避那个时代的“现实问题”。我们不得不一再回溯当时的社会现实和发展状况，厘清什么是那个时代处于重要地位的社会问题，再将我们所解读的文本所论述的问题与此相对照，以判别作者是否准确地把握住自己时代的脉搏，是否客观地反映出问题的视域，是否到位地考虑到问题的症结，有没有独特的解决思路，等等。

此外，文本研究需要对马克思思想做出评价，而评价需要有参照系，因此研究者还要面对当时斑斓的思想图景和一系列复杂的理论“事件”。一方面要梳理与马克思发生过直接关系的思想家及其派别，诸如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费尔巴哈、施蒂纳、海涅、魏特林、威廉·沃尔弗、赫斯、卢格、格律恩、蒲鲁东、拉萨尔、福格特、巴枯宁等

人，以及空想社会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共产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同盟、德国社会民主党等思潮或党派与马克思复杂的纠葛及思想差异。另一方面更要甄别虽然没有与其直接接触过，但对其思想发展和理论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的思想先驱与他的思想关系。终马克思一生，黑格尔哲学可以说是其观照、把握世界，理解和诠释时代最为重要的参照系。迄今为止，就二者的关系而言，无论是对他们思想关联的具体细节和演变轨迹的探寻，还是从整体上对黑格尔的实际影响做出程度上或实质性的判定，都有很大的研究空间。这也直接关乎马克思思想与旨在全面颠覆黑格尔哲学的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此外，还有一个比较的层次是为人们所忽略的，那就是与马克思处于同一时代、同一思想传统和社会环境，但思想意旨却迥然不同的思想家。比如，被奉为“存在主义之父”和鼻祖的克尔凯郭尔只比马克思小三岁，19 世纪 40 年代开始流行的叔本华的唯意志论也是与马克思主义同时诞生的思想体系。相同的时代、相同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现实为什么会“塑造”出、怎样“塑造”出这些思想“另类”？这些比较和分析，可以凸显出人类哲学和思维探索的多元进路，以及在这杂色斑斓的图景中马克思的思想处于一种怎样的地位。

这样的比较方式还可以进一步延伸下去，即梳理马克思文本中提出的思想或问题在后来哲学史、思想史演进中的传承与变迁，辨析这些思想或问题在当代社会实践中的表征或地位。不理解这些传承与变迁，很容易把在马克思那里还处于 19 世纪特定时代诠释的思想，无界域地与后来所获得的新的内涵混同起来。而把马克思的原始思想提升为当代的思想，实际上无助于确立其客观的历史地位。当然，这不意味着否定马克思的时代与当代社会的本质关联。尽管二者已经有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距离，世界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但如果从资本所开辟的“世界历史”的运演看，除社会结构要素增多、社会现象空前复杂等程度和层次差异以外，二者尚有诸多本质上的相似性、同构性。因此，马克思当年的言说至少仍能诠释当代的部分现实，马克思的文本及其思想不是已走进博物馆的陈列物，不只是记录一段思想史的文献。尽管解决纷繁复杂的时代课题未必会从那里找到现成的答案，但迄今它仍然指导并且参与着对当代现实的“塑造”，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寻找当代社会与马克思当年的思考的内在关联，将会理性而客观地使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

值“呈现”出来。而文本研究的目的、主旨和当代性不也正在于此吗？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下，我和我的同道们决定奉献我们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力图从文本、文献个案出发对马克思思想重新进行梳理、阐释和评论，尽可能地把版本考证、文本解读、思想阐释与现实意义重估紧密结合起来，以矫正长期以来形成的误读和曲解。

当然，由于马克思一生撰写的文本、文献是卷帙浩繁的，要对其著述一一进行解读并不可能；这样，我们就只能从中选取出那些最能表征马克思思想特质、内涵以及发展历程的重要篇章，作为我们重点研究的对象。选取的原则是：一，马克思写作这些著述或手稿是经过精心考虑的，同时花费了他比较大的精力和比较多的时间；二，这些作品的篇幅一般比较大；三，有些著述虽然不完整、不系统，但它们提出或触及的问题涉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主题，在马克思漫长的思想创构过程中，对这些问题具体内涵的理解和解释可能有反思、变化甚至修正，但这些主题被揭示或提了出来，这昭示了这些作品永久的思想史价值；四，对有些著作过去虽然有所研究，但现在看来要么存在资料不完整、不权威甚至错误的问题，要么解读方式、观点概括有偏差，等等。

根据上述原则，我们计划从以下 12 个方面对马克思的文本、文献及其思想展开深入研究：

一，通过对“中学文献”“大学习作”与“博士论文”及其笔记的研究，探讨马克思思想起源中的启蒙背景、浪漫情怀与自我意识；

二，通过对“《莱茵报》—《德法年鉴》时期”重要文本的研究，探讨马克思思想转变中所产生的“苦恼的疑问”以及他对现实解放之路的寻求；

三，以“犹太人问题”为中心，重新考察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思想传承、决裂的过程；

四，通过对“巴黎手稿”的再研究，分析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及其扬弃异化的思路；

五，以《神圣家族》为中心，重新考察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和思想的建构过程；

六，通过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分析马克思在批判中所重构的“新哲学”的构架、体系及其特征；

七，通过对《哲学的贫困》与《贫困的哲学》的比较研究，探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基础；

八，通过对1848—1852年一批“政治文献”的研究，重新审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政党学说和革命方略；

九，通过对“1857—1858年手稿”的研究，厘清劳动、货币与资本理论的复杂内涵及其论证逻辑；

十，通过对“1861—1863年手稿”的研究，甄别马克思经济学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与超越；

十一，通过对《资本论》第一卷不同版本的比较研究，阐释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及对资本的逻辑的批判；

十二，通过对“人类学笔记”与“历史学笔记”的研究，概括和分析马克思晚年对东方、古代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

以上研究计划拟在2018年马克思诞辰200年之前全部完成。

为保证研究的高质量和思路的完整性，它们将由我和受我的研究方式和思想观点影响的同道们一起完成。我们多年专注于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的学习和研究，每个人既对自己所研究的文本有精深的理解和掌握，也有宽广的比较视野和深刻的分析力度。其中两卷由我本人撰写，其他各项虽然由其他人署名，但其中的思想观点、论述思路、章节安排乃至文字表述也由我提出或者把关。多年来，我们已经形成一个严格的“学术共同体”传统，除非特殊情况，每周五下午都会在我的办公室进行探讨，教学相长，共同提升。我是这种研究方式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也是相关观点和质量的第一责任人，诚恳接受学界内外的监督和批评。

谨以我们的努力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专业研究的繁荣和发展！

2012年9月17日

于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中心

目　录

引言　重新发现“资本一般”概念的理论意义 …… 1
第一章　“资本一般”概念的提出过程 …… 18
　第一节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转向 …… 18
　第二节　“资本一般”理论的酝酿和写作 …… 37
　第三节　“资本一般”理论的最终完成 …… 58
第二章　“资本一般”的批判对象和批判方法 …… 78
　第一节　作为批判对象的“资本” …… 79
　第二节　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 …… 105
　第三节　作为批判方法的“一般” …… 121
第三章　作为理论整体的“资本一般” …… 136
　第一节　广义“资本一般”理论的前两个环节 …… 137
　第二节　广义“资本一般”理论的第三个环节
　　——狭义“资本一般”理论 …… 167
　第三节　基于“资本一般”的经济理论史评述 …… 203
第四章　“资本一般”与古典经济学批判 …… 211
　第一节　分工理论与生产劳动的界定 …… 212
　第二节　流通理论与不变资本的再生产 …… 233
　第三节　地租理论与平均利润的形成 …… 245
第五章　“资本一般”与庸俗经济学批判 …… 264
　第一节　古典经济学的解体与庸俗化 …… 265

第二节　庸俗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经济学 …… 291
第三节　“资本一般”与未来社会的逻辑构想 …… 310
综论　重新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叙述逻辑 …… 326

参考文献 …… 344
人名索引 …… 347
主题索引 …… 350

Contents

Introduction Rediscover the Concept of Capital in General ····· 1
Chapter 1 The Proposing of the Concept of Capital in General ····· 18
1. The Causes for Marx's Shift to Political Economy ····· 18
2. The Preparation and Writing of the Section of Capital in General ····· 37
3. The Final Completion of the Section of Capital in General ····· 58
Chapter 2 The Criticism and Critical Method of Capital in General ····· 78
1. Capital as a Critical Object ····· 79
2. The "Reasonable Core" of Hegel's Dialectics ····· 105
3. General as a Critical Method ····· 121
Chapter 3 Capital in General with All Moments ····· 136
1. The First Two Moments of Generalized Theory of Capital in General ····· 137
2. The Third Moment of Generalized Theory of Capital in General—Special Theory of Capital in General ····· 167
3. Comment o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eories Based on Capital in General ····· 203

Chapter 4 Capital in General and the Critique of Classic Economics ····· 211
1. Division of Labor and the Definition of Productive Labor ····· 212
2. Circulation Theory and Reproduction of Constant Capital ····· 233
3. The Theory of Land Rent and the Formation of Average Profit ····· 245
Chapter 5 Capital in General and the Critique of Vulgar Economics ····· 264
1. Disintegration and Vulgarization of Classical Economics ····· 265
2. Vulgar Economics and Socialist Economics ····· 291
3. Capital in General and the Logical Deduction of the Future Society ····· 310
Conclusion Reunderstand the Narrative Logic of the Critique of Economics ····· 326

References ····· 344
Name Index ····· 347
Subject Index ····· 350

图表目录

图 1　魁奈《经济表》的资金环流简化图 …… 83
图 2　古典经济学的“资本—利润”模型 …… 85
图 3　斯密价值理论中的资金环流简化图（即生产成本价值论） …… 86
图 4　劳动成本价值论视角下“资本—利润”模型的扩展形式 …… 92
图 5　马克思剩余劳动理论简化图 …… 95
图 6　李嘉图的劳动成本价值论简化图 …… 100
图 7　庸俗经济学的“三位一体”公式简化表 …… 102
图 8　广义“资本一般”理论的辩证逻辑结构 …… 205
图 9　“1861—1863 年手稿”中提及的主要经济学立场及相继关系 …… 209
图 10　斯密对国民财富增长动力的解释 …… 214
图 11　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简化图 …… 247
图 12　马克思的地租理论简化图 …… 262

表 1　MEGA²第二部分“《资本论》及其手稿卷”的出版情况 …… 2
表 2　“资本一般”文本群的创作时间 …… 10
表 3　“资本一般”文本群的三种文本类型 …… 17

表 4 “1861—1863 年手稿”各笔记本的写作时间推测 …… 66
表 5 “1861—1863 年手稿”在《全集》中文第一版中的编排情况 …… 74
表 6 “1861—1863 年手稿”在 MEGA² 中第 II 部分第三卷的第 1—6 册的编排情况 …… 75
表 7 “1861—1863 年手稿”在《全集》中文第二版中的编排情况 …… 76
表 8 “1861—1863 年手稿”各笔记本在三个版本中的编排情况对照表 …… 77
表 9 “资本的生产过程”草稿在“1861—1863 年手稿”中的分布状况表 …… 171
表 10 与“资本的流通过程”直接相关的手稿在“1861—1863 年手稿”中的分布状况表 …… 185
表 11 “资本和利润”草稿在“1861—1863 年手稿”中的分布状况表 …… 194
表 12 “1861—1863 年手稿”中有关生产劳动的内容分布 …… 218
表 13 “1861—1863 年手稿”中关于机器问题的内容分布 …… 237
表 14 李嘉图级差地租理论示意图 …… 250
表 15 “1861—1863 年手稿”中有关地租问题的内容分布 …… 251
表 16 “1861—1863 年手稿”中关于价值和利润的内容分布 …… 271
表 17 马克思对《政治学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的内容分类 …… 273
表 18 “1861—1863 年手稿”中关于李嘉图学派解体的内容 …… 280
表 19 “1861—1863 年手稿”中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的内容分布 …… 292

引言　重新发现“资本一般”概念的理论意义

“1861—1863 年手稿”又称“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指的是马克思 1861 年 8 月—1863 年 6 月写下的连续编号的系列笔记本手稿，总标题是“资本一般（Das Capital im Allemeinen）”。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六册创作计划中，“资本一般”是第一册“资本”的第一篇，包括“商品”、“货币或简单流通”和“资本一般”三章。[①] 其中前两章构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以下简称“第一分册”）的内容，于 1859 年先行出版；马克思从 1861 年开始为第三章撰写了二十三个笔记本近 1 500 页的草稿，后人将这二十三个笔记本合称为“1861—1863 年手稿”。在过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1861—1863 年手稿”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主要是因为其中包含了《资本论》第 4 卷“剩余价值学说史”的唯一底稿；相应地，对这部手稿的学术讨论也主要集中在其中梳理政治经济学理论史的部分。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以下简称“MEGA²”）第二部分“《资本论》及其手稿卷”以及中文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37 卷的陆续出版，“1861—1863 年手稿”的主体部分首次以原始顺序出现在中文读者面前。新版“1861—1863 年手稿”不仅重现了马克思写作手稿二十三个笔记本的大致顺序，而且还收录了大量此前未公开发表的内容。根据对新文献的阅读可以发现，马克思不仅在“1861—1863 年手稿”中对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都进行了专门评述，同时也完成了“资本一般”理论的逻辑建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11.

标志着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工作的初步完成。“资本一般”不仅是“1861—1863 年手稿”的标题，同时也是这部手稿的核心议题。在新文献的佐证下，仅仅用“历史评述”这样的称谓已经无法概括“1861—1863 年手稿”的主要内容，以“资本一般”为基础重新研究“1861—1863 年手稿”将会成为一项崭新的理论工作。

一、为何要重新研究“1861—1863 年手稿”

近年来，“回到马克思”逐渐成为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共同口号。这个口号的产生有着复杂的理论和现实背景，MEGA^{2}的出版则进一步将这一口号落实为切实的学术研究范式。随着新文献的出版，马克思的许多经典文本被重新激活，各种尝试“回到马克思”的相关学术研究才获得了真正的生命力。不过，MEGA^{2}各卷在学术研讨中的使用状况并不平衡。相比于“巴黎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热门文本，MEGA^{2}中最先出齐的“《资本论》及其手稿卷”始终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资本论》及其手稿卷”是 MEGA^{2}的第二部分，共 15 卷 23 册，涵盖了马克思从 1857 年开始与《资本论》直接相关的全部重要著作和手稿，其中有许多手稿此前并不为人所熟识。MEGA^{2}中关于《资本论》的艰苦编辑工作本身已经为《资本论》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遗憾的是，目前学术界尚未基于这些文献得出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资本论》本身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对《资本论》理论内涵的解读要结合马克思的众多经济学手稿才能实现。无论是为了推进新文献的利用，还是为了深入阐发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重新研究《资本论》及与之相关的各部手稿都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表 1　　MEGA^{2}第二部分“《资本论》及其手稿卷”的出版情况

卷数	内容		出版时间
II/1	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	第 1 册	1976 年
		第 2 册	1981 年
II/2	1858—1861 年经济学手稿与著作		1980 年
II/3	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	第 1 册	1976 年
		第 2 册	1977 年
		第 3 册	1978 年
		第 4 册	1979 年
		第 5 册	1980 年
		第 6 册	1982 年

续前表

卷数	内容		出版时间
II/4	1863—1867 年经济学手稿	第 1 册	1988 年
		第 2 册	1992 年
		第 3 册	2012 年
II/5	《资本论》第 1 卷（1867 年汉堡版）		1983 年
II/6	《资本论》第 1 卷（1872 年汉堡版）		1987 年
II/7	《资本论》第 1 卷（1872—1875 年巴黎版）		1989 年
II/8	《资本论》第 1 卷（1883 年汉堡版）		1989 年
II/9	《资本论》第 1 卷（1887 年伦敦版）		1990 年
II/10	《资本论》第 1 卷（1890 年汉堡版）		1991 年
II/11	《资本论》第 2 卷手稿		2008 年
II/12	《资本论》第 2 卷恩格斯编辑稿		2005 年
II/13	《资本论》第 2 卷（1885 年汉堡版）		2008 年
II/14	《资本论》第 3 卷手稿和编辑稿		2003 年
II/15	《资本论》第 3 卷（1894 年汉堡版）		2004 年

在传统的经济学手稿研究中，比较受到重视的有“1844 年手稿”“1857—1858 年手稿”“1861—1863 年手稿”。这三部手稿再加上《资本论》第 1 卷的德文第四版，共同构成了研究马克思经济学思想的核心文本。手稿是一种特殊的文本类型，本身就具有思想实验的性质，因此经济学手稿的内容一般还会包含着马克思在经济学之外的哲学思考。国内外学术界对于上述各部手稿的研究也往往侧重于对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的挖掘，并且已经获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然而在手稿研究的热潮中，国内外学界对“1861—1863 年手稿”的研究却始终停留在经济学具体观点的简单比较上，很少出现专门基于这部手稿的哲学研究。作为上述三部手稿中篇幅最大的一部，“1861—1863 年手稿”对于手稿研究而言具有独特的价值。近年来，“1857—1858 年手稿”与《资本论》之间的差别逐渐成为学术界的热点议题，国内外的研究者对两者的差别进行了形形色色的解释。当关于“1857—1858 年手稿”与《资本论》的争论难以达成共识的时候，处在它们之间的“1861—1863 年手稿”却被冷落和遗忘了，这种研究现状与“1861—1863 年手稿”的地位并不匹配。作为两个文本个案，“1857—1858 年手稿”和《资本论》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差别，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马克思其他时期的文本对比研究之

中。文本个案之间的差别，往往意味着马克思在思想的某些方面发生了尚未被关注的转变，但是这种转变不应当被任意地发挥。对于文本上的差别，理应通过回归文本的方式来得到恰当的解释。在脱离具体文本的情况下，形式对比和外在评论都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只会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在这种意义上，作为马克思经济思想转变期的重要文本，对“1861—1863 年手稿”的重新研究不仅可以补全手稿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而且也是破解当下手稿研究困境的关键步骤。

“1861—1863 年手稿”是马克思众多经济学手稿中最先发表的一部，早在 20 世纪初，“1861—1863 年手稿”中关于经济学史的评述部分就由考茨基编辑后单独发行。根据恩格斯的遗愿，考茨基将手稿中的部分内容编辑为《剩余价值学说史》，作为《资本论》的历史评述部分单独出版，这种编排方式也奠定了此后研究“1861—1863 年手稿”的基调。苏共编排的俄文二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沿用了上述编排方式，将“1861—1863 年手稿”主体内容拆散重排为两个相对独立的文本，一部分作为“剩余价值学说史”的草稿被整理为《资本论》的第 4 卷，另一部分被独立重新编排为《资本论》的第二稿。在以苏联学者为代表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出版经济学手稿主要是为了给《资本论》研究提供辅助材料，因此手稿的大部分内容都根据《资本论》的篇章结构重新进行了删改和编排。例如，在出版“1857—1858 年手稿”时，编者根据“七个笔记本的索引”以及《资本论》的结构额外补充了二十多个标题。在编辑出版“1861—1863 年手稿”时，编者对手稿内容的删改更加明显，这部标题为“资本一般”的手稿被拆分为两部分，参照《资本论》重新设计了篇章结构并修订了标题。对手稿的重新编排一方面凸显了马克思经济学手稿与《资本论》的关联，但另一方面也遮蔽了马克思在写作经济学手稿时所面对的理论困难，以及马克思为了克服这些困难而进行的艰苦理论探索。更为重要的是，上述编排方式导致了目前尴尬的研究现状：由于《资本论》第 4 卷和《资本论》第二稿的定位过于深入人心，“1861—1863 年手稿”虽然出版最早且为学界所熟知，但是极少有学者关注手稿的原始顺序及叙述逻辑。

将“1861—1863 年手稿”中的“批判部分”单独出版是恩格斯的遗愿。恩格斯曾在《资本论》第 2 卷的序言中对“1861—1863 年手稿”

进行过专门的介绍，并指出“这个手稿的批判部分，除了许多在第二册和第三册已经包括的部分之外，我打算保留下来，作为《资本论》第四册出版”①。在介绍“1861—1863 年手稿”时，恩格斯的直接目的是尽快出齐《资本论》全部四卷，而不是全面地评估手稿的理论价值；因此，在《资本论》四卷出齐之后，理应按照原貌对“1861—1863 年手稿”重新进行整体性的研究。然而，由于按原文顺序编排的“1861—1863 年手稿”影响力甚微，“1861—1863 年手稿”的整体研究一直停滞不前。目前，按原文顺序出版的“1861—1863 年手稿”是 MEGA^{2}以及以 MEGA^{2}为蓝本的各个翻译版本，参照 MEGA^{2}重新编排的中文新版“1861—1863 年手稿”目前也即将出齐。可惜，这些按照原始顺序编排的手稿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目前流行的仍然是另外两个版本：一个是将“剩余价值理论”部分单独出版的《剩余价值学说史》，实际上将“1861—1863 年手稿”当作了《资本论》的注解；另一个是苏联学者重新编排过的《资本论》第二稿，编者根据《资本论》的结构重新编排了“1861—1863 年手稿”中去掉“剩余价值理论”部分之后的其余内容，将“1861—1863 年手稿”视为《资本论》的过程稿。这两种编排方式实际上蕴含着相同的理论判断：《资本论》代表了马克思的成熟论述，而作为注解和过程稿的“1861—1863 年手稿”并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思想发展阶段。上述两种版本的编辑原则都是尽力呈现手稿与《资本论》的关联，而不是呈现手稿本身的结构；以此为文本依据来研究“1861—1863 年手稿”，必然很难寻觅到马克思写作这部手稿时遵循的逻辑线索和蕴含的理论内容。

与此前整理出版的各个版本相比，MEGA^{2}中重新编排的“1861—1863 年手稿”几乎是一部全新的著作。MEGA^{2}第二部分大致上按照原始顺序出版了与《资本论》直接相关的手稿和著作，其中的第三卷分六册收录了“1861—1863 年手稿”的全部二十三个笔记本。除了第 XVI 笔记本和第 XVII 笔记本前 7 页的位置存有争议之外，MEGA^{2}II/3 的六个分册基本上还原了马克思的写作顺序和思考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 32—37 卷中收录的“1861—1863 年手稿”基本上是按照 MEGA^{2}翻译而来，因此手稿的各种细节也得到了保存。新版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6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

“1861—1863 年手稿”保留了手稿的总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三章　资本一般”①，提示出“1861—1863 年手稿”并不是一部独立的手稿，而是从属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计划”中第一册第一篇“资本一般”的第三章，这一篇的前两章“商品”和“货币”已经在“第一分册”中先行出版。这意味着将“1861—1863 年手稿”单独当作《资本论》的第二稿的判断可能是不恰当的，至少应当把“第一分册”和“1861—1863 年手稿”合称为《资本论》的第二稿。除此之外，新版的“1861—1863 年手稿”还保留了马克思为“历史评述”部分所拟订的目录和提纲。马克思的理论史评论是理论建构的辅助性工作，根据马克思的提示，“历史评述”至少包括“剩余价值理论”“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亚·斯密和李嘉图关于利润和生产价格的理论”“**地租**（价值和生产价格的区别的例解）”“所谓李嘉图地租规律的历史”“利润理论”“庸俗经济学”七个部分；其中前两个标题是“**资本的生产过程**”部分的理论史评论，后五个标题是“资本和利润”部分的理论史评论。② 最初马克思计划先完成“剩余价值理论”部分，但是在“剩余价值理论”的写作过程中实际上几乎涉及了上述七个部分的全部内容。因此，马克思在最终制订提纲的时候才会专门列出了七个标题以提示每个理论史评论部分对应的位置。在这个意义上，在出版时仍然用“剩余价值理论”来命名“1861—1863 年手稿”的历史评述部分是欠妥的，这实际上是将许多分属不同议题的内容强行归拢在一起。从上述状况可以看出，新文献的出现是对传统的文献解读框架的严峻挑战，如何消化这种冲击是理论工作者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综上所述，“1861—1863 年手稿”包含着有待解开的许多谜题，而且如何处理这些谜题直接关系到对《资本论》的解读以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在“1861—1863 年手稿”中，马克思不仅对经济学理论史进行了回顾和评述，而且还制订了《资本论》第 1 卷和第 3 卷的详细提纲并完成了其中大部分的内容，保留了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过程中理论批判和思想建构的大量细节。对于“1861—1863 年手稿”的理论研究远远没有完成，而且“剩余价值学说史”或《资本论》第二稿的定位也不足以涵盖这部手稿全部的理论内容。传统的编排方式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5.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312-313.

限制了解读“1861—1863 年手稿”的视角，在新文献的支持和冲击下，对“1861—1863 年手稿”的重新研究将成为越来越难以回避的理论任务。

二、解读“1861—1863 年手稿”的多重困境

“1861—1863 年手稿”是马克思众多经济学手稿中最先发表的一部，但是研究的热度远远不及后来出版的“1844 年手稿”和“1857—1858 年手稿”。造成这种反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文献编辑方面的因素，也有理论研究方面的因素，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手稿本身复杂的文本状况。“1861—1863 年手稿”涵盖了海量的思想史议题，二十三个笔记本的内容也并不连贯。清理“1861—1863 年手稿”的文本状况，是解读这部手稿的必要前提。

前面已经提到，马克思 1861 年开始写作“1861—1863 年手稿”的目的是完成《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二分册，也就是说，“1861—1863 年手稿”是一部未能付印的书稿。手稿的文本状况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在写作第 I—V 笔记本和第 I—II 最终笔记本（即第 XVI—XVII 笔记本）时，马克思按照付排稿的规格设计了篇章并进行了相对严谨的叙述；但是随着写作的进行，手稿内容开始变得越来越散乱，表明马克思遇到了某些困难以致无法按照原有的计划进行写作。“1861—1863 年手稿”的文本可以明显地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正面阐述性的文本，内容大体上是按照 1858—1861 年间制订的“资本一般”第三章提纲创作的，具有成熟专著的形式；第二类是历史评述性的文本，是对其他经济学观点的引注和评述，具有研究手稿的形式；第三类是提纲线索性的文本，是马克思对自己思路的不断整理。在手稿中，这三类文本在理论内容上混杂存在、在写作时间上交替进行，给手稿的编排和解读制造了极大的困难。过去的手稿研究往往没有将这三类文本区分开来加以对待，导致了“1861—1863 年手稿”一直被当作一部内容庞杂、逻辑隐晦的不成熟手稿。在面对原始顺序的文本时，复杂的文本结构就成为解读“1861—1863 年手稿”时必须应对的一个技术性障碍。从手稿文本的原始状况来看，马克思在开始写作“1861—1863 年手稿”时已经有了相对成型的创作规划和理论构想（第 I—V 笔记本、第 XVI—XVII 笔记本）；但是这些规划和构想在手稿的写作过程中遇到了实际的困难，导致他不断地重新整

理思路（第 XI—XV 笔记本、第 XVII—XVIII 笔记本）；经过长时间的反复整理之后，马克思修订完善了原有的提纲并继续进行付排稿的写作（第 XVIII—XXIII 笔记本）。相对棘手的是，在上述每个创作阶段的手稿中都同时存在着正面阐述性的文本、历史评述性的文本和提纲线索性的文本，难以将它们完全剥离开来加以单独的研究。

由于“1861—1863 年手稿”特殊的文本结构，清理“1861—1863 年手稿”混杂的文本内容时首先需要确定马克思在写作手稿初期所拥有的思路，接着还要寻找上述思路遇到了怎样的困难，最后才能解释马克思如何克服了遇到的困难并修订了写作提纲。这样，解读“1861—1863 年手稿”就遇到了第二重困境，也就是如何理解马克思在写作手稿时所运用的理论框架。“1861—1863 年手稿”的标题是“资本一般”，那么“资本一般”应当就代表了马克思在手稿中所运用的理论框架。然而，过去的手稿研究大多没有这样做，因为“资本一般”概念往往被当作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过程中的一个不成熟表述。例如，德国学者容尼克尔和桑德尔在评论“1861—1863 年手稿”时就认为，“资本一般”是马克思“根据认识论的考虑提出来的，即认为应把资本一般和资本的‘现实’严格区分开来……在资本的‘现实’运动中，资本的本质表现为相反的东西”，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是与逐步克服‘资本一般’的概念联结在一起的”，“1861—1863 年手稿”所呈现的就是马克思如何通过回顾理论史“逐步克服资本一般和资本的‘现实’运动之间的严格区分”①。这种观点是基于经典教科书体系的合理推论，基本上代表了 20 世纪 80、90 年代理论界对“资本一般”概念的共同判断。如果上述推论都成立的话，那么“资本一般”概念就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过程中所采用的一个权宜之计，一旦我们掌握了马克思更具唯物主义色彩的认识论方法（也就是《资本论》中所运用的方法），“资本一般”概念就不再具有特别的研究价值。正因如此，研究者在解读“1861—1863 年手稿”时往往刻意地将“资本一般”概念排除在研究视域之外，专门去寻找手稿中符合唯物主义的表述。

然而，参照“1861—1863 年手稿”中关于“资本一般”的具体讨论，理论界此前关于“资本一般”概念的判断可能是不符合马克思原意

① 尤·容尼克尔，C. 桑德尔. 国际版上新发表的 1861—1863 年手稿//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 6 卷.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188.

的。如果“资本一般”概念只是一个权宜之计，那么在手稿中应当能够看到马克思反思或放弃这一概念的相关叙述；但从“1861—1863 年手稿”中找不出这样的痕迹，恰恰相反，马克思始终在强调“资本一般”概念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作用。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采用的叙述结构与“1861—1863 年手稿”中的“资本一般”提纲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两者之间的关联更体现为同一种批判思路的延续，而并非一种方法对另一种方法的替代。随之而来的就是解读“1861—1863 年手稿”的第三重困境，即如何客观地评估“资本一般”概念的逻辑功能和理论内容。直观地看，“资本一般”这样的提法显然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如果沿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路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那么马克思的理论工作就应当是直接指出资产阶级社会中“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并在此基础上批判那些试图从观念出发来变革现实的“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①。令人困惑的是，马克思没有直接这样做，而是采用了一个具有黑格尔辩证法色彩的“资本一般”来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开篇。甚至有学者据此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在 19 世纪 60 年代初出现了倒退，不得不借助制造现实与本质的对立来叙述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因此，在解读“1861—1863 年手稿”的文本内容之前，需要预先清理马克思运用“资本一般”概念的具体情况，以及“资本一般”概念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具体关联。

以 1858 年 6 月为界，马克思对“资本一般”概念的运用可以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在“1857—1858 年手稿”中，“资本一般”只是一个偶尔出现的概念；在 1858 年 6 月之后，马克思计划以“六册结构”出版他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资本一般”成为这个计划中第一册第一篇的总标题，马克思在“第一分册”和“1861—1863 年手稿”中基本上完成了对“资本一般”部分的完整论述。如果单从“1857—1858 年手稿”的内容来看，“资本一般”概念确实存在过于思辨的特点。在“1857—1858 年手稿”第 II 笔记本的第 18 页和第 22—23 页，马克思拟订了两个提纲；在这两个提纲里，马克思表达了用“一般性（或资本的一般概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2 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13.

念)”“特殊性”“个别性（或资本作为货币）”三个环节来阐述资本理论的想法。这三个环节后来经常被用来对应《资本论》的三卷，即资本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总过程（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而“资本一般”概念被认为代表了资本的“一般性”环节。如果上述观点成立的话，那么“资本一般”概念严格来讲就不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概念，它以一种抽象的“一般性”作为资本理论的前提，却没有具体解释如何从社会生产过程中得出这种一般性。

在“1857—1858 年手稿”之后，马克思对“资本一般”还有一个漫长的探索期。马克思在 1858 年初把“资本一般”确立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起点，同年 6 月马克思中止了“1857—1858 年手稿”（即编号为 A 的七个笔记本）的写作，另起了两个笔记本（编号为 B 和 C）来写作这部名为“资本一般”的著作。由于出版期限的迫近，马克思计划将“资本一般”分为两册出版，其中笔记本 B 和 C 完成的是第一分册的全部内容以及第二分册的开头，1859 年出版的“第一分册”就是以这两个笔记本为底稿完成的。“第一分册”出版之后，马克思 1859—1863 年持续修订纲要、整理手稿，为第二分册的写作做准备，留下了三个关于“资本章”的提纲（两个写在编号为 B″的笔记本上、一个写在单独的小册子里）、一本“引文笔记”（内容是对此前所有经济学手稿的分类索引）和一个用于信息摘录的“厚笔记本”。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马克思在 1861 年夏天开始另起了一个笔记本序列来写作“资本一般”的第二部分，也就是“1861—1863 年手稿”的二十三个笔记本。马克思将此系列笔记本的标题定为“政治经济学批判　资本一般”，并在手稿写作中不断地调整写作提纲。

表 2　　“资本一般”文本群的创作时间

	第一阶段 1857 年 7 月— 1858 年 5 月	第二阶段		
		1858 年 6 月— 1859 年 1 月	1859 年 2 月— 1861 年 8 月	1861 年 8 月— 1863 年 6 月
笔记本 M	第 1—22 页	第 23—33 页		
	“导言”	“七个笔记本的索引”		
笔记本 A	I—VII 序列笔记本		笔记本 VII 第 63a—192 页	笔记本 VII 第 193—277 页
	“1857—1858 年手稿”		[资料摘抄]	

续前表

	第一阶段 1857年7月— 1858年5月	第二阶段		
		1858年6月— 1859年1月	1859年2月— 1861年8月	1861年8月— 1863年6月
笔记本B		笔记本B′、笔记本B″前20页 [资本一般草稿片段]	笔记本B″第21—36页 “引文笔记索引”“我自己的笔记本的提要”	
笔记本C		遗失 [资本一般草稿]		
第一分册		已出版 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一分册		
引文笔记			单独的92页笔记 [经济学手稿的系统回顾]	
计划草稿			单独的16页笔记 “资本章计划草稿”	
1861—1863年手稿				I—XXIII序列笔记本 “资本一般”[第二分册]
补充笔记				A—H序列笔记本 [资料摘抄]

因此，1858年6月—1863年6月实际上构成了一个与“1857—1858年手稿”相对独立的创作期，马克思在这五年间集中完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计划”中第一册的第一篇“资本一般”；“1861—1863年手稿”是这个创作期的收官之作，同时也标志着“资本一般”理论的真正完成。在这个创作期中，最为重要的是“1861—1863年手稿”与“第一分册”，将这两部分结合起来一起看待才能呈现“资本一般”概念的整体结构。1858年，马克思在给拉萨尔的信中曾提示道，“第一篇《资本一般》很可能一下子就占两个分册……这里正是叙述政治经济学的最抽象的部分，写得过于简短，读者不易理解”，而且“这两个分册

必须同时出版”①。马克思后来只出版了其中的“第一分册”，而没有出版的第二分册实际上就是“1861—1863 年手稿”。结合马克思的书信可以推测，马克思在 1858 年之后再次使用“资本一般”概念时已经完成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并在“第一分册”和“1861—1863 年手稿”的写作过程中将其确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这个方法的制定……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②。马克思十分重视“资本一般”理论的完整性，而且它“第一次科学地表述了关于社会关系的重要观点”③，意味着这部以“资本一般”为起点的著作包含着马克思从未公开表述过的理论成果。因此，对这一时期的文献进行研究时，应当将“第一分册”和“1861—1863 年手稿”当作同一部著作的上下篇以发现马克思的新见解，它们共同构成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一般”概念的完整阐述。将“资本一般”当作一个不成熟的非唯物主义表述是一种误解，产生这种误解的主要原因是以往理论界对于“资本一般”概念的研究主要依据“1857—1858 年手稿”进行，往往采用“一般性—特殊性—个别性”的形式比附来推测“资本一般”概念的理论内涵。这样做的弊端十分明显：一方面，这种观点难以获得足够的文献支持，长久以来都难以形成有效的理论共识；另一方面，这种观点人为地设定了“本质”和“现象”的对立，将“资本一般”概念设定为一个直接指认本质的、带有思辨哲学残余的独断论概念，制造了马克思思想水准的倒退。在“1857—1858 年手稿”的研究中，已经有学者关注到了“资本一般”概念与上述思辨三段论之间的差别，以及马克思对“资本一般”概念的发展。④但是，由于马克思对“资本一般”概念的完整论述是在“第一分册”和“1861—1863 年手稿”当中完成的，以“1857—1858 年手稿”为底本必然无法展现“资本一般”概念的真正内涵。

综上所述，解读“1861—1863 年手稿”的困难在于其复杂的文本结构和晦暗的逻辑线索，而破解这种困难的出路就在于重新发现马克思

---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8.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3.

③ 同①167.

④ 顾海良. 试论“资本一般”与“许多资本”//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 5 卷.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202-214.

的“资本一般”理论。对于“1861—1863 年手稿”的研究而言，最紧要的工作不是将它与“1857—1858 年手稿”或《资本论》进行具体观点的对比，而是结合 1858 年 6 月—1863 年 6 月的全部经济学文献来重新发现“资本一般”理论的具体内容和逻辑功能。

三、“资本一般”与“1861—1863 年手稿”

根据 MEGA[2]和中文二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收录的“1861—1863 年手稿”，马克思写作这部手稿的直接目的是完成“资本一般”理论。“1861—1863 年手稿”的内容虽然看起来较为杂乱，但马克思的写作过程始终没有脱离他为“资本一般”理论所制订的提纲，而且最终完成了提纲中的大部分内容。“资本一般”不仅是“1861—1863 年手稿”拟订的总标题，同时也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计划”的开篇。1858 年 6 月到 1863 年 6 月，马克思致力于分两册完成这部题为“资本一般”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以此来批评当时流行的各种政治经济学观点。“1861—1863 年手稿”是“资本一般”系列文本的收官之作，同时也标志着“资本一般”创作期的完结。

在解读“1861—1863 年手稿”时，“资本一般”是最为明显同时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条逻辑线索。通过“资本一般”的若干提纲和草稿，“1861—1863 年手稿”的写作过程和理论结构可以很直观地被指认出来。根据马克思的提示，“资本一般”部分包括“商品”“货币”“资本”三章，其中前两章在“第一分册”中先行出版。“第一分册”出版后，马克思为第三章“资本”拟订了提纲：

I. 资本的生产过程
(1) 资本转化为资本
(α) 过渡
(β) 资本①和劳动能力的交换
(γ) 劳动过程
(δ) 价值增殖过程
(2) 绝对剩余价值
(3) 相对剩余价值

① 在手稿中写的是“商品”，这里是《全集》编者根据所注手稿页码上的内容订正的。

（α）大量人的协作
（β）分工
（γ）机器
（4）原始积累
（5）雇佣劳动和资本
II. 资本的流通过程
III. 资本和利润

“1861—1863 年手稿”的第 I—V 笔记本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提纲来写的。在“资本一般”提纲的基础上，“1861—1863 年手稿”的逻辑框架可以很容易地辨认出来。“1861—1863 年手稿”的内容可以被分为两部分，第 I—V、XVI—XVII、XIX—XXIII 笔记本的内容是“资本一般”理论第三个环节（即资本形式的价值）的正面阐述，而第 VI—XV、XVIII 笔记本的内容是在此基础上对各种经济学理论的历史述评。在“1861—1863 年手稿”中的正面阐述部分，马克思完成了“资本章”的三个环节，即“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和利润”。在历史评述的部分，马克思首先主要摘录和评述了三个版本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三个版本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以及其他一些零散的相关著作，完成了对斯密和李嘉图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之后，马克思又摘录了马尔萨斯以及李嘉图学派开始解体后社会主义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的一些著作，完成了对空想社会主义和庸俗经济学的双重批判。

结合“第一分册”和“1861—1863 年手稿”的内容可以证明，“资本一般”理论的逻辑框架就是运用辩证法对价值概念的逻辑演绎，表现为价值概念克服自身的抽象性、获得全部具体规定的辩证发展过程，包括商品、货币和资本三个环节。“商品”是“资本一般”理论的逻辑起点，价值在商品中具有最抽象的规定性，但同时也是最无规定性的抽象，即体现在特殊使用价值中的一般劳动时间。“货币”是“资本一般”理论的逻辑中项，价值在货币形式中克服了无规定的抽象性并获得了新的规定性，成为通过流通来实现增殖的物化劳动（即金银等贵金属）；价值在货币的形式上实现了自为的存在，不过它仍然是抽象的，还需要以人们对货币的普遍认可为前提。“资本”是“资本一般”理论的逻辑终点，价值在资本形式中克服了自己的抽象性，成为不依赖于人的自在

自为的独立主体。在资本的形式中，价值既是自己的前提又是自己的结果：资本存在的前提是雇佣劳动制度，雇佣劳动制度的前提则是生产资料与社会个体的分离，而生产资料与社会个体的分离本身又是资本生产的结果。因此，价值在资本的形式中获得了自我创造、自我更新的能力，而个人基于自由意志的行动只不过是资本生产的中介和工具，价值由此获得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外表。

不过，在呈现了“1861—1863 年手稿”的逻辑结构之后，对这部手稿的文本解读才会遇到其真正的困难，即如何看待马克思的“资本一般”理论。“资本一般”的提纲是清晰的，令人疑惑之处在于马克思为什么要以这样一个概念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开端。除此之外，由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运用的叙述方法与“资本一般”是基本一致的，这意味着他后来也没有放弃在“资本一般”部分所得到的理论成果。随之而来的另一个困惑就是：“资本一般”这样一个看起来带有思辨色彩的“先验结构”，为什么可以用来批判政治经济学呢？

“资本一般”概念的直接批判对象是 18、19 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因此在呈现“资本一般”概念的批判功能之前，首先需要重新梳理政治经济学中的资本理论在何种意义上会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对象。一般情况下，资本的表现形式是一定量的货币，而将资本和一般货币区分开来的特征是它可以带来新的货币。从斯密开始，关于资本的研究就一直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议题；在李嘉图之后，经济学家开始进一步关注如何计算或确定资本的一般利润率。为了确定资本的一般利润率，经济学家进行了多种多样的理论探索，由此也产生了激烈的学术争论。随着经济危机的加剧和工人运动的兴起，相关争论在 19 世纪 40 年代达到顶峰，许多的社会活动家也参与其中，出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学派对正统经济学的猛烈冲击。尽管当时参与争论的流派各执一词，但是经济学家们却分享了一种共识，认为经济危机的发生是因为现实的经济运行背离了资本的一般利润率。在当时的经济学家看来，资本拥有天然的或正当的一般利润率，但错误的经济政策会导致利润率过高或过低，从而进一步导致经济危机的发生。也就是说，如果能够发现一般利润率的计算方法，并让资本的一般利润率正常地实现，那么经济危机就不会发生。马克思显然不会接受政治经济学通过理论消除危机的思路，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的发生并不是因为经济的和谐秩序“被经济学家们的错误理论

搞乱了”，恰恰相反，资产阶级社会的“这种不和谐是真实的”，不可能通过经济理论或者经济政策的方式彻底消除。①

然而，仅仅凭借单纯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不足以彻底批判英国政治经济学的上述观点。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类似，政治经济学也从物质动因出发来解释“资本”，一般利润率的观念是从现实的生产过程中抽象出来的。对于参与经济活动的个体而言，商品的所有者需要参照既定的一般利润率来为自己的商品定价，以保证自己的商品能够顺利交换出去并获得收益。而且，无论个体以何种动机、何种身份参与经济活动，都必然会遇到一般利润率的客观外在限制。除了从物质动因出发之外，政治经济学与历史唯物主义在方法论上也会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特别是古典经济学家和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也与马克思一样把资本主义生产视为生产的特殊形式。政治经济学以一般利润率的经验事实为研究对象，把利润视为“资本”这种特殊商品的价格，并试图从一般的商品生产中抽象出交换价值的计算方法，从而以此确定资本的价值——一般利润率。19 世纪英国的经济学家大体上都认同上述带有唯物主义色彩的思路，经济学内部的分歧仅仅在于如何对商品生产的一般条件进行理论抽象，由此产生了多种相互对立的价值理论。由于政治经济学同样采用了唯物主义的研究立场，一般的唯物主义批判方法在批判政治经济学的时候就难以奏效了：如果直接从社会生产的物质动机出发进行抽象，那么必然会同样陷入政治经济学业已存在的争论之中；如果在理论上直接指认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性，那又会陷入形而上学独断论的泥淖。

马克思最终选择了用“资本一般”来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开端，意味着他在对“资本一般”的叙述过程中已经克服了历史唯物主义在批判政治经济学时所遇到的困难。在用“资本一般”还原了“1861—1863 年手稿”的原始逻辑结构之后，对“1861—1863 年手稿”的文本解读还要解决另一个问题，即解释马克思如何运用“资本一般”理论完成了对政治经济学的唯物主义批判。由于“1861—1863 年手稿”只包含了“资本一般”的第三个环节，因此还需要将前两个环节的相关文本也纳入“资本一般”的议题下整体考虑，即“第一分册”以及未收入“第一分册”的笔记本 B′和 B″（见表 3）。总而言之，“1861—1863 年手稿”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

本身是“资本一般”理论的后半部分，对于这部手稿的恰当解读只有在“资本一般”理论的整体框架下才可能实现。

表 3　　“资本一般”文本群的三种文本类型

	第一阶段 1857 年 7 月— 1858 年 5 月	第二阶段		
		1858 年 6 月— 1859 年 1 月	1859 年 2 月— 1861 年 8 月	1861 年 8 月— 1863 年 6 月
正面阐述		笔记本 B′、B″、C “第一分册”		“1861—1863 年手稿” 笔记本 I—XXIII
思路整理	笔记本 M：第 1—22 页 “1857—1858 年手稿”	笔记本 M：第 23—33 页	“引文笔记” 笔记本 B″［引文笔记索引］ “我自己的笔记本的提要” “资本章计划草稿”	
材料摘抄			笔记本 A・VII：第 63—192 页	笔记本 A・VII：第 193—277 页 “补充笔记” A—H

第一章 “资本一般”概念的提出过程

“资本一般”，是马克思19世纪50年代末为批判当时的经济学说而提出的新概念。在此之前，马克思已经进行了多年的经济学研究，并在经济学研究的支持下对德国和法国的社会思潮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批判，马克思将这种经济学视角称为“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①，即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然而在抵达伦敦之后，历史唯物主义与古典经济学的亲缘关系逐渐显现出来，导致它既不足以应对当时英国的经济学争论，也不足以彻底超越英国社会主义者的社会改革方案。马克思因此开始认真地思考自己的经济学观点与古典经济学的差别，进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全新的“资本一般”概念。在1861—1863年间写下的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以“资本一般”为核心阐发了自己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观点，完成了“资本一般”理论的逻辑框架。

第一节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转向

人类的普遍自由和解放是马克思一生追求的理想目标，但是达成这一目标并不容易，寻找实现自由和解放的现实路径构成了马克思理论探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12.

索的重要议题。在德国思辨哲学的传统中，自由就是人自主（autonomy）或自决（self-determination）的能力；相应地，人的解放也就是消除自然欲望和既有观念对人的蒙蔽，使人成为只遵循自我规定的真正的人。在如何实现自由的议题上，德国的思辨哲学和政治实践都将法和国家当作实现自由的具体形式，个体服从法和国家也就是服从人自己的本性，一部良好的民法典是人实现自由本性的现实途径。然而在经过物质利益的思考后，马克思发现法和国家实现的只是有产者的自主和自决，无产阶级在现代社会中处在非人境遇之中。马克思因此转向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试图揭露法和国家的虚假意识形态及其对无产阶级的压迫。在对人类自由和解放的不断追问中，马克思不仅实现了对国家哲学和法哲学的批判，后来也完成了对英国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一、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开端

从18世纪开始，自由成为欧洲各国知识界的共同追求，但是各国对于自由的理解各不相同。由于国家分裂并遭到入侵，德国知识分子对自由的理解往往与国家统一和民族自决的任务联系在一起，特别强调人的自主和自决。德国传统中的自由意味着不仅要免除自然对人的压迫，更要免除他人意志对个体的强制，并尤其关注历史和现实的维度。德国的思想家普遍相信，理性基础上的法和国家是人实现自我规定的伦理实体，这种传统深刻地影响了青年马克思对于自由的理解。不过，在离开《莱茵报》之后，马克思不再认同通过法和国家来实现自由的“德国道路”，并转向了经济学研究来寻找人实现自由的现实可能。

在哲学上，德国的自由道路始终与民族国家的独立和统一紧密关联，体现为通过理性立法来实现对自主和自决的追求，并以此来批评英国和法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德国传统中对自由的追求极力地避免英、法的抽象讨论方式，逐步形成了通过立法和建国来实现自由的国家主义路线。康德用他的先天演绎证明了，尽管对象世界是自在的，但它并不会限制人的自由，人仍然可以运用理性安排自己的生活；康德在政治上主张运用实践理性来确定人作为人应当普遍拥有的法权，并进一步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而黑格尔则进一步证明了，理性本身实现的不仅是自

为主体的主观设计，而且也是对客体的客观认识；人有能力用理性来发现法和国家的必然形式，这种具有客观必然性的法和国家的实现同时也就是人的自我规定的实现，人将在法和国家的生活中获得真正的自由。因此，法学、哲学和历史学在19世纪的德国一般被看作同一个学科，象征着人类理性所蕴含的解放自身的力量。继承了古罗马法的思想资源，德国拥有悠久的法学教育和研究的传统。经过普芬道夫、莱布尼茨一直到黑格尔的理论探索，德国的古典法学在理论上开辟出了一条与英、法迥异的政治现代化道路。德国的现代化思路放弃了英国自然法传统对幸福的追求，转而以自由为现代政治秩序的核心理念①；在自由的实现方法上也反对法国暴力革命的道路，主张通过法和国家的自上而下的渐进改革来保障自由的逐步实现。此外，德国的法学传统所关注的自由是人的自然法权，与重视社会秩序的英国自然法传统和重视政治启蒙的法国自然法传统有很大的差别。当现实与自由相背离时，实践的法学需要通过哲学和历史的方法②去重新界定自由人格得以实现的条件，进而在理论上将这些条件以法权的形式确定下来，并最终以国家的形式来保证法权在现实中的强制性。

对于德国的知识界而言，法学是自由人格实现的理论中介，关于法权的抽象演绎在理论上优先于现实的法律条文。马克思在大学时期接受

---

① 康德在晚年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中就明确地表达了对幸福主义的批评，认为所有专注于幸福概念的个体伦理学理论和社会伦理学理论只能承认失败。因为我们只有拒绝各种实质性目标以及各种质料性目标，并且使我们自身受到形式性判准和消极性判准的束缚，才能达到普遍有效的目标。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对幸福和自由进行了更加具有思辨色彩的区分。

② 1806年德意志各邦宣布废除神圣罗马帝国的法律之后，如何为德意志联邦制定一部统一的法律成为德国知识界最主要的思想议题。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黑格尔主义法哲学和历史法学派成为德国法学的中坚力量，同时也是马克思大学期间几乎所有的教学内容。黑格尔的辩证法将观念论发展到了极其精妙的境界：康德在自然界之外为人类开辟了自由的领地，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则完成了人类自由必然实现的观念论证明；黑格尔的辩证法让当时的知识界相信，人类可以通过纯粹理性和逻辑的方法去认识绝对的本质，人类社会的本质也可以通过理性和逻辑进行自我验证，而不拘泥于各种纷繁的表象。历史法学派的方法则是从历史所给定的法律题材（罗马法的原始篇章）出发，运用语言的分析和文本的注释追根溯源，结合既有的注释和评注对其进行彻底研究，并注重实践的面向，对这些素材进行哲学化处理，使其达到逻辑上的一致，并进一步抽象为逻辑自洽的原理体系，产生以形式伦理学为前提的精神上的关联。因此，对于当时的法学研究而言，法学、哲学和历史学的方法实际上是同一种方法，即思辨的方法。

了这样的法学教育，并明显受到了体系主义①传统的浸染。他将《学说汇纂》的前两章翻译成了德文，并着手撰写一部宏大的法学著作，试图以完善法学的形上学基础来解决当时的法学困境。② 这部被马克思称为“倒霉的作品”的法学著作没有保存下来，现在只能从马克思给父亲的一封信中了解它的篇章结构。③ 如果仅根据目录来看，马克思的法学著作确实乏善可陈④，马克思自己也承认了其中的欠缺，并意识到对形式法或概念法进行抽象演绎的“努力都是不恰当的”⑤，此后“只从事一些实证⑥的研究”⑦。这次学术尝试的失败成为马克思加入青年黑格尔派的契机，因为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和追随者也在考虑精神和法如何在国家与社会中现实地发生作用。青年黑格尔派的出现，主要是因为黑格尔法哲学的封闭性导致它无法面向现实和未来，客观意志的自在和自为最终都只能指向其自身；如果要让法哲学指明通向现实和未来的道路，那就必然要将客观意志再次主观化，变成一种积极主动的意志。与青年黑格尔派的立场相似，马克思在法学中的“实证”态度同样要求理性突破

---

① “体系主义者”是萨维尼在《论占有》一书中对德国法学研究中学院派的称呼，学院派体系法学的传统可以追溯到 14 世纪的法学家巴托鲁斯（Bartolus de Saxoferrato），16 世纪从布尔日（Bourges）大学发端，一直延续到马克思生活的 19 世纪。在德国，几乎所有重要的法学家都撰写过专门的著作，试图将法学体系化，例如普芬道夫的《自然法与万民法》、胡果的《现代罗马法阶梯》、蒂堡的《〈学说汇纂〉法体系》、甘斯的《现代罗马法体系》和萨维尼的《罗马法体系》等，其中甘斯和萨维尼都是马克思在柏林大学时的授课教师。他们都延续着古老的经院方法，力图在前作——特别是《学说汇纂》——的基础上运用古典原则构建具有更高程度的一致性、一般性和平衡性的合理化的民法体系。

② 马克思没有说明当时的困境是什么，结合他当时上课的情况来看，当时马克思遇到的理论问题可能是萨维尼和甘斯之间关于财产权问题的争论。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0.

④ 马克思的篇章安排仍然遵循了优士丁尼和盖尤斯的罗马法形式，并延续了分叉法和三分法。对于这一问题的持续探讨必定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马克思在大学时期的思想演变，本书无力论及，相关内容可以参阅凯里的研究成果。

⑤ 同③13-14.

⑥ 此处《全集》中文一版的引文为“正面的研究”。此外，在“给父亲的信”的中文译本中，jus positivum 被翻译为“成文法”。在法学语境中，positive law 有多种翻译方式，总体而言指的是与自然法（natural law）相对的由人类制定的法律。natural law 与 positive law 之间的差别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诠释，对理解马克思的思想而言也尤为重要。综合马克思在信中的内容，positive 指称的不仅是与应然法对应的现有法，而且还表征着马克思后来所采用的实证态度，因此本书统一译作“实证法”。

⑦ 同③16.

抽象演绎的局限，在现实中保持对各种既有观念和现象的批判。不过，在这种“实证”思路中，普遍理性本身仍然高于现实；普遍理性与现实的差别及其对现实的批判，是现实世界发生改变的真正动力。

依据德国的学术传统和法学视角，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对历史法学派的法律实践进行了批评，反对用民族、历史或传统等非理性的因素来为现实辩护，并追求普遍理性在社会中的真正实现。历史主义①法学是当时德国最主要的法学流派，其领军人物萨维尼主导了德国18世纪中期的法律制定工作，同时也是马克思大学时期最重要的教师之一。历史法学派基本立场深受民族主义②和浪漫主义③的影响，认为法是民

---

① 历史主义是对18世纪之前的理性主义和自然法哲学的非历史性的批判与纠正。历史主义在文学方面表现为浪漫主义，在历史学方面表现为客观主义史学，在经济学领域表现为历史学派（个人幸福的实现有赖于民族的政治权利），在法学领域则表现为历史法学派。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是历史主义方法的开创者，也是浪漫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赫尔德认为，不仅人类历史和自然界的历史有着本质的不同，而且不同民族之间的历史也存在着差别，同一民族的成员具有共同的心理特征。赫尔德强调民族历史的特殊性，世界上不存在绝对客观的真理标准，必须深入其中地了解历史才能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赫尔德为历史的发展赋予了进步的意义，并强调各民族在各时代的文化都有各自独特的价值。历史主义对社会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史主义法学主导了德国19世纪上半叶的法律改革，历史主义经济学曾统治世界经济学研究长达数十年。

② 德国的民族主义兴起于18世纪后半叶，直接诱因是法国入侵并占领了德意志联邦的大部分地区，最为迫切的目标是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德意志民族长期处于分裂的状态，法国对德国的占领减轻了德意志地区分裂的状况，法国在德国的军事暴行同时也激起了德国国内强大的反抗侵略、向往统一的民族主义思潮。在此期间，反对、批判和超越法国启蒙理性的思潮开始逐渐转化为德国思想界的共识，重视传统、信仰和情感的德意志精神被看作足以超越启蒙理性的民族特性。法国撤军后，为了团结原神圣罗马帝国的成员，奥地利和普鲁士主持成立了德意志议会，德国成为一个极为松散的邦联国家。欧洲各国为了维持力量的均衡对德国的实际统一百般阻挠，普、奥两国为了争夺在德意志议会的领导权屡生龃龉，难以达成一致。在复杂的政治局势下，通过德意志议会制定全国性的法律，成为最为现实的统一路线。然而德意志各邦对于未来法律的选择存在分歧，除普、奥以外的德意志其他各邦也在犹豫是否要分别制定法律，或者直接接受《法国民法典》《普鲁士一般邦法》《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经过反复的争论，历史法学派击败了各种分裂势力，并排除了法国启蒙理性传统对德国法学的影响，德意志各邦开始共同筹备制定具有德国特色的民法典。

③ 浪漫主义主要是基于情感和信仰而对启蒙理性的回应与修正。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和自然科学的勃兴，对普遍理性的追求成为整个欧洲的一股强劲风潮；普遍理性强力地改造着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其抽象性和机械性的弊端也日益显露。与之相对，从法国萌生的浪漫主义强调人类情感和意志的作用，可以看作对启蒙理性的必要修正。浪漫主义传到德国之后演变为文艺领域的狂飙运动，深远地影响了德国的哲学、文学和艺术。拿破仑入侵德意志之后，浪漫主义迅速蜕变为德意志民族主义，哺育了一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艺术家。

族精神的体现，“法存活于民族的意识之中”①，拒斥来自法国的启蒙理性和自然法传统；在他们看来，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不同，不存在适用于一切时间和地点的统一的自然法，每个民族和社会都有自己特定的历史生长环境，因而主张以历史为法律的主要依据，将法律以及其他制度看作历史的具体反映，并特别重视民族传统的传承、史料典籍的编纂和法律体系的构建。德国当时法律——包括“书报检查令”和“林木盗窃法案”——的制定都是在历史法学派的主持下进行的，这些历史主义的“实证法”遭到了马克思基于普遍理性的猛烈批判。

在普遍理性的视角下，人与动物法的差别就在于人可以超出自身的自然本能和给定条件而进行普遍的理性思考。历史主义将历史和传统当作法源（Fontes iuris/source of law）来对法律进行论证，实际上是让人服从于自己直接的既有生存条件，在法律上把人再次降低到动物的程度；在这样的法律条文中，“只有**动物的本性**才是**无可怀疑的东西**”②。历史法学让人关注现实、关注历史，是为了让人放弃理性的批判和思考：“消除实证的事物中的理性假象，是为了承认**没有**理性假象的实证的事物”；“摘掉锁链上的**虚假的花朵**，是为了戴上没有花朵的**真正锁链**”③。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历史主义难免沦为对威权政体的无条件谄媚，“**凡是存在的事物**他都认为是**权威**，而每一个权威又都被他拿来当作一种**根据**”④。因此，历史法学派演绎的法学理论和制定的法律条文在马克思看来都只是“把已有的法表述出来并把它们提升为普遍的东西”⑤，把现实法权建立在非社会的自然状态和非道德的自利个人的基础之上，把国家建立在自然冲动和个人意志的基础之上。按照马克思此时的看法，应该用现代“更加理想和更加深刻的观点”来从整体上将国家看作“实现法律的、伦理的、政治的自由”的伟大有机体⑥，在这样的国家里，“个别公民服从国家的法律也就是服从他自己的理性即人类

---

① 萨维尼. 历史法学派的基本思想. 郑永流，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6.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3.

③ 同②232.

④ 同②231.

⑤ 同②250.

⑥ 《全集》中文二版将“伟大有机体”译为“庞大的机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28）。

理性的自然规律”[①]。由此可见，马克思此时仍然延续了德国哲学的学术传统，将现实与普遍理性之间的矛盾当作改造世界的动力，认为只要通过批判使普遍理性得到认同，或使以普遍理性为标准制定的法律成为社会行为的准则，人的全面解放就有可能实现。

在被迫离开《莱茵报》编辑部之后，马克思开始认识到以普遍理性为中介不仅无法实现普遍的自由，反而还会导致普遍利益的全面丧失，即无产阶级的产生。“**丧失财产的**人们和**直接**劳动的即具体劳动的**等级**，与其说是市民社会中的一个等级，还不如说是市民社会各集团赖以安身和活动的基础”[②]，市民社会中通过理性立法来保障的法权只能实现有产阶级的自由，而这种自由的基础是无产阶级的普遍不自由。为了在理论上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马克思写下了他的第一部著作，即“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③]。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性的分析”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据 MEGA^2 编者的考证，马克思在结束对第 302 节的批判之后停止了写作，中断之后的写作从第 XXIII 页对第 303 节的批判开始重新进行。通过中断前后的内容对比，可以明显地看出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思路的演进。

最初，马克思将黑格尔的法哲学和历史法学派当作同一种观点的两种形态来进行批判：历史法学派“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说明今天的卑鄙行为是合法的……历史对这一学派也只是显示了自己的后背”[④]；黑格尔用更加抽象、更加思辨的方式重复了历史法学派的谬误，非批判地接受了旧制度的“动物”法。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几乎是全盘接受了德意志原来的政治体制，其行政权理论“大部分都可以原封不动地载入普鲁士邦法”[⑤]。为了完成政治体制的论证，黑格尔一方面设定了一个抽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28.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00-101.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12.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 此处的 a posteriori 至少有三种译法。首先，可以译作“后背”，来自《旧约全书·出埃及记》33：20/23。“‘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耶和华说，‘看哪，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其次，可以译作“后验”，表示对已有经验或已有观念的理论确认，与先验（a priori）相对应。最后，可以译作“后天”，既与前文的前天、今天对应，也指称历史法学派经验主义的后天假设，即对现实的非反思态度。

⑤ 同②57.

象而超验的“主权”国家，另一方面延续了旧时代的等级制度。马克思批评道，“**等级**……把人变成直接与其规定性相一致的动物”①，旧时代的法是动物的法，基于等级的法是人类动物学。因此，黑格尔和历史法学派都犯了同样的错误，将“动物的法”强加给人：历史法学派是将现实的表象理解为观念，又以这种观念作为解释现实的依据；黑格尔的法哲学只不过是对这些观念进行了思辨化的处理，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

完成“克罗茨纳赫笔记”之后，马克思在批判第303节时指出了产生这种“动物的法”的现实根源：

> 我们在这里找到了谜底。“**私人等级**在立法权的等级要素中获得**政治意义**。”显然，**私人等级**是按照它现在的样子，即按照它**在市民社会中的构成**获得这种意义的……等级要素是**私人等级**即非政治等级的**政治意义**，这是定义中的矛盾。……**私人等级**并没有变成**政治等级**，而是作为**私人等级**它获得自己的政治效能和政治意义。它不是无条件地具有政治效能和政治意义。它的政治效能和政治意义是**作为私人等级的私人等级所具有的政治效能和政治意义**。因此，私人等级只有按照**市民社会的等级差别**才能进入政治领域。市民社会的**等级差别**成了政治差别。②

在这里，国家的政治秩序不仅不是作为人的人实现其自身本质的场所，反而成为作为私人等级的私人等级将自身外化的领域；在这种情况下，人将无法在国家当中实现自身的普遍本质。因此，现代国家中的人不可能是作为人的人，而只能是作为私人等级的人；法和国家不过是市民社会中的私人等级实现自身的政治形式。自此，马克思不再纠缠于普遍理性在法和国家形式中的实现，转而开始深入地分析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这两个对立范畴的互动结构。马克思开始放弃早年间面对现实时所采用的德国传统法学思路，转而开始讨论现代政治国家中人的本质丧失的必然性。

论证现代社会中人的本质丧失的必然性，标志着马克思系统地放弃了早年间的法学立场，并以“无产阶级”为中介转向了对工业生产的经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02.

② 同①88-90.

济学研究。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①，是人类社会始终的目标和追求。马克思认为，在德国当时没有阶级能够代表人的普遍本质，因此政治领域的角逐只是各个阶级之间特殊利益的争斗。德国这种落后的状况造成了思想界庸俗观点的横行，宗教的、哲学的和历史的理论都在描述人类的理想追求，但这些理论缺乏改变现实的物质力量，反而最终全部沦为对现实间接的理论辩护。马克思把德国的国家哲学、法哲学以及宗教、传统等等称为“副本”，它们都是以思辨或想象的虚幻方式对现代政治国家的不平等现状的解释。通过副本批判，马克思指出了这些意识形态的庸俗性，揭示了德国人在观念上的自我束缚，他们“没有想到**迄今为止的哲学**本身就属于这个世界，而且是这个世界的**补充**，虽然只是观念的**补充**”②。

但是，马克思批判法哲学和国家哲学的目的并不是要求人放弃对人的本质的追求，“这种批判撕碎锁链上那些虚幻的花朵，不是要人依旧戴上没有幻想没有慰藉的锁链，而是要人扔掉它，采摘新鲜的花朵”③。从副本批判到原本批判的过渡过程，也就是寻找现实变革可能性的过程。马克思认为，德国未来的希望在于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和行动。无产阶级虽然由市民社会产生，但是他们已经丧失了一切私有财产，被排除在市民社会之外；无产阶级所遇到的压迫是市民社会普遍的不公正，而不是某一个等级对另一个等级的特殊的不公正。因此，无产阶级本身的解放“不要求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的**权利……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④。无产阶级的出现证明了现代社会普遍的非正义，同时也潜在地蕴含着扬弃这种非正义的可能。以无产阶级为中介，马克思找到了批判现代政治国家及其理论基础的现实路径。对现代政治国家及其观念基础的批判，不仅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其导言的重要理论内容，同时也是马克思后来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理论线索之一。

无产阶级及其革命性是马克思法学批判的最终结论，同时也是马克

---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1.

② 同①10.

③ 同①4.

④ 同①17.

思转向经济学研究的关键中介。对于马克思而言，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① 的解放宣言是真正哲学的全部任务，而无产阶级是真正哲学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的产生“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②。在意识到法哲学和国家哲学的虚幻性之后，马克思放弃了在法和国家领域实现普遍理性的解放路径，无产阶级就成为人类在社会中获得解放的唯一力量。在德国，“无产阶级只是通过兴起的**工业**运动才开始形成”，而且伴随着“社会的**急剧解体**、特别是……中间等级的解体”③，因此，德国当时已有的思想资源——法哲学、国家哲学、教会哲学等等——都无法对无产阶级进行理论的说明。为了证明德国现实的解放道路，马克思必须对无产阶级的产生过程和历史任务重新进行思考，并由此同时开启了英国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思潮的研究。

二、从“无产阶级”到“雇佣劳动”

18 世纪 20 年代，由于普鲁士政府逐渐偏向于保守④，通过议会立法统一德国的道路受阻。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开始引起德国思想界的关注。法国的社会主义原本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它在德国与费尔巴哈的哲学相结合，演变成为批评传统道德、国家和宗教观念的激进思潮，代表了一种自下而上的民族统一路线。从 1843 年开始，社会主义开始成为马克思思考的重要参考坐标系，德国社会主义与法国社会主义的各种观点成为马克思主要的批判对象。通过经济学与法哲学的结合，马克思指出了德国当时所有的法学理论和立法实践——包括社会主义者的各种方案——都只是“本末倒置”的意识形态。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私有财产制度造成了劳动者的绝对贫困，只要立法仍然

---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8.

② 同①17.

③ 同①17.

④ 1819 年 3 月 23 日，奥古斯特·柯采布埃被激进民族主义者卡尔·路德维希·桑德刺杀。这一事件被威廉三世视为“德意志大学生协会”过激的危险举动，成为普鲁士王国敌视民族主义并限制各种社团活动的导火索。“德意志大学生协会”是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坚定的拥护者，在此事件之后，与之相类似的民间组织相继被限制甚至取缔，德国的民族统一运动遭受了重大的打击。柯采布埃曾获得俄国沙皇赐予的贵族称号和田产，他在其写作的剧本和散文中嘲笑了大学生协会会员，因而被会员称为俄国间谍。

围绕私有产权而展开，那么社会问题永远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马克思19世纪40年代经济学研究的成果在《资本与雇佣劳动》一文中得到了完整的阐述。不过，由于尚未形成自己的经济学研究方法，马克思此时的经济学理论主要是批评德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方案时的附带产品，并没有完全超越英国的政治经济学。

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首先，资产阶级社会是一种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社会，是“恢复了的奴隶制”①；其次，资产阶级社会中的道德都是虚伪的说教，其实质是“利益支配一切”的极端利己主义②；最后，资产阶级社会的弊端可以通过有计划地联合与协作而得到消除，新的社会将“最迅速和最圆满地改善人数最多阶级的精神和物质生活”③。总之，法国的社会主义将现代社会问题的根源归结于私有制所导致的不平等，并认为人类可以通过自觉的制度设计和共同协作来消除这些不平等，从而实现理想的社会形式。1839年，费尔巴哈的两部著作《论哲学和基督教》和《黑格尔哲学批判》相继出版，费尔巴哈的人本学与社会主义相结合，迅速在德国哲学界产生了剧烈的化学反应，少数人把控的教会和国家成为被批判的对象，而哲学本身则被寄予了无限的希望。随着青年黑格尔派成员施泰因的著作《现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德国出版，融合了德国古典哲学、法国社会主义以及费尔巴哈人本学的激进青年黑格尔派在德国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他们普遍相信社会主义的组织原则才是德国乃至人类未来唯一合理的组织形式。在青年黑格尔派看来，只有哲学才能把握时代的精神和人类的真正使命，而哲学的任务就在于向人民展现未来社会的景象，“以便人民明了它、理解它，并为之欢欣鼓舞”，从而将人民提升到自觉的程度；哲学和社会主义一时间被视为同一种追求的两种表达，“当代哲学的顶峰必然构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④。

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进程也与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紧密相关。受到鲍威尔等人的影响，马克思在大学期间也加入了青年黑格尔派的行列。马克

---

① 傅立叶选集：第1卷.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17.

② 傅立叶选集：第3卷.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303.

③ 圣西门选集：第3卷.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163.

④ 卡尔·格律恩. 费尔巴哈和社会主义者. 张念东，译.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84(2).

思在《莱茵报》时期贯彻了青年黑格尔派的立场，认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①，而哲学的使命就是让人民意识到新时代的到来并将他们提升到自觉的程度。从 1843 年开始，遇到物质难题的马克思逐渐意识到青年黑格尔派对法哲学和国家哲学的理论批判只是一种对副本的批判，并不会起到实际的作用。到达巴黎之后，完成思想转变的马克思很快就放弃了黑格尔法哲学的写作工作，并有意识地加强了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自觉地将自己与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区分开来。德国的社会主义认为，人类社会中普遍利益的实现只能建立在理性与道德的基础之上，因此哲学在社会变革之中将发挥着先导的作用。而马克思指出，有产者的理性和道德都只能以他们自己的私人利益为出发点，普遍利益的实现只能寄希望于没有私人利益的群体——无产阶级。马克思清算了青年黑格尔派从观念出发改造世界的哲学信仰，转向了直接对生产进行研究的政治经济学，初步分析了无产阶级产生的条件及其历史使命，即资本主导的生产方式和雇佣劳动制度所蕴含的经济结构。马克思为此写了一组笔记，即后人所称的“巴黎笔记”，并在 1845 年与出版商列斯凯（Carl Leske）签订合同，计划出版一部名为《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的两卷本著作，这是马克思第一个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出版规划。

虽然马克思 1845 年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写作计划没有完成，但从同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可以分析出马克思此时主要的经济学观点。与德国的意识形态家们不同，马克思认为，人与动物的差别是生产，“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②。也就是说，人在生活条件的合作生产中才会结成一定的社会组织。随着生产的发展，基于土地共有的原始部落开始解体，私法和私有制同时“从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解体过程中发展起来”③。原始的所有制仅仅涉及不动产（地产），“真正的私有制只是随着动产的出现才开始的”④。随着分工的细化，动产逐渐向资本转化，财产的法权成为阶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20.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19.

③ 同②584.

④ 同②583. 马克思此处以罗马法中的古罗马公民的合法所有权（dominium ex jure Quiritum）作为例证，并认为各国的私法和私有制都是“以罗马法典为基础”。

级划分的主要依据和观念保障。在现代国家私法体系中，拥有立法权的有产阶级在法律上拥有资本的私有权，然而在事实意义上占有和生产社会财富的劳动者却在法律上一无所有。以历史法学派为代表的意识形态家，用形而上学的方法来界定财产法权，将这种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抽象为一般的观念，从而把法律变成了有产者特殊意志的表达，造成了在法律中一无所有的赤贫阶层。劳动者为了获得生活资料不得不为有产阶级工作，从而进一步加剧贫富差距的程度。

《德意志意识形态》以经济学的话语复述了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时得出的结论。法哲学以观念作为法的依据，而观念来自现实的物质生产；如果现实的不合理来自生产领域，那么根据法学理论制定的法只能是对不合理现状的认可。过去的哲学试图对现实进行观念化的解释，将历史的发展呈现为人类道德观念或普遍价值的实现；然而，现实变革的力量只能来自现实本身，人的非批判的观念最终都只能沦为对现实的辩护。因此，对现实的研究必须直接从社会生产的领域进行，而不是从观念的领域进行。

在经济学研究的辅助下，马克思提出人实现自由的中介是“劳动”，而不是“理性”。人通过劳动不断地消除着对象世界的自在性，并将其转化为“为我”的存在。然而，在消灭了自然外在压迫之后，由于货币成为人和人关系的中介，人并未真正获得自由。在私有制条件下，穷人为了生存不得不为富人劳动，结果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财产——特别是劳动条件——的私有制，是导致一部分人无法自由的现实障碍。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劳动消除了自然的外在性，使人类成为真正自在自为的存在。但是在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私有制条件下的劳动创造出一个独立于个体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有产阶级实现了自身的自由，获得了自主和自决的现实能力。但是，无产阶级在社会中成为被抛弃的非人，成为有产阶级实现自由的手段。在评论李斯特的经济理论时，马克思重申了这一观点，认为历史主义的经济学将一部分人贬低为创造财富的物，另一部分人成为享受财富的自由的人。如果不触动私有财产制度，人通过理性的立法活动将永远无法实现人的自由。上述观点既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成果，也是对自己从前的哲学信仰的“清算”①。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14.

此后由于革命的影响，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只能断断续续地进行。在《共产党宣言》和《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中，马克思正式公开表达了自己在经济研究中的见解，并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一文中汇集了关于经济学研究的演讲内容。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私有制和雇佣劳动指的是同一种关系：有产者用货币购买无产者的劳动从而实现私有财产的增加。也就是说，雇佣劳动制度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从而将社会分裂为有产者和无产者两个对立的阶级。马克思的论证重点由此完成了从“无产阶级”向“雇佣劳动”的过渡。雇佣劳动制度下的劳动契约看起来是资本家和工人双方认可的法律文书，符合形式上或程序上的公平原则；但是，马克思指出，雇佣劳动制度中的工资水平是阶级斗争的结果，因此形式上的正义并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生产中所隐含的对抗。在这个意义上，那些追求形式合理性的社会理论最终都会沦为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辩护，而马克思进行批判的目的，就是为了揭露现代社会中阶级对抗的性质并寻找扬弃这种对抗的现实路径。

马克思转变后的思路仍然与人的自由和解放密切相关，但是在理论细节上已经有了很明显的完善。马克思已经意识到，现代社会中无产阶级不自由的现状并不完全是一个个体对另一个个体的意志强制，在更多的情况下是雇佣劳动制度条件下基于自由意志的自然过程。因此，自由贸易和公平工资无法解决自由的难题，在私有财产制度和雇佣劳动制度下，个体必然会被区分为自由的有产者和不自由的无产者两个阶级。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分三个部分说明了“构成现代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物质基础的**经济关系**”①：

> （1）**雇佣劳动对资本**的关系，工人遭受奴役的地位，资本家的统治；
>
> （2）**各个中间市民阶级和所谓的市民等级在现存制度下必然发生的灭亡过程；**
>
> （3）**欧洲各国资产者阶级在商业上受**世界市场霸主**英国的奴役和剥削的情形。**②

这个提纲是马克思对自己 1844—1849 年间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次整体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11.

② 同①712.

回顾①，通过这三部分可以勾勒出马克思在革命前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大体轮廓。首先，资本家剥削工人的雇佣劳动制度是现代社会基本的经济关系；其次，除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以外，其他阶级都将会在这种经济关系的作用下逐渐消失；最后，危机的发生迫使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地开拓世界市场，将这种经济关系扩展到世界各地，当没有新的市场可供扩展时，危机将无法解除，最终导向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马克思在此期间吸纳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大量理论成果，延续和丰富了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出的批判纲领。马克思将资本和雇佣劳动联系在一起进行批判的思路，后来也贯穿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全过程。

不过，马克思此时仍然没有超越英国政治经济学。尽管马克思一直想要写作并出版一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著作，但是与当时已经存在的其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相比，马克思在这一阶段还没有提出真正具有超越性的纲领，只是把现存的各种观点条理化、体系化，并服务于德国无产阶级的斗争运动。这种政治经济学上的贫乏，一方面是由于马克思当时对政治经济学的知识储备尚不足以承担超越整个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任，另一方面也是由于 1844 年之后的革命和流亡生活让马克思难以拥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除此之外，马克思对于未来社会的构想还存在着内在的矛盾：他的批判方法参考了古典经济学的经验主义，但是他的追求目标却是带有浓重古典哲学色彩的人道主义理想，即人绝对的自主和自决，这两者之间在理论上是相互排斥的。如果论证不了新的生产形式在未来社会中实现的必然性，那么马克思就无法将自己的理论与古典经济学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学区分开来，同时也就无法论证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现自由和解放的社会远景。不过，马克思在 19 世纪 40 年代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使得马克思在后来的研究中

---

① 《雇佣劳动与资本》原本是马克思在 1847 年的演讲，经整理于 1849 年又作为社论发表在《新莱茵报》第 264—267 和 269 号上。《雇佣劳动与资本》面向的读者主要是工人和革命者，所以马克思在其中几乎没有使用任何的政治经济学概念。然而这并不妨碍这部著作的政治经济学价值，因为马克思写作《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的主要原因是“看到了 1848 年以波澜壮阔的政治形式展开的阶级斗争以后，我们想更切近地考察一下经济关系本身，也就正当其时了，因为这种经济关系既是资产阶级生存及其阶级统治的基础，又是工人遭受奴役的根由”，无论其中是否运用了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和研究方法，对于这种经济关系的研究都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

不得不回到这个问题上，寻找超越古典经济学的中介。

三、从“剩余价值”到“资本一般”

1849 年 8 月，马克思迫于法国政府的压力前往伦敦避难，等待欧洲大陆新一轮革命浪潮的到来，也因此“重新得到了几分宁静从事研究工作”①。革命事业的空窗期让马克思有时间继续进行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随着欧洲革命浪潮的逐渐平复，马克思遇到了新的课题，即论证危机和革命再次到来的必然性。在此期间，马克思对经济学的各派观点进行了详尽的钻研，并在 19 世纪 50 年代末完成了剩余价值理论的主要内容。剩余价值理论可以看作马克思对既有观点的回顾，而对剩余价值的进一步研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即以“价值”概念为批判对象的“资本一般”理论。

1850 年，马克思在伦敦重启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并且大大扩展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不列颠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最后，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资产阶级社会看来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切决定我再从头开始，批判地仔细钻研新的材料”②。马克思在一篇国际评论中提到了美国加利福尼亚金矿的意义，认为旧金山和纽约将会取代伦敦和利物浦成为世界贸易的中心；欧洲为了避免成为美国工商业和政治上的附庸，就必须进行社会革命，改变生产和交换的方式。③ 6 月，马克思获得了大英博物馆阅览室的出入证，从 1850 年到 1852 年，马克思在那里进行了相对集中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研究最初围绕着英、法的社会革命和经济危机展开，但是论题很快就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与此同时，出版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的计划也再次被提上日程，恩格斯希望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能够在 1851 年 4 月之前完成并出版，不过，新著直到 6 月仍然遥遥无期。④ 马克思计划写三卷——“经济学批判、社会主义和经济思想史”⑤，恩格斯在 11 月建议他为了出版

---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9.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14.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262-264.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7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82.

⑤ 麦克莱伦. 马克思传. 王珍，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93.

将经济思想史扩充为两卷，“第三卷可以出《社会主义者》，第四卷出《批判》——《批判》之外可能剩下的东西——和已经非常有名的‘正面的东西’”①。到1852年夏天，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又一次流产，他本人迫于生活的压力也不得不中断了经济学的研究。尽管新的著作没有成功出版，但是长时间的阅读和积累已经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和现代政治经济学的争论都有了深入的洞察。

马克思这一阶段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摘抄和评述写在二十四个笔记本上，学界一般将其统称为“伦敦笔记”。伦敦笔记的前十三个笔记本的内容相对集中，1851年4月之前写的第I—VII笔记本主要讨论了当时经济学界关于危机的争论，4、5月间写的第VII—X笔记本讨论了围绕李嘉图政治经济学而产生的各种争论，5、6月间写的第XI—XIII笔记本则主要摘抄了当时工人运动和阶级状况的各种史料。从上述十三个笔记本的摘抄内容也可以看出马克思当时在伦敦所关注的现实问题，这些笔记本的内容后来直接或间接地运用在了“1857—1858年手稿”、“1861—1863年手稿”以及《资本论》中。经过两年多的艰辛钻研，马克思出版经济学著作的愿望尽管并没有实现，但此时他已经意识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本身的界限。马克思在1851年4月给恩格斯的信中曾说，整个经济学“开始使我感到厌烦了。实际上，这门科学从亚·斯密和大·李嘉图时代起就没有什么进展，虽然在个别的常常是极其精巧的研究方面作了不少事情”②。在马克思再次重启政治经济学研究之前，对整个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超越已经呼之欲出。

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的主要研究成果是对雇佣劳动制度进行了经济学的解释，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40年代的经济学理论主要以雇佣劳动制度为批判对象，认为雇佣劳动制度是资本家通过劳动合同或社会契约合法地剥削工人的一种制度。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延续了他在革命年代的思考，用经济学的语言重新表述了自己的理论立场，“一个人埋头制定了剩余价值理论”③。从雇佣劳动批判到剩余价值理论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95. “正面的东西”指的应该是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已经公开发表的观点。

② 同①246.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47.

的发展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它们分别是同一现象的法学表达和经济学表达。恩格斯甚至认为，《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与资本》证明马克思在1847年“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而且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它是**怎样**‘产生’的”①。

价值的性质是18、19世纪经济学研究的核心议题，同时也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的逻辑前提。在政治经济学的讨论中，商品的价值总是与货币和价格结合在一起，也就是研究货币如何准确地实现商品的价值。从斯密开始，价值就被当作商品价格的“真实尺度”，而价值研究的目的就是寻找并消除货币价格与真实价格之间的差别。在日常生活中，商品所有者虽然拥有价格的制定权，但是人们会认为商品本身具有一个客观的价格尺度，这种日常观念就成为价值理论的现实基础。相应地，商品价格中超出商品价值的部分，就是商品所有者不合理的收入，即商品所有者对他人财富的无偿占有。通过区分劳动的二重性，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分别确定了作为商品的劳动能力（Arbeitsvermögen）的价值和价格，工人的劳动能力所创造的价值是劳动期间全部的对象化劳动量，而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货币（即劳动能力的价格）是“生产出工人的劳动能力所需的对象化劳动量”②，这两个对象化劳动量之间的差额就是剩余价值。不过，由于剩余价值理论的理论基础和论证方法都来自古典经济学，因此必然也会遇到困扰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理论难题。例如，工人所创造的价值无法被精确地计算，特别是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之间换算比例的问题至今仍然困扰着劳动价值论的支持者。如果劳动创造的价值无法被计算出来，那么剩余价值理论本身的说服力就要大打折扣。

剩余价值理论虽然可以证明无产阶级所面临的不公正待遇以及工人在生产过程中自由的必然丧失，但是并不足以证明这种不公正和不自由可以在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中被消除。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社会个体参与经济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货币量的增加，个体的自由也就是通过支配自己的财产来获取货币的自由。根据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观点，私有制和货币支配下的雇佣劳动制度必然会导致有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而且剥削的程度会随着资本生产的发展不断加剧，进一步拉大贫富

---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2.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65-266.

差距，从而导致经济危机的不断发生。以剩余价值理论作为基础，自然会提出通过计划经济来废除私有制、废除货币这类的道德要求。用经济话语来表达，这样的道德要求就是生产应当以产品的增加为目的，而不是以货币的增加为目的。基于上述理由可以顺理成章地推导出社会主义改革的方案，即有计划地控制生产以实现理性与道德的诉求。不过，值得怀疑的是马克思是否会支持这样的社会改革方案。马克思在 19 世纪 40 年代就已经批判过以理性和道德来改造国家的德国社会主义路线，那么同样的批判思路也适用于以理性和道德来改造生产的经济社会主义路线。而且，即使丧失了所有财产的无产阶级没有私人利益，但也无法保证无产阶级在脱离赤贫状态之后不会再次蜕变为新的资产者。那么人类社会就需要不断地消灭资产者，人类普遍的自由和解放将永远无法完全实现。

在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之后，马克思开始意识到价值本身不应当是研究的前提，而应当是被批判的对象。货币是价值的现实化身，要消除个体对货币的追求并扬弃以货币为中介的社会关系，就必须要先说明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货币为何能够统治人。作为一般等价物，货币不仅可以购买物品，而且还可以购买劳动；相应地，似乎不仅商品具有价值，而且劳动本身看起来也有可以用货币来衡量的价值。价值本身只不过是个体相互交换时产生的一种观念，但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价值却表现为各种东西普遍拥有的一种抽象性质，货币也因此拥有了交换一切东西的能力。马克思指出，经济学上的价值概念只能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价值这个经济学概念在古代人那里没有出现过。……价值概念泄露了资本的秘密”；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价值只是为了“揭露欺诈行为”而设定的道德和法律概念；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条件下，价值才成为理论研究的对象，“价值概念完全属于现代经济学，因为它是资本本身的和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最抽象的表现”①。

为了完成对价值的批判性分析，马克思在 1858 年初转向了对“价值”的纯形式研究，并通过“资本一般”理论完成了对“价值”范畴的考察。从研究过程本身来看，这一转变并不突兀，“要知道什么是剩余价值，他就必须知道什么是价值”②。然而从理论成果和逻辑细节上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80.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6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1.

看，这次转变对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进程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正是由于抽象出了“价值”概念，马克思才找到了自己与英国政治经济学的真正差别：英国政治经济学以价值的存在作为研究前提，而马克思批判的正是这个作为研究前提的“价值”。

第二节 “资本一般”理论的酝酿和写作

1857—1863 年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生涯中的一个主题集中、逻辑连贯的研究阶段。“资本一般”概念在这一阶段频繁地出现在马克思的手稿当中，是研究 1857—1863 年间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重要线索。以 1858 年 6 月为界，马克思这一时期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时期：1857 年 6 月—1858 年 6 月是“资本一般”理论的酝酿期，“资本一般”只是一个偶然出现的辅助性的范畴；1858 年 6 月—1863 年 6 月是“资本一般”理论的创作期，“资本一般”成为马克思创作的核心概念和总标题。合理并明确地区分这两个时期，是理解“资本一般”理论的必要前提。

一、“资本一般”理论的酝酿期（1857 年 6 月—1858 年 6 月）

在“导言”和“1857—1858 年手稿”（即笔记本 M 和笔记本 A）中，马克思虽然已经提出了“资本一般”范畴，但是“资本一般”只是一个辅助性的理论工具，马克思提出这个概念是为了更方便地说明“资本”和“货币”这两种价值形式的差别。而在“1861—1863 年手稿”中，“资本一般”是对商品章、货币章和资本章所有理论内容的总括，其内涵和地位都远远超出“1857—1858 年手稿”中的“资本一般”概念。区分“资本一般”概念在这两部手稿中的不同含义，是理解马克思“资本一般”理论的基本前提。在 1857—1858 年间，马克思的“资本一般”概念尚未达到“1861—1863 年手稿”中的水平，还不足以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进行彻底的说明。简言之，1857 年 6 月—1858 年 6 月只是“资本一般”理论的酝酿期。

马克思重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直接目的是论证危机和革命发生的必然性，并在此基础上论证消除社会对抗的现实路径。在写作“1857—1858 年手稿”时，马克思面临的思想议题主要是当时经济学界关于危

机问题的经济学争论。经历了1847年经济危机和1848年革命，马克思在抵达伦敦后一直相信新一轮的危机和革命很快就会相伴而来。当时的英国经济学界正在经历两场激烈的思想交锋，一场是围绕1823年《主仆法案》（Master and Servant Act，1823）和1847年《工厂法案》(Factories Act，1847)[①] 而展开的关于工人权利的经济学争论，另一场是围绕1816年《铸币法案》(Coinage Act，1816）和1847年经济危机而展开的关于货币数量的经济学争论。这两场争论看起来毫无关联，但参与争论的各方拥有一种共同的信念，即国家可以通过恰当的法律改革和制度设计减小甚至消除经济危机的影响，并进一步避免危机的再次发生，而马克思显然无法接受这样的论调。抵达伦敦后，马克思不止一次表达了危机必然到来的信心，并认为“没有商业危机，就不会有重大的革命事件”[②]。

为了寻找危机产生的原因，当时的经济学家提出了形形色色的理论。在英国，危机的原因被归结为1844年银行法所导致的购买力下降，产生了反对货币流通理论[③]的银行学派；在法国，危机的原因被归结为工人贫困所导致的生产过剩，产生了主张对银行和货币进行改革的劳动货币理论[④]。最终，危机的争论演化成为关于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的争论，李嘉图和蒲鲁东的货币学说也因此被推到了理论前台。在马克思看来，通过货币改革来延缓甚至避免危机是不可能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危机必然会周期性地发生。为了回应“消除危机”的各种方案，马克思对这两场争论的相关材料进行了细致的摘抄，写下了著名的“伦敦笔记”。1857年经济危机爆发之后，马克思经济学创作的热情再次被激发起来，由此开始了新一轮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了驳斥众多经济学

---

① 国内一般将Factories Act译作《十小时工作日法案》。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20.

③ 货币流通理论来自李嘉图的货币数量理论，认为货币本身没有价值，货币的购买力取决于银行发行货币的数量，货币数量越多，货币代表的价值就越少，商品价格越贵。英国1844年银行法就是根据货币数量理论制定的，并据此在1847年危机爆发时没有增发货币来刺激消费，导致了危机的进一步扩大。

④ 劳动货币理论来自蒲鲁东的社会主义理论，在经济学领域的代表是达里蒙。劳动货币理论认为，产品的价格由工人的工资和资本家的利润两部分构成，这意味着工人用自己的工资无法买回自己生产的产品，由此一方面导致了生产过剩，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工人的贫困。因此，他们主张向工人发行劳动券、小时券来替代货币，让工人可以买回他们相应劳动时间的产品。

家的无聊工作，马克思才在1857年准备要写作一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著作，并为这部著作写了准备性的导言。

在创作计划重启之初，马克思所拟订的写作纲要延续了他一贯的写作风格，试图直接对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错误观念（以及以这些错误观念为出发点的理论）进行唯物主义的批判，揭露这些抽象理论所掩盖的现实对抗。然而，马克思所熟稔的写作方式在经济学批判中并不适用。由于英国政治经济学家的研究也是从现实生产出发的，如果没有事先提取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区别于其他生产形式的一般性特点，那么对经济学具体观点的批判将难以顺利进行。马克思为此进行了艰苦的学术探索，在1857—1858年间写下了七个探索性的笔记本，在其中首次提出了表征资产阶级社会特殊性的“资本一般”概念，并以此来批评从“生产一般”出发的政治经济学。古典经济学试图从各种生产形式——包括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中抽象出“生产一般”，并在此基础上对现代社会进行分析，这种分析方法必然会将从古代社会到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当作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正确的方法应当是先指认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的差别，再在这个差别的基础上反观现代社会，这样才能发现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性或非自然性。马克思用来指认的现代社会特殊性的范畴就是“资本一般”，即“把作为资本的价值同单纯作为价值或货币的价值区别开来的那些规定的总和”①。具体地讲，资本的价值与货币的价值之间的具体差别表现为：商品具有一个价值，它的价值体现为一定货币量；但是资本所支配的价值不是直接的货币量，而是货币所购买的劳动所能创造的产品的价值量，其特殊性在于“从形式规定性方面来看，是**价值自行增殖过程**”②。

在“1857—1858年手稿”的七个笔记本中，“资本一般”只是一个偶尔出现的概念，它的论证逻辑服务于货币与资本的区分以及固定资本和流通资本的形式分析。在笔记本M和笔记本A（即“导言”和“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关于货币的讨论大体延续了他在“1844年手稿”中的基本观点，货币既是“通用的**分离剂**”，也是“地地道道的**黏合剂**；它是社会的［……］**化合**力”③。当人从原始的共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69.

② 同①270.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45.

财富中异化出来后，个人也就丧失了原有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联系而只能为私人利益劳动；货币作为“通用的**分离剂**”将传统的社会纽带解开并重新联结在一起，劳动者不得不采用货币（交换尺度）作为自身和社会的唯一联系纽带，“每个个人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就在于他是**交换价值**的或**货币**的所有者。他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①。货币本身是人为了方便流通而创造出来的东西，它的作用是衡量并实现商品的一般价格。但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中，货币的流通表现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货币成为与人对立的独立力量。人虽然可以认识到货币带来的社会问题，却无法取消货币这种人造物，反而只能服从于货币流通的规律。马克思认为，“只有在资本的基础上流通才能掌握一切生产要素”②，货币才会具有这样的强制力。因此，前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与现代社会中的成为资本的货币之间具有根本的差别；在“1857—1858 年手稿”中，马克思将资本区别于货币的特殊性质称为“资本一般”。“资本一般”原本只代表着与一般社会（经济）关系相对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特殊社会（经济）关系，表明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立场；随着经济学批判的深入，“资本一般”概念逐渐表现为与现实的直接对立，这种割裂本质与现象的批判方法为马克思的叙述制造了巨大的障碍。

马克思提出“资本一般”首先是为了从形式规定上区分货币和资本这两种不同价值形式，这是“资本一般”在“1857—1858 年手稿”中的第一重含义。在“1857—1858 年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了经济学家在资本问题上的混淆：李嘉图和西斯蒙第等经济学家“不是把资本看作处在**特有形式规定性**上的资本”，“而只是想到资本的物质实体，原料等等”；不过这些物质实体不足以将自身变成资本，于是，萨伊和西斯蒙第把资本又看作“某种**非物质的**……同它的物质构成无关的东西”，将资本等同于非物质的价值③；然而，资本本身虽然是价值，但价值不一定就能成为资本，为了说明价值和资本的差别，李嘉图和萨伊再次回到了生产的物质形态来解释资本的自我增殖，将资本“说成是生产新劳动时所使用的积累劳动”或在劳动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生产性服务**”。这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6.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80.
③ 同①268.

些混乱的讨论只是一些无意义的同义反复，一方面抽象地将资本混同于流通过程中的价值形式，另一方面又抽象地将资本混同于劳动过程中的物质变化，因此“不可能表明价值和劳动所发生的关系”。理解资本的关键就在于“**劳动**与资本对立而作为主体出现，即工人只是在**劳动**的规定上出现，而劳动并不是**工人本身**”①。也就是说，价值和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都获得了新的规定：价值及其货币的物化形式都只是交换的尺度，而资本是与劳动进行交换的特殊价值；劳动本身是人和生产资料共同发生作用的物质生产过程，而与资本进行交换的劳动是作为商品的、具有二重性的劳动。为了避免在概念上发生混乱，马克思认为“必须把资本在某**一定**点上表现出来的一定形式固定下来”②，从而第一次提出了“资本一般”概念。为了区分资本和货币，就不能从物的方面将资本“看作**简单生产过程**”，而是要从形式规定性方面将其看作“**价值自行增殖过程**”。在生产过程中，“资本通过劳动消费了自己的材料，并通过自己的材料消费了劳动”③；资本在退出流通的时候并没有像一般的商品那样在消费中丧失自己经济的形式规定（即价值），而是让资本的“使用价值的消费本身进入经济过程……在生产过程的任何一瞬间，资本都没有不再是资本，或者说价值都没有不再是价值”④。

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对“资本一般”概念的运用已经体现出他批判方法的转变。他此时对古典经济学资本理论的批评虽然仍然延续了“导言”中的基本观点，但已经明显不同于早年间批判形而上学时所运用的批判方法。古典经济学同样坚持从物质生产出发来分析经济形式，但这恰恰是其缺陷所在；古典经济学没有意识到“实体的形式同经济**形式**即价值本身无关”⑤，而只是从物质实体的形式变换来看待资本，因此在劳动、价值、资本等概念上纠缠不清，无法解释资本如何在物质形式的变换中实现了自身的增殖。马克思指出，“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其结果是劳动价格——尽管从工人方面来说是简单交换，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69.
② 同①270.
③ 同①270.
④ 同①271.
⑤ 同①272.

从资本家方面来说……必须属于与交换的形式规定不同的另一种经济形式规定，否则，资本就不可能作为资本，劳动就不可能作为与资本相对立的劳动”①；也就是说，如果要理解资本与价值的差别，就必须研究资产阶级社会特有的经济形式，“在完成的资产阶级体制中，每一种经济关系都以具有资产阶级经济形式的另一种经济关系为前提”②。在批判古典经济学时，仅凭唯物主义颠倒并不足够，还必须要以逻辑的方式呈现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形式；在此意义上，代表这种经济形式的“资本一般”虽然只是“实际运动在观念上的表现”③，但却是经济学批判中不得不采用的一种理论中介。

在分析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时候，马克思再次运用了“资本一般”概念来区分一般形式上的资本和“各特殊的现实的资本”④，这是“资本一般”在“1857—1858 年手稿”中的第二重含义。除了资本和货币的区分之外，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是马克思运用“资本一般”概念所做的另一个重要区分。在说明固定资本与“资本一般”的关系时，马克思指出，所有的资本都具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在概念上是与劳动进行交换的价值，即一般的资本或“资本一般”；但资本在现实中会采用不同的形式，从而体现为固定资本、流通资本等。资本采用物的形式来实现自身，是因为“资本一般……为了增殖自己的价值，它必须二重地存在……即自己把自己当作异己的东西来发生关系”⑤；换言之，资本要占有劳动的产品，不仅要购买劳动，而且还必须用货币“交换生产过程的各个要素，即工人的生活资料、原料和工具”⑥，而固定资本是“作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2. 在“1857—1858 年手稿”中，马克思把资本看作一种特殊的“已设定的交换价值”，唯一与这种交换价值对立的使用价值就是劳动。资本和劳动的交换包括两个环节——交换行为和劳动过程，前一个环节属于普通的流通范畴，而后一个环节则是“在质上”与交换不同的过程。马克思将（不属于流通范畴的）劳动过程作为区分资本（与劳动）交换和简单交换的标准，资本家“**用货币交换来的东西的使用价值**表现为**特殊的经济关系**”，“工资不能等到产品完成时才支付这一点，甚至是关系的本质规定”。这个说法延续了马克思早年间的雇佣劳动批判，同时已经包含着剩余价值理论和劳动二重性理论的核心要素。

② 同①236-237.

③ 同①270.

④ 同①440.

⑤ 同①440-441.

⑥ 同①336.

为生活资料，作为原料，作为劳动工具”① 的资本。固定资本体现了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单个工人的总体劳动是被固定资本结合在一起的：在“精神统一性”方面，工人的总体劳动“服务于他人的意志和他人的智力，并受这种意志和智力的支配”；而在“物质统一性”方面，工人的总体劳动从属于“**机器**的，固定资本的**物的统一**”②。但是从经验现象的层面上看，固定资本又表现为对“资本一般”的否定，表现为与经济形式和流通过程无关的物。正是因为固定资本的这种物的形式，古典经济学家才会在分析资本概念时产生价值和物质的混乱，认为固定资本的积累（即各种生产条件的改进）是产生利润的真正原因。

通过辩证法的运用，马克思试图证明：资本退出流通并表现为物，恰恰是为了实现自身的抽象规定；固定资本虽然在表面上表现为物的积累，但实际上是对劳动及劳动产品所有权的占有。为了说明“资本一般”和各种特殊资本（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借用了黑格尔概念论中的基本范畴：“一般的东西，一方面只是**思维中的**特征，同时也是一种同特殊事物和个别事物的形式并存的、**特殊的**现实形式”③。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形式，“资本一般”代表了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普遍存在的经济关系。但是，“资本一般”概念本身是自我矛盾的：价值是交换行为或流通过程中的尺度，无法通过交换行为或流通过程本身实现增殖；而“资本一般”作为一种特殊的价值，其本质特征就是产生利润或自我增殖。“资本一般”概念自身具有的内在矛盾意味着它无法在经济活动中直接实现自身，按照辩证法的基本观念，现实化的过程就首先表现为否定自身规定性的过程。“资本一般”的进一步现实化必须采用否定流通的、物的形式，“总要有一部分资本**固定起来**，丧失价值，不生产”④，从而将自身存在的各种条件重新创造出来。完成了这些特殊环节的资本主义生产才能再生产出自身赖以存在的条件和前提，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一般”才可能是一种在现实中真正发挥作用的抽象，“资本一般”所代表的形式规定才可能在经济关系的各个方面被确立起来。“资本一般”所经历的一般、特殊、个别的发展过程，既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20.

② 同①463-464.

③ 同①441.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0.

是理论上的形式抽象，也是“完成的资产阶级体制”中每天都在发生的现实。① 因此，“把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这两个规定理解为资本一般的**形式规定**，是非常重要的”②。马克思认为上述关于“资本一般”与现实资本的区分，其“逻辑学性质多于经济学性质，但毕竟是我们研究过程中极其重要的问题”，而且计划“以后我们还要回来谈这一点”③。

综合以上两个区分，在对古典经济学进行批判的过程中，“资本一般”概念获得了双重的理论内涵：一方面，“资本一般”是“抓住了与所有其他财富形式或（社会）生产发展方式相区别的资本的特征的一种抽象”；另一方面，“资本一般”是“与各特殊的现实的资本**相区别**的……一种**现实的**存在”④。作为自行增殖过程的价值，“资本一般”一方面是抽象的，因为它的辩证形式“不过是产生资本的实际运动在观念上的表现”⑤；不过，“资本一般”另一方面又是现实的、在经济活动中发挥作用的一般规律，“这一点虽然普通的经济学并不**理解**，但已承认”⑥。通过“资本一般”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要抛开资本的物的形式，而是重点考察资本的（与其物质实体形式无关的）经济形式。古典经济学试图直接从作为物质实体的资本中抽象出关于资本的形式规定，“不论是斯密，还是后来所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照例都缺乏对于理解经济关系的形式差别所必要的理论认识，——他们都是粗略地抓住现成的经验材料，只对这些材料感兴趣”⑦。

马克思从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经济形式出发来理解“资本一般”，并试图通过对“资本一般”的辩证逻辑演绎来呈现资本如何将自身存在的条件不断地再生产出来。马克思将这种“自己创造自己”的现象看作作为总体的“社会有机体”的共同特征⑧，“有机体制本身作为一个总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6.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0.

③ 同①441.

④ 同①440.

⑤ 同①270.

⑥ 同①440.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70.

⑧ 马克思在“1861—1863 年手稿”中以人的历史为例重新表述了这个原理：“人的存在是有机生命所经历的前一个过程的结果。只有在这个过程的一定阶段上，人才成为人。但是一旦人已经存在，人，作为人类历史的经常前提，也是人类历史的经常的产物和结果，而人只有作为自己本身的产物和结果才成为**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50-351）

体有自己的各种前提，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有机体制在历史上就是这样生成为总体的”①。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形式能够在自身的运动过程中将自己的前提重新创造出来，“资本一般”的抽象规定因此才成为普遍发挥作用的一般规律。为了实现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形式”的总体认识，马克思试图在唯物主义研究的基础上，将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在理论上呈现为“资本一般”在现实中自我克服和自我实现的对象化过程。

按照马克思在“1857—1858 年手稿”中的论证逻辑，“资本一般”是资产阶级社会中经济关系的抽象，其作用是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与一般的社会生产关系区分开来，从而说明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性质。然而，“1857—1858 年手稿”中的“资本一般”概念实际上难以完成这样的任务。首先，马克思试图从现代社会中抽象出“资本一般”的规定性，但是很难证明对“资本一般”所做的抽象规定是恰当和全面的。“资本一般”本身是观念抽象的结果，当“资本一般”的抽象规定与现实资本的经验现象相悖的时候，“资本一般”就会显现出它与唯物主义立场的内在矛盾。其次，即使认可了“资本一般”的有效性，也很难证明“资本一般”所揭示的社会生产形式能够扬弃自身从而实现人类的自由和解放。在“1857—1858 年手稿”中，“资本一般”概念实际上只是说明了人的活动在何种生产方式下会成为货币增殖的工具和中介，但是尚不足以论证一种不以货币为中介的社会关系，并证明它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只是完成了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但还没有超越政治经济学提出自己关于通往未来社会的解决方案。

1858 年初，马克思“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并认为黑格尔的方法“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②。借助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重新改造了“资本一般”概念，克服了“资本一般”的抽象性，并逐渐形成了以“资本一般”为开端的新的写作计划。在新的写作计划中，马克思解决了如何通过辩证法来获得“资本一般”规定性的方法论问题，从而重新制订了“资本一般”的创作提纲。得到新思路的马克思很快就结束了笔记本 A 即“1857—1858 年手稿”的写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7.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9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0.

作，转而按照新的思路开始写作笔记本 B 和 C，正式开启了“资本一般”理论的写作期。

二、“资本一般”理论的写作期（1858 年 6 月—1863 年 6 月）

在“1857—1858 年手稿”中，马克思将资本区别于其他价值形式的总体性规定称为“资本一般”，以此来对应适用于一切时代的“生产一般”。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用辩证法的逻辑演绎展现了“资本一般”将自身现实化的物质前提，即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方式。因此，马克思在相关的论述中将主要的精力放在了货币和资本——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式对比上。不过，上述对比不仅没有获得确定的结果，反而在关于“资本一般”的论述中显示出了越来越多的先验思辨色彩。从 1858 年 6 月开始，马克思转变了论证的思路，不再将“生产一般”和“资本一般”对立起来，转而试图在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开篇呈现商品、货币和资本的内在一致性，即价值在这三种财富形式上的不同表现，“资本一般”因此也拓展为商品、货币和资本三个理论环节。马克思将辩证法运用到了全部三个环节之中，在新的叙述结构里，“资本一般”的全部规定性都来自对商品概念和货币概念的辩证演绎。

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商品、货币和资本是现代社会中物质财富的三种形式，商品是可以直接满足个体或社会需要的产品或服务，货币是财富数量的实物表现和衡量尺度，资本是为了实现财富增长而进行的货币积累。在这三种形式的财富中，商品的历史最悠久，通常被当作财富最普遍、最正义的存在方式，而货币和资本形式的财富经常会遭到道德上或政治上的批评。古典经济学试图调和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例如斯密和李嘉图都一方面承认资本生产中的分配方式不利于直接生产商品的雇佣工人，另一方面又试图证明货币流通和资本积累可以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带来福利水平的总体提升。在 19 世纪中叶，经济学出现了分化，关于财富形式的争论逐渐走向前台，成为各方争论的核心议题。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坚持将商品作为唯一真实的财富形式，并以此来批评资本家的利润是将工人的产品据为己有；与之相对，正统的经济学研究则普遍认为商品生产是工人和资本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资本家有理由获得一部分产品作为利润。经过 50 年代艰苦的经济学研究，马克思发现了财富

争论中各方的共同局限，并指出了解决这场争论的出路：“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①。从物的自然形态来看，财富的这三种形式体现为绝对的差异性；从人和人的关系来看，三种财富形式具有共同的特征，它们都代表了“通过转让而进行占有”的经济关系。② 商品、货币和资本本身都只是自然物，它们之所以能够成为进行交换的物品，是因为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标，就是排除物质材料的干扰，从而将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方式剥离出来加以考察。在这个意义上，商品概念和货币概念都是对现代资本生产过程的抽象，并不能构成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为了对这三种财富形式的内在关联进行说明，马克思从 1858 年开始系统地整理过去十多年的经济学手稿，并试图以“资本一般”为题正面阐述自己与古典经济学的差别，写下了一系列的笔记和书稿。

在获得了“资本一般”的叙述结构之后，马克思很快就结束了“1857—1858 年手稿”的写作，转而在笔记本 B 和 C③ 上按照新的结构重新构思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著作。马克思起初没有预料到“资本一般”理论的创作难度，甚至计划在 1859 年初就可以完成“资本一般”全部的写作工作。按照辩证法的逻辑要求，“资本一般”理论中商品、货币和资本的每一个环节的发展都必须是自我设定或自我克服的二重化过程，马克思不得不花费大量的精力来寻找各个环节过渡的逻辑中介。在出版合同的期限内，马克思只完成了“资本一般”写作计划中带有绪论性质的“商品章”和“货币章”，最重要的“资本章”还一点也没有谈到。1859—1861 年间，马克思对自己的经济学手稿进行了系统的回顾，并在 1861 年 8 月恢复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分册）》的写作，写下了二十三个笔记本的手稿，也就是“1861—1863 年手稿”。因此，1858—1863 年是“资本一般”理论真正的写作期，其间的系列文本共同构成了马克思“资本一般”理论的完整内容。

与“资本一般”理论直接相关的文本首先是马克思从 1858 年 6 月开始写作的笔记本 B′、B″和 C。为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出版，马克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4.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94.

③ 笔记本 C 现已遗失，根据马克思后来所做的笔记本索引，笔记本 C 中应当包含着“资本一般”价值章（即商品章）的最初手稿。

思中断了“1857—1858年手稿”的写作，并在题为B′和B″的两个笔记本上重新整理思路。在这两个笔记本中，马克思以“资本一般”为题拟订了一个相对完备的理论框架，并大体上完成了“资本一般”理论的前两章和第三章的开头的付排稿。马克思以“资本一般”理论的新提纲重新整理了1857—1858年间七个笔记本的内容，并草拟了两份提纲，写了一部草稿。从提纲和草稿的内容来看，“资本一般”的前两章“价值（商品）”和“货币”在1858年10月就已经大致完成，第三章“资本”的提纲也初具雏形。

对于理解马克思的“资本一般”理论而言，笔记本B′和B″的内容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其中有马克思在“货币章”和“资本章”之间写的两个过渡章节“简单流通中占有规律的表现”① 和“向资本过渡”②，后来的“第一分册”、作为第二分册的“1861—1863年手稿”以及《资本论》中都没有收录这两个章节。由于马克思对“资本一般”的逻辑完整性有着极高的要求，当我们要完整呈现“资本一般”理论时，上述过渡章节就成为不可或缺的逻辑环节。在“向资本过渡”一节中，马克思简明地梳理了“商品章”和“货币章”的整体结构，并说明了这两个章节同“资本章”的关系。商品及其简单流通形式并不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过程，它只“是资产阶级生产总过程的抽象领域，它通过自身的各种规定证明，它是［B″－6］那个在流通背后进行的、从流通中产生又产生出流通的更深刻的过程即工业资本的要素，其单纯表现形式”③。简单流通中价值的抽象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之前也存在，但也只是第二性的、派生的、偶然出现的形式，“作为商业资本和货币资本的资本，在资本还没有成为社会的支配因素的地方，正是在这种抽象中表现出来”④。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下，价值本身才成为社会关系普遍的形式，价值才会成为分析资本关系的出发点。价值从商品形式到货币形式的发展过程只是从现代社会关系投射到过去的抽象形式，马克思试图以此来证明前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生产和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所采用的是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正是由于看不到资本主义条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47.

② 同①365.

③ 同①370.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9.

件下生产的特殊性，政治经济学家才会将现代生产的社会形式看作人类理想的实现。在“简单流通中占有规律的表现”一节中，马克思明确地批评了上述庸俗观念：“流通中发展起来的交换价值过程……是自由和平等的现实基础”，“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所有权、自由和平等的三位一体……只是在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中才得到实现”①。也就是说，经济学家所追求的人类理想实际上都只能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中实现，因此经济学以商品生产来批评资本生产的思路从根本上讲只能沦为对现实的辩护和解释，不具有改变现实的力量。

除了笔记本 B 和 C 之外，另一部与“资本一般”理论直接相关的文本是“第一分册”。尽管“第一分册”只包含了“资本一般”理论的前两个环节，“第一分册”本身也是一部相对成熟的经济学著作，体现了“资本一般”理论的基本特点。恩格斯在回忆马克思这段时间的工作时说：“1859 年前后……他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在纲要上已经完成，而且在最重要的细节上也已经完成”②。马克思自己也认为“这部著作第一次科学地表述了关于社会关系的重要观点”③。在论及社会关系时，马克思曾说“有些经济学家……根本就不知道，人的社会关系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有什么区别”，“只有在人们思维着，并且具有这种对可感觉的个别性和偶然性进行抽象的能力的情况下，才可能有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④。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社会关系不是使用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物的关系，而是由交换价值代表的抽象关系，即通过交换而实现占有权转让的经济关系。如果单纯从物的方面出发来看待社会关系，就会像古典经济学家一样，“把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和受这些关系支配的物所获得的规定性看作物的**自然属性**，这种粗俗的唯物主义，是一种同样粗俗的唯心主义，甚至是一种拜物教，它把社会关系作为物的内在规定归之于物，从而使物神秘化”⑤。为了批驳古典经济学家的错误立场并呈现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社会关系，马克思在“第一分册”中以极其严整的形式呈现了交换价值（即一般劳动时间）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62.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6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1.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7.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63.
⑤ 同①85.

的抽象运动过程，以此来呈现价值观念被普遍接受需要怎样的生产方式作为现实前提。交换价值的抽象运动形式不仅仅是思维中的过程，它同时代表了现实中经济参与者在生产和交换过程中的社会身份，“这种特定的社会身分，决不是来自人的个性，而是来自以商品这个特定形式来生产产品的人们之间的交换关系”①。价值形式抽象运动中各个范畴之间的相互联系，反映的是现实生产过程中拥有不同社会身份的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现实的生产过程中，这些社会关系往往通过人的占有物来发挥作用，经济学家因此才会将各种社会关系混同于某种物质的特殊性质。

由于拥有新的理论内容和叙述方法，马克思在“第一分册”中采用了崭新的写作形式。在19世纪40年代的著作中，马克思一般都会直接对批判对象的观点进行批评，揭示其观点的现实基础，并证明他们的观点为什么最终无法改变现实。在“第一分册”中，马克思没有沿用这种写作习惯，而是对社会关系的抽象表现——价值概念——进行系统而全面的理论建构，“它一开始就以系统地概括经济科学的全部复杂内容，并且在联系中阐述资产阶级生产和资产阶级交换的规律为目的”②。在对价值这一抽象概念进行阐释时，叙述的方法就显得尤为重要。马克思这时通过提取黑格尔的辩证方法找到了将研究对象呈现为统一整体的逻辑工具，恩格斯说这“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③。除了“第一分册”以及笔记本B′和B″之外，“资本一般”理论最重要的部分是在“1861—1863年手稿”中写下的。马克思原计划写作两个分册来阐述他的“资本一般”构想，而且“这两个分册必须**同时**出版”④。仅通过“第一分册”无法展现“资本一般”的理论全貌，对“资本一般”的完整阐述必须要结合马克思此后为第二分册而写的“1861—1863年手稿”。综上所述，马克思为完成“资本一般”理论而进行的写作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858年6月—1859年1月，马克思拟订了“资本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89.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0.
③ 同②603.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8.

般”的三章结构并出版了其中的前两章。这一阶段的相关文本包括：(1)“七个笔记本的索引”①，马克思在其中首次提出了“资本一般”理论价值、货币、资本一般的三篇结构，写在笔记本 M 的第 23—33 页上②；(2)“资本一般”理论的最初草稿，马克思在其中完整地勾勒了“资本一般”理论的内在逻辑，写在笔记本 B′、B″和 C 上③；(3) 出版的“第一分册”，内容是在“资本一般”理论的框架下对商品和货币这两种财富形式的辩证逻辑演绎。

第二个阶段是 1859 年 2 月—1861 年 8 月，马克思为了继续写作“资本一般”而进行了艰苦的手稿整理和文献摘抄工作。这一阶段的相关文本包括：(1) 为准备“资本一般”理论而写的“引文笔记”④，马克思在其中分二十余个专题系统地重新整理了“巴黎笔记”、“布鲁塞尔笔记”、“曼彻斯特笔记”和“伦敦笔记”中的相关内容⑤；(2) 用来摘录新材料的“厚笔记本”⑥，马克思在其中有意识地记录了遇到的新材料，并根据自己的新观点对过去的摘录进行了整理，这个笔记本的内容后来大部分在“1861—1863 年手稿”中得到了采用⑦；(3) 为完成“资本一般”理论而写的“我自己的笔记本的提要”⑧ 和“资本章计划草稿”⑨，“我自己的笔记本的提要”写在笔记本 B″的最后几页上，内容为“1857—1858 年手稿”七个笔记本的目录，“资本章计划草稿”保存在一个只有 16 页的单独笔记本里，内容是“1861—1863 年手稿”的写作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97.

② 笔记本 M 的前 22 页是马克思 1857 年 8 月底写的“导言”。

③ 笔记本 A、B、C 是马克思为 1857—1858 年的系列笔记本做的编号。其中笔记本 A 包括编号 I—VII 的七个笔记本，后来学界一般将其统称为“1857—1858 年手稿”；笔记本 B 和 C 记载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册第一篇“资本一般”的最初草稿，笔记本 B 的内容以“《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一分册》第二章初稿片段和第三章开头部分”为题收录在《全集》中文二版第 31 卷，笔记本 C 没有保存下来。

④ “引文笔记”目前尚未发表，马克思 1860 年初为这部笔记所写的索引以“引文笔记索引”为题收录在《全集》中文二版第 31 卷中。

⑤ 同①654.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 6 卷.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91.

⑥ “厚笔记本”是马克思对“1857—1858 年手稿”的第 VII 笔记本的别称。这个笔记本共有 277 页，其中前 63 页是“1857—1858 年手稿”的结尾部分，第 63a—192 页是 1859 年 2 月—1861 年夏天所做的摘录，其余部分是与“1861—1863 年手稿”同时进行的材料摘录。

⑦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 6 卷.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92.

⑧ 同①605.

⑨ 同①583.

提纲。

第三个阶段是1861年8月—1863年6月，马克思开始正式动笔写作“资本一般”最后一章的书稿。这一时期的相关文本包括：（1）以“资本一般”为题的系列草稿，即“1861—1863年手稿”收录的二十三个笔记本；（2）以“补充笔记”为题的摘录笔记，“补充笔记”包括A—H共八个笔记本，保存了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摘录的“与我（指马克思——引者注）所加工的那部分政治经济学有关的文献”①。

在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生涯中，1858—1863年是一个以“资本一般”为主线的独立写作时期。在此期间，马克思为了创立“资本一般”理论留下了众多的文本，“1861—1863年手稿”是整个创作期的收官之作。因此，对“1861—1863年手稿”的解读，必须结合整个创作期的所有文本才能实现。在全新的“资本一般”部分，马克思不再设想更加符合自由人格的古代社会或未来社会，而是通过对现代社会的财富形式的辩证演绎来揭示价值观念的普遍化需要怎样的社会前提。在这个意义上，商品概念、货币概念和资本概念都是经济学家对于现代资本生产的理论抽象，只是抽象程度依次递减；相应地，各种经济学理论的对立实际上只是抽象程度的差异，而这种对立本身所蕴含的意义只有在“资本一般”的逻辑体系中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与“资本一般”的酝酿期（1857年6月—1858年6月）相比，马克思从1858年6月开始彻底放弃以“生产一般”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开篇的想法，转而以“资本一般”的新思路来作为全部创作计划的开端，从而终结了“1857—1858年手稿”的思路并开启了通往《资本论》的思想旅程。

三、关于“资本一般”理论的三个提纲

按照1858年制订的写作计划，马克思准备用两个分册分三章完整地阐述他的“资本一般”理论；其中“商品章”和“货币章”在“第一分册”中出版，但计划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分册）》最终没有完成，只留下了篇幅浩大的“1861—1863年手稿”。“1861年8月—1863年6月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是1859年以同一书名在柏林出版的第一分册的续篇”②，作为第二分册的“1861—1863年手稿”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346.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

内容庞杂、结构繁复，对其直接进行文本解读的难度极大。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为“资本章”而写的三组提纲就成为理解“资本一般”理论的主要文本线索。

关于“资本一般”的第一组提纲，是马克思在“1857—1858 年手稿”中为“五篇计划”的第二篇而拟订的两个提纲，可以看作“资本一般”理论的前身。马克思始终没有正式动笔写第二篇，不过草拟的两个提纲是追溯“资本一般”起源的主要文本依据。在“1857—1858 年手稿”的笔记本 II 第 18 页“货币章”的写作过程中，马克思插入了一个关于资本的提纲，这个提纲将第二篇分为六个部分①：

I.

(1) 资本的一般概念。

(2) 资本的特殊性：流动资本，固定资本。(资本作为生活资料，作为原料，作为劳动工具。)

(3) 资本作为货币。

II.

(1) **资本的量。积累。**

(2) **用自身计量的资本。利润。利息。资本的价值：**即同作为利息和利润的自身相区别的资本。

(3) **诸资本的流通。**

(α) 资本和资本相交换。资本和收入相交换。资本和**价格。**

(β) **诸资本的竞争。**

(γ) **诸资本的积聚。**

III. 资本作为信用。

IV. 资本作为股份资本。

V. **资本作为货币市场。**

VI. 资本作为财富的源泉。资本家。

可能是觉得这样的六部分显得过于散乱，马克思在笔记本 II 第 22 页又将上述六部分整合为极具辩证法意味的三部分②：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20-221.

② 同①233-234.

I. **一般性：**

(1)

(a) 由货币生成资本。

(b) 资本和劳动（以**他人**劳动为中介）。

(c) 按照同劳动的关系而分解成的资本各要素（产品。原料。劳动工具）。

(2) **资本的特殊化：**

(a) 流动资本，固定资本。资本流通。

(3) **资本的个别性：**

资本和利润。资本和利息。资本作为**价值**同作为利息和利润的自身相区别。

II. **特殊性：**

(1) 诸资本的积累。

(2) 诸资本的竞争。

(3) 诸资本的积聚（资本的量的差别同时就是质的差别，就是资本的大小和作用的**尺度**）。

III. **个别性：**

(1) 资本作为信用。

(2) 资本作为股份资本。

(3) 资本作为货币市场。

这两个提纲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可以看作同一个提纲的两个版本。与后来的提纲相比，这组提纲要呈现的主要是资产阶级社会形成之后资本的总体性作用及其对从前的各种社会关系——特别是劳动关系和土地所有制——的改造，从而将历史性的资本概念和一般性的货币概念区分开来。不过，这样的写作计划有两个难以克服的缺陷：第一，这个计划涉及的议题繁多庞杂，几乎囊括了当时经济学研究的所有领域，在短时间内几乎没有完成的可能；第二，更重要的是，这个计划虽然突出了资本和货币的差别，但是并没有体现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关系崩溃的潜在可能性，因而无法与后面国家、世界市场和危机的内容串联起来。

关于“资本一般”的第二组提纲，是马克思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前两个分册所拟订的提纲，是“资本一般”理论的首次整体出场。放弃了以“生产一般”为开端的“五篇计划”之后，马克思转而制订了以

“资本一般”为开篇“六册计划”①。新的写作计划中的第一册“资本”大大地缩减了涉及的经济学内容，论题也更加集中。在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付印稿之前，马克思根据新的写作计划为“资本一般”拟订了新提纲②：

(III) 资本一般
从货币到资本的过渡
(1) 资本的生产过程
(a) 资本和劳动能力的交换
(b) 绝对剩余价值
(c) 相对剩余价值
(d) 原始积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的前提）
(e) 占有规律的转变
(2) 资本的流通过程

“第一分册”写作完成后，马克思又在一个单独的笔记本上写下了另一个版本的“资本章”计划草稿，并大致上按照这个草稿写作了“1861—1863 年手稿”③：

I. 资本的生产过程
货币转化为资本
(α) 过渡
(β) 资本④和劳动能力的交换
(γ) 劳动过程
(δ) 价值增殖过程
(2) 绝对剩余价值
(3) 相对剩余价值
(α) 大量人的协作
(β) 分工
(γ) 机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9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31.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04.
③ 同②585-592.
④ 马克思在手稿中写的是“商品”，这里是《全集》编者根据所注手稿页码上的内容订正的。

（4）**原始积累**

（5）**雇佣劳动和资本**

II. 资本的流通过程

III. 资本和利润

在这第二组提纲中，马克思对“五篇计划”的第一篇和第二篇的内容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造。第一组提纲中的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混杂在一起，“一般性”这一章中既要讨论资本和劳动，也要讨论原料、劳动工具以及流通资本和固定资本。这样的讨论形式说明，马克思此时的论述主要还是按照批判对象的理论结构进行，尚未形成自己独立的论证逻辑。在第二组提纲中，马克思将理论对象限定在了可变资本及其再生产的过程，将不变资本排除在讨论范围之外。① 这样做有两个好处。第一，论域的缩小可以让马克思在较为有限的篇幅内呈现资本与其他价值形式的差别。在第一组提纲中，以价值增殖为目的的资本是第二篇论证的最终结果，在此之前需要对资本的一般性、特殊性和个别性进行完整的考察；而在第二组提纲中，通过可变资本的简短论述已经足以界定出资本的概念，并将其与简单流通中的商品和货币等价值的表现形式区分开来。第二，对可变资本的具体分析可以直接导出资产阶级社会中阶级对抗和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在“五篇”结构中，危机问题只有到第五篇才会出现；在第二篇中既没有关于危机问题的专门论述，也没有呈现出危机潜在的必然性。由于危机问题是马克思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现实和理论指向，这样的处理方式显然不可能让马克思满意。在第二组提纲中，马克思通过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比例变化论证了危机的必然发生，为马克思之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因此，在新的提纲中，马克思用“资本的生产过程”一篇奠定了整个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基础，在理论的精致程度上超越了第一组提纲所代表的“五篇计划”。

关于“资本一般”的第三组提纲，是马克思在“1861—1863 年手稿”写作进入尾声时再次拟订的一个提纲，是“资本一般”理论的完成

① 马克思认为，不变资本对于利润率的计算是必要的，但是在理解资本关系的一般性规定时却无关紧要。在“资本的生产过程”一章中，马克思在不变资本出现的地方有两种处理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将不变资本转换为其他可变资本的结果，对于无法转换的不变资本就需要采用第二种方式，将其放在其他的篇章进行讨论。

形式。1862 年，马克思在写作“1861—1863 年手稿”第 XVIII 笔记本的时候已经基本完成了对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性回顾和“资本一般”理论环节的整体构建，马克思开始再次审视“资本章”的写作计划，并重新拟订了“资本一般”章第一篇和第三篇的目录①，即“资本一般”的第三组提纲：

I. **资本的生产过程**

(1) 导言。商品。货币。

(2) 货币转化为资本。

(3) **绝对剩余价值；**

(a) 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

(b) 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c) 绝对剩余价值；

(d) 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

(e) **同时的各工作日**（同时雇佣的工人人数）。

(4) **相对剩余价值；**

(a) 简单协作；

(b) 分工；

(c) 机器等等。

(5) 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结合。

(6) 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原始积累。韦克菲尔德的殖民理论。

(7) **生产过程的结果**。（占有规律的表现上的变化可以在第 6 点或第 7 点中考察。）

(8) 剩余价值理论。

(9) 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

III. 资本和利润

(1) 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

(2) 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

(3) 亚·斯密和李嘉图关于利润和生产价格的理论。

(4) **地租**（价值和生产价格的区别的例解）。

(5) 所谓李嘉图地租规律的历史。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312-313.

（6）利润率下降的规律。

（7）利润理论。

（8）利润分为产业利润和利息。商业资本。货币资本。

（9）收入及其源泉。

（10）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中货币的回流运动。

（11）庸俗经济学。

（12）**结论。《资本和雇佣劳动》。**

与第一组和第二组提纲相比，第三组提纲已经与《资本论》中第1卷和第3卷的篇章安排高度一致。由于第二分册的出版计划临时取消①，马克思在1863年终止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写作。因此，这组提纲可以被看作“1861—1863年手稿”的总结，同时也是“资本一般”理论的最终成果。从这三组提纲的演变过程中可以看出，马克思1857—1863年间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是一个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过程，而且“资本一般”理论正是马克思从“1857—1858年手稿”向《资本论》过渡的中介环节。

第三节 “资本一般”理论的最终完成

“1861—1863年手稿”是“资本一般”创作期的收官之作，标志着马克思“资本一般”理论的最终完成。在“1861—1863年手稿”的基础上完整地呈现“资本一般”理论，是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前提。随着MEGA²和新版中文《全集》的出版，“1861—1863年手稿”首次大致以原始顺序展现在世人面前，为“资本一般”理论的重新发现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要理解马克思的“资本一般”理论及其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首先要重新审视过去对“1861—1863年手稿”

① 马克思原本委托拉萨尔来运作第二分册的出版，拉萨尔也曾提醒他应该在1860年12月前把第二分册的书稿准备好，并与第一分册由同一家出版社发行。但原来的出版计划由于书稿没有按时完成而最终落空。当马克思开始继续撰写第三章的时候，拉萨尔只得重新在柏林寻找出版商谈《政治经济学批判》续篇的发行事宜。1862年和拉萨尔的关系遇冷后，马克思准备等手稿修饰好并誊清后，亲自把它带到德国与出版商面谈，但最终没有成行，《政治经济学（第二分册）》的出版计划至此完结。

的编排方式，根据新文献重新研究“1861—1863 年手稿”的写作过程、创作主旨和理论内涵。

一、“1861—1863 年手稿”的写作过程

“1861—1863 年手稿”二十三个笔记本的写作从 1861 年 8 月开始，到 1863 年 7 月结束，每个笔记本具体的写作时间现在已无法全部一一确定。困难来自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笔记本上日期的标注比较混乱，只有少数几个笔记本注明了写作日期，马克思在大多数笔记本上都没有做类似的标注；其次，马克思手稿的写作经历了多次长短不一的中断①；最后，每个笔记本的写作过程可能会经历反复，也会出现留白、补写和改写的情况，已无法通过手稿内容本身确定其确切的写作时间。由于上述困难的存在，“1861—1863 年手稿”各个笔记本的写作顺序和写作时间至今仍未有定论。对“1861—1863 年手稿”各个笔记本写作时间的推测只能通过以下三个方面的材料来进行：马克思在笔记本封面上标注的日期、马克思在手稿中使用的报刊引文以及马克思 1861—1863 年间的书信。根据目前公布的材料，马克思“1861—1863 年手稿”的写作过程大体上分为五个阶段，可以概略地呈现如下：

第一阶段（1861 年 8 月—1862 年 3 月）：写作第二分册第一篇和第三篇的付排稿，包括第 I—IV 笔记本和第 V 笔记本的前 47 页，以及最终笔记本 I—II。1861 年 8 月到 1862 年 3 月，马克思写了第 I—V 笔记本，内容是“资本章”第一篇“资本的生产过程”的前三节；同时马克思还设了两个“最终笔记本”，写作第三篇“资本和利润”的内容。

第 I—II 笔记本的主要内容是“资本章”第一篇“资本的生产过程”的第一点“货币转化为资本”②，包括八个小标题。在 1858 年为“1857—1858 年手稿”七个笔记本做的索引中，“货币转化为资本”是“货币章”的第六篇③；在“第一分册”的初稿中，“货币转化为资本”被一拆为二，“货币章”第六篇的标题被改为“向资本过渡”④，“货币

① 在 1861—1863 年间，马克思曾前往曼彻斯特进行了短暂的游历，马克思的财务压力和健康状况也经常打断他的写作。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7.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03.

④ 同③365.

转化为资本”插入“资本和劳动能力的交换”之前成为“资本章”第一篇“资本的生产过程”的第一节。① 在“第一分册”的发行本中，第二章“货币或简单流通”只保留了“货币章”草稿中的前四篇，删去了第五篇和第六篇。根据马克思在“第一分册”出版后写的“资本章计划草稿”，原来计划中“向资本过渡”、“货币转化为资本”以及“资本和劳动能力的交换”三部分整合在一起并重新划分为四部分②，构成了“资本章”第一篇“资本的生产过程”的第一点“货币转化为资本”。

第 III 笔记本的内容是“资本的生产过程”的第二点“绝对剩余价值”，这一部分的篇幅较短，只写了第 95—124h 页共 38 页，从页码和纸张可以推测这 38 页是分三阶段完成的。第一阶段，马克思在第 III 笔记本的前 5 页上写了第一节“应当把剩余价值看成只是同一定的、即用于工资的资本部分的关系”，并在第 99 页的开头重新谋划了“绝对剩余价值”的写作要点③，这些内容应当是与第 I 笔记本同时写的④。第二阶段，马克思在第 100—106 页上写了后面四节，篇幅都很短，写作时间难以确定，可能是与第 II 笔记本同时写的。⑤ 此后，马克思留下了第 106—124 页的空白页，转而从第 125 页开始写“相对剩余价值”。第三阶段，马克思对“绝对剩余价值”的各节进行了反复的增补，这次增补的篇幅很长，具体起止时间难以确定，内容写在第 106—124 页以及后来插入的第 124a—124h 页。⑥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93-400.

② 在“资本章计划草稿”中，“资本的生产过程”的第一节“货币转化为资本”有四节：α. 过渡；β. 商品和劳动能力的交换；γ. 劳动过程；δ. 价值增殖过程。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92.

④ 第 III 笔记本最初编的页码是 1—6，后来马克思接着第 II 笔记本将这 6 页编为第 95—100 页。因此，笔者推测，马克思在第 I 笔记本上写“货币转化为资本”时，同时设立了一个独立的笔记本写“绝对剩余价值”；马克思用完了第 I 笔记本并开始写第 II 笔记本时，意识到最好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笔记编写连续的页码，于是在为第 II 笔记本标了第 54—94 页后，接着将第 III 笔记本的 1—6 页改为 95—100 页。

⑤ 第 III 笔记本第 95—100 页的页码和第 101—131 页的页码不是连续标上的，因为马克思在标注第 100 页（即原来的第 6 页）之后的页码时误将数字 100 看成了 160。据此可以推测，马克思写作第 100—101 页时出现了一次中断，而且第 101 页之后的内容应当是在第 II 笔记本设立之后才开始写的。当然，这样的证据并不充分，因为马克思也有可能是先写内容，而后才补标的页码。

⑥ 在第 III 笔记本第 124 和 125 页之间，马克思插入了第 124a—124h 共 8 页内容，根据 MEGA^{2}编者的考证，这 8 页内容“大约是与第 V 笔记本同时，直接在 196 页之后写作的”。从页码的情况来看，这 8 页也不是连续写成的，前 4 页 a—d 的页码是用墨水写的，页码 e 是用铅笔写的，a—e 页上的数字页码是在写作后三页 f—h 时补上去的。

在对“绝对剩余价值”进行增补的同时，马克思在第 III—V 笔记本写了第三点“相对剩余价值”① 的相关内容，从马克思的通信看，第三点的写作过程经常中断②，并至少持续到了 1862 年 3 月③。马克思写到第 V 笔记本第 211 页时停止了第三点的论述，直接在第 VI 笔记本上开始写“剩余价值理论”④。

除了上述五个笔记本外，“最终笔记本”和“最终笔记本 II”——第 XVI、XVII 笔记本——应当也是从这段时间开始写的，而且写作过程可能一直持续到 1862 年 10 月。“最终笔记本”上标注的日期是“12 月”，“最终笔记本 II”上标注的日期是“1862 年 1 月”。马克思可能在写第 IV—V 笔记本的时候就已经在谋划“政治经济学批判”系列笔记的最后一篇“资本和利润”，但是由于没法估计中间会写多少个笔记本，所以直接另设了一个单独的笔记本写第二分册最后一篇的内容，并将其命名为“最终笔记本”，随着篇幅的增加又设了“最终笔记本 II”。

第二阶段（1862 年 3 月—1862 年 6 月），主要是马克思对斯密经济学的相关评述，包括第 V—IX 笔记本和第 X 笔记本的前 24 页。1862 年 3 月底，马克思中断了第 V 笔记本的写作，转而从第 VI 笔记本上开始写第一篇的第五节“剩余价值理论”。第 VI 笔记本的主体部分在 1862 年 3 月底马克思前往曼彻斯特探望恩格斯前就已经完成了。4 月，马克思在曼彻斯特继续写第 VII 笔记本。回到伦敦后，马克思完成了第 VII—IX 笔记本，并且把原来的一个独立笔记本纳入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笔记本的序列，也就是第 X 笔记本。这五个笔记本的写作几乎没有中断，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和考茨基都对这些笔记做过标注或修改。

除了少量关于 J. 斯图亚特、重农学派和内克的内容，第 VI—IX 笔记本中主要的篇幅都用来讨论斯密的理论。马克思的评述基本上是按照《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章节顺序进行的，其中关于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64.

② 马克思在 1862 年 3 月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的书进展不很快，由于家务琐事，工作经常整个星期难于进行，也就是说被打断。”

③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 6 卷.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85.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7.

斯密的理论评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延续了第 IV 笔记本中关于斯密分工理论的批评，“研究年利润和年工资怎样才能购买一年内生产的、除利润和工资外还包含不变资本的商品”①；二是延续了第 V 笔记本第 184 页所拟订的写作计划②，讨论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问题**”③。第 VII 笔记本后半段以及第 VIII—IX 笔记本中，马克思在对斯密进行批判考察的同时，开始插入一些关于其他经济学家的评述。插入这些内容的直接目的是补充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争论，马克思专门用很长的篇幅讨论了“二流人物……反对亚·斯密的这场论战”④。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关于约翰·穆勒的观点的分析，马克思写了 28 页（第 318—345 页）。⑤

第 X 笔记本原来是一个独立的笔记本，写作时间至少早于第 IX 笔记本，前 24 页的内容是关于重农学派一些人物的补充。马克思本计划在讨论完斯密和内克之后就开始进入关于李嘉图的内容，然而此时马克思同时意识到手稿的理论部分需要进行扩充，因此他在一个单独的笔记本上写下了原计划中未包含的内容。这个独立笔记本逐渐影响了“政治经济学”手稿的写作，马克思在第 IX 笔记本中反复提及独立笔记本上的内容。1862 年 6 月初，马克思写完了第 IX 笔记本和独立笔记本的前 24 页⑥，结束了第二阶段的写作。

第三阶段（1862 年 6 月—1862 年 10 月），主要是对李嘉图经济学的相关评述，包括第 X 笔记本的后 34 页、第 XI—XIV 笔记本和第 XV 笔记本的前 30 页。马克思从 6 月中旬开始在独立笔记本第 25 页讨论第四个插入部分“洛贝尔图斯先生。洛贝尔图斯致冯·基尔希曼的第三封书简”⑦，这部著作的主要内容是对李嘉图地租理论的反驳。马克思对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55.

③ 同①135.

④ 同①161.

⑤ 同①167-216.

⑥ 独立笔记本的第 1—24 页后来被编为“政治经济学”第 X 笔记本的第 421—444 页；关于洛贝尔图斯的内容是从独立笔记本第 25 页开始写的，后来被改为第 445 页。

⑦ 洛贝尔图斯的著作是马克思从拉萨尔那里借来的。1862 年 6 月 9 日，拉萨尔给马克思写信，要求将书尽快归还。马克思不得不尽快对洛贝尔图斯的著作进行摘录，在 6 月中旬就获得了初步的成果，在 6 月 16 日给拉萨尔的回信中提到了关于洛贝尔图斯的几点意见，并在 18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已经揭穿了李嘉图地租学说的骗局。

李嘉图和洛贝尔图斯双方的观点都进行了批判，并开始建构自己的地租理论作为直接的回应。

从第 33 页开始，马克思将独立笔记本编入了“政治经济学”笔记本的序列，并且在目录中将魁奈、兰盖、布雷和洛贝尔图斯插入李嘉图之前，构成“剩余价值理论”的第 e—g 三节。① 马克思在第 XI 笔记本上继续写了关于洛贝尔图斯地租理论的评述，从第 522 页开始进入了对李嘉图著作的批判，其中关于“平均价格或费用价格和市场价格”② 的内容可能是提前写好后装订进来的。③

马克思在第 XII 笔记本上继续对李嘉图的地租理论进行分析，并且插入了关于斯密地租理论的长篇内容。④ 结束了对地租理论的分析之后，马克思在第 XII 笔记本的末尾和第 XIII 笔记本上接着评述了李嘉图的剩余价值理论、利润理论和其他相关论述。第 XIII 笔记本的末尾和第 XIV 笔记本的前 10 页评述了李嘉图的主要反对者马尔萨斯。

马克思在第 XIV 笔记本的封里为“剩余价值理论”余下的部分拟订了一个提纲⑤，接着马尔萨斯之后的内容是“李嘉图学派的解体”、“经济学家的反对派”、“拉姆赛”、“舍尔比利埃”和“理查·琼斯”。在第 XIV 笔记本和第 XV 笔记本中，马克思按照这个计划进行了写作，写了“李嘉图学派的解体”⑥ 和“以李嘉图理论为依据反对经济学家的反对派”⑦ 的一部分。1862 年 10 月，马克思在第 XV 笔记本中评述霍吉斯金时中断了“剩余价值理论”的写作⑧，转而开始完善第三篇“资本与利润”的理论内容，并对资本的各种形式进行了完整的分析⑨，手稿的第三个写作阶段至此结束。

---

① 马克思没有给魁奈的插入内容编号。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25.

③ 即笔记本中的第 542—556 页，这几页的原始页码是 142—156，马克思用铅笔将这些页码改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笔记本的连续页码。

④ 同②383.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5.

⑥ 同⑤70.

⑦ 同⑤209.

⑧ 同⑤301.

⑨ 同⑤322.

第四阶段（1862 年 10 月—1862 年 12 月）：完善整体结构，并继续完善理论史的部分，包括第 XV 笔记本的后 83 页、第 XVII 笔记本的后 37 页和第 XVIII 笔记本；第 XVI 笔记本和第 XVII 笔记本的前 7 页比较特殊，也可以放在这一部分做整体考虑。在这个阶段，马克思开始打算完成整个“资本章”的写作，而不仅仅是“剩余价值理论”或“资本的生产过程”以及“资本和利润”两篇。马克思补全了“资本一般”的理论缺环，并按照第 XIV 笔记本上的计划①补充了与“剩余价值理论”相关的其他政治经济学家的内容。上述工作的完成让马克思有了结束“政治经济学批判”笔记本写作的想法。在第 XVIII 笔记本接近末尾的地方，马克思重新拟订了“资本章”第一篇和第三篇的提纲②，开始着手整理“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的全部内容。1862 年底，他在给库格曼的信中写道：“第二部分终于已经脱稿，只剩下誊清和付排前的最后润色了。”③

从现存的资料可以推测，马克思在写作第 XV 笔记本时有了结束笔记本写作的打算。马克思在第 XV 笔记本第 890 页中断了“剩余价值理论”的写作，从第 891 页开始集中阐述他在“各种收入及其源泉”④ 方面的思考结果，主要内容是“资本的各种形式”⑤ 和“商业资本”⑥；在写作过程中，马克思还插入了“资本一般”理论的最后一个逻辑环节，即“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货币回流运动”⑦。马克思此时可能感觉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写作已经接近尾声，在第 XV 笔记本写完之后直接将上述补充性的内容写在“最终笔记本 II”的空白页上，并为两个“最终笔记本”编上了号码“XVI”和“XVII”。第 XVII 笔记本写完之后，马克思继续在第 XVIII 笔记本上完善第三篇“资本和利润”的内容。⑧ 完成了第三篇的补充之后，马克思在第 XVIII 笔记本中又回到了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5.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312-313.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636.

④ 同①.

⑤ 同①322.

⑥ 同②181.

⑦ 同②99.

⑧ 第 XVIII 笔记本的前几页（第 1066—1068 页）原本写的是关于“复利”的补充内容，这些内容可能在马克思写第 XVII 笔记本的最后几页前就已经完成了。马克思写完第 XVII 笔记本之后没有新设笔记本，而是在第 XVIII 笔记本上接着“复利”之后继续写“货币回流运动”。

“剩余价值理论”的写作，继续对霍吉斯金进行评述并完成了其余的部分。

第五阶段（1863 年 1 月—1863 年 6 月）：梳理笔记并再次增补资料，包括第 V 笔记本的后 9 页和第 XIV—XXIII 笔记本。1863 年 1 月，马克思再次回到第 V 笔记本中断的地方，试图对未完成的第一篇进行完善，并且又写了五个笔记本（第 XIV—XXIII 笔记本）。但是马克思没有完成这一任务就结束了手稿的写作，最后三个笔记本主要是引文的摘抄。

1863 年 1 月，马克思首先在第 V 笔记本上接着写“机器”的部分。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正在对机器这一节作些补充。在这一节里有些很有趣的问题，我在第一次整理时忽略了。为了把这一切弄清楚，我把我关于工艺学的笔记（摘录）全部重读了一遍，并且去听韦利斯教授为工人开设的实习（纯粹是实验）课”①。第 V 笔记本的纸写完之后，马克思另起了第 XIV 笔记本作为第 V 笔记本的继续。

最后几个笔记本大体上是依据第 XVIII 笔记本上的提纲对第一篇其余几点的完善，1863 年 1—5 月连续写下的这五个笔记本中，马克思明显想要继续甚至完成第一篇“资本的生产过程”的写作。在写作过程中，马克思再次修改了第 XVIII 笔记本中刚刚制订的提纲，在第 XX 笔记本第 1282 页结束了“(c) 机器”部分，并以“(h)”为标题下写了很长的内容，在第 XXI 笔记本第 1301 页又写了“(i)”，从第 1361 页起写了“(k) 资本的生产性，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从内容本身看，(h)、(i) 和 (k) 都是马克思新提纲中“资本的生产过程”篇的第五点“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结合”② 标题下的内容，应该接着第四点“相对剩余价值”之后开始写。但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笔记本中没有为第五点写作单独的笔记。在第 XXII 笔记本中，马克思跳过了第五点，直接写了第六点“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并接着“(3) 相对剩余价值”将其标记为“(4)”。

与之前十几个笔记本不同，马克思在最后几个笔记本的写作中大量地运用了第 VI—XVIII 笔记本中的资料，可以看作对整部手稿的系统回顾和利用。不过，“政治经济学批判”笔记本最终没有完成它的使命，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317.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313.

表 4　　“1861—1863 年手稿”各笔记本的写作时间推测

笔记本 \ 日期		1861		1862							1863	
		8—11 月	12 月	1—3 月	3—6 月	6 月	6 月	7—10 月	10—11 月	11—12 月	1 月	1—6 月
I—IV	1—174											
V	175—211											
	211—219											
VI—IX	220—420											
X	421—452											
	453—489											
XI—XIV	490—861											
XV	862—890											
	891—973											
XVI	973—1021											
XVII	1022—1028											
	1029—1065a											
XVIII	1066—1068											
	1068—1157											
XIX—XXIII	1159—1472											
写作阶段分期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第四阶段		第五阶段	

□第一篇“资本的生产过程”的手稿　■第三篇“资本与利润”的手稿　■三篇混杂的手稿

马克思在第 XXIII 笔记本停止了对第一篇的整理，这套庞大的系列笔记本停在了第 1472 页，留下了 25 页的空白。

二、“1861—1863 年手稿”的文本现状

“1861—1863 年手稿”二十三个笔记本写在马克思自己装订的笔记本上，每个笔记本最外面有一张纸专门作封面和封底，也就是说一般从第 3 页开始手稿的正文，封底的两页也很少用来写正文。笔记本的封面上大部分写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标题和笔记本的编号，封里写目录和其他增补内容，标为 A 页或 a 页，其他的纸张上标记连续的页码。每页纸写有 35—40 行字，字迹潦草且有很多缩写、代号，很难辨认。

第 I 笔记本：页码范围是第 1—53 页，由 28 张纸组成。第 I—V 笔记本使用的是同一种纸，但是由于对折的次数不同，大小并不统一。第 I 笔记本封面上写有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三章　资本一般”①，以及笔记本的编号“I”；封里则包含有日期“1861 年 8 月”、笔记本内容的目录以及几段补充的内容②，马克思将这一页标记为“A”。

第 II 笔记本：页码范围是第 54—94 页，由 22 张纸组成。这个笔记本没有用完，89-94 页共六页是空白③，之后的几张纸没有标页码，写满了数学演算式。第 II 笔记本封面上同样写有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三章　资本一般”和笔记本的编号“II”；不过封里没有写日期，只有笔记本内容的目录以及《大纲》的摘要④，马克思同样将这一页标记为“A”。根据笔记本中引用的内容⑤可以推测，第 II 笔记本大概写于 1861 年 9 月底。第 II 笔记本第 54—70 页是正文，从第 70 页开始是长篇的增补。

第 III 笔记本：页码范围是第 95—131 页，由 24 张纸组成；其中

---

① 马克思在这里没有写第一册的标题“资本”和第一篇的标题“资本一般”。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88.

③ 马克思后来在第 II 笔记本第 89—93 页这五页上写了关于分工的补充内容。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88-190.

⑤ 马克思在第 II 笔记本的最后几页增补上引用了《曼彻斯特卫报》（1861 年 9 月 17 日）上关于货币的文章，这份报纸是恩格斯寄给他的，马克思在 9 月 28 日的回信中说他现在非常需要它。

20 张纸与第 II 笔记本的尺寸相同，4 张插入的纸与第 V 笔记本的尺寸相同，马克思将其标为 124a—124h 八页。这个笔记本折叠得很不整齐，封面上有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笔记本编号“III”，没有标注日期和目录。第 III 笔记本原本是单独编页的一个笔记本，大部分内容是第一篇“资本的生产过程”的第二点“绝对剩余价值”。①

第 IV 笔记本：页码范围是第 138—174 页，由 20 张纸组成，尺寸与第 I 笔记本相同。封面上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标题和笔记本编号“IV”，封里 138a 包含有对正文的补充和“1857—1858 年手稿”的摘要②，没有写目录和日期。第 III 笔记本和第 IV 笔记本中都没有第 132—137 页，马克思可能是将第 III 笔记本最后一页的数字 131 误读为 137，因此从 138 页开始标注第 IV 笔记本的页码。

第 V 笔记本：页码范围是第 175—219 页，由 24 张纸组成。笔记本封面上写有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编号“V”，封里有“1857—1858 年手稿”的摘要和拉姆赛的一段引文，没有写目录和日期。封里原本依惯例标为“A”，后来马克思又补写了“175a”，将其编入正文。这个笔记本之前就编有页码，马克思用新的页码把它们覆盖了，旧页码已无法辨认。第 189、208、209 页没有写满，现已无法确定马克思当时想要补写的内容。

第 VI 笔记本：页码范围是第 220—272 页，由 28 张纸组成。封面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标题和笔记本编号“VI”，封里写有目录，总标题为“(5) 剩余价值理论”，即“资本章”第一篇“资本的生产过程”的第五点。

第 VII 笔记本：页码范围是第 273—330 页，由 32 张纸组成。封面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标题和笔记本编号“VII”，封里写有内容的目录，以及用铅笔标记的“重商主义者 317”③。第 283 页之后的 283a 和 283b 是后来标的，可能是因为马克思在第一次标页码时漏标了这一张纸。

第 VIII 笔记本：页码范围是第 331—376 页，由 24 张纸组成。这个笔记本由两种纸装订而成，外面 8 张纸的纸张与第 VI 笔记本相同，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92.

② 同①395-397.

③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 6 卷.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104.

里面几张纸与第 VII 笔记本相同。封面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标题和笔记本编号“VIII”，封里写有目录，以及用铅笔标记的“托伦斯，本笔记第 387 页”①。马克思这里把页码写错了，手稿中提到托伦斯是在第 337 页，而且第 VIII 笔记本也没有第 387 页。这个笔记本的第 337 页上标有日期“目前（1862 年春）”②，是判断第 VI—IX 笔记本写作时间的主要依据。

第 IX 笔记本：页码范围是第 377—420 页，由 24 张纸组成。封面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标题和笔记本编号“IX”，封里写有内容的目录，以及用铅笔标记的“重商主义者（408）”③。

第 X 笔记本：页码范围是第 421—489 页，由 36 张纸组成。封面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标题和笔记本编号“X”，封里写有内容的目录。第 X 笔记本原来是马克思专门用来写“插入部分”④ 的一个独立的笔记本，目的是评述一些之后才可能要研究的问题⑤。第 X 笔记本的页码是重新单独排列的 1—32，而且内容与第 IX 笔记本也没有明显的逻辑承接关系。从笔记的相互引用情况来看，第 X 笔记本的写作时间可能与第 IX 笔记本第 402 页之后的内容同时或交替进行。⑥ 后来马克思将这个独立笔记本的页码编入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列中。

第 XI 笔记本：页码范围是第 490—580 页，由 79 张纸组成，纸张的尺寸不统一，并有一张散页（第 574—575 页之间）。封面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标题和编号“XI”，封里写有目录和一些引文。这个笔记本的许多页码都改动过，其中第 542—556 页原来的页码是 142—156。

---

①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 6 卷.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105.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02.

③ 同①106.

④ 同②374.

⑤ 马克思在 1862 年 6 月 18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正在把这一卷大加扩充，因为德国的狗东西是按篇幅来估量一本书的价值的。现在我终于顺便把地租这个烂摊子（但是在这一部分我一点也**不**打算**涉及**它）清理出来了。很久以来，我就怀疑李嘉图的学说是否完全正确，现在我终于揭穿了骗局。在我们没有见面的这一期间，我又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极其新鲜的东西，准备加到这一卷里去。”

⑥ MEGA^{2}的编者对此有详细的考证，认为“笔记本 IX 的结尾部分，至少是关于奈克尔（即内克——引者注）的论述，是在经过了短暂的中断之后写的”；“马克思在这段时间内在一个独立笔记本（后来是笔记本 X）中写了‘插入部分。魁奈的经济表’以及关于兰盖和布雷的论述”。

因此，第 XI 笔记本可能是把已经写好的散页装订在一起的。

第 XII 笔记本：页码范围是第 581—669 页，由 46 张纸组成，其中第 644、645 页之后各有一张纸被撕掉了，而且漏标了页码 649。封面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标题和编号“XII”，封里写有目录和一些引文，没有日期。由于笔记本的纸被撕掉了两张，第 603—604 页和第 605—606 页的两张纸是散页。第 XII 笔记本的页码大多已经难以辨认，几乎全部用铅笔描画过。

第 XIII 笔记本：页码范围是第 670—770a 页，由 52 张纸组成。封面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标题和编号“XIII”，封里写有目录、增补和一些引文，没有日期。笔记本的正文只写到了第 770 页，马克思后来在封底上对第 716 页进行了增补，并将封底页码编为 770a。

第 XIV 笔记本：页码范围是第 771—861 页，由 48 张纸组成，页码漏标了 838，第 850 页和第 853 页的背面分别标为 850a 和 853a。封面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标题和编号“XIV”，以及时间标记“62 年 10 月”，封里写着马克思为之后几个笔记本拟订的写作计划。[①] 这个笔记本的封皮严重损坏，第 771—772 页和第 860—861 页已经散开，从笔记本中脱落下来，这张纸的下半部分现在保存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

第 XV 笔记本：页码范围是第 862—973 页，由 60 张纸组成。封面上标有日期“62 年 10 日”，以及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编号“XV”；封里中的目录是对第 XIV 笔记本里的写作计划的细化。马克思在第 XV 笔记本的最后一页和第 XVI 笔记本的第一页上标的都是第 973 页。这个笔记本的页码情况比较混乱，第 870、947、949 页之后各有两页没有编页码，后来编为 870a 和 870b、947a 和 947b、950a 和 950b；第 865、866 页标了页码，但马克思写作时将这两页漏了，完成第 870a 页之后，马克思接着在这两页上补写了内容，然后接着写 870b，马克思在这几页上都做了标记。

第 XVI 笔记本：页码范围是第 973—1021 页，由 24 张纸组成。笔记本的封皮的纸张与其他部分的纸张不同，可能是后来加上的。封面上写有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　最后的笔记　12 月”，封里写着内容的目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5.

录。马克思最初用拉丁字母和希腊字母标记这个笔记本的页码，后来接着第 XV 笔记本将这些字母改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笔记本的连续数字页码。笔记本的最后一页有关于内容的提示：“李嘉图和学派 977、韦克菲尔德 975、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平均利润率 982、竞争 976、资本主义生产 979。”①

第 XVII 笔记本：页码范围是第 1022—1065a 页，由 24 张纸组成。封面上写有标题“最终笔记本 II　政治经济学批判　1862 年 1 月”，以及一个提示“从第 1029 页开始续第 XV 笔记本（1862 年 10 月和 11 月）”。第 XVII 笔记本的封面是一张散页，上面同时写着“笔记本 XVII”和“XVIII”，马克思在正文第一页（即第 1022 页）的页眉上又特别标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　XVII”。第 XVII、XVIII 笔记本可能原来是装订在一起的，马克思后来把第 1066 页及之后的纸张分离出去，设为单独的第 XVIII 笔记本，因此这两个笔记本共用着同一个封面。第 XVII 笔记本最初用拉丁字母和希腊字母标记页码，马克思后来接着第 XVI 笔记本将这些字母改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笔记本的连续数字页码。

第 XVIII 笔记本：页码范围是第 1066—1157 页，由 46 张纸组成。这个笔记本没有封皮，马克思在第 1066 页的页眉标记了笔记本的编号“XVIII”，具体原因见第 XVII 笔记本的介绍。第 1068 页有一个提示“续笔记本 XVII（第 1065a 页）”，第 1066—1068 页上关于“复利”的内容很可能是之前写上去的。

第 XIX 笔记本：页码范围是第 1159—1241 页，由 42 张纸组成，第 1241 页没有写完。封面上标有日期“1863 年 1 月”，以及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编号“XIX”；封里上标注“笔记本 V 的续篇”。

第 XX 笔记本：页码范围是第 1242—1294a 页，由 32 张纸组成。封面上有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编号“XX”，以及日期“1863 年 3 月”，马克思后来又补上了“4 月、5 月”；封里写有内容目录和一个增补。在第 1273、1274 页，马克思剪贴了 1863 年 3 月 24 日《泰晤士报》的部分内容。

第 XXI 笔记本：页码范围是第 1300—1345 页，由 24 张纸组成。封

①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 6 卷.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12.

面上有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编号“XXI”，以及日期“1863 年 5 月”；封里写有内容目录和一个提示“休谟和马西（利益）”。第 XXI 笔记本的部分纸张被直接剪走，贴在了“1863—1865 年手稿”的第六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中，部分页码也被直接改成了第六章的页码。

第 XXII 笔记本：页码范围是第 1346—1406 页，由 32 张纸组成。封面上有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编号“XXII”，以及日期“1863 年 5 月”；封里写有一个提示“历史部分。配第”，以及内容目录和一些著作的提示。

第 XXIII 笔记本：页码范围是第 1407—1472 页，由 47 张纸组成。封面上有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编号“XXIII”，以及日期“1863 年 6 月”；封里写有一些著作作者的名字，没有目录。第 XXIII 笔记本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笔记本序列的最后一本，内容和页码都只写到了第 1472 页，笔记本的纸张没有用完。

在“1861—1863 年手稿”写作过程中和完成后，马克思应当不止一次重读了这部手稿的全部内容，用墨笔、铅笔和红笔等多种类型的笔对手稿进行了标记。马克思在重读手稿时写下的标记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标记可能会在新手稿中采用的段落。马克思在读这类段落时，会在笔记本纸张的边上用线条进行标记，并写下可能采用这些段落的章节。例如在第 V 笔记本第 200—201 页，马克思画了贯穿整页的竖线，并在边上标记了“Profit”。① 第二类是标记可能会在新手稿中使用的例子和引文。马克思在遇到这类例子或者引文时，会在相应的句子或者词下面用横线进行标注；例子数量较多的时候，马克思还会在页边用数字注明例子的顺序。② 第三类是标注在新手稿中已被使用的内容。马克思在“1861—1863 年手稿”中对已经纳入新手稿的内容都进行了消除标记，消除符号通常是逐段画下的直线或斜线，也有标记在页边的消除符号。在写作“1863—1865 年手稿”时，马克思还曾将“手稿”第 XXI 笔记本中的一些内容裁剪粘贴到了新手稿中相应的位置。但是由于“1863—1865 年手稿”没有完整地保存下来，因此无法完全确定“1861—1863 年手稿”在新手稿中被利用的情况，现在只能通过手稿本身的标记

① Karl Marx.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Manuskript 1861-1863) Teil 1// 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II/3.1. Berlin: Dietz Verlag, 1976: 304-306.

② 同①196.

以及《资本论》第1卷的成稿来推测“1861—1863年手稿”内容的应用。

“1861—1863年手稿”的历任拥有者和编辑者都在原稿上留下了一些标注和记号，目前每页手稿上都有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和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档案馆所做的页码标记（印章），因不影响手稿内容的解读，文中不再一一列举。

三、“1861—1863年手稿”的出版情况

马克思死后，恩格斯获得了“1861—1863年手稿”全部二十三个笔记本。在《资本论》第2卷的序言中，恩格斯将“1861—1863年手稿”当作马克思为《资本论》留下的第一份亲笔材料①，并对手稿的内容进行了简略的介绍②。在《资本论》第2、3卷出版之后，恩格斯曾与考茨基和劳拉·拉法格沟通过该手稿对于加工《资本论》的作用，最终决定以“1861—1863年手稿”中“剩余价值理论”部分为主体来扩充、出版《资本论》余下的理论史批判内容。但是恩格斯没有完成这一计划就逝世了，他在遗嘱中将包括“1861—1863年手稿”在内的马克思的全部亲笔手稿留给了爱琳娜·马克思。从1895年开始，考茨基受托出版《剩余价值理论》，并拿到了“1861—1863年手稿”原件。20世纪20年代初，《剩余价值理论》三卷本出版后，考茨基将“1861—1863年手稿”移交给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纳粹在德国执政之后，“1861—1863年手稿”没有随其他手稿一起运往哥本哈根丹麦社会民主党档案馆，不知所踪。1936年，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得到了完整的“1861—1863年手稿”，并在此后近四十年的时间里以“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论》第二稿”为主题陆续出版了“1861—1863年手稿”的大部分内容。

“1861—1863年手稿”的第VI—XV笔记本、第XVIII笔记本、第XX—XXIII笔记本构成了后来的《剩余价值理论》的主要内容，并最早面世。1905—1910年，考茨基就编辑出版了《剩余价值理论》，他对马克思的手稿的内容做了多处删改。1954—1961年，苏联重新编辑出版了《剩余价值理论》俄文新版本，1956—1962年又出版了该书的德文单行本。1962—1964年，《剩余价值理论》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全

① 恩格斯当时可能没有看到马克思“1857—1858年手稿”的七个笔记本，因此将“1861—1863年手稿”当作《资本论》的“第一个手稿”或“第一种稿本”。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7.

集》俄文第二版第 26 卷（共三册）出版。除《剩余价值理论》之外，“1861—1863 年手稿”中的其余的内容经编辑后分别于 1973 年和 1980 年收录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的第 47、48 卷。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中，“1861—1863 年手稿”由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的编译体例全部译成中文。1985 年《全集》中文第一版的第 48 卷出版，标志着“1861—1863 年手稿”的中译本全部发表，手稿的内容分别收录在第 26 卷第 I—III 册、第 47 卷和第 48 卷中。

表 5　“1861—1863 年手稿”在《全集》中文第一版中的编排情况

<table>
<tr><th colspan="2">卷次</th><th>收录笔记</th><th>笔记内容</th></tr>
<tr><td colspan="2" rowspan="3">47</td><td>第 I—IV 笔记本
第 V 笔记本的前 37 页</td><td>“资本的生产过程”</td></tr>
<tr><td>第 V 笔记本的后 9 页</td><td>中断后恢复写作的“资本的生产过程”</td></tr>
<tr><td>第 XIX—XX 笔记本</td><td>接续第 V 笔记本继续写作“资本的生产过程”</td></tr>
<tr><td rowspan="3">26</td><td>I</td><td>第 VI—X 笔记本</td><td rowspan="3">剩余价值理论</td></tr>
<tr><td>II</td><td>第 X—XIII 笔记本</td></tr>
<tr><td>III</td><td>第 XIII—XV 笔记本
第 XVIII 笔记本</td></tr>
<tr><td colspan="2">48</td><td>第 XV 笔记本的一部分
第 XVI—XVII 笔记本
第 XVIII 笔记本的一部分
第 XXI—XXIII 笔记本</td><td>资本的生产过程；商业资本、平均利润；资本和利润</td></tr>
</table>

尽管俄文第二版“1861—1863 年手稿”比考茨基的版本更加符合手稿的原貌，但是俄文版的编者也并没有依据手稿的写作顺序来编排，而是按照一定的理论体系对手稿进行了重构。特别是在编辑第 47、48 卷时，俄文第二版的编者按照《资本论》前三卷的结构剪裁了“1861—1863 年手稿”的内容，通过删改、移置拼凑出了手稿中原本并不存在的“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而且第 XV 笔记本中的“收入及其源泉”则完全没有收入。这种编排方法不仅破坏了手稿的整体性，也违背马克思的原意。特别是马克思在第 XVIII 笔记本中已经拟订了第一篇和第三篇的章节计划，而俄文第二版的编者没有按照马克思的提纲进行编排，这种编辑方法是值得商榷的。

表 6 “1861—1863 年手稿”在 MEGA² 中第 II 部分第三卷的第 1—6 册的编排情况

册次	收录笔记	写作时间	笔记内容
1	第 I—IV 笔记本 第 V 笔记本的前 37 页	1861 年 8 月—1862 年 3 月	第一篇“资本的生产过程”
2	第 VI—X 笔记本	1862 年 3 月—1862 年 10 月	剩余价值理论
3	第 X—XIII 笔记本		
4	第 XIII—XV 笔记本		
5	第 XV 笔记本的后 30 页	1862 年 10 月—1862 年 11 月	商业资本
	第 XVI 笔记本 第 XVII 笔记本的前 7 页	1861 年 12 月—1862 年 10 月	第三篇“资本和利润”
	第 XVII 笔记本的后 37 页 第 XVIII 笔记本	1862 年 10 月—1862 年 12 月	续商业资本 其他补充材料
6	第 V 笔记本的后 9 页	1863 年 1 月	续第一篇
	第 XIX—XXIII 笔记本	1863 年 1 月—1863 年 6 月	续第一篇

MEGA² 陆续出版后，“1861—1863 年手稿”第一次被按照时间顺序发表在 MEGA² 第 II 部分第三卷的第 1—6 册中。它的发表使研究者终于可以了解手稿的原貌，提供了推进“1861—1863 年手稿”研究的文献基础。除了 MEGA² 之外，目前按照时间顺序发表的“1861—1863 年手稿”还有两个版本，分别是英文版和日文版的《〈资本论〉手稿集》。不过这两个版本可以看作 MEGA² 的翻译版，不再单独列表。

目前，关于 MEGA² 版“1861—1863 年手稿”编排原则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对第 XVI 笔记本和第 XVII 笔记本前 7 页的写作日期的判断上。马克思在第 XVI 笔记本上标有“12 月”，在第 XVII 笔记本的封面上标有“1862 年 1 月”和“从第 1029 页开始续第 XV 笔记本（1862 年 10 月和 11 月）”。MEGA² 的编者据此推测，“1862 年 12 月，马克思写第 XVI 笔记本”，认为第 XVI 笔记本是紧接着第 XV 笔记本写的。他们继而推断第 XVII 笔记本上注明的“1862 年 1 月”是一个笔误，该笔记本实际上写于“1863 年 1 月”。MEGA² 的编者给出的理由是马克思还没有习惯用新的一年的年数。《全集》中文第一版也沿袭了这样的推论，而且也没有做必要的说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的“1861—1863 年手稿”编排没有采用 MEGA² 编者的判断，而是采用了新的时间排序。中文第二版编

者根据理论阐述、所标日期、所用纸张特点三个方面的因素，将第 XVI 笔记本和第 XVII 笔记本前 7 页放在了第 V 笔记本（1861 年 12 月中断于第 211 页）和第 VI 笔记本（1862 年 3 月）之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中第 32—37 卷对“1861—1863 年手稿”的编排方式既不同于俄文第二版也不同于 MEGA²，因此可以看作现行“1861—1863 年手稿”的第三个版本。

表 7　　“1861—1863 年手稿”在《全集》中文第二版中的编排情况

<table>
<tr><th>卷次</th><th>收录笔记</th><th>写作时间</th><th>笔记内容</th></tr>
<tr><td rowspan="2">32</td><td>第 I—IV 笔记本
第 V 笔记本的前 37 页</td><td>1861 年 8 月—1862 年 3 月</td><td>第一篇“资本的生产过程”</td></tr>
<tr><td>第 XVI 笔记本
第 XVII 笔记本的前 7 页</td><td>1861 年 12 月—1862 年 10 月</td><td>第三篇“资本和利润”</td></tr>
<tr><td>33</td><td>第 VI—X 笔记本</td><td rowspan="3">1862 年 3 月—1862 年 10 月</td><td rowspan="3">剩余价值理论</td></tr>
<tr><td>34</td><td>第 X—XIII 笔记本</td></tr>
<tr><td>35</td><td>第 XIII—XV 笔记本</td></tr>
<tr><td rowspan="2">36</td><td>第 XV 笔记本的后 30 页</td><td>1862 年 10 月—1862 年 11 月</td><td>商业资本</td></tr>
<tr><td>第 XVII 笔记本的后 37 页
第 XVIII 笔记本</td><td>1862 年 10 月—1862 年 12 月</td><td>续商业资本
其他补充材料</td></tr>
<tr><td rowspan="2">37</td><td>第 V 笔记本的后 9 页</td><td>1863 年 1 月</td><td>续第一篇</td></tr>
<tr><td>第 XIX—XXIII 笔记本</td><td>1863 年 1 月—1863 年 6 月</td><td>续第一篇</td></tr>
</table>

根据现有的文献材料来看，中文第二版编者的判断比 MEGA² 编者的判断更加尊重手稿的原始状况，但这两种编排方式都没有反映出马克思写作手稿时出现的在数个笔记本上同时写作的情况。例如，第 X 笔记本与第 IX 笔记本显然是同一时期写下的；第 XVI、XVII 笔记本原本被马克思命名为“最终笔记本 I”和“最终笔记本 II”，根据所注日期和纸张判断，“最终笔记本 I”大约是和第 IV 或第 V 笔记本同时开始写作的，后来才插入“1861—1863 年手稿”二十三个笔记本序列，编为第 XVI 和第 XVII 笔记本。因此，MEGA² 和《全集》中文第二版的编者对第 XVI 笔记本和第 XVII 笔记本前 7 页的判断都值得商榷，马克思应当是分别从 1861 年 12 月和 1862 年 1 月开始写作这两个笔记本，而且一直写到了 1862 年 10 月；之后马克思才在写作第 XV 笔记本的同时将这两个笔记本编为第 XVI、XVII 笔记本，并在第 XVII 笔记本上继续写作。

综合以上信息，并参考相关文献，可以用下面这个表简要地说明

“1861—1863 年手稿”在各个发行版本中编排情况的差异。

表 8 “1861—1863 年手稿”各笔记本在三个版本中的编排情况对照表

<table>
<tr><th>写作时间</th><th>收录笔记</th><th>俄文二版（中文一版）</th><th>MEGA²版</th><th>中文二版</th></tr>
<tr><td>1861 年 8 月—
1862 年 3 月</td><td>第 I—IV 笔记本
第 V 笔记本的前 37 页</td><td>主要在第 47 卷
部分在第 26 卷（I）</td><td>II/3.1</td><td>第 32 卷</td></tr>
<tr><td rowspan="3">1862 年 3 月—
1862 年 10 月</td><td>第 VI—X 笔记本</td><td>主要在第 26 卷（I）
部分在第 26 卷（II、III）</td><td>II/3.2</td><td>第 33 卷</td></tr>
<tr><td>第 X—XIII 笔记本</td><td>主要在第 26 卷（Ⅱ）
部分在第 26 卷（Ⅰ、III）</td><td>II/3.3</td><td>第 34 卷</td></tr>
<tr><td>第 XIII—XV 笔记本</td><td>主要在第 26 卷（III）
部分在第 48 卷</td><td>II/3.4</td><td>第 35 卷</td></tr>
<tr><td>1862 年 10 月—
1862 年 11 月</td><td>第 XV 笔记本的后 30 页</td><td rowspan="3">主要在第 48 卷
部分在第 26 卷（II）</td><td rowspan="3">II/3.5</td><td>第 36 卷</td></tr>
<tr><td>1861 年 12 月—
1862 年 10 月</td><td>第 XVI 笔记本
第 XVII 笔记本的前 7 页</td><td>第 32 卷</td></tr>
<tr><td>1862 年 10 月—
1862 年 12 月</td><td>第 XVII 笔记本的后 37 页
第 XVIII 笔记本</td><td>第 36 卷</td></tr>
<tr><td>1863 年 1 月</td><td>第 V 笔记本的后 9 页
第 XIX—XX 笔记本</td><td>第 47 卷</td><td rowspan="2">II/3.6</td><td rowspan="2">第 37 卷</td></tr>
<tr><td>1863 年 1 月—
1863 年 6 月</td><td>第 XXI—XXIII 笔记本</td><td>第 48 卷</td></tr>
</table>

第二章 “资本一般”的批判对象和批判方法

“资本一般”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计划的开端，同时也是其中最为抽象的部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通过对“第一分册”和“1861—1863年手稿”的重新解读可以发现，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社会时采用了一种以概念批判辅助社会批判的独特批判方法，而“资本一般”是从概念批判向社会批判过渡的中介环节。商品、货币和资本是抽象性依次递减的经济概念序列，概念的抽象程度越高，其内在矛盾也就越明显，其获得现实性或普遍性所必需的中介也就越复杂。经过严密的辩证逻辑演绎之后，马克思证明了体现在商品交换、货币流通和资本流通中的价值规律都是现代资本生产的抽象表现形式，它们之间虽然存在着形式上的对立，但是拥有共同的现实基础，即现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应地，各种以现存的商品、货币或资本为前提的经济学理论看似符合唯物主义的立场，实际上都已经或直接或间接地认可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合理性。因此，“资本一般”尽管具有经济学的外表，但它实际上是对古典经济学方法论的整体批评，即用逻辑的方法证明现存的商品、货币和资本为什么不可以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前提。在“资本一般”部分，马克思的批判方法并不是提出另一种经济学理论来替代已有的经济学理论，也不是直接针对个别代表人物、具体章节的孤立评论，而是将各种相互对立的经济学概念全部纳入“资本一般”的辩证逻辑环节中加以理

解，而“这种阐述同时也就是对全部经济学文献的批判”①。

第一节 作为批判对象的“资本”

“资本一般”理论直接的批判对象是政治经济学中的形形色色的价值理论和资本理论。在过去的马克思经济学思想研究中，研究者往往囿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逻辑，侧重于挖掘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以及唯物史观在经济学中的运用，相对忽视了马克思在进行这些讨论时所处的经济学语境，相应地也就忽视了其批判对象——价值理论和资本理论——的具体内容。政治经济学的资本理论在传统的解释中往往被简单地归结为对资产阶级的理论辩护，这样的论断严重阻碍了学界对于古典经济学的细致研究。古典经济学与唯物史观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需要放在更加宽广的思想史背景中才能得到恰当的定位。政治经济学提出价值理论和资本理论具有现实的动机，即为货币积累的合理性做辩护。传统道德哲学认为货币财富的追求是有损德性的，美德总是伴随着克制与节俭，但是古典经济学证明了对资本积累的追求更加有利于普遍利益的实现。通过将价值作为财富的真正内容，斯密解决了货币积累的道德困境，个人为了积累货币而进行的生产客观上将导向社会个体利益的普遍实现。在斯密之后，资本理论由于无法整合利润理论和价值理论之间的矛盾而走向分裂，一派坚持利润理论而走向庸俗化，另一派坚持价值理论而走向社会主义。古典经济学中“资本”和“价值”之间的矛盾以及关于利润问题的争论，是“资本一般”理论出场的历史语境，也是理解“资本一般”理论的必要背景。在“1861—1863 年手稿”中，马克思以“剩余价值理论”为题在第 VI—XVIII 笔记本专门评论了政治经济学发展史，系统地回顾了古典经济学利润理论的形成及其分化的过程。

一、“资本—利润”模型的形成过程

基于劳动价值预设的资本积累理论是古典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贡献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0.

之一，同时也是马克思“资本一般”理论最主要的批判对象。古典经济学既是经济学，也是道德哲学，它的理论目标不仅是研究国民财富的增长，同时也是在论证一种合乎理性和道德的社会秩序。斯密通过他的资本积累理论为自由市场辩护，认为充分竞争条件下的自由生产会带来最佳的社会福利状态。然而他的理论内部存在着道德悖论，在理论上将直接从事劳动的工人放置在了不平等的社会位置上。这一道德悖论在经济学理论中表现为价值理论和利润理论的矛盾：价值意味着等价交换，象征着平等互利的社会关系；而利润是对等价交换原则的否定，体现为直接的不平等。不过，古典经济学认为积累具有优先性，即使它违背了平等原则；资本积累虽然会造成相对的贫富差距，但是也消灭了绝对的贫困。在持古典立场的经济学家看来，获得利润的资本不仅是必要的不平等，而且是必然的不平等。

“资本—利润”关系是马克思对斯密经济学理论的总结，“所有的古典经济学家一般都用这种关系来说明资本关系本身”①。资本本身是货币，但它是可以带来货币的货币，额外货币（即利润）从何而来一直是古典经济学研究的目标。在“资本—利润”模型中，资本组织下的生产是利润的来源，“等量资本平均说来提供等量利润，或者说，如果平均利润率既定，利润量就取决于预付资本量”②。根据斯密的资本理论，利润是扣除原料价格和劳动成本之后的产品剩余：劳动生产率由于资本积累程度的提高而得到发展，从而使得单位时间的劳动可以创造出更多的产品，这些多出来的产品就构成了利润的来源；在进一步的社会分配中，产业资本创造的剩余产品转化为付给土地所有者的地租、付给货币所有者的利息和付给产业资本家的产业利润。斯密将利润看作资本积累的合理回报，他对资本的辩护不仅是经济辩护，而且也是道德辩护。在斯密的理论框架中，资本家通过经济活动获得利润不仅是道德的和正义的行为，他们还因此而成为文明社会的引领者和组织者。相比之下，在传统社会中拥有崇高地位的贵族阶层反而是社会的附庸和累赘，对社会生产的积累和社会福利的增长没有积极影响，甚至只有消极和负面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利润的真实来源和分配原则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59.

② 同①70.

尽管是经济学研究中争论的核心议题，不过经济学研究者对利润问题的特别关注是从李嘉图学派解体之后才开始的。在此之前，斯密的资本理论虽然存在着逻辑不自洽的致命漏洞，但斯密本人对此并不关心；在斯密活跃的18世纪中叶，经济学研究仍然总是与某种政策主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斯密的资本理论是为论证自由主义政策而提出的混杂着道德哲学和社会理论的政策经济学，斯密提出“资本—利润”模型是为了证明，与重商主义的干涉政策相比，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更具优越性。为了证明自由秩序下资本家为生产做出的贡献，斯密将价值作为财富的尺度，并从价值理论出发批评了以货币为财富尺度的重商主义和以产品为财富尺度的重农主义。在与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的论战中，斯密似乎没有给他理论内部的矛盾给予足够的重视，也没有试图去解决这些矛盾。因此，如果要理解斯密的资本理论，就不能局限于其内部的叙述逻辑，同时还必须参照它的批评对象，即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的支持者。

重商主义以货币作为国民财富的尺度，在政治上要求干预主义的社会秩序。从15世纪到17世纪，经济学的主要研究目标是制定出能够增加国家财富的经济政策，持政府干预主义观点的重商主义者长期占据着经济学研究的主导地位。重商主义者认为利润（即剩余价值）产生于产品价值的加价，在这种情况下，一人之所得必然是他人之所失。在重商学派的解释中，经济活动本身并不会带来净产品（即扣除社会成本之后的社会产品），财富的总量也不会增长，社会经济活动只是社会产品的再分配过程。因此，“剩余价值——即利润，利润形式的剩余价值——完全是用**交换**，用商品高于它的价值出卖来解释的”①。在现代社会形成之前，获取利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经院哲学当作非道德的、违背自然秩序的经济动机；重商主义继承了经院哲学的经济学②观点，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1.

② 经院哲学中是否有成型的经济学，至今仍然存有争论。但不可否认的是，经院哲学中关于“公平价格”（人不应当在交换中获利）和“合理财产”（过多的物质财富会导致德行的堕落）的讨论构成了重商主义经济学的最为主要的智力来源。经院哲学对经济行为的道德批评并没有因为古典经济学的出现而消失，反而随着自由主义经济学在现实和理论中的繁荣而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在晚期重商主义和19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中，经院哲学的立场仍然经常会在理论上重现，甚至在德国观念论哲学对英、法自由主义的批评中也仍然可以看到经院哲学的痕迹。

认为在交易中获利是非道德的、非自然的行为。获利行为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是合理的，即为了国家财富增长而进行的生产和贸易。为了促进一国财富的有效积累，重商主义者主张国家有意识地对经济活动进行控制，通过压低工人的工资降低生产成本，通过税收政策和产业计划扶持出口商品生产，通过关税保护来保证国际贸易顺差。简而言之，重商主义的利润理论是为干预主义的经济政策做辩护的，将利润的来源看作流通过程中对等价交换原则的人为否定。

重商主义的观点后来尽管“被亚·斯密从古典科学中赶出去了”，但在现实中仍然遗留着深远的影响力；在自由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实践遇到挫折的时候，重商主义对经济动机的批评和干预主义立场总会被再次提及，“特别是在社会主义者中间，这种见解仍然阴魂不散”①。重商主义总体上认为市场本身是有缺陷的，重商主义者带有浓重的传统色彩，往往把自己当作医生，认为自己能够发现并医治社会的病痛。在重商主义者看来，经济学研究的目标就是洞察经济规律，从而对经济体的缺陷进行干预和修补。重商主义者提出了多种经济干预的方案，例如制度结构的变革、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涉等等，这些主张后来遭到了斯密的猛烈批评。

与重商主义不同，重农主义以产品作为国民财富的尺度，在政治上要求自由主义的社会秩序。作为重商主义政策的反对者，重农学派在18世纪中期提出了自由放任的经济主张。重农学派在经济活动中发现了农业生产中“净产品”的存在，认为财富的增长来自净产品的积累，净产品的增长是利润的真正来源。由于农业生产特殊的增殖性，经济活动就可以在不损害任何人利益的情况下实现财富的增殖。马克思认为，重农学派是现代经济学的真正鼻祖②，“重农学派把关于剩余价值起源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直接生产本身的领域，这样就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奠定了基础”③。不过，重农主义的利润理论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由于“农业劳动是一种使剩余价值的创造在物质上显而易见，而且可以

---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3.

② 马克思认为，重农学派的理论贡献有两点：首先，重农学派分析了“资本在劳动过程中借以存在的物质要素”，只是尚未直接将这些物质要素当作资本来理解；其次，重农学派“确定了资本在流通中所采取的形式……并且一般地确定了资本的流通过程和再生产过程之间的联系”，只是尚未采用固定资本、流动资本这些名词。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6.

不经过流通过程就表现出来的劳动”①，重农学派的研究者将农业劳动视为唯一的生产劳动，将地租视为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从而将利润视为“一种较高的工资，这种工资由土地所有者支付，并且由资本家作为收入来消费”②，也就是地租在各阶级间的重新分配。由于利润完全来自农业生产领域，重农主义者相信，对经济活动的人为干涉（税收政策、产业政策等等）并不会带来财富的增加，反而只会抑制农业生产中社会净产品的增长速度。他们因此提出了自由放任的政策主张，即社会的自然法则会带来最快的财富增长，自然秩序优于人为设计的秩序。

在经济学理论上，重农学派将经济体看作由自然法则支配的、独立于人类意志的实证性的领域，认为人能够像发现自然科学规律一样地发现经济体的自然规律；其代表成果就是魁奈的《经济表》，他将社会经济活动呈现为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在利润或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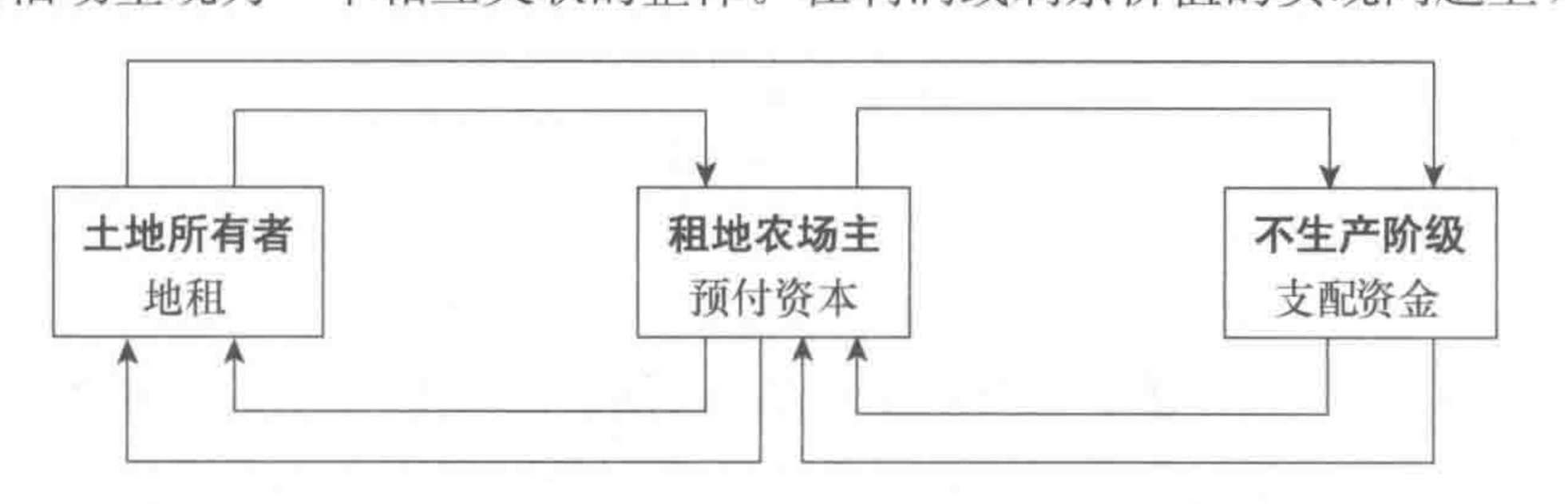

图 1　魁奈《经济表》的资金环流简化图

与重商主义不同，重农学派认为“产品是按自己的价值出卖的，不是高于自己的价值出卖的。……产品按它的价值出卖，卖者就实现了剩余价值”③。因为在农民或租地农场主的农业生产中，“土地的生产率使劳动者能够在一个工作日（假定为已知量）生产出多于他维持生活所必需消费的东西”④。投入土地的劳动会生产出高于投入成本的农业产品，不仅可以补偿生产参与者的投入，而且还会有产品剩余。重农学派认为地租是“真正的、经济的、可以说是合法的积累源泉”⑤。对地租的经济学解释同时也是对经济动机的辩护，以此出发，在农业生产中获利就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1.
② 同①20.
③ 同①28.
④ 同①24.
⑤ 同①36.

成为一种道德的、自然的欲望，个人追求私利的自由竞争状态将使社会和经济从中受益。因此，马克思才会说重农学派“在资产阶级视野以内对**资本**进行分析……把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变成生产的一种永恒的自然形式”①。

马克思将重农学派的局限视为资本主义生产萌芽时期的理论表达，“那时资本主义生产正从封建社会内部挣脱出来，还只能对这个封建社会本身给以资产阶级的解释，还没有找到这一生产本身的形式”②。在重农学派的解释中，以土地所有权为基础的封建主义“被资产阶级化了，资产阶级社会则获得了封建主义的外观”③，土地所有者表现为真正的资本家，土地在他们手中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与自由劳动者对立，而土地所有权与劳动者的分离正是资本和雇佣劳动制度发展的第一个条件。重农学派的体系中于是就产生了如下矛盾：“一方面，地租，即土地所有权的实际经济形式，脱去了土地所有权的封建外壳，归结为超出工资之上的纯粹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这个剩余价值又是按封建主义方式从自然而不是从社会，是从对土地的关系而不是从交往引申出来的”④。因此，他们把剩余价值的产生直接等同于农业生产中有机物的增加，而不是将其视为交换关系中价值的增加，将物的使用价值和物所采用的社会形式混淆起来。然而，重农学派对待封建主义的矛盾态度最终还是会必然导向资产阶级的结论，他们“对土地所有权的表面上的推崇也就变成了经济上的否定和对资本主义生产的肯定”，与此相应的要求是“全部赋税都转到地租上”和“自由放任，无拘无束的自由竞争”⑤。

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之间的争论构成了古典经济学产生的理论背景，斯密的资本理论本身就是对重商主义者 J. 斯图亚特的批评和对自由放任政策的辩护。斯密继承了重农主义者的自由放任立场，通过重新界定“财富”概念，他将利润和资本积累联系在一起，从而证明了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更有利于国民财富的增长。斯密改造了经济学中的财富概念，认为国民财富不是在银行或仓库中贮藏的贵金属或者产品，而是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5.
② 同①25.
③ 同①23.
④ 同①25.
⑤ 同①26.

一个国家单位时间（一般是一年）内产品和服务的流动量（简称“年产品”）。年产品的数量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劳动生产力的水平，二是生产性劳动在社会总劳动中的比例，而这两个因素的提高都有赖于资本积累程度的提升。资本积累提高了劳动分工的精细程度和参与生产劳动的人口比例，并避免了由各种外在因素（如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的短缺等）所导致的生产中断，使连续生产和更加精细的分工成为可能；随着资本积累程度的提高，分工的程度以及生产性劳动的比例也会随之提升，在根本上实现国民财富的增长，资本因而就成为决定国民财富增长的核心因素。也就是说，资本积累可以带来更多的产品，而单位时间内新增的产品就是利润来源；资本积累创造了利润（即新增产品），地租、利息和工资是对这些新增产品的重新分配，这就是斯密的“资本—利润”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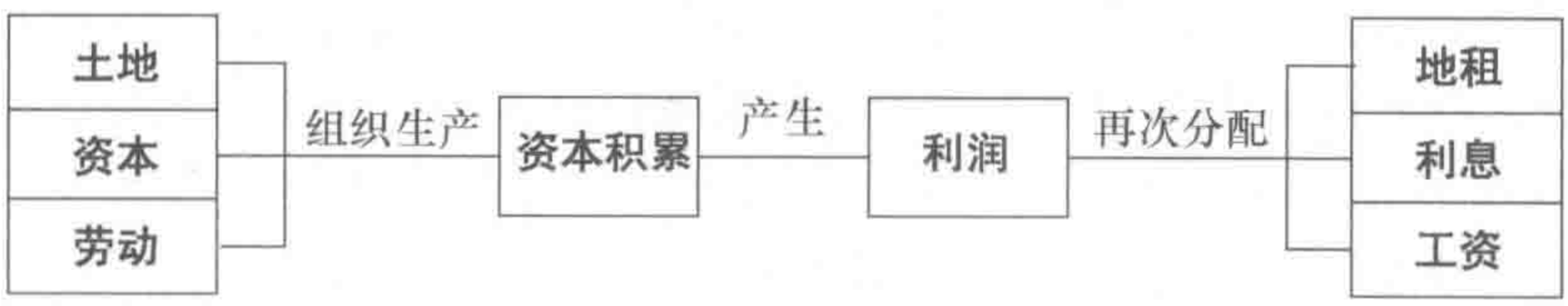

图 2 古典经济学的“资本—利润”模型

除了批评重商主义之外，斯密的资本理论也对重农学派的“净产品”产生过程进行了改造；斯密认为“净产品”产生于生产制造业，其他各种收入形式都是对这些产品的再分配。斯密的资本理论为理解现代生产开辟了道路，“从亚当·斯密开始的后来的经济学家……合理地把**工业利润**看成剩余价值**最初**为资本占有的**形式**，从而看成剩余价值的最初的一般形式，而把利息和地租仅仅解释为由工业资本家分配给剩余价值共同占有者各阶级的工业利润的分支”①。与斯密的资本理论类似，马克思同样“把与预付资本总额相联系的剩余价值，称为**资本的利润**……因为直接参与生产的资本家**直接**占有剩余劳动，而他以后还要在哪些项目下把这个剩余价值与他人分享，不管是同土地所有者分享，还是同资本的出借人分享，这是无关紧要的”②。在现实的生产过程中，各阶级的收入也确实都来自产业资本家的预付资本及资本利润，其中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1.

② 同①62.

人的工资来自预付资本，而地主的地租以及借贷资本家的利息来自资本利润；在扣除了工资、地租、利息以及生产成本之后，剩下的货币量才是产业资本家的纯利润。

通过分析资本家的经济行为，斯密的资本学说进一步将资本积累与人的自然欲望结合在一起，从而为追求私利的经济动机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提供了根本的理论辩护。与晚期重商主义者的观点不同，斯密认为基于个人私利的充分自由竞争不仅不会带来经济失衡和交易成本的上升，反而会降低产品的价格，使产品在最低的生产成本下被生产出来。在斯密的解释中，资本家是根据最终产品来看待市场的，他们为了获取更高的收入，一方面会进入利润收益高于平均水平的生产部门，另一方面会按照人们的需要或期望来进行生产。因此，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不仅会迫使价格下降到超额利润消失的生产成本上，而且还会在整体上生产出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品。在盈利动机和相互竞争的共同作用下，资本家在组织生产时会购买更有效率的生产要素，从而引导劳动和土地在各生产领域中的合理配置，使各种生产要素分配在相对效率最高的生产部门。与此同时，消费者以自己的购买行为作为中介来引导资本家的投资，表现为商品价格和资本利润的上升与下降。斯密据此试图说明，在摆脱了经济计划和政府指导的情况下，通过资本家自行组织的生产，自由竞争的市场将会以最低的社会成本满足消费者的欲望，生产资源也会在竞争性的市场中实现最优配置。相比之下，重商主义者以社会公益的名义对经济进行干涉，实际上只是增进了商人和政客的个人私利，国民享受的福利并不一定会得到真正的改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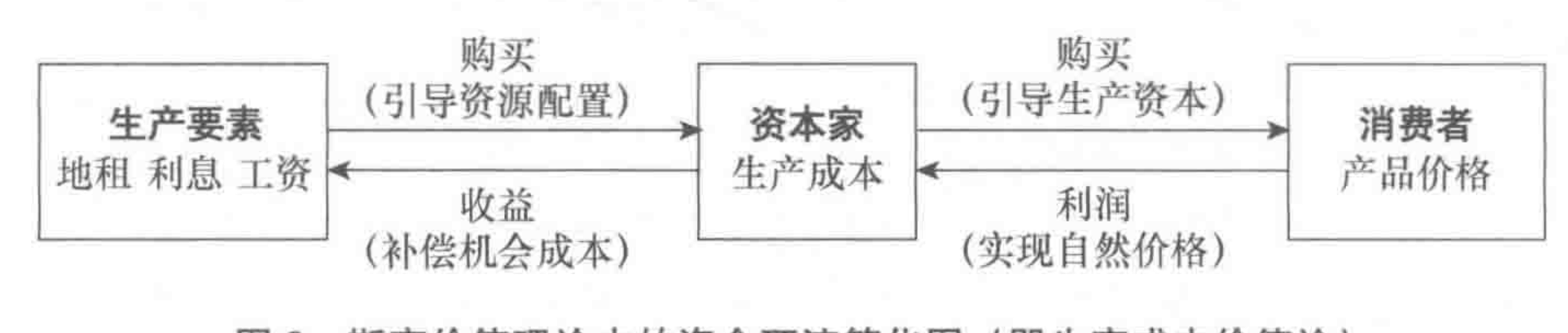

图 3　斯密价值理论中的资金环流简化图（即生产成本价值论）

斯密的经济学说标志着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真正形成。在斯密的解释框架中，社会被当作一个具有自身规律的经济实体，在经济活动中，不仅存在人与人的关系，同时社会本身也成为与人对立的、拥有自身规律的外在对象。斯密的“资本—利润”模型为现代社会的主要政治观念提供了整体的辩护，标志着现代社会在理论上的自觉。资本主义

的经济理论自此才摆脱了传统社会和经院哲学的观念束缚，与此同时，攫取利润的经济动机也得到了道德哲学的支持和辩护。此后，对社会规律的认识成为经济学的主要目标，人反而成为社会规律发挥作用的工具。因此，资本概念——及其对利润的解释——在理论上具有双重深意：一方面，资本概念意味着财富增长需要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从而在经济活动中突出了个人自由（即理性进取与追逐私利）的现实价值，构成了现代自由主义的根本立场；另一方面，资本概念同时也意味着社会是拥有自身规律的独立实体，又在经济活动中反过来消灭了个人自由的实际意义。人只是社会规律发挥作用的工具，体现了现代社会中人的地位的困境。现代社会中人的困境从一开始就困扰着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者，这种既自由又不自由的自由主义遭到了来自经济学内外的广泛的批评。在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中，社会关系一方面表现为个人“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①；而古典经济学的资本学说只是在理论上将这种现象复述出来，并以孤立个人的观念为预设前提，给这种现象披上了自然规律的外衣。

斯密拥有强大的整合历史与现实的理论能力，将资本积累条件下利润的产生当作理所应当的事情，因而没有对利润的性质进行进一步的理论解释，遗留下了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马克思将这些矛盾解释为重农学派的理论残余：斯密继承了重农学派的主要观点并“采用了更稳定的名称”②，提出了自己的财富和资本积累理论；但是在他的著作中“往往夹杂着许多属于重农学派而同他自己提出的观点完全矛盾的东西”③。斯密与重农学派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两点上：（1）重农学派认为经济政策和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产品的生产，而斯密认为经济的目的应该是价值的生产（即消费）；（2）重农学派认为土地是国民财富的源泉，而斯密认为财富的源泉是劳动。在资本理论中，斯密以价值和劳动为基础提示了利润的性质，但在描述利润时又不停地将“利润（新增价值）”和单纯作为物的“净产品”混淆在一起。马克思认为斯密没有想要去解决他的“资本—利润”模型“同他提出的价值理论的联系的问题”④，甚至没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5.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5-16.

③ 同②46.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70.

意识到资本理论和价值理论之间的矛盾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不过，马克思同时也指出斯密保持了理论上的诚实，正是在这两个理论相互矛盾的联系中，“剩余价值和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性质……还多少可以辨认”①。因此，在讨论利润和剩余价值理论时，可以完全不考虑斯密的这种摇摆不定，斯密理论的二重性“并不妨碍他对剩余价值的性质和来源的探讨，因为斯密……不自觉地坚持了商品交换价值的正确规定，即商品的交换价值决定于商品中包含的已耗费的劳动量或劳动时间”②。尽管存在着内在逻辑不一贯的地方，斯密的资本理论总体上还是保持了自身观点的统一性，因为他的目的只是为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进行历史和理论的辩护。

不过，如果从价值理论的角度来看，斯密经济学在逻辑上的缺陷就是致命的。斯密从既有的经济现象出发，无法解决商品流通和资本流通这两种经验现象的矛盾，因此把它们的抽象形式都当作真正经济规律确定下来，在理论中表现为出现了价值理论和利润理论的对立。斯密将上述现实矛盾和理论对立都忠实地记录在自己的著作之中，而这些论述或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古典经济学的解体。具体地考察斯密的价值理论的复杂内涵，对于解读马克思的“资本一般”理论而言具有先导性的作用。

二、“资本—劳动—利润”的扩展形式

在斯密的经济学体系中，价值理论的理论功能是确定产品价格的形成机制，斯密将劳动当作衡量价值——真实价格——的基本尺度。如果基于价值理论的形式来分析经济现实，那么价值理论必然会导向对资本本身的道德批判，因为利润是产品总价格与劳动价格即工资之间的差额，劳动显然成为被剥削的对象。不过，斯密的资本理论实际上没有坚持他的价值理论，斯密用价值理论完成了对自由秩序的辩护之后，很快就放弃了劳动价值论的预设，转而用生产成本价值论来讨论市场如何通过价格实现资源的配置。这种转变在经济学上是可理解的，也是必要的；然而对于斯密的追随者而言，这一转变则是致命的，后来经济学围绕价值理论和利润理论出现了持续多年的争论。价值理论和利润理论实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59.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7.

际上成为斯密一个人开启的两条对立的经济学研究道路，在这两条大相径庭的道路中，利润的性质得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解释方式，导致了古典经济学的最终解体。

为了解释价格和利润的性质，斯密实际上提出了两种价值理论，即劳动价值理论和生产成本价值理论。尽管斯密对价值的解释始终是以劳动为中介的，然而他对劳动的界定并不一贯。斯密在劳动概念上的混乱起源于对工人劳动的矛盾分析：从价值理论出发，劳动被界定为资本家用工资基金买来的商品（即劳动本身），资本的利润表现为对价值规律的否定；从利润理论出发，劳动被界定为一定时间内生产出来的商品，资本的利润表现为资本家组织下生产出来的产品剩余。马克思从斯密的混淆中区分出了两种不同的劳动：一种是存在于任何社会形式的一般的生产劳动，而另一种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前提的雇佣劳动。因此，斯密的混淆实际上就是用作为“劳动一般”的社会劳动消解了雇佣劳动这个“劳动特殊”，而马克思认为雇佣劳动本身才是分析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形式的关键所在。“劳动一般”的直接产物是产品，没有资本关系作为中介；雇佣劳动的直接产物是工资，产品的所有权归资本家占有；然而，斯密显然将上述两种劳动当作了同一种抽象的劳动，并以此开发了基于劳动的价值理论。

价值理论是斯密为了解释“资本—利润”关系而提出的理论假定。当斯密说资本是利润的源泉时，实际上是在说（生产率提高之后的）劳动及其产品是利润的源泉。斯密认为，分工的充分发展是提高生产力的主要手段，在斯密的经济学说中，对劳动以及分工形式的历史分析始终是最重要的理论工具，斯密的“资本—利润”关系因此可以进一步扩展为“资本—劳动—利润”的扩展解释模型。由于斯密在劳动概念上存在着的矛盾和混淆，斯密没有将利润当作劳动的产品，而是把利润看作资本与劳动结合之后才产生的一种神奇产物。简单地说，如果商品所有者只是各自生产并进行交换，那么利润的来源就是交换当中的额外获益；然而，资本与劳动的交换是一种例外，因为资本与劳动的结合可以在单位时间内制造出更多的产品，利润的来源也就由流通领域转移到了生产领域。由于资本理论和价值理论的目的都是论证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斯密在他的著作中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两种交换之间不一致是一个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斯密经济学中利润理论和价值理论之间的矛盾为后

来关于利润的争论埋下了伏笔，而对上述矛盾的评论也构成了马克思批判斯密的主要理论视角。

为了解释资本积累所带来的财富增加，斯密从劳动分工和产品交换中发展出了抽象的劳动价值理论，将劳动作为个人评价产品价值的标准尺度和占有社会财富的一般形式。在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中，劳动过程创造的产品是财富的基本形式，而生产过程中劳动的耗费量是产品交换的基本价值尺度；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分工的高度发展使得复杂劳动成为可能，从而使单位时间的劳动可以比过去的简单劳动创造出更多的价值。马克思充分肯定了斯密将财富形式归结为劳动的理论创见，“斯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他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规定性，——干脆就是劳动，既不是工业劳动，又不是商业劳动，也不是农业劳动，而既是这种劳动，又是那种劳动”①。从斯密的劳动价值出发，财富就是李嘉图资本理论中所说的过去的、对象化了的劳动，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体现在商品中的“一般性的劳动”或“劳动一般”。马克思指出，“劳动一般”不仅是经济学中的理论抽象，同时也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现实：“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一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这里，劳动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都成了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②。

劳动价值理论是古典经济学中最为复杂的一部分，杂糅了相对价格理论、价格总水平理论、福利分配理论等现代经济学的内容，而且斯密本人没有对其中的任何一种理论进行过明确的分析。抛开理论的细节不谈，斯密创建价值理论的经济学目的是解释产品按相对价格出售时如何实现利润并补偿各生产参与方支付的生产成本。斯密以劳动时间作为价值尺度不仅是理论上的抽象，同时也符合人们的直观印象：一个劳动者愿意用他生产的产品 A 去交换另一个劳动者的产品 B，只能是因为他自己生产产品 B 所需的时间等于或大于生产产品 A 的时间；随着分工的发展，协作劳动将会降低产品的平均生产时间，从而使生产者在与其他人的交换中获益。斯密显然并不认为这种非等价的交换是对价值理论的否定，因为斯密价值理论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论证分工所带来的成本下降和利润的提升。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5.

② 同①46.

消费者之所以愿意按照一定的价格将产品带离市场，是因为消费者无法以低于该价格的成本生产出或购买到相应的产品，这是斯密的劳动价值论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斯密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或两种状态：一种是原始的野蛮状态，只有简单的分工，没有资本积累，土地也处于未开发的状态；另一种是发达的文明状态，分工已经充分发展起来，资本和土地由于相对稀缺都不再无偿提供，从而拥有了自己的价格。在原始的简单经济中，（以家庭或公社为单位的）劳动者首先要为自己的生存而生产产品，因此社会分工一直处在比较低的水平上，用于交换的剩余产品的价格或交换价值基本上由生产该产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决定。而在现代的发达经济中，劳动者的生活资料由资本家的储蓄（即资本积累）提供，劳动者只从事社会分工中的商品生产，不需要再直接为自己的生存而生产，分工的精细程度因此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生产单位产品所需的劳动时间相应地大幅下降，产品的相对价格就不再直接由劳动时间决定，而是取决于产品的生产成本和消费者的购买需求。价值理论中利润和等价交换原则之间的冲突并不会让斯密感到困扰，利润的存在意味着消费者和资本家都从交换中获益。而且，斯密认为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最终会使产品在最低的成本下被生产出来，斯密把这个生产成本称为“自然价格”。在“自然价格”的作用下，各经济部门之间的利润率、工资、租金等将逐渐均等化，而“自然价格”也将是消费者购买商品的可能的最低价格。①

由于单纯用劳动时间无法解释相对价格的具体形成机制，斯密没有坚持彻底的劳动价值论，他对相对价格的解释最终混合了劳动成本价值论和生产成本价值论这两种不同的价值理论。斯密认为，在现代生产中，由于资本积累和土地开发产生了额外的成本，产品的交换价格就只能用它的生产成本来解释，即一件产品的价值取决于所有的生产要素（土地、资本和劳动）的价格。马克思认为这恰恰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雇佣劳动与一般的社会劳动有着本质的差别，“劳动生产力真正大规模的发展，只是从劳动变为雇佣劳动，而劳动条件一方面作为土地所有权，和另一方面作为资本同劳动相对立的时刻才开始的”，因此“劳动者自己再也不能占有这一发展成果”②。雇佣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

① 参见本章“图 3 斯密价值理论中的资金环流简化图（即生产成本价值论）”。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6.

劳动契约只保证了法律形式上的平等，而在现实发挥作用的社会关系中，“劳动条件以土地所有权和资本的形式同雇佣工人相对立”，劳动者被迫要与资本家和地主分享自己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调节商品交换价值的内在尺度了”①。马克思在“1861—1863 年手稿”中多次区分了斯密价值理论中两种思路的混乱：一种是“他研究商品的价值……从商品价值推出工资和利润”；另一种是“相反的道路，又想倒过来从工资、利润和地租的自然价格的相加数来推出商品价值”②。马克思认为“这是两种理解方式”，前一种“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内在联系，可以说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而后一种“则只是把生活过程中外部表现出来的东西，按照它表现出来的样子加以描写、分类、叙述并归入图式化的概念规定之中”③。斯密的价值理论既是劳动成本价值理论，也是生产成本价值理论，导致“资本—劳动—利润”模型可以对利润进行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一种解释通向了李嘉图派社会主义经济学，而另一种解释则通向了庸俗经济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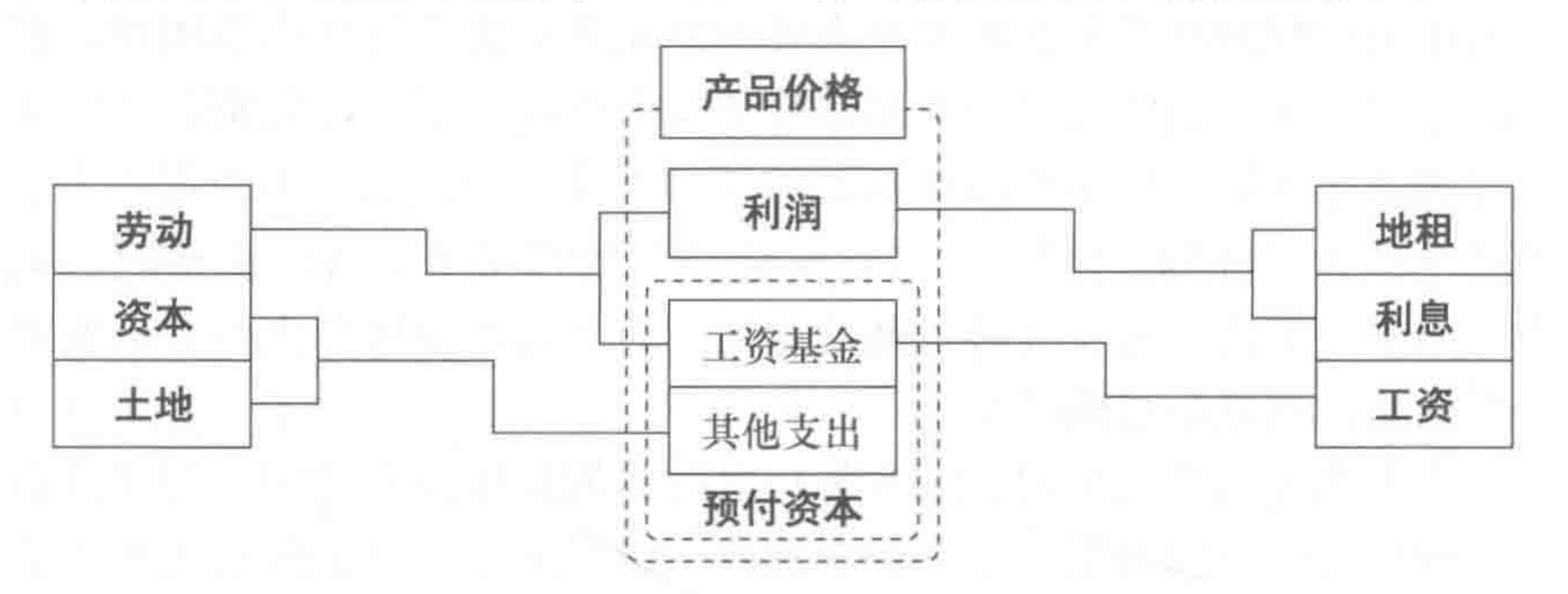

图 4　劳动成本价值论视角下“资本—利润”模型的扩展形式

基于劳动成本价值论，斯密的“资本—利润”模型可以进一步以雇佣劳动为中介扩展为“资本—劳动（工资）—利润”的形式，利润是产品价值与雇佣工人工资之间的差额。在劳动成本价值理论中，斯密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对地租、利息和工资的来源进行了统一的解释；土地和资本的投入都是不会产生新价值的生产成本，工人劳动所创造的新价值是各种收入形式唯一的来源。工人的劳动不仅补偿了资本家支出的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2 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8.

② 同①75.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2 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82.

资的价值，而且还创造出了高于工资基金的剩余价值，也就是资本家所获得的利润。正因如此，马克思认为斯密在对剩余价值的认识上远远超过重农学派，“在重农学派看来，剩余价值只表现为地租形式，而在亚·斯密看来，地租、利润和利息都不过是剩余价值的不同形式”①。

站在马克思的视角来看，斯密无法用劳动价值论解释利润的性质，是因为斯密没有对雇佣劳动和一般的社会生产劳动进行区分，从而混淆了一般社会生产中作为价值尺度的劳动和资本主义生产中作为商品的劳动。由于混淆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劳动形式，斯密理论中的商品价值就取决于两个完全不相等的劳动量：一方面，“**商品**的价值决定于生产商品所必要的劳动量”；另一方面，“商品的价值决定于可以用来买进商品的活劳动量”，“实际上就是把**工资**当作商品的价值尺度”②。如果将工资作为商品的价值尺度，利润就是高于商品价值出售而获得的额外收入，也就是说资本通过购买劳动就实现了价值的增殖；按照这样的解释，资本的出现就否定了劳动价值理论基础上的等价交换规律，将资本和劳动的交换“建立在完全对立和矛盾的原则上”③。马克思对此深表惋惜：“亚当虽然实质上是说明剩余价值，但是他没有明确地用一个特定的、不同于其各个特殊形式的范畴来阐明剩余价值，因此，后来他直接就把剩余价值同更发展的形式即利润混淆起来了。”④

为了更加明确地计算产品的价格，斯密提出了另一种相对价格理论——生产成本价值论。基于生产成本价值论，斯密的“资本—利润”模型以“劳动一般”或“产品一般”为中介可以扩展为“资本—劳动（产品）—利润”的形式，利润是对各生产阶级的价值补偿。按照这种解释，分工高度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离不开放弃消费而进行资本积累的资本家和提供生产原料的土地所有者，因此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生产功能应当在产品的相对价格中得到补偿。对于斯密而言，劳动成本价值论和生产成本价值论没有实质的差别，只不过是同一现象的不同描述。在生产成本价值论中，斯密考虑的主要是他在道德哲学方面可能会遇到的诘难，即工人在现代生产条件下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斯密花费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2.

② 同①46.

③ 同①49.

④ 同①66.

了大量的篇幅来说明，只有从事资本积累和组织生产的产业资本家才是真正的生产阶级，保护资本家利益——私有财产——的经济政策和非平均分配具有巨大的重要性。

斯密虽然一直专注于对生产劳动的具体形式的分析，但他只是将资本主义生产和前资本主义生产当作分工的不同发展阶段，认为劳动生产率的水平取决于分工的水平，进而为资本积累做辩护。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中，资本积累扫除了分工进一步发展所遇到的现实阻碍，斯密从而将利润的性质解释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带来的产品增加，并将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原因解释为资本积累所带来的精细化分工。劳动者并不能带来资本积累，他们的工资仅仅足够满足直接的消费欲望；地主阶级也不能带来资本积累，他们更愿意将财富消费在非生产的服务上，来满足自身的奢侈生活；只有新兴的资本家阶级为了获取利润而奋斗，通过储蓄和投资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积累，而不是将所有的收入都消费掉。此外，即使工人在生产和分配中被压制、被异化，但是社会福利也因分工的发展而实现绝对的量的增加；斯密认为，就算是最贫穷的工人，他在文明社会中的生活质量也要远远优于非洲原始部落中的国王的生活质量。因此，生产成本价值论实际上将利润（从劳动者产量中扣除的作为资本家纯收入的部分产品）看作对资本家生产功能的价值补偿，资本家理应从产品的价格中收取一部分货币作为利润，以补偿并奖励他们通过牺牲消费而节省下来的生产性支出，以期资本家继续为持续生产的雇佣工人提供生活资料和生产材料。不过，斯密的解释并不完全令人信服，从劳动者产品中扣除地租和利润的观点后来遭到了社会主义者的猛烈批评。

在马克思看来，斯密相对价格理论和价值学说的根本错误在于混淆了“劳动的价值（雇佣工资）”和“劳动的量（产品价值）”。斯密在利润问题上过分的理论自信，冲淡了他自己对价值问题的关注，“斯密关于剩余价值的一般理论……并不打算哪怕是稍微证明一下：工人加到产品上的价值……由于工人不是全部占有这个价值，而是被迫同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分享这个价值或商品，已不再由包含在产品中的劳动时间决定了”①。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中，活劳动的消耗作为价值尺度的原则并未失效，只不过“在劳动的物的条件属于一个阶级或几个阶级，而只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1.

劳动能力属于另一个阶级即劳动者阶级的一切生产方式下——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一定量对象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所支配的活劳动量，大于该商品本身包含的活劳动量”①。也就是说，利润的量并不取决于单位时间内新增的产品量，而取决于有酬劳动时间与无酬劳动时间之间的比例，即总产量与工资之间的差额。利润作为产品总量中的“这个扣除部分只能由工人加到原料上的、超过只支付他的工资或只提供他的工资等价物的劳动量的那部分劳动构成；因而这个扣除部分是由工人的剩余劳动，即工人劳动的无酬部分构成”②；而斯密“把劳动的价值或某一商品（或货币）对劳动的购买力当作价值尺度，这就使他在阐述价格理论、研究竞争对利润率的影响等等地方乱了思路，使他的著作在总的方面失去了任何统一性，甚至使他把许多重大问题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③。“只要资本直接同劳动相对立，而不是同劳动能力相对立”④，斯密利润理论和价值理论的矛盾就无法克服；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与资本进行交换的不是全部活劳动的量，而是劳动能力的价值，即工资。马克思据此提出了“可变资本—剩余价值”模型以替代斯密的“资本—利润”模型：剩余价值只能“由构成工资即花费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产生”，“因为这是资本中惟一不仅再生产自己，而且生产一个‘余额’的部分”；而“在利润的形式上，剩余价值是按照预付资本总额计算的，而且……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各个不同领域中利润的平均化，还有一些新的形态变化”⑤。也就是说，利润水平和工资水平并没有自然的标准，其水平如何完全取决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与斗争结果；由于工人阶级在法权上不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他们在这场斗争中处于绝对的劣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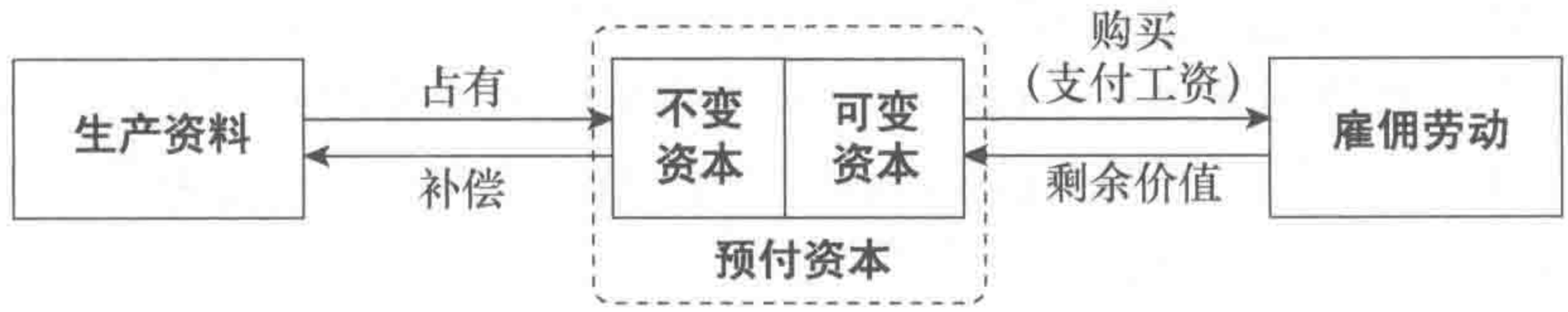

图 5 马克思剩余劳动理论简化图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8.
② 同①61-62.
③ 同①50.
④ 同①49.
⑤ 同①66.

古典经济学中资本理论和价值理论的冲突，起源于斯密在劳动形式上的混淆，将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特殊的劳动形式（即雇佣劳动）混同于一般形式的社会劳动。雇佣劳动的特点是劳动者不占有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劳动者因此表现为孤立的个体，而生产的社会条件作为一种外在的东西与个体劳动者相对立；雇佣工人虽然自愿与资本家签订了劳动契约，但是资本家按照契约支付给工人的不是全部的劳动产品，而只是维持工人劳动能力的最低工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资本和雇佣劳动的交换不能直接用劳动成本价值论来解释。在劳动变成商品的雇佣劳动制度下，劳动本身已不能作为自己的价值尺度，劳动力商品的价值需要按照交换规律进行重新界定。通过区分劳动的二重性和劳动力商品的二重性，马克思解开了价值理论和资本理论之间的谜题，解释了现代社会中资本与劳动的等价交换如何在最终结果上产生了不等价的结果（即利润）。在马克思之前，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也曾试图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对利润进行彻底的解释，但是他们的尝试并没有成功，反而加速了古典经济学的崩溃和庸俗化。

三、利润理论争端与古典经济学的庸俗化

斯密之后的经济学逐渐脱离了关于具体经济政策的直接讨论，并在李嘉图的影响下演化为一种以高度抽象为特点的演绎逻辑体系；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也发生了转变，由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动力转向了对国民收入功能性分配的研究。不过，斯密混淆剩余价值和利润的错误“在李嘉图和他的所有的后继者的著作中，仍然存在”①。经济学研究在 19 世纪出现了分化：部分经济学家坚持斯密的劳动成本价值论，试图用价值理论推演出一套符合道德要求和社会正义的分配原则来替代纯经济的资本关系；另一部分则坚持斯密的生产成本价值论，认为必须对各生产要素给予物质补偿，才能保证生产的顺利进行。由于在利润理论上的巨大分歧，这两派经济学研究者在 19 世纪中期进行了激烈的学术争论，即马克思在“1861—1863 年手稿”中提到的庸俗经济学与经济学反对派（即社会主义者）之间的论战。②

关于利润理论的争论起源于李嘉图基于劳动成本价值论对生产成本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6.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60.

价值论的系统反驳①，理解李嘉图对斯密价值理论的改造是解读马克思“资本一般”理论的必要前提。斯密用原始生产和现代生产的区分来解决价值理论和利润理论的矛盾，然而这种带有自然法色彩的做法并没有被后来的经济学研究者接受。李嘉图明确地指出了价值理论和利润理论之间的矛盾，并试图将两者直接地统一起来，证明价值原则在现代工业生产中仍然适用。李嘉图的做法是将产品总价值（总价格）等同于产品所耗费的总劳动时间，并将资本看作积累起来的劳动时间，资本的价值按照周转速度的不同分次转移到产品当中。在界定国民财富的衡量标准时，李嘉图恢复了使用价值的地位，认为使用价值是国民财富的真正内容，从而将交换价值变成了单纯的以钟点为标准的价格尺度。因此，生产的真正目的是创造出更多数量和种类的使用价值，所谓交换价值——货币及价格等等——只是为了促进生产而设立的辅助性工具。李嘉图据此否定了生产成本价值论，并指出产品的价格只与生产产品耗费的时间有关，而与各种生产成本的价格无关；也就是说，产品价格即财富在各阶级之间的分配原则并不是由价值规律决定的抽象规定，而是在各经济阶级的竞争过程中被确定下来的均衡状态。李嘉图彻底的劳动价值理论很快受到了社会活动家的欢迎，社会主义者认为工人在竞争中处于绝对的劣势，应当直接在现实中贯彻劳动价值理论，即工人应当收回所有的劳动产品。以李嘉图的经济学说为基础的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最终导致了古典经济学本身的分裂和庸俗化，经济学内部随之出现了为资本积累辩护的观点，重新提出了生产成本价值论。这就是马克思谋划“资本一般”理论时的经济学争论背景。

斯密的生产成本价值论将相对价格解释为对土地、资本和劳动的价值补偿，而李嘉图试图证明劳动是相对价格变化的决定性因素，地租和资本都是劳动成本的转化形式。为了论证劳动是构成相对价格的唯一成

---

① 李嘉图对相对价格和生产成本价值论的关注起源于英国关于《谷物法》的争论。当时许多经济学家主张提高进口谷物的关税将有利于英国的经济发展，贸易保护主义者利用生产成本价值论来为自己辩护，认为降低或取消谷物关税将会导致产品价格的普遍下降，进而导致英国经济的衰退。李嘉图主张自由贸易和取消关税才是英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合理路线，因此他提出了完全基于劳动成本价值论的相对价格理论来反驳贸易保护主义者，即产品价格的长期变化取决于生产产品所需的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不取决于支付这一劳动的工资成本。李嘉图试图证明，取消关税虽然会造成食物价格和货币工资的下降，但不会影响国际贸易中产品的价格。

本，李嘉图对斯密的劳动成本价值论至少进行了以下三方面的改造：

第一，斯密笔下的劳动价值是一种作为关系的相对价值，李嘉图将其改造成一种以时间计量的绝对价值。为了强调分工中精巧劳动的作用，斯密不愿意直接用时间来计量生产一件产品所需的劳动时间，而试图用工资市场上通过讨价还价而形成的不同工资水平来评估劳动的复杂程度；通过产品的价格也可以判断劳动的复杂程度，复杂劳动的高工资也会体现在产品的相对价格中。斯密以工资水平来度量劳动的复杂程度实际上是一种循环论证，李嘉图明确地拒绝了斯密的混乱解释，并指出产品的价值取决于生产该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与工资水平没有直接关系。对于斯密而言，产品的劳动价值是产品生产者进行交换的主观尺度，是一个相对的量；而对于李嘉图而言，产品的劳动价值是构成生产成本的唯一要素，是一个绝对的时间值。如果按照李嘉图的思路单纯以劳动时间来衡量产品的价值，就会再次遇到困扰斯密的复杂劳动的换算问题；然而李嘉图并没有因此困扰①，因为他的劳动价值论要解释的是同一产品在不同时期相对价格变化的原因，而不是某一时刻两个产品交换的尺度，由此便引出了李嘉图对斯密价值理论的第二处改造。

第二，斯密创立劳动价值是为了解释一般交换中价格的形成机制，李嘉图将其改造成对工业制造业产品长期价格变化趋势的理论解释。交换行为在斯密的理论框架中具有经济学和道德哲学的多重深意，他因此十分强调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差别，认为产品仅以劳动量作为相互交换的标准，其（交换）价值遵循着与使用价值截然不同的尺度。只有摆脱了直接以满足需要为目的的使用价值生产，真正的分工才能发展起来；以价值和财富增殖为目的的现代生产不仅不会导致社会风气的败坏，而且还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将使用价值生产出来。② 李嘉图则将使用

---

① 李嘉图同样以工资水平来度量不同劳动的复杂程度，但是他认为这个工资水平与产品的价值或相对价格无关。基于古典经济学中的最低工资理论，李嘉图假定了拥有不同技能的劳动者的工资始终分别维持在一个固定的水平上；在工资水平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化就只能用工资之外的其他因素进行解释，也就解决了以工资计量价值的循环论证问题。

② 对于斯密以及整个古典经济学而言，使用价值大体上是一个带有经院哲学色彩的概念。经院哲学和传统道德认为，人对使用价值的需求是一种自然的、合乎道德的欲望，而对于利润和价值的欲求则是一种非道德的贪婪。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者反对这种强调使用价值的陈旧观点，因而采用了矫枉过正的立场，总体上忽略甚至否认了使用价值（即需求）在生产中的作用。这导致古典经济学主要以生产成本作为市场交换的尺度和动力，在解释相对价格和自然价格时缺乏对需求的有效分析。相应地，古典经济学——以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实际上是一种成本理论，与现代经济学的价格理论有着明显的差别。

价值和交换价值结合在一起，对劳动成本价值论的适用范围进行了限定。使用价值虽然不是交换价值的尺度，但是交换价值却要以使用价值的存在为前提，只有具有使用价值的产品才能在市场上形成价格。商品的价格由其稀缺性和所需劳动时间共同决定，劳动成本价值论只适用于那些拥有稳定使用价值并可以不断地再生产出来的产品，即拥有普遍需求并可以持续供给的产品，而不能用来分析那些绝对稀缺的产品的价格①，例如名酒、名画等艺术品或收藏品。简单地说，工业产品的价格水平——在竞争的作用下——由产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即劳动价值）决定，而艺术品或收藏品的价格则完全取决于购买者愿意支付的货币量，没有客观的普遍标准。通过区分不同性质的产品，李嘉图认为劳动成本价值论总体上仍然可以解释现代工业生产中产品相对价格的形成机制，从而引出了李嘉图对斯密价值论的第三个同时也是最为重要的一处改造。

第三，斯密在分析现代生产时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劳动成本价值论，李嘉图则将劳动价值理论改造成为适用于他所处的时代的相对价格理论。在原始的简单经济中，劳动量毫无疑问是交换的唯一标准；不过在发达的分工中，斯密认为资本和土地也同样具有决定价格的力量。李嘉图不同意这种观点，并试图证明资本和土地都不是决定价格的独立因素。资本是储存起来的过去的劳动，资本和劳动共同生产的产品包含两部分劳动量，一部分是在生产过程中当时就被消耗掉的劳动量，另一部分是贮藏在资本中的用来辅助生产的过去的劳动量。资本在形成价格时发挥的作用完全可以用劳动量来解释，资本并不能独立作为价格的决定因素。接着，李嘉图用农业收益率递减的规律证明了地租也不是价格的决定因素，反而是产品价格决定了地租的水平，也就是说土地按照其肥力获得的地租不会影响相对价格的长期变化趋势。通过对劳动成本价值论的改造和发展，李嘉图否定了工资、利息和地租在相对价格形成机制中的独立作用，并将它们解释为经济参与各方在竞争中对产品价格的瓜分。也就是说，工资、利息和地租是对产品价格的分配，而不是产品价格的决定力量。值得注意的是，李嘉图并没有独断地认为劳动量是决定

① 李嘉图认为，对于那些不能自由再生产的商品（如艺术品、古籍等），它们的价值和相对价格取决于购买者感兴趣的程度及其私人财产的数量，而与商品所消耗的劳动时间无关。这类产品在社会总产品中只占很小的比例，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相对价格的唯一因素；他只是强调，在解释产品价格的长期变化趋势时，产品所需的劳动时间的量的变化是最为关键的指标。对于李嘉图来说，工资率、利息率以及利润率的变化在分析价格长期变化趋势时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素。李嘉图对生产成本价值论的反驳，是为了提出更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从而以更加合理的收入结构促进经济的有效增长。因此，他并不关心利润的性质。在李嘉图看来，资本的利润本身不过就是产品价格扣除工资和地租之后的余额，个别资本的利润在社会产品总价格中所起的作用无关紧要，完全可以忽略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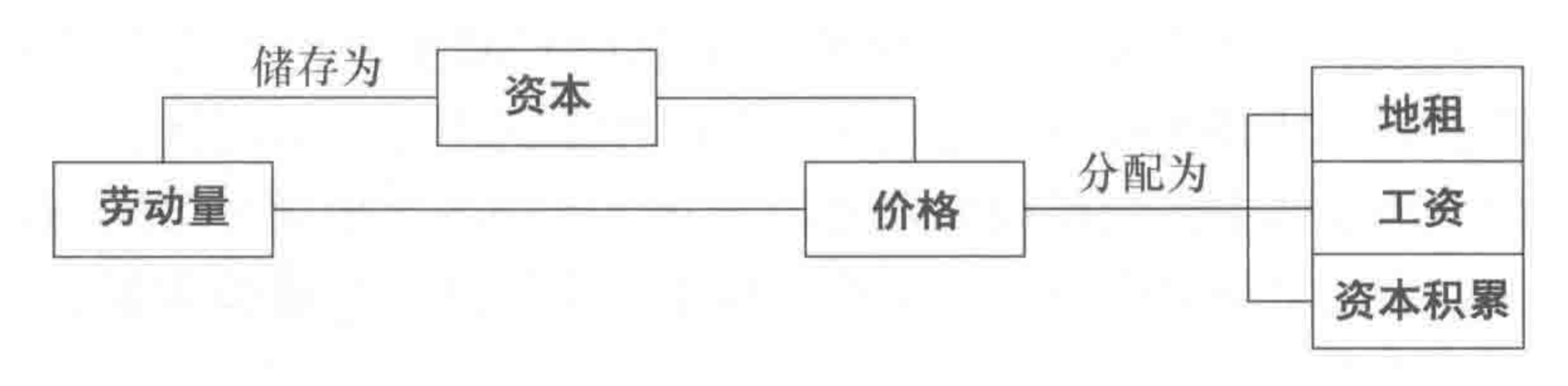

图 6　李嘉图的劳动成本价值论简化图

根据李嘉图的价值学说，工资、地租和利润等收入形式分别代表了参与各方在经济活动中的竞争关系。工人之间的竞争导致工资水平只能被压在维持工人群体生存的最低限度上，古典经济学将这一现象称为“工资铁律”。农业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使他们不得不把产品价格的一部分作为地租支付给地主，成为地主阶级收入的来源。工业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则导致产品价格的形成，将产品的价格稳定在由劳动时间决定的价格水平（即价值）上。对于资本家而言，利润等于产品价格减去工资；利润中扣除了地租之后的剩余部分，就构成了资本家的收入。根据李嘉图的解释，产品的价格水平由劳动时间（即价值）决定，而产品价格的分配则由市场当中的竞争行为来决定；因此，各阶级收入水平的变化不会影响工业产品的总价格。如果接受李嘉图的理论，那么利润和价值就不应当放在一起讨论，对价值的研究只能用来确定产品价格水平的长期变化趋势，而无法用来确定利润的水平。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条件下，产品总价格水平是一个常数（即产品的价值或其所耗费的时间），产品顺利出售之后所获得的货币是生产参与各方收入的来源；利润的高低取决于资本家与工人、地主之间经济竞争的力量对比，而不取决于产品成本价格——工资、地租和利息——的高低。简而言之，李嘉图认为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格，而竞争决定商品价格在各阶级间的分配。

尽管李嘉图很谨慎地限定了劳动成本价值论的适用范围，但是李嘉

图经济学的一些追随者还是尝试着提高劳动成本价值论的普遍适用性，从而衍生出了李嘉图派社会主义经济学，引发了社会主义者和古典经济学家关于利润性质的争论。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有意无意地曲解了李嘉图的价值理论，试图根据劳动成本价值论来证明工人承受着经济上的剥削：工人的生产劳动创造了产品的全部价值，却只能获得最低水平的工资；资本家阶级和地主阶级没有直接创造价值，却获得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作为自己的收入。社会主义者依照劳动成本价值论提出了工人收回所有产品的道德要求，并将资本家获得的利润看作不合理的收入。不过，根据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商品按照劳动时间（或劳动成本价值）进行出售，是资本家之间竞争的结果；因此，劳动价值理论的成立要以私有财产和自由竞争为前提，从李嘉图的经济学说无法推导出李嘉图社会主义学派的结论。但是伴随着工人运动的兴起，李嘉图派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过与现实的社会运动相结合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暂时地掩盖了社会主义者在理论上的内在缺陷。

在社会主义者的理论攻击下，正统的经济学研究者也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利润问题上，他们一方面试图修正李嘉图经济学中价值理论和利润理论的逻辑缺陷，另一方面被迫回应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生产秩序的挑战。在功利主义的影响下以及对利润的研究和辩护热潮中，生产成本价值论再次获得研究者的支持，其中影响力最大的理论成果是西尼耳的利息理论。西尼耳认为资本和劳动对于产品的生产都是必要的，产品的价格应当足以补偿资本家和工人双方的付出；西尼耳因此发展了斯密的生产成本价值论，将工资定义为补偿工人辛苦劳作而支付的价格，并将利润定义为对资本家放弃消费享乐而组织生产的补偿。西尼耳主张工人不仅要将自己的工资和产品的成本生产出来，还要额外再劳动一个小时，将资本家的利润也生产出来，否则资本家就不会愿意把自己的储蓄拿出来用于组织生产。西尼耳的“最后一小时”理论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马克思在“1861—1863 年手稿”中对此进行过专门的批评。①

在西尼耳之后，经济学内部出现了更加庸俗化的观点，将土地和资本都看作与劳动一样具有生产功能的商品，而地租和利息就是购买这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24-229.

功能时所支付的价格；这种观点的支持者将土地和地租、资本和利息的关系都解释为商品和价格的关系，认为“除货币和商品外，交换价值的关系还以资本、利息、地租、工资等形式出现”①，表现为“土地—地租，资本—利息，劳动—工资”的“三位一体”公式。在庸俗经济学的“三位一体”公式中，利润理论和价值理论之间的矛盾消失了，各种收入形式“作为相异的和彼此无关的形式、作为只是彼此不同但**无对抗性的**形式相互对立”②。在庸俗经济学的解释中，作为收入形式的地租、利息和工资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它们来自不同的源泉，“一个来自土地，另一个来自资本，第三个来自劳动”③。这些收入源泉或生产要素共同在生产中发挥作用，但是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相同的东西，“好比农民、牛、犁和土地，尽管它们彼此不同，但它们却在农业中……**协调地**共同劳动”④。地主、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冲突只是因利润分割不均而产生的对立，而且冲突将在三个阶级的竞争中得到解决，并带来有益的结果：一方面在整体上促进生产的发展（扩大利润总量），另一方面在各阶级之间实现大致相当的回报率（形成平均利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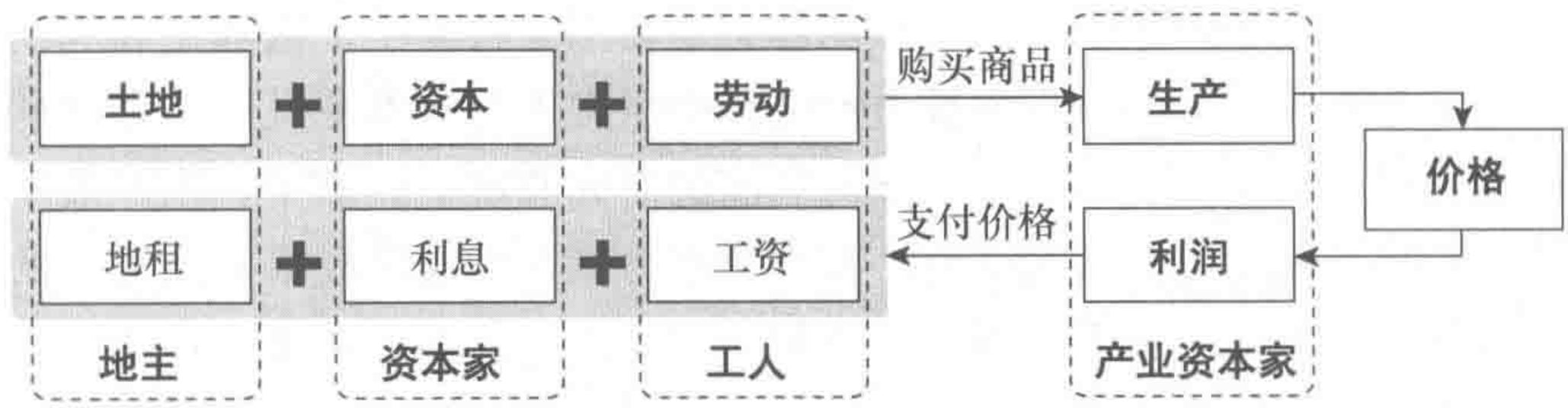

图 7　庸俗经济学的“三位一体”公式简化表

综上，“土地—地租，资本—利息，劳动—工资”的“三位一体”公式片面地发展了斯密的生产成本价值论。在“三位一体”公式的解释下，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自然、和谐的经济形式，既不存在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也不存资本增殖（即利润）对价值规律的背离；各种生产要素（土地、资本和劳动）在竞争中形成各自的自然价格（地租、利息和工资），并在产品价格的利润中分别得到相应的补偿；“工资在这里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2 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63-364.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2 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63.
③ 同②.
④ 同②.

现为劳动的特殊产品，表现为劳动的唯一产品（工资对于雇佣工人来说确实也是劳动的唯一产品），所以价值的其他部分——**地租、利润（利息）**——也必然表现为……土地和资本各自的果实”①。“资本—利润”的解释模型被庸俗化为等量投入应当获得相应回报或生产性商品按照其价格得到价值补偿的一般规律，“土地—地租，资本—利息，劳动—工资”就成为这种一般规律在各个领域的不同表现；各种生产要素都被当作可以自动产生利润或价值的源泉，**“一切经济范畴就总只是同一关系的各种不同的名称，而这种无法理解现实差别的彻底无能于是就被认为是纯粹的常识本身”**②。

总而言之，经济学内部价值理论和利润理论之间的矛盾是马克思观照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视角。价值理论的成立，意味着交换必然遵循着某种等价的原则；利润理论的成立，则意味着交换中等价原则的失效。斯密在他的经济学模型中首次呈现了价值理论和利润理论之间的潜在冲突，但是他没有尝试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而是用生产的原始状态和文明状态将这一矛盾保存下来。在斯密看来，价值理论适用于生产的原始状态，而利润理论适用于生产的文明状态，两者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而后者是前者在高度分工条件下的现代变型。李嘉图明确意识到了价值理论和利润理论之间的冲突，但他和斯密一样未加批判地将利润当作了合理的收入形式。在讨论赋税原理的时候，李嘉图继承了斯密的劳动价值理论，但是对价值理论的适用范围进行了限制，认为价值理论只能解释产品价格总体水平长期的变化趋势，而不能解释利润的性质；利润——以及工资和地租——的形成取决于其他的经济因素（如竞争），价值理论和利润理论是相互独立的两个学术领域，基于劳动时间的价值理论不足以也不应当成为对利润理论的反驳。在李嘉图之后，社会主义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的研究者都将价值理论与利润理论混淆在一起。社会主义经济学家用价值理论反对利润理论，认为利润破坏了等价交换原则，是私有财产制度和货币制度下资本家的不合理收入；庸俗经济学家则用价值理论来为利润理论辩护，认为利润本身不过是资本（即货币）的价值或价格，资本家通过“出售”货币来获得利润没有违背等价交换的原则。李嘉图和庸俗经济学的观点都是对斯密“资本—利润”模型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95.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05.

维护，同时也是19世纪经济学的主流观点。

为了超越经济学中关于价值理论和利润理论的争论，马克思在“第一分册”和“1861—1863年手稿”中形成的“资本一般”理论完成了对“资本—利润”模型及其庸俗化的整体批判。在“1861—1863年手稿”中，马克思以“剩余价值理论”为题全面回顾了从斯密到庸俗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对其中的重要人物和著作进行了专门的评述，梳理出了经济学走向庸俗化的理论线索。在斯密的剩余价值理论中，“混乱不是发生在他专门谈论利润和地租这些剩余价值的特殊形式的地方，而是发生在他把利润和地租仅仅当作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当作‘工人加到材料上的劳动中的**扣除部分**’的地方”①。也就是说，对于斯密而言，混乱只是由于概念混淆而导致的叙述困难，而且斯密本人也承认了矛盾的存在，并以原始经济和发达经济的区分加以历史的分析。马克思认可了古典经济学家在相对价格方面的研究成果，他们“把**剩余价值**，即剩余劳动——已经完成并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超过**有酬劳动即超过以工资形式取得自己等价物的劳动的余额——理解为**一般范畴**，而本来意义上的利润和地租只是这一般范畴的分支”②。

古典经济学陷入悖论的地方主要在于，为了说明利润的性质，工资、利润和地租（作为产业利润的转化形式）既被当作各种收入形式的三个原始源泉，又被当作一切交换价值的三个原始源泉，实际上是“把商品价值被占有时分成的不同项目说成这个价值的源泉的内容”③，从而出现了劳动成本价值论和生产成本价值论两种自相矛盾的价值理论。在李嘉图之后，经济学走向了庸俗化；庸俗经济学不再追求一贯的解释，而是“企图用烦琐论证的办法，靠玩弄词句来加以解决”④。在庸俗经济学中，古典经济学“粗俗的经验主义变成了虚伪的形而上学，变成了烦琐哲学，它绞尽脑汁，想用简单的形式抽象，直接从一般规律中得出不可否认的经验现象，或者巧妙地论证它们是同一般规律相一致的”⑤。庸俗经济学直接从土地、资本和劳动这三个源泉出发，将古典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6-67.
② 同①59.
③ 同①75.
④ 同①66.
⑤ 同①66.

经济学中“不一贯的说法和错误的意见化为十分一般的词句，来掩饰他自己的陈腐的浅薄见解”①，提出了“土地—地租，资本—利息，劳动—工资”的“三位一体”公式来直接否认利润学说与价值学说之间的矛盾。马克思认为，庸俗经济学只是用“学理主义的语言”② 复述了现实生产中的表象，将表象转换为观念，并将这些观念的抽象联系宣布为自然规律，这种粗鄙的、无视事物内在联系的思维方式成为马克思经济学中最核心的批判对象。

价值理论上的分歧是19世纪政治经济学争论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成为马克思批判政治经济学的突破口。商品、货币和资本都是现实中存在的东西，它们的共同点是可以进行交换，政治经济学家因此抽象出了“价值”观念来指代它们可以交换的性质。然而，不同的经济学流派虽然采用了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并以现存的商品、货币或资本为研究前提，但却得出了许多种相互对立的价值理论。在黑格尔辩证法的启发下，马克思发现了解决上述困境的出路，开发出了另一种唯物主义的批判方法：各种相互对立的经济理论实际上都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抽象反映，揭示这些理论的共同前提同时也就是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认识。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一般（das Allgemeine）”指的是各种抽象观念克服其外在对立性后所达到的、包含着内在差异的统一性，同时也是观念扬弃抽象性并通向客观必然性的逻辑中介。经过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改造之后，“一般”的理论功能由一种逻辑中介被颠倒为一种现实中介；相应地，“资本一般”的理论结果就是各种经济学理论共同反映的社会生产过程，即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方式。

第二节 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

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商品、货币和资本都具有双重属性，它们一方面作为自然物质具有一般的实体形式，另一方面又具有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所特有的经济形式。政治经济学以现存的商品、货币或资本为研究前提，实际上也就将实体形式和经济形式混为一谈。为了批评以各种财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81.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62.

形式为前提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改造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并提取了其中的合理内核。黑格尔开发辩证法是为了批判各种以抽象观念为前提的哲学观点，通过辩证逻辑的各个环节展现各种观念的抽象性，并将各种相互对立的抽象观念整合为一个绝对知识自我发现的过程；而经过马克思的改造之后，辩证法的理论功能是批判以商品、货币和资本为前提的各种经济学理论，并在辩证逻辑的各个环节中展现这些经济学理论各自反映的片面的经验表象。在叙述方法上，马克思沿用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理论批判功能，尝试在“资本一般”部分完成对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各种研究前提的“无前提”批判，进而揭示政治经济学各派观点的真正前提，即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资本一般”正是对黑格尔的颠倒：黑格尔运用辩证法的目的是发现具有历史必然性的观念并将其作为社会的共同理想，而马克思运用辩证法的目的是揭示各种经济概念所对应的经济现象，并在概念与现实的矛盾中证明这些概念自我扬弃的必然性。通过“资本一般”来展现马克思对辩证法的改造和运用，是理解《资本论》特殊叙述结构的一把钥匙。

一、黑格尔哲学中的“一般”

长期以来，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先验哲学领域，试图解决马克思思想中本体论、认识论和历史观的问题；而这些哲学问题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系较为疏远，如何在两者之间建立有效的联系一直是困扰学术界的理论难题。传统教科书体系将政治经济学看作唯物史观的具体运用，即唯物史观确定了生产方式与上层建筑的互动结构，而政治经济学就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研究。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将哲学与政治经济学割裂开来，依据该立场，马克思的哲学完全可以独立于其政治经济学之外，政治经济学的细节研究似乎无足轻重、无关大局。此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也希望在哲学与政治经济学之间建立联系，但是他们更加倾向于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黑格尔的哲学进行比附，寻找两者在形式和内容上的共同点，并试图以此来重新构造马克思的哲学理论；这样的做法实际上矮化了马克思在哲学理论上的思索，越过马克思早年的思索，直接把政治经济学看作对黑格尔亦步亦趋的模仿和并不完全的超越。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中，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毫无疑问发挥着先导性和基础性的作用，然而，如果只谈论马克思在经济学中所采用的哲学形式而脱离经济思想史的理论内容，马克思在经济学中所运用的哲学视角就无法被恰当地呈现出来。因此，在对“1861—1863 年手稿”这部以经济学内容为主的文本进行细节研究时，哲学和经济学的研究顺序恰恰应该倒过来，先讨论马克思在研究和批判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具体的立场和方法，之后才能对其哲学内涵进行总结。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导言”和“第一分册”的“序言”中，马克思重申了自己在批判政治经济学时的唯物主义立场；不过，与此同时，黑格尔辩证法的思想因素也在马克思 1858—1863 年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发挥着越来越明显的作用。马克思从 1857 年底开始“发狂似的”总结自己的经济学研究，试图尽快“写完政治经济学原理……使公众认清事物的实质”；在此过程中，“黑格尔的《逻辑学》……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马克思很大的忙，以至于马克思“很愿意……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①。与古典经济学的庸俗唯物主义相比，黑格尔思辨哲学的优势在于可以将研究对象描述为一个具有内在必然联系的整体，而——从唯物主义的立场来看——缺陷在于用观念作为整个理论的基础和出发点。在运用黑格尔的思辨逻辑时，马克思剥离了它唯心主义的神秘色彩，从而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提取出了它的“合理内核”，并以此为方法制定了“资本一般”（das Capital im Allgemeinen）理论。鉴于当前关于“合理内核”的定义尚存有争论，本书不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做宏观对比，而只对“一般”范畴的具体运用进行分析。

“资本一般（das Capital im Allemeinen）”中的“一般（das Allgemeine）”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具有独特的逻辑功能，在中文语境中又被译作“共相”“共体”“普遍性”等。② 黑格尔认为，真理是“客观性和概念的同一”③，而“一般”是概念（Begriff）克服主观性并“通过推论以展开它自身进入客观性”的逻辑中介。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将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43.

② 黑格尔. 小逻辑. 贺麟，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8，15-16.

③ 同②400-401.

“一般”视为概念通过否定抽象性来肯定其具体规定性的纯粹自身关系；“在概念的这种实现的过程里，共体（Allgemeinheit）就是这一个返回自己的全体……并且这全体通过扬弃中介性被规定为直接的统一性”①。也就是说，抽象概念的规定性是空洞的，因此会随着认识主体和对象的变化而产生分歧；要在观念上实现对某一类对象的真正理解，应当对这类对象最抽象的规定性进行逻辑演绎以获得其具体的规定性，而不是通过理论抽象来获得这类对象的共同点。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体系中，“一般”是概念论的第一个环节。黑格尔哲学中的“概念”指的是对必然性的客观认识，黑格尔提出“概念”范畴，是对休谟不可知论和康德先验哲学的整体批评。

在欧洲的哲学传统中，理性似乎一直都拥有一种认识世界本质的能力，并且可以通过对本质的认识来对现象界进行改造，从而重新设计一种符合理性、道德和信仰的社会生活。休谟经验主义哲学的出现，极大地动摇了这种信念。休谟认为人只能获得关于个别事物的观念，但无法确定这些观念之间的联系。也就是说，我们并不能证明理性比感性更加可靠，道德的重建不能依靠理性或者信仰这种与普遍性相关的认识方式；相比之下，个体的自然冲动以及朴素感情才是现代道德秩序的基础。休谟的不可知论彻底消解了传统道德哲学和经院哲学的自信，人的理性并不具有认识本质的能力，对社会的理性设计完全是一种理性的狂妄。所以，人类社会应当遵循一种自然秩序，而不是人为设计的道德秩序。理论的作用就是揭示社会实体的规律，并在此前提下实现个体有限的自由。在休谟代表的英国自由主义传统中，个体的自由就是摆脱他人基于任何理由的限制，而只服从于自然和人性的限制。在休谟看来，社会改革的方向应当是自然秩序和自然权利的实现，而不是道德或理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实现。

为了消除不可知论对理性和道德的冲击，康德重新安排了认知主体和认知对象的关系，并证明人仍然拥有获得普遍知识的能力。康德的先验哲学承认对象世界的自在性，但认为即便如此人还是可以获得可靠的知识。为了回应休谟对理性的诘难，康德指出个别对象之间的联系的确不能由对象本身来提供，而只能由人的理性来保障。也就是说，虽然在

① 黑格尔. 小逻辑. 贺麟，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373.

面对认知对象时，人只能获得作为结果的现象；但是，人可以通过纯粹的主观逻辑演绎确定一些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原则，然后将这些原则与具体的对象相结合，而后就可以获得具有必然性的知识。康德证明了，即便存在主客体之间的截然对立，人仍然可以在人类社会中根据人自身的原则来安排、设计社会生活，而不必完全服从于自然法则。与休谟的立场相对，康德认为社会存在的目的是实现基于理性和道德的自由，而不是实现自然欲望的满足。

不过，康德实际上没有解决休谟所提出的问题，而是将休谟的区分进一步绝对化了，主观的精神和客观的自然成为两个绝对分隔的实体，这样的分隔进一步构成了对人的认识能力的严峻考验，即人无法确定自己对普遍性的认识是否符合对象本身。在这种情况下，对象界对于人类而言是一个黑箱，只会向人类展现它的结果；至于它内在的运行机理，既不会因人的行为而改变，也不会被人的理性所理解。由于主客两个实体的根本对立，人所能观察到的只是另一个实体自我运动的结果，而不是它运动的原因。人能做的只是根据结果来反推原因；然而即使是这样，也无法保证人对原因的推测是符合对象本身规律的认识。人的确可以根据自己的观念来设计自己的生活，然而观念本身的主观任意性足以摧毁基于观念建立起来的一切体系。所以，问题不在于观念的作用，而在于哪种观念具有客观必然性。

因此，黑格尔将休谟和康德都归入不可知论的阵营，因为他们在对待真理（即客观的普遍性和必然性）时采用了相似的态度，即认为“知识不能涉及绝对和上帝的本性，不能涉及自然界和精神界的真理和绝对本质……真理不可知，只有那些不真的，有时间性的和变幻不居的东西才能享受被知的权利”①。在黑格尔看来，这些怀疑主义者之所以否认真理的可认识性，是因为他们采用了错误的认识方法，黑格尔称之为“知性思维”或“主观精神”：主体运用知性思维对感性具体事物进行分解，从中抽象出某种特性，然后再用普遍性的概念对其加以规定。黑格尔认为，知性思维本身是有缺陷的：一方面，知性所达到的普遍性的知识是纯主观的抽象概念，它“只属于知性自身，不属于对象本身”②，在理论上将主体和对象分裂成了对立的两极；另一方面，上述抽象概念

① 黑格尔. 小逻辑. 贺麟，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41.

② 黑格尔. 逻辑学：上卷. 杨一之，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105.

不过是指认出了不同事物之间的共同点，“只能分析出已知的固定和静止的规定来”①，并不能提供比有限对象本身更多的普遍性，在现实中只能沦为对现状的辩护。

黑格尔认为，对“真”的追求也就是对“一般性（即普遍性）”的追求，真实的东西一定可以用“具体共相”的辩证逻辑形式来进行证明，而被证明具有“具体普遍性”的东西也一定是真实的。黑格尔肯定了真理的存在以及人通过自身认识真理的可能，同时也证明了人在现实当中实现自身价值的必然。“追求真理的勇气，相信精神的力量，乃是哲学研究的第一条件”；“人应该尊重他自己，并应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②。根据这样的立场，黑格尔谴责当时盛行的启蒙主义和批判哲学是“庸俗浅薄”的学问，认为它们“不去认识真理，只去认识那表面的有时间性的偶然的东西，——只去认识虚浮的东西”③。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黑格尔提出“一般”是为了批评那种试图直接从经验事实抽象出普遍知识的知性思维方式，而这种被黑格尔摧毁的“庸俗唠叨的形而上学”正是19世纪的经济学研究所使用的方法。④ 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将价值视为商品、货币和资本的共同点就是一种典型的知性思维方式。商品、货币和资本——就其自然属性而言——是截然不同的东西，它们的共同点仅仅在于都可以进行交换。如果用知性思维来抽象商品、货币和资本的共同点，很容易得出“交换价值”这种抽象概念。在这个意义上，“价值”观念就体现出了知性思维的弊端：一方面，关于价值的知识是意识的产物，必然会随着认知主体的立场以及认知对象的范围而变化，难以达成共识；另一方面，商品交换、货币流通和资本生产是具有明显差别的社会存在，直接简单地把它们当作同一类对象来认识，并用价值规律作为它们的共同规律，实际上也就掩盖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性。任何概念本身都是抽象的，概念要获得客观的实在性，必须先克服自身的抽象性，变成具有具体规定性的“一般”。概念的抽象性不可能通过对象或其他概念来克服，而只能通过自身的演绎来完成。完成了这一过程的概念，就克服了自身的

① 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上卷. 贺麟，王玖兴，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20.
② 黑格尔. 小逻辑. 贺麟，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36.
③ 同②34.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1-605.

抽象性，而“一般”正是抽象概念通向具体概念的逻辑中介。

二、通往“一般”的辩证逻辑

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提出的辩证方法是对“知性思维”的批判，实际上也是对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批判。在斯密之后，政治经济学在李嘉图的引领下开始演化成为一门实证学科，逐渐形成了所谓的逻辑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通过对个别具体事实的分析，逻辑实证主义试图得出一定的逻辑演绎模型，被经验证实了的演绎模型就是认识的目标——规律。通过“逻辑”和“实证”两个环节，逻辑实证主义试图在理论上完成“从个别到普遍（即从具体到抽象）”的跳跃。然而逻辑实证主义的上述跳跃是有逻辑漏洞的，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和库恩的范式理论都对逻辑实证主义的实证部分提出质疑。不过，从黑格尔哲学的立场来看，实证只是一种检验的方法，而逻辑实证主义的根本缺陷在于其逻辑方法的局限性。

继承了洛克和休谟的经验主义立场，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方法是一种典型的“知性思维”，试图通过对个别具体事物的分析得出适用于普遍对象的抽象结论。根据前文黑格尔对“知性思维”的批评，这样的目标是不可能达到的。首先，对个别事物的分析不可能超出事物本身，只能是对某些现存事物的特定属性的抽象（A→A）；其次，在此基础上得出的适用于其他对象或领域的普遍性理论，只能是完全主观的联想（A→A）→B；最后，由此得出的理论上的规律不是对象本身的规律，对象本身的规律只能作为一种外在的规律与主体相对立。因此，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不仅无法弥合个别与普遍之间的鸿沟，反而进一步将认识的主体和对象割裂开来，将社会规律看作与个人对立的强制的外在必然性。

为了在理论上达成个人与社会的和解，黑格尔提出了自己的理性思辨方法。黑格尔认为，真理是概念与客观性的符合，人对真理的认识（即哲学）需要经历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发展过程，“从开始阶段的抽象形式的统一，经过现实的区别，最后达到自身内在区别的统一整体”①。与知性思维的逻辑形式“（A→A）→B”不同，黑格尔逻辑学

① 张世英. 黑格尔辞典.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605.

的理性方法可以表达为“（$A_1 \rightarrow A_2$）$\rightarrow A_3$”：A_1是认识真理的出发点，它必须是“无规定性的单纯的直接性”①；A_2是A_1为了克服自身矛盾而设定的转化形式，（$A_1 \rightarrow A_2$）是矛盾的不断自我生成和自我克服的过程；回到自身的、完成了（$A_1 \rightarrow A_2$）全过程的A_3虽然看起来是回到了起点A_1，但它已经是拥有内在差别的统一整体，从而将自身的最原初的规定在复杂有机体中重新实现出来。最终达到的“统一整体”就是“具体一般（das konkrete Allgemeine）”或“具体共相”，“具体一般”既是真理的存在形式，也是认识真理的理性方法。完成上述过程的“共相”或“一般”就克服了自己的抽象性，获得了与自己概念相关的全部规定性，成为具有必然性和客观性的概念。例如，在黑格尔的法哲学中，作为起点的抽象概念是“自由意志”；然而，单独的自由意志只是一个抽象的规定，没有任何现实的内容。通过对“自由意志”概念的辩证演绎，自由意志的抽象性最终在国家环节被完全克服。黑格尔以此证明，伦理国家就是自由意志必然要采用的形式，同时自由意志也是伦理国家的内在精神。在这个意义上，自由意志是“抽象一般”或“主观概念”，而伦理国家是“具体一般”或“客观概念”；自由意志的抽象规定只有在伦理国家中才能完全实现，而伦理国家也只有在符合自由意志诸规定的情况下才可以被视为真正的国家。

那么，作为“抽象一般”的主观概念如何获得自己的全部规定呢？根据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一个概念要获得全部的规定，需要从最抽象的规定开始，到克服抽象性并返回自身结束。概念的抽象性可能会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可能是无规定性的抽象概念；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是自相矛盾的抽象规定。对这两种抽象性的克服，就构成了辩证逻辑的核心方法。首先，作为逻辑起点的概念是绝对抽象的纯形式规定，克服其抽象性的方法是将抽象范畴二重化，从而获得具体的规定，表现为抽象概念本身与自身的自我对立。其次，如果将概念二重化之后的两个对立面是相互矛盾的，那么这就意味着通过二重化获得的规定本身仍然具有抽象性。这时就要用到第二种逻辑方法，将此概念二重化后产生的抽象对立转化为彼范畴的具体性质，完成从形式到内容的转化或扬弃，表现为概念抽象规定的自我扬弃。再次，如果通过上述方法获得的新范

① 黑格尔. 小逻辑. 贺麟，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89.

畴仍然具有抽象性，那么就再次对新范畴进行二重化的区分。最后，反复地运用二重化和扬弃这两种方法，直至概念的抽象性被完全克服，概念也就获得了自己的全部规定性，成为具有客观性的观念。

黑格尔的理性思辨方法与政治经济学的知性方法具有本质性的差别。在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方法（A→A)→B 中，（A→A）的认识过程是从感性具体到抽象概念的分析过程；这个分析过程无视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对立转化和前进发展，在理论上无法达到真正的普遍性，即使没有走向知性形而上学的独断论，也会陷入经验主义的不可知论。与之相比，$(A_1 \rightarrow A_2) \rightarrow A_3$从最抽象的直接规定性出发并最终回到自身，黑格尔的理性思辨方法一方面具有逻辑形式的必然性，另一方面也展现了观念自我展开和自我实现的全过程，从而达到了真正的普遍性和必然性。通过辩证法的一般原则，黑格尔所呈现的研究对象不仅是一个拥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而且还是一个具有发展趋势的历史性过程。相比之下，由于无法克服“本质和现象、原因和结果的鸿沟”①，政治经济学只能是对现有社会规律的认可，无法提出具有真理性和过程性的意见。

在“资本一般”理论中，马克思认可了黑格尔超越知性思维时所进行的方法论批判，提取了黑格尔哲学中的合理内核——对“具体一般”或“客观概念”的思辨叙述。通过剥离“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②。这种继承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与黑格尔一样，马克思认可真理的存在以及人通过自身认识真理的可能，同时也始终坚持人在现实当中必然会最终实现自身的自由本质；另一方面，马克思在批判政治经济学时采用了黑格尔的立场，并在构建政治经济学体系时采用了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作为自己的叙述方法，试图用概念辩证法将对象——价值及其具体规定——解释为拥有内在联系的整体。

在批判了各种哲学观点之后，黑格尔没有把它们全部抛弃，而是在一个对立统一的逻辑线索之中将其展现为绝对知识的不同环节。也就是说，黑格尔对各种哲学观点的批判并不是以一种理论为前提去批判另一种理论，而是一种“无前提”的批判，即直接批判那种从既定前提出发的理论方法。黑格尔通过辩证法所实现的是一个无前提的、拥有内在联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1.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2.

系的整体，各种对立的抽象观点都可以在这个整体中得到符合理性的理解。马克思在批判政治经济学时采用了类似的方法：各种经济学理论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但它们都是对现实生产和交换过程的抽象，因此无法在方法论上判定优劣；马克思批判这些经济学理论的方法也并不是提出一种更具普遍性的理论，而是通过批判这些理论的研究前提来将各种对立的经济学理论整合在一个辩证的整体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经济学所采用的从现实出发的唯物主义思路正是其致命的方法论缺陷，“经济学家们把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和受这些关系支配的物所获得的规定性看作物的**自然属性**，这种粗俗的唯物主义，是一种同样粗俗的唯心主义，甚至是一种拜物教，它把社会关系作为物的内在规定归之于物，从而使物神秘化”①。商品、货币和资本确实是现实中的存在物，但恰恰正因如此它们都不能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前提。马克思在“资本一般”部分所完成的理论工作，是完成对这三种经济学研究前提的批判，并运用辩证法揭示其存在的历史前提。

可惜的是，马克思一直没有专门撰写关于黑格尔辩证法合理内核的著作，对于黑格尔辩证法合理因素的正面表述最先是由恩格斯在“第一分册”的书评中给出的。1859 年“第一分册”出版后，恩格斯在马克思的授意下在《人民报》第 14 期和第 16 期上连载了对该书的书评《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以下简称“书评”），“简短地谈一下方法问题和内容上的新东西”②。“书评”分两部分③，第一部分重申了马克思在批判政治经济学时所坚持的唯物主义，第二部分则专门阐述马克思所采用的新方法。在“书评”的第二部分，恩格斯叙述了政治经济学的庸俗唯物主义方法、黑格尔对这种唯物主义不可知论的批判以及马克思对黑格尔逻辑方法中合理因素的继承。恩格斯指出，马克思在“第一分册”——“资本一般”的前两部分——中所采用的方法“是从历史上和实际上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初的和最简单的关系出发……我们分别考察每一个方面……于是出现了需要解决的矛盾”；“这些矛盾也是在实践中发展着的，并且可能已经得到了解决”，简单关系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85.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9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42.

③ 该书评原本还有第三部分，恩格斯打算在第三部分讨论“第一分册”的经济学内容；由于《人民报》停刊，这一部分并没有发表，也没有留下手稿。

本身产生的矛盾“由建立新关系来解决”；接着，“新关系的两个对立面我们现在又需要展开说明”①。马克思的这种新方法在当时没有得到恰当的理解和评价，直到1873年马克思仍然认为人们对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②。由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运用的新方法并不是现成的东西，对“资本一般”的理解只能结合马克思的具体讨论来逐步推测。

三、实现为“一般”的“资本”

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一般”代表获得了具体规定性的客观概念。概念首先克服了自己自在的潜在性，获得了自为的存在形式；然后再次克服自为的抽象性，成为自在自为的客观概念。黑格尔认为，人的观念并不能任意地想象，只有被辩证法证明了的观念才具有现实性。因此，“一般”概念在黑格尔哲学中具有认识论和道德哲学的双重含义，它一方面是主体的认知结果，另一方面又代表着主体必须遵守的道德原则。马克思早年间批评了道德哲学意义上的黑格尔辩证法，认识论意义上的辩证法作为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被悬置了。在批判政治经济学时，马克思复活了辩证法的认识论功能。通过改造和运用黑格尔辩证法的理论批判功能，马克思在“资本一般”部分揭示了作为经济学研究前提的商品、货币和资本的前提分别是什么，并最终通过对资本观念的辩证演绎获得了关于“资本一般”的全部规定。

“一般”是获得了自身全部规定性的概念，相应地，“资本一般”指的是获得了自身所有规定性的资本。不同的经济学流派试图从不同的经济事实里抽象出相应的价值理论作为其经济学研究的基础，再用这种价值理论来解释资本的性质。前文已经提到，政治经济学抽象出来的“价值”是一个有限的抽象概念，那么按照辩证法应当如何处理各种基于价值理论的经济学分歧呢？根据黑格尔的观点，知性思维的弊端在于盲目地追求抽象的统一性并以抽象概念“这种虚妄的假象……为真实”，因此也会将这些抽象概念所带来的矛盾当作无法克服的客观矛盾；而辩证法的功能就在于揭示那些抽象概念的有限性，并将在扬弃矛盾的逻辑过程中将矛盾双方统一为更加高级的具体概念，“但仍然保持那个规定性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3-604.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

的孤立有效性”①。在通过“资本一般”概念批判政治经济学时，马克思采用了与黑格尔辩证法相同的逻辑方法，不是以某种确定价值理论为出发点，而是从价值抽象规定（即一般劳动时间）的内在矛盾出发，并在逻辑演绎过程中始终保持着这一抽象规定的孤立有效性。在辩证法的启发下，马克思没有像英国政治经济学家那样将某种一般的价值理论作为经济学理论的真实基础，而是从一开始就强调体现在商品交换中的价值观念（即一般劳动时间）的抽象性及其遇到的理论难题和现实困境。② 综合“第一分册”和“1861—1863 年手稿”的内容来看，马克思关于“资本一般”概念的叙述过程，也就是运用辩证法克服价值的抽象规定的逻辑过程。马克思指出：在商品和货币形式中，价值概念总是和自身的实现形式相矛盾，因此只是价值的抽象形式；只有在资本形式中，价值才真正克服了自身的抽象性，成为具有客观性的观念。因此，“资本一般”又可以大致上被区分为两个环节：一是“资本一般”获得其抽象规定性的过程，即价值获得自身抽象规定性——自行增殖——的过程，包括商品和货币两个否定性环节；二是“资本一般”实现其自身抽象规定的过程，即货币成为资本的过程。“资本一般”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通过辩证演绎展示价值概念如何获得自己全部的规定性，而这些规定性也就是资产阶级社会所具有的特殊生产方式。

通过分析“资本一般”概念可以发现，马克思在批判政治经济学时采用的是一种崭新的理论思路，是对唯物主义立场的主动反思。与马克思的立场类似，古典经济学也以生产为研究对象，天然地带有唯物主义的倾向；但是，由于古典经济学采用了错误的方法，所以无法揭示价值的特殊性质。恩格斯在为“第一分册”而写的“书评”中，明确指出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问题：

> 在这里必须解决与政治经济学本身无关的另外一个问题。应该用什么方法对待科学？一方面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它具有完全抽象的“思辨的”形式，黑格尔就是以这种形式把它留下来的；另一方面是平庸的、现在重新时兴的、实质上是沃尔弗式的形而上学的方

① 黑格尔. 小逻辑. 贺麟，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77.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37.

> 法，这也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写他们那些缺乏内在联系的大部头著作时采用的方法。①

政治经济学采用了这样一种平庸的方法，这种方法“曾被康德特别是黑格尔在理论上摧毁，只是由于惰性和缺乏一种别的**简单**方法，才使它能够在实际上继续存在”②。恩格斯的这段评论需要结合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具体批判才能够得到解释。马克思在批判政治经济学的非历史性时，曾指出现代经济学家的问题：

> 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为有了统一（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③

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学家的唯物主义只是摆出一些生产的基本要素，然后就直接以这些要素为前提开始经济学研究。经济学的生产理论只是指认出了不同生产现象之间的共同点，并不能提供比生产本身更多的必然性，因此这样的理论不足以称之为科学，只是“非现实的东西”和“无概念的概念”，必然走向独断论的形而上学。

基于唯物主义的经济学理论走了一条错误的“庸人”路线，本应在理论中得到解释的经验表象，却错误地被当成了理论的前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因此才会被偷换为与历史无关的永恒自然规律。马克思后来在批评古典经济学分析方法的错误时，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 古典经济学力求通过分析，把各种固定的和彼此异化的财富形式还原为它们的内在的统一性……它想了解与表现形式的多样性不同的内在联系。……在进行这种分析的时候，古典经济学有时也陷入矛盾；它往往试图在没有中介环节的情况下就直接进行这种还原和证明不同形式的源泉的同一性。……它感兴趣的不是从起源来说明各种不同的形式，而是通过分析来把它们还原为它们的统一性，因为它是从把它们作为已知的前提出发的。④

---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1.
② 同①.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6.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59-360.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虽然试图在各种财富形式背后寻找统一的内在联系，但是由于他们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种收入形式当作了既定的前提，也只能从各种财富形式中抽象出“劳动一般”作为财富形式的共同点。因此，“劳动一般”也是从各种既定表象中抽象出来的，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形式的产物，基于“劳动一般”提出的各种价值诉求最终也都会转变为对现代生产方式的辩护。

在充分了解了马克思叙述“资本一般”概念时所运用的方法之后，“资本一般”概念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范畴的批判性就显露出来了。在完成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之后，马克思用“资本一般”概念的辩证结构证明了以下结论：体现在商品交换、货币流通和资本流通中的价值规律都是现代资本生产的抽象表现形式，它们之间虽然存在着形式上的对立，但是拥有共同的现实基础。因此，英国政治经济学基于价值规律的种种理论无法认识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方式，更无法提出真正有效的社会改革方案。简而言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过程在逻辑上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步骤：

首先，为了批评政治经济学“从具体到抽象”的错误方法，马克思区分了物质的“实体形式”和“经济形式”①，并以“经济形式”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真正对象。“实体形式”就是物质对象作为自然物所具有的属性，而“经济形式”是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下人的观念为物质对象赋予的社会属性。要了解一种社会生产方式的特殊规定，应当以物质载体上非实体的“经济形式”为研究对象，“这些**形式**对于物质财富本身是有决定作用的”②。相应地，政治经济学家所犯的错误就在于用研究物质的实体形式的方式去研究物质的经济形式，因此“把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和受这些关系支配的物所获得的规定性看作物的**自然属性**……从而使物神秘化”③。这样就意味着，在批判政治经济学的时候，需要排除商品、货币和资本实体形式的影响，单独地研究“从生产本身的自然必然性产生的，不以意志、政策等等为转移的［经济］形式”④。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2.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58.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85.
④ 同②15. ［］内容为引者加。

其次，为了从物质材料上将资本主义生产赋予物的经济形式剥离下来，马克思选择了资产阶级社会最普遍的存在物——商品——的经济形式作为逻辑起点。商品在实体形式上几乎没有共同点，它们被归为同一类对象完全是因为被赋予了一致的经济形式。商品是“对象化在一种特殊使用价值中的一般劳动时间”①，商品成为最普遍的存在物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现象，意味着人们在观念中普遍接受了“一般劳动时间”的价值规定。在对商品的经济形式（即交换价值）进行界定时，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对这个制度的内在有机联系和生活过程的理解——的基础、出发点，是**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②；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文中，马克思对价值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诸交换价值（**交换价值**只有在至少存在两个交换价值的情况下才存在）代表一种**它们共有的**、‘同它们的使用价值完全无关’｛在这里也就是指同它们的自然形式无关｝的东西，即‘**价值**’”③。也就是说，对于价值概念的理解需要排除一切实体形式的因素，即排除了实体形式或使用价值之后的纯粹的“**一般劳动时间**”④。研究商品如何成为最普遍的存在物，也就是研究“一般劳动时间”这种抽象的经济形式在何种前提下可以成为不以“意志、政策等等为转移的形式”。“资本一般”概念的作用，正在于揭示“一般劳动时间”这种抽象的规定性在怎样的生产方式中才能克服其主观性并成为具有客观性的经验现实。

最后，价值的普遍存在是一个经验事实，而价值观念（即一般劳动时间）的抽象性是一个理论现实，马克思用“资本一般”概念解决了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在“第一分册”和“1861—1863 年手稿”中，马克思运用辩证法呈现了价值作为“一般劳动时间”的抽象性，以及这种抽象性的克服需要怎样的现实条件作为中介，而这些现实条件也就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所特有的生产方式。在现实的经济运行中，资产阶级社会的中介功能被抽象掉了，商品和货币似乎成为天然就具有价值的东西，产生利润也似乎成为资本的自然属性，“物现在表现为资本，资本也表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41.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83.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399.
④ 同①424.

现为单纯的物，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全部结果则表现为物所固有的一种属性”①。为了排除实体形式对经济学研究的影响、避免重蹈政治经济学的覆辙，马克思在叙述“资本一般”概念时严格地遵循了辩证法的逻辑规则，从商品概念中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出发来展现“价值”由于其抽象性而导致的矛盾、矛盾自我克服的中介以及价值扬弃矛盾后所获得的新的规定性。由于方法上的局限，政治经济学家无法像马克思那样认识经济概念与现实间的中介，因此也无法区分物质对象的实体形式和经济形式——“他们刚想笨拙地断定是物的东西，突然表现为社会关系，他们刚刚确定为社会关系的东西，却又表现为物来嘲弄他们”，政治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缺陷就在这种“天真的惊异中暴露出来了”②。

综上所述，马克思在“资本一般”部分完成了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但他的批判方法并不是提出另一种经济学理论，而是将各种相互对立的经济学观念全部纳入“资本一般”的辩证逻辑环节中加以理解。商品、货币和资本是抽象性依次递减的经济概念序列，概念的抽象程度越高，其内在矛盾也就越明显，相应地，其获得现实性所必需的中介也就越复杂。根据“资本一般”概念的叙述逻辑，商品概念是抽象的，其内在矛盾的克服要以货币概念的规定性被普遍认可为前提；货币概念同样也是抽象的，其内在矛盾的克服要以资本概念的规定性被普遍认可为前提；而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资本概念的抽象性被克服了，资本观念和资本生产达到了统一。在资本观念的主导下，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果是作为雇佣劳动的劳动和作为资本的劳动条件之间的分离，劳动和劳动条件的分离又会反过来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从而进一步强化人们头脑中的资本观念。在“资本一般”概念的“资本”环节，马克思解释了资本观念和资本生产在何种生产方式中可以达到经验上的一致，同时也就解释了抽象价值观念普遍化的社会前提：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方式中，个人劳动必须“采取与自身直接对立的形式，即抽象一般性的形式，才变成社会劳动”③，于是价值的存在就不再只是一种抽象的观念或者观念中的抽象，而是“社会生产过程中每天都在进行的抽象”④。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05.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27.
③ 同②426.
④ 同②423.

第三节 作为批判方法的“一般”

从商品到“资本一般”的逻辑演绎，确定了哪些社会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特有的社会关系，同时也证明了以商品、货币或资本为前提的价值理论和经济学研究不可能提出超越资产阶级社会的改革方案。政治经济学的缺陷，就是把商品、货币或资本当作了客观存在的前提来进行研究，而没有考虑到它们本身都只是人的一种观念，这些前提是需要被说明的东西。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关系是价值客观化的历史前提；通过“资本一般”理论对价值观念的辩证演绎，资本以及资产阶级的社会关系也就被呈现为一个拥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从表现形式上看，“资本一般”理论本身表现为抽象概念的辩证发展过程，即价值概念自我设定、自我克服和自我完成的形式演绎，这也正是马克思批判方法的新特点。在“资本一般”的叙述过程中，马克思完成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黑格尔运用辩证法的目的，是要证明某些观念具有现实的必然性；马克思运用辩证法的目的，则是要揭示这些具有“客观”外表的观念的历史性前提。

一、抽象概念与具体概念

在 19 世纪 40 年代的形而上学批判中，马克思就开始基于唯物主义立场探讨抽象范畴和具体范畴的关系，批评思辨哲学将抽象范畴当作具体范畴和客观现象的本质。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抽象范畴和具体范畴的关系又被颠倒过来了，“资本一般”或劳动价值理论是抽象思维的产物，却代表了对资产阶级社会本质的理解；具体范畴表现为抽象范畴自我设定、自我克服和自我实现的结果，这种思路甚至被部分学者解释为马克思思维水平的倒退。根据“第一分册”和“1861—1863 年手稿”的内容可以看出，马克思在形而上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运用的方法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都是一种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无前提”批判，其中的差别仅仅在于批判对象有所不同：形而上学批判的批判对象是以抽象观念为前提的思辨哲学，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批判对象是以经济现象为前提的经济学。

在批判以抽象观念为前提的思辨哲学时，马克思的理论任务是揭示抽象观念赖以成立的现实前提。按照马克思 19 世纪 40 年代的批判思路，抽象范畴是从具体范畴中提取出来的共同点，只有在具体范畴中才能够得到恰当的解释；思辨哲学却误将抽象范畴当作了具体范畴内在的本质和目的，颠倒了两者之间的地位。马克思在“导言”中延续了 40 年代的唯物主义思路，反对将抽象范畴当作历史发展的目标。尽管抽象简单范畴在比较具体的范畴形成之前也可能会存在，但是在具体范畴形成之后，这些抽象范畴才能获得其真实发挥作用的现实的规定性；也就是说，抽象范畴的普遍性是由具体范畴赋予的，“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①，只有具体范畴中普遍包含着抽象范畴的规定性，抽象范畴才会表现为真正的抽象性。对于经济学研究而言，这就意味着只有在具体复杂的范畴（资本）中才能认识抽象简单的范畴（如劳动、价值、货币等等）。因此，马克思对同一抽象范畴的论述会进行两次，一次是在具体范畴出现之前的抽象范畴，另一次是在具体范畴出现之后的抽象范畴。通过两个抽象范畴的对比，马克思试图凸显同一范畴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意义，从而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这种思路主导了“1857—1858 年手稿”的初期写作。

在批判以经济现象为前提的经济学时，马克思的任务是揭示这些经济现象背后所代表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因此，在“资本一般”部分，抽象范畴和具体范畴的地位发生翻转。“资本一般”理论的完整形态是作为简单抽象范畴的“商品（价值）”到作为复杂具体范畴的“资本”的逻辑演绎过程，在这里，抽象范畴被当作讨论的出发点和本质的规定性，而具体范畴是抽象范畴自我设定、自我克服和自我实现的全过程。抽象范畴不再是简单地出现两次，而是作为一个完整的逻辑整体呈现出来，是约束具体范畴的形式规定。而且抽象范畴实现自身的逻辑过程还表现为一种外在的必然性，成为统治现实经济关系的特殊经济形式，而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人仅表现为这种外在规律的人格化。

这两种看似对立的方法实际上是内在一致的。通过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开始意识到不仅唯心主义的空洞想象会导致思想的庸俗化，直接的唯物主义的机械反映论也会导致同样的结果；批判庸俗唯心主义需要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5.

调物质生产在观念形成时的基础作用，而批判庸俗唯物主义就需要强调（经济）形式对物的决定作用。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严厉地批评了政治经济学从物质材料出发来研究社会关系的错误立场：

> 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是财富的特殊社会形式，或者不如说是财富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财富的材料，不论是主体的，如劳动，还是客体的，如满足自然需要或历史需要的对象，最初对于一切生产时代来说表现为共通的东西。因此，这种材料最初表现为单纯的前提。这种前提完全处在政治经济学的考察范围之外，而只有当这种材料为形式关系所改变或表现为改变这种形式关系的东西时，才进入考察的范围。关于这方面的通常的一般论述，只限于一些抽象概念。这些抽象概念在政治经济学的最初尝试中还有一些历史价值，那时人们还在极其艰难地把各种形式从材料上剥离下来并竭力把它们作为特有的考察对象固定下来。后来，这些抽象概念成了索然无味的老生常谈，它们越是自命不凡地以科学的面貌出现，就越使人讨厌。①

与政治经济学不同，马克思的“资本一般”理论是对经济形式（社会关系）的研究，是对物的社会属性的研究，而古典经济学“把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和受这些关系支配的物所获得的规定性看作物的**自然属性**，这种粗俗的唯物主义……使物神秘化”②。

综合马克思对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双重批判可以看出，“新唯物主义”不是简单的“物质决定论”，更不可能是要求人服从于外在社会规律的“经济决定论”。通过重新界定抽象范畴在理解经济形式时的逻辑功能，马克思的“资本一般”理论代表了个人超越社会外在强制性的一种可能，即人通过理性可以发现与现实规律不同的却真实发挥作用的内在规律，这个内在规律不仅能够解释现实规律的成因，而且还蕴含着超越现实规律的可能。

在新的方法中，抽象范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对物的自然属性的抽象，另一种是对物的社会属性的抽象。从物质实体中抽象出来的自然抽象范畴指代的是一类物本身所具有的共同点，要以物的自然存在为前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66.

② 同①85.

提；因此对自然属性的认识要坚持唯物主义的立场，以物质实体为第一性的存在。而从物质实体中抽象出来的社会抽象范畴不是物本身的属性，而是社会关系赋予它的新的属性；因此对社会属性的理解就要以社会关系作为根据，物质实体在这种理解中是第二性的存在。例如，在对商品进行分析时，商品作为物结合着“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①，而且正是以这种关系为前提，生产者的产品才获得了商品的规定。在自然属性上完全不同的物却都可以被看作商品，这并不意味着商品作为物具有某种共同的东西，而是因为交换关系使不同的物具有了共同的社会属性。

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商品作为最普遍的物，作为“资产阶级生产的最一般的范畴”②，说明交换关系已经成为物的普遍的前提。交换的社会关系成为真正普遍的前提，也就意味着交换关系已经克服了交换行为本身会遇到的现实困难：简单流通和货币的出现，解决了物物交换的困难；而资本流通的出现，进一步解决了简单流通中的困难。交换行为遇到的困难以及解决困难的现实过程，在理论上就体现为商品的社会属性（即价值）的内在矛盾自我展开和自我克服的逻辑过程，也就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全部理论内容。与马克思新的辩证方法相比，古典经济学的庸俗之处就在于试图用庸俗唯物主义的立场研究资本，想要直接从资本的具体存在中分析出它的抽象性质，从而将资本的社会属性解释为物的自然属性，无法看到货币和资本代表的不同的社会关系。在马克思看来，货币和资本的属性都是由社会关系赋予的，只有用逻辑的方式才能恰当地理解不同社会关系之间的形式差别。

二、抽象概念的自我扬弃

通过改造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在“资本一般”理论中将其运用在了对价值概念的认识上。价值是一种抽象观念，但是它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却是真实的，而且个人的意志并不会对价值的功能产生实质的影响。不过，即使拥有客观性的外表，价值概念本身仍然只是人的观念，不足以成为科学研究的物质对象。一种观念成为被普遍接受的东西，意味着现实生活中已经将这种抽象观念的所有规定性完全实现出来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4.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32.

了。一旦将价值这种抽象观念确定为科学的研究对象，那么实际上同时也就接受了与价值观念相关的全部具体规定。抽象价值概念的具体规定，只能通过辩证法的逻辑方式才能得到完整的呈现。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呈现具体“一般”或“共相”的黑格尔辩证法就成为批判政治经济学的唯一方法。前文已经提到，黑格尔的辩证法的逻辑功能是呈现抽象概念的具体规定，具体的逻辑方法可以归结为两条：抽象概念的自我对立和抽象规定的自我扬弃。马克思在“资本一般”理论中反复运用了这两种逻辑方法，演绎出了抽象价值概念的具体规定。

价值概念从抽象到具体发展的一种方法是完成抽象概念的自我对立。所谓抽象概念，就是不以自身为前提的概念，或者说以人的主观性为前提的概念。在“资本一般”理论的三个环节——商品、（简单流通中的）货币和资本——中，商品形式和货币形式的价值都是抽象概念，它们的存在都取决于人的某种需要。

商品形式的价值是最抽象的价值，它完全是商品所有者头脑中的一种想象，没有确定的存在形式。在商品形式中，价值的抽象规定是交换，即“对象化在一种特殊使用价值中的一般劳动时间”①，价值的存在和实现都要以人的直接需要为前提。为了克服价值在商品形式中的抽象性，马克思在“资本一般”理论中对商品进行了二重化的区分。“一般劳动时间”是商品的本质规定，但只提供了一种抽象的规定性，因为商品中的“一般劳动时间”只是商品所有者的主观想象，无法在定在中实现自身。为了克服商品形式的抽象性，就需要对商品进行二重化的区分，将“一般劳动时间”的性质赋予一种特定的商品，并将其设定为与其他商品发生关系的一种独立的商品。这种与其他商品对立的特殊商品就是一般等价物，商品范畴由此完成了自我对立，并过渡到简单流通的环节。

在简单流通过程中，货币形式的价值同样也是抽象的价值。在货币形式中，价值的抽象规定是通过流通实现增殖。简单流通过程中的货币以物的形式实现了价值的定在，货币是“一般劳动时间”的物质化身。但是“**流通的直接存在是纯粹的假象**”②，因为一方面流通的持续进行要以商品的不断生产和需求的不断生成为前提，而且另一方面流通本身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41.

② 同①367.

不具备实现价值增殖的可能。价值在货币形式中自行增殖的规定需要通过外在条件来实现，因此这种价值形式仍然是抽象的。为了克服货币形式的抽象性，就要对货币进行二重化的区分，将一部分货币投入生产转变为资本，将其作为特殊的货币与其他货币发生关系。简单流通过程中的货币由此完成了自我对立，并过渡到了资本流通过程。

价值概念从抽象到具体发展的另一种方法是完成抽象规定的自我扬弃。所谓抽象规定，指的是抽象概念二重化之后两个对立面互为前提、互为条件的状况，马克思将其称为“相互矛盾的要求的总体”①。在“资本一般”理论的三个环节中，商品形式和货币形式的价值将自身二重化之后都遇到了这样的困境，马克思通过两次形式转换解决了抽象形式的自我对立，揭示了价值观念的具体规定。

商品的二重性会导致抽象规定的产生。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二重性，而且只有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一个物品才能够被称为商品。然而在商品形式中，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是互为前提和互为条件的矛盾体：“商品要表现为交换价值，表现为对象化的一般劳动时间，就要先作为使用价值来转让，交给别人，而它们要作为使用价值来转让，反过来又以它们作为交换价值的存在为前提”②。商品本身二重化所导致的对立无法通过商品本身的规定来克服，然而从另一个方面看，这种对立恰恰构成了简单流通的实际内容。在简单流通过程中，商品作为使用价值进入流通，它的交换价值表现为观念中的金（即价格）；金作为交换价值进入流通，它的使用价值是观念中的、与个人需求无关的一般使用价值。在商品流通卖（W—G）或买（G—W）的过程中，商品将自己二重化为商品和金的对立，从而将自身的二重性全面实现出来，克服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互为前提的矛盾。商品二重化之后出现的抽象规定在这个意义上完成了自我扬弃，将自身具体化为简单流通的内容，简单流通过程中的货币也因此成了更为具体、更加高级的价值形式。

货币的二重性同样也会导致抽象规定的产生。在简单流通过程中，货币将物物交换 W—W 分解为（W—G）和（G—W）两个相对独立的过程，在这两个过程中，货币分别将自身二重化为价格尺度和购买手段。显而易见，这两个过程同样是互为前提和互为条件的矛盾体：“我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37.

② 同①.

们把商品的第一形态变化即商品向货币的转化当作第一流通阶段 W—G 完成的结果来说明，同时也就是假定有另一个商品早已转化为货币，因而现在已经处在第二流通阶段 G—W 上”①。一方面，商品向货币转化（W—G）是流通得以进行的前提；另一方面，商品能够实现向货币的转化，又要以业已存在的流通的结果（G—W）为前提，“流通本身就是这种恶性循环”②。不过，只要将 W—G—W 的形式规定转换为 G—W—G，形式上的矛盾性就被克服了，简单流通的抽象性就会具体化为资本流通的内容。G—W—G 和 W—G—W 是对同一过程的不同描述，但是从中可以看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形式规定：W—G—W 的两极是具有相等价值量的商品，它们的交换是实在的物质变换，即使用价值的交换；而 G—W—G 的两极是具有相等价值量的金，我们立即就会意识到这个过程本身是不现实的、抽象的过程。G—W—G，即“为卖而买”的公式，本身就意味着货币进入流通的目的是实现货币数量的增殖，而这正是资本流通的简单规定。货币在简单流通过程中将自身二重化之后出现的抽象规定在这个意义上完成了自我扬弃，将自身具体化为资本流通的内容，资本也因此成了更为具体、更加高级的价值形式。

上述两种方法在“1861—1863 年手稿”中也得到了反复的运用，构成了“1861—1863 年手稿”中最为核心的论证逻辑。

马克思在手稿中多次运用二重化的方法来建构抽象概念的自我对立，以此来克服概念的抽象性。例如在“资本一般”第三章的第一篇“资本的生产过程”中，作为资本，货币投入流通的唯一目的是实现货币量的增加（即价值的增殖），然而简单流通并不具备价值增殖的可能，商品与货币的形式变换并不会改变它们所代表的价值量。为了克服资本概念的矛盾，货币必须将自身二重化为自己的反题。货币作为价值的化身，本身就是对象化的一般劳动，唯一与货币对立（Gegensatz）的东西是“非对象化劳动，**活劳动**”③，因此货币的二重化也就是与劳动进行交换。资本家拿出一定量的货币作为预付资本来支配活劳动，同样需要将预付资本二重化，一部分用来直接与活劳动交换，另一部分用来购买劳动条件，也就是再次二重化为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二重化的方法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85.

② 同①.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9.

在手稿中的运用十分频繁，类似的例证不胜枚举，此处不再一一陈述。

马克思在手稿中对第二种方法——抽象规定的自我扬弃——的运用主要体现在对“资本的流通过程”的形式转换上。在“资本的流通过程”中，单个资本因为周转和流通的时间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利润率，资本流通在总体上看就是许多单个资本的偶然并行和相互补偿。各单个资本的循环“互为前提、互为条件”①，因此由这些单个资本流通（G—W—G′）组成的资本总流通再次成为一个自相矛盾的总体。不过，如果从产品生产的角度来看，资本流通就克服了自相矛盾的性质，从而体现为“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从再生产的角度来看，由单个资本流通（G—W—G′）组成的资本总流通的抽象规定就表现为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W—G—W′）的具体内容。“W—G—W′表现为再生产过程中的真正意义上的流通阶段”②，一件产品（W′）的消费过程同时也是另一件产品（W）的生产过程。马克思以这样的形式转化证明，资本流通中货币的增殖也只是一种表面的形式，资本流通的实际内容是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即产品的不断消费和不断生产。在社会再生产中，一种商品被资本 A 生产出来，并成为资本 B 生产的原料；而货币的作用就是以自身为中介将资本 A 的商品提供给资本 B，并补偿资本 A 使其重新获得货币以进行再生产。货币的各种资本功能只是维持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中介和工具，它们的所有规定都有赖于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顺利进行。

总的来说，辩证法中的“一般”概念集中体现了马克思在批判政治经济学理论时所运用的方法。政治经济学内部的各个流派虽然互相攻讦，但是都以价值为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前提，试图从各种财富形式中分析出价值的性质。通过改造和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用他的“资本一般”理论呈现了价值概念的全部具体规定，从而证明价值概念与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关系实际上是同一种东西，各种经济学理论只不过是对现代资本生产过程不同程度的抽象。

三、辩证法的起点和终点

价值观念本身是人在交换和流通中产生的一种观念，这种观念的客观化和普遍化意味着流通本身已经控制了生产的各个方面。因此，作为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392.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38.

经济学概念的价值只有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之中才能出现，价值概念本身的全部规定性也就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关系的理论反映。对价值概念的逻辑演绎，要从最抽象的价值规定开始，到价值概念的抽象性完全被克服结束。对于黑格尔的辩证法而言，逻辑的起点和终点构成了一个封闭的圆环，仅仅是抽象概念的完全实现；而在马克思的“资本一般”理论中，从逻辑起点到逻辑终点的过程表现为一个层层递进的历史过程，作为逻辑终点的资本不仅实现了价值的全部规定，同时还蕴含着价值概念自我扬弃的逻辑论证。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方法复活了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因素，批评了以价值作为研究对象的各个经济学流派。

“资本一般”是对政治经济学庸俗观点的批判。之所以说政治经济学具有庸俗性，是因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将社会（关系）规律当作了自然规律、当作了与人对立且必须服从的外在必然性，从而使个人在经济活动中丧失了自身的自由本质并成为社会规律发挥作用的手段。将社会看作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具有自身规律的独立经济实体对于经济学而言至关重要，标志着政治经济学作为独立学科的产生；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普遍相信，基于理性选择和相互竞争，自由个人的经济行为会在社会层面上产生一种与私人动机不同的整体趋势，而且这种趋势可以通过静态的逻辑模型得到揭示。基于德国的自由主义传统，马克思认为，人的自由只能是人根据自己本质的自我规定，而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实现的劳动自由只是由社会形式所赋予的外在的形式自由；因此，资产阶级社会的外在规律（尽管实现了劳动自由）同样是一种“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①，那么，认可这种外在规律的政治经济学就是一种屈从于现实的庸俗观点。

“资本一般”是对政治经济学庸俗方面的整体批评，同时也是研究资产阶级特有经济形式（社会关系）的学说；它一方面要解释这种经济形式为何会成为与人对立的必然性，另一方面也要说明经济形式扬弃这种必然性的必然性。“资本一般”作为概念具有双重含义：从抽象的方面讲，它代表着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相较于一般社会形式）或资本形式（相较于一般价值形式）的特殊性，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各种资本的共同特征的抽象，表明资产阶级社会关系和经济形式的历史性与非自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1.

然性；从现实的方面讲，它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真实发挥作用的抽象规定，体现为与各种特殊资本并存的一般形式的资本，表明由资产阶级社会关系和经济形式产生的现实的必然性，以及这种必然性自我扬弃的必然性。

相应地，“资本一般”作为理论也表现为两个过程：在抽象形式方面，体现为“商品—简单流通—货币”的辩证发展过程，价值形式通过克服自身的矛盾而发展为资本的一般规定性；在现实规定方面，体现为“一般资本—特殊资本—个别资本”的辩证发展过程，也就是“资本一般”克服自身的抽象性并将自身的抽象规定实现在经济活动中的真实过程。在“资本一般”的逻辑过程中，唯物主义的各种观点都被颠倒过来了，“资本一般”的抽象规定表现为真实发挥作用的现实规定，而生产力（即生产资料）和现实的个人表现为“资本一般”实现自身抽象规定的中介和手段。因此，完成了的“资本一般”理论表现为一个抽象范畴自我演绎的“先验的结构”①，表现为一种与唯物主义批判不同的崭新的批判逻辑。

“资本一般”理论的逻辑起点是商品。商品，就是有价值的东西，是资产阶级社会最普遍的存在物，同时也普遍地存在于人类历史的各个时期。价值在商品中具有最抽象的规定性，但同时也是最无规定性的抽象，即一般的社会劳动。在商品的形式上，人们只能认识到这种自在的价值形式，价值以人的直接需要为前提，并且人可以通过自给自足的生产主动地将价值取消。克服了商品形式的抽象性之后，价值在货币形式中获得了新的规定性，即通过流通来实现增殖的对象化劳动。在货币的形式上，人们可以认识到价值的自为形式，价值不再以人的直接需要为前提，而是自己成为自己的目的——实现增殖。不过，货币形式的价值仍然是抽象的，实现增殖的手段还是必须以人的自然需要为前提，因此人似乎仍然可以通过主动克制自己的欲望来消灭价值。

“资本”是“资本一般”理论的逻辑终点。价值在资本形式中成为自在自为的主体，是真正存在的价值。在货币的形式上，价值只是实现了自身的目的，但仍然要以人的需要为基础；但在资本的形式上，价值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2.

自己成为自己的前提，从而具有了自在自为的客观性。马克思指出，货币成为资本的前提是雇佣劳动制度，雇佣劳动制度的前提则是生产资料与社会个体的分离，而生产资料与社会个体的进一步分离本身又是资本生产的结果。因此，资本生产既是自己的前提也是自己的结果，价值在资本的形式中获得了自我创造、自我更新的能力，而个人基于自由意志的行动成为价值实现自我规定的中介和工具。价值本来只是人的观念，但在资本生产的条件下，价值不再以人的需要为前提，成为一种不依赖于人的客观实体。经过商品、货币和资本环节的辩证演绎，价值概念在资本环节获得了自身的具体规定，脱离了对人的依赖。价值此时表现为物本身所具有的一种可比较的性质，同时也就在观念上将一切东西——无论它本来是否具备商品的性质——都实现为商品。

由于采用了新的方法，马克思的“资本一般”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不再是“对经济学的个别章节作零碎的批判”或“对经济学的某些争论问题作孤立的研究”，而是“系统地概括经济科学的全部复杂内容，并且在联系中阐述资产阶级生产和资产阶级交换的规律”①，也就是将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形式呈现为一个由简单范畴（价值）不断扬弃自身的抽象性从而变成现实规律（资本）的辩证逻辑过程。不过，由于“资本一般”理论和辩证法的复杂性，马克思关于逻辑起点的问题曾经有几种不同的表述：从资本出发、从商品出发和从价值出发。

在“导言”和“1857—1858 年手稿”中，资本是出发点：“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②。马克思此时尚未创立“资本一般”理论，仍然试图用抽象范畴和具体范畴的区分来研究资本。资本是历史生成的具体范畴，代表了资产阶级的社会有机体，因此资本在理论上既是作为条件和前提的起点，也是作为结果和产物的终点。只有在资本这个具体范畴之下，才能对货币、劳动等抽象概念进行解释，从而将前资本主义的货币形式与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货币形式区分开来。

在“资本一般”理论中，马克思不再以资本本身为出发点，因为资本作为具体范畴是简单范畴的产物和结果。为了逻辑地说明“资本一般”的生成过程，马克思区分了简单流通和资本流通两个逻辑过程。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0.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9.

简单流通中，马克思“以资产阶级生产的最一般的范畴，即商品作为起点”①：商品为了实现自身的双重规定就必须否定自身进入流通，简单流通中的形式规定产生了特殊的商品——货币，作为独立价值形式的货币反过来又否定了简单流通。简单流通的结果同时也是对自己的否定，从而以货币（价值）为中介过渡为资本流通。马克思强调简单流通向资本流通的过渡的逻辑环节不是资本现实的历史产生过程，“简单流通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生产总过程的抽象领域，它通过自身的各种规定证明，它是［B″－6］那个在流通背后进行的、从流通中产生又产生出流通的更深刻的过程即工业资本的要素，其单纯表现形式”②。简单流通是现代资本流通在表面上产生的抽象形式，这种抽象形式不仅存在于现代，而且普遍地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的各种社会形式中；但是只有在现代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简单流通才不再仅仅是抽象形式，而是成为一种真正发挥作用的现实的普遍规律。

在简单流通过程被自我扬弃之后，简单流通的结果——价值或作为价值形式的货币——就成为资本流通新的逻辑起点，从而引出了“资本一般”最抽象的规定性：

> 如果我们像以前以商品为出发点那样，现在以交换价值本身——它的独立化是流通过程的结果——为出发点，那么我们便发现：（1）……交换价值的存在……是二重的，一次存在于使用价值中，另一次存在于货币中。然而两个形式互相交换着，并且由于单纯的这样的交换，价值才不会消灭。（2）为了使货币作为货币保存……货币进入流通甚至应当是货币自我保存的一个要素，而货币的自我保存应当就是进入流通。……交换价值在货币上的独立化，实际上只是表明交换价值对体现交换价值的特殊使用价值是漠不关心的。③

以商品为出发点和以价值为出发点的两种说法看起来是矛盾的，甚至有研究者将这两个出发点对立起来，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分析是从商品出发，而古典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才以价值或交换价值为出发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32.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70.
③ 同②380-381.

点。实际上，在“资本一般”理论中，这两个出发点对应的是不同的逻辑过程，以商品为出发点的是“资本一般”在简单流通中的抽象生成过程，以价值为出发点的是“资本一般”在资本流通中的自我生成过程。

综上所述，“资本一般”部分的理论功能，是揭示经济概念存在及发挥作用的现实前提，并批判政治经济学以抽象价值理论来研究资本的庸俗思路。马克思所运用的“资本一般”概念虽然与黑格尔辩证法具有相似的逻辑结构，但是具有彻底的唯物主义基础。因此，不应当把“资本一般”概念视为带有思辨哲学色彩的半成品，恰恰相反，“资本一般”概念代表了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发展，是一个批判性的历史唯物主义范畴。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下重新看待“资本一般”概念，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的差别——以及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差别——就直观地呈现出来了。

首先，与政治经济学以价值作为理论起点不同，“资本一般”的起点是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商品。马克思在叙述“资本一般”概念的过程中至少批评了政治经济学的三个流派，分别是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以功利主义和历史主义为方法的庸俗经济学家以及当时在英国理论界异常活跃的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这三派经济学家虽然观点相左，但是都试图从经济活动中抽象出一般价值理论作为理解经济现象的前提。通过“资本一般”概念的逻辑演绎，马克思驳斥了政治经济学家将“价值”作为商品生产一般规律的共同缺陷，并展现了商品、货币、资本三种价值形式的内在联系和本质差别。政治经济学家之所以将价值作为研究的起点，是因为他们普遍地相信商品生产是生产的一般形式，同时也是研究资本生产的可靠前提。而马克思认为，商品的普遍存在恰恰是需要被说明的特殊现象，而不应当是不加批判的前提。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上，马克思将商品作为“资本一般”的开端，证明了商品的概念（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具有内在矛盾的抽象概念；在三种价值形式中，商品形式中的价值具有最高的抽象性，同时也具有最低的现实性，从商品生产中抽象出的任何价值概念都不可能实现对社会生产的本质认识。通过对商品概念的批判性分析，马克思不仅批评了那些用“学理主义的语言”来复述现实的庸俗经济学家①，同时也批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62.

了将劳动作为价值尺度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派。马克思明确地将自己与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区分开来，声明自己“并没有说‘交换价值的共同的社会实体就是劳动’……**价值形式**……归结为‘共同的社会实体’，归结为劳动，是令人奇怪的”①。“资本一般”概念以商品作为逻辑起点，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英国的各派政治经济学研究明确地区分开来。

其次，与黑格尔将理念作为逻辑学的终点不同，“资本一般”概念的逻辑终点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方式。前文已经提到，马克思沿用了黑格尔辩证法的逻辑方法，并且与黑格尔辩证法拥有共同的批判对象——知性思维（马克思称之为资产阶级理智）。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之处在于，他用辩证法发现的具有客观性和必然性的客观概念仍然是一种观念；也就是说，黑格尔批评了那种从抽象观念出发来理解现实的思维方式，但是批判的结果却是重新确立了另一种观念作为现实世界的基础。经过马克思的改造之后，辩证法的终点不再是具有客观必然性的概念，而是抽象观念赖以存在的社会生产方式。所以，在“资本一般”概念的叙述过程中，商品二重性（即价值最抽象的规定性）的自我克服过程并不是基于既定前提的概念推演，“资本一般”概念中逻辑环节的否定扬弃，是从观念的抽象规定到其现实前提的不断呈现。在这个意义上，商品和货币形式的价值观念都是抽象的，以商品观念或者货币观念为动机的行为并不必然能导向符合其自身规定性的经验结果；只有在资本环节，抽象的资本观念和现实的资本生产才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达到了统一，都表现为等量（货币）资本带来等量（货币）利润的经验表象。观念和现实的矛盾在“资本”环节达到了统一，同时也就意味着体现在商品和货币上的价值形式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生产总过程的抽象领域”②，以资本和雇佣劳动制度为典型特征的资产阶级社会才是抽象价值观念存在的真正现实基础。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资本一般”概念的叙述体现了马克思颠倒黑格尔辩证法并剥离其合理内核的具体过程。马克思在“资本一般”概念中颠倒黑格尔辩证法的目的，并不是要像黑格尔一样直接用辩证法先验地预设未来，而是运用辩证逻辑来揭示抽象观念的现实基础。

最后，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范畴，“资本一般”概念的批判有效性是由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399-400.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70.

其逻辑结构来保证的。尽管“资本一般”概念是一个历史唯物范畴，但是其批判对象的特殊性质决定了“资本一般”的叙述方法看起来像一个先验结构。在马克思早年的形而上学批判中，形而上学的抽象观念往往与经验事实直接相悖，可以用物质优先的原则直接对抽象观念进行批判。然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经济概念是与经验事实的直接同一，以往的批判方法就不再适用了。前文已经提到，马克思在区分“实体形式”和“经济形式”之后确定了新的批判方法。政治经济学表面上遵循了唯物主义的立场，但是经济学家们从物质对象上抽象出来的观念实际上反映的是以物质为载体“经济形式”，而不是物质本身的“实体形式”。物质对象的经济形式是由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的，因此政治经济学理论与物质对象的符合只是一种偶然现象，只有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才会发生。“资本一般”概念的独特批判方法，就是用辩证逻辑来呈现经济概念与现实生产在经验表象上的统一需要怎样的社会关系作为中介。从商品概念中价值最抽象的规定性（一般劳动时间）开始，到价值克服抽象规定从而完全被现实化结束，整个逻辑过程就构成了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解，即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方式如何成为与资本观念和资本生产相符合的现实中介。因此，“资本一般”概念的叙述必须严格采用纯形式的辩证逻辑结构，它的批判性是通过整个结构来保证的，其中每一个命题也只能放在这个结构中才能获得恰当的理解。在“资本一般”概念的逻辑整体中，以商品、货币或资本为基础的任何一种价值理论都是对现实生产过程的抽象，只是抽象程度有所不同；相应地，它们作为观念所具有的客观性只能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才会产生，全部都无法超越资产阶级社会的局限。

值得注意的是，“资本一般”部分只是马克思“资本”理论的第一个环节，仅仅揭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在“资本一般”部分之后，马克思还计划“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竞争和信用中来说明”资产阶级社会中现实危机的具体表现。[①] 因此，“资本一般”概念只是完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最抽象的部分，并不能代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全部理论内容；对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全面呈现，还需要结合 1863 年之后的相关文献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581.

第三章　作为理论整体的“资本一般”

马克思提出“资本一般”理论的目的是指出“资本”概念的科学含义。古典经济学的资本理论一方面具有科学性，是对社会整体规律的忠实研究；另一方面又具有庸俗性，将商品、货币和资本未加批判地当成了研究的前提，从而将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方式及其必然规律当成了自由的外在界限。为了批评古典经济学的庸俗部分，马克思在 1858—1863 年运用新的批判方法创立了完整的“资本一般”理论。“资本一般”理论从内容上可以区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形态。广义“资本一般”理论包括“第一分册”和“1861—1863 年手稿”，内容是价值概念的矛盾及其自我克服，分为商品、货币和资本三个辩证环节；狭义“资本一般”理论则特指“1861—1863 年手稿”中的理论内容，即资本概念的矛盾及其自我克服，同时也是广义“资本一般”理论的第三环节。换言之，从“资本一般”理论的视角来看，“第一分册”和“1861—1863 年手稿”结合在一起才是一部完整的理论著作。还原“资本一般”理论的创立过程对于理解“1861—1863 年手稿”而言具有基础性的先导作用，尽管手稿的成型程度不及出版过的“第一分册”，但马克思在其中已经完成了“资本一般”理论的创建工作，标志着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第一节　广义“资本一般”理论的前两个环节

广义“资本一般”理论呈现的是价值概念的自我设定、自我克服和自我完成的辩证发展过程，也就是价值概念克服自身抽象性获得具体规定（即成为资本）的逻辑过程，马克思计划用两个分册来完整地阐述这一理论。在1859年出版的“第一分册”中，马克思完成了“资本一般”理论的前两个环节“商品”和“货币或简单流通”；第三个环节“资本”则留到“第二分册”进行论述，即后来的“1861—1863年手稿”。“第一分册”和“1861—1863年手稿”结合在一起，提供了广义“资本一般”理论的全部逻辑环节。作为正式出版物，“第一分册”的理论叙述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刚刚获得的辩证方法，各个逻辑环节的辩证关系严整而连贯，表现为整齐的三段论辩证结构。

一、商品的二重性与一般等价物

“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①，相应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对象是“资产阶级经济制度”②，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③。然而，由于“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④，因此经济学对关系的研究和批判需要从对物的研究开始。将商品作为经济学研究的起点不是任意选定的，商品是“资产阶级生产的最一般的范畴”⑤，是资产阶级社会中最普遍的物。商品是古典经济学家和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的研究前提，他们都从中抽象出了劳动价值理论作为自己的经济学基础。对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分析，首先是对普遍存在的商品的分析。在商品环节，一件商品的价值只能表现为另一件商品，价值与使用价值不能在同一件商品中同时存在。通过将自身二重化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4.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11.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8.
④ 同①.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32.

为普通商品和一般等价物，商品形式中的价值克服了最初的抽象性，进而获得了新的规定并实现为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

1. “商品一般”概念的抽象性

在“第一分册”的开篇，马克思写道：“资产阶级的财富表现为一个庞大的商品堆积”①。商品本身拥有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分别体现为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不过经济学研究的只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即交换价值。明确商品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之间的差别，是理解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基础。

商品之所以被称为商品，不是因为它的自然属性或使用价值，而是因为它代表着一种不属于它的东西，代表着其他生产者仓库里的产品或其他消费者口袋里的货币。从一件商品上可以很轻易地看到它的自然属性，以自然属性为基础的使用价值是商品成为商品的必要前提；但从商品使用价值上看不出商品的社会属性，甚至看不出它是不是商品。也就是说，除了自然属性之外，商品作为物还代表着人和人（或群体）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且正是因为代表着特定的社会关系，商品才成为商品。商品只有在交换过程中、“只有在同其他商品的关系中才是商品”②，为了彼此表现为可交换的对象，商品必然要将自己二重化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体。因此，尽管商品的自然属性构成了商品满足个人需要或社会需要的使用价值，但“使用价值……不反映任何社会生产关系……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③；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商品的社会属性，也就是商品可以用来交换其他商品的属性——交换价值。

从交换价值的方面理解商品的前提，是界定交换价值的规定。马克思认为，交换价值“代表相同的、无差别的劳动，也就是没有劳动者个性的劳动”，也就是“**抽象一般的**劳动”④。按照马克思在“导言”中的思路，劳动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才“不再是同具有某种特殊性的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⑤，从而表现为一般的劳动或劳动一般。在“第一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19.
② 同①434.
③ 同①420.
④ 同①421.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6.

分册”里，马克思直接将这种抽象劳动作为交换价值的规定，并对这种“表现在交换价值中的劳动的特定性质”① 进行了说明。在商品交换中，商品 A 和商品 B 的交换首先需要满足两个条件：（1）商品 A 的所有者不需要商品 A 的使用价值，商品 A 是他的生产剩余；（2）商品 A 的所有者需要商品 B 的使用价值来满足他的特殊需要，而且恰好商品 B 也是另一个劳动者的生产剩余。因此，从物的方面来看，商品 A 和商品 B 本身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东西，两者之间的联系完全来自各自所有者的自然需要。然而，商品 A 和商品 B 的交换比例又不是任意的，在交换中，一个商品 A 能够换来一个商品 B（而不是两个或者更多）就意味着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等价的关系，在这种等价关系中，“它们作为使用价值的自然属性、从而它们同特殊需要②的关系，都无须考虑了”③。在商品的等价关系中，商品作为使用价值的特殊性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可以用数量换算的纯形式的统一性：

> 不论商品的自然存在的样式怎样，不管商品作为使用价值所满足的需要的特定性质怎样，商品总以一定的数量彼此相等，在交换时相互替代，当作等价物，因而尽管它们的样子形形色色，却代表着同一个统一物。……一切商品，作为社会劳动的化身，都是同一个统一物的结晶。这个统一物即表现在交换价值中的劳动……是**抽象一般的**劳动。……一切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劳动时间**。④

从个体生产者的角度来看，生产的交换价值的劳动本身虽然还是一种特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21.

② 马克思——与古典经济学一样——不重视需求在价格形成机制中的作用，并认为成本才是解释价格的核心要素。在古典经济学的价格理论中，价格会围绕生产成本（即自然价格）进行波动，需求只是短期价格波动的影响因素，可以忽略不计。在德国古典哲学中，需求也被当作一种任意的自然冲动而受到轻视。例如，在黑格尔的法哲学体系中，欲望和需求只是理念实现自身的一个环节，终将在更高的伦理实体中被扬弃。结合这两方面的思想背景来看，马克思“价值与自然需要无关”的观点深受当时经济学和哲学的视域限制。在后来的思想发展中，成本和需求的对立催生了现代经济学，理性和欲望的对立催生了现代哲学，马克思所采用的古典主义观点在两个领域内都遭到了强烈质疑。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消费社会”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马克思的理论缺失，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需求的塑造也纳入社会批判理论之中；但他们也只是将需求和价值之间的冲突重申了一遍，没有真正地解决这个问题。

③ 同①436.

④ 同①421-422.

殊劳动，但在交换中却扬弃了自身的特殊性，表现为一定数量的可以支配他人特殊劳动的一般劳动；从社会生产的角度来看，每个商品生产者都在为社会生产使用价值，“个人的劳动时间实际上就是社会为生产一定使用价值、满足一定需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①，个人一定数量的具体劳动表现为社会一般劳动的特殊形式。

从商品概念的分析可以得出，构成商品交换价值的劳动需要满足两个前提②：（1）这种劳动必须是同质的，“与劳动的形式、内容和个性无关”；（2）这种劳动必须是可计量的，“劳动的量的存在是**劳动时间**”。这两个前提同时也是交换价值的两个规定，或一般劳动时间的两个规定；在“商品章”和“货币章”的逻辑环节中，“资本一般”理论就体现为这两个规定不断实现自身的辩证逻辑过程。

基于上述分析，马克思断定，商品的交换价值就是一般劳动时间，即可以用时间钟点来计量的简单劳动。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都将劳动时间当作价值或价格的决定因素，但他们对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机制有着不同的解释。斯密提出劳动成本价值论是为了证明现代的资本主义生产极大地降低了社会生产的成本，斯密认为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规律只有在原始的简单经济条件下有效，现代发达经济体中的商品自然价格由生产成本决定。李嘉图完善劳动价值论则是为了证明价格的长期变化趋势与工资水平无关，因此李嘉图认为劳动所耗的时间是决定商品价格长期变化趋势的唯一因素，地租、利润、工资的水平不会影响价格的长期波动。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上继承了李嘉图的主要观点，并将其整合为商品概念辩证发展的内在逻辑规定。在“商品章”中，马克思提示了他的劳动价值论与前人的差别，指出要理解交换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必须把握住下列几个主要观点③：

（1）劳动化为简单的、可以说是无质的劳动；

（2）生产交换价值因而生产商品的劳动借以成为**社会劳动**的特有方式；

（3）以使用价值为结果的劳动和以交换价值为结果的劳动之间的区别。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25.

② 同①422.

③ 同①422.

关于第一个观点，马克思认为如果要将劳动时间作为商品交换价值的计量尺度，就必然要“把不同的劳动本身化为无差别的、同样的、简单的劳动，简言之，即化为质上相同因而只有量的差别的劳动”①。抽象的一般劳动也就是一定社会中每个正常人都能完成的劳动，即简单劳动或非熟练劳动（unskilled labour），复杂的劳动都可以换算为复合的简单劳动。② 关于第二个观点，马克思认为交换价值代表了一种特殊社会关系，即以抽象劳动作为纽带的社会关系。私有制使个人劳动成为私人劳动、个人产品成为私人产品，从而使劳动的社会性只有通过“个人劳动采取一般性这种抽象形式，或者个人产品采取一个一般等价物的形式”③ 才能实现；因此，在私有制条件下，（隐蔽在物的外壳之下的）抽象一般劳动是人与社会联结的唯一纽带④。关于第三个观点，马克思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22-423.

② 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的换算问题是劳动价值论者必然要面对的理论难题。斯密认为，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的换算比例可以通过商品交换时或者工资谈判时的讨价还价（即博弈）体现出来，因此没有专门再研究这个问题，也没有意识到通过价格博弈来解释劳动换算比例实际上是一种循环论证。李嘉图试图克服斯密的逻辑缺陷，认为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的换算只影响工资水平，对于产品的自然价格（即价值）没有实质影响。相比之下，马克思的解决方式比斯密和李嘉图都要抽象得多。马克思认为简单劳动看起来是思维的抽象，同时也是“社会生产过程中每天都在进行的抽象”；也就是说，简单劳动不仅在理论上符合交换价值的概念规定（即同质的抽象劳动），而且资本主义生产也会将所有的劳动都现实地简化为简单劳动。在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中，“简单劳动构成资产阶级社会劳动总量的绝大部分”，而且那些复杂的劳动也会随着生产的发展被简化为单调的简单劳动。通过分析相对剩余价值生产，马克思在“1861—1863 年手稿”中专门讨论了机器生产出现之后劳动的简化过程。总之，马克思没有刻意去解决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的换算问题，因为他认为简单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现实的结果，复杂劳动终将被现实简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62.）

③ 同①426.

④ 在私有制达到顶峰的资产阶级经济制度下，个人不得不将自己的劳动化约为无质的劳动，并以这种抽象劳动为中介来获得与社会的关联，脱离抽象劳动之外的个人将丧失其社会性的地位。作为对比，在公社宗法制的生产中，“成为生产前提的公社……使个人劳动直接表现为社会机体的一个肢体的机能”，个人的具体劳动直接就是满足公社需要的社会劳动；因此，在那里成为社会纽带的“是劳动的特殊性，而不是劳动的一般性”。传统社会中宗法关系瓦解之后，自然法传统成为重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社会纽带的主要思想资源。人与社会直接联系的传统社会瓦解之后，以斯密为代表的自然法传统为了重建社会秩序，主要是通过界定抽象法权进而建立“普遍人性—抽象法权—社会文明”的整体结构；德国的古典法学派批评了自然法学中抽象的普遍人性论，试图建立“民族精神—抽象法权—国家文明”的民族复兴道路。用劳动生产（而不是用抽象法权）来界定人与社会的抽象关系，是马克思与历史法学派乃至整个自然法传统的根本不同。通过劳动价值论，马克思指出法权是由生产决定的，现代社会中联结人与社会的是“个人劳动—抽象劳动—社会劳动”的生产结构；作为抽象法权基础的自由只是劳动的自由，人作为人的自由实际上是被悬置甚至放弃了。

认为“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是劳动的一种特有的社会形式”，私有制条件下的社会关系是这种劳动的前提，而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则与社会形式无关。为了说明以交换价值为结果的劳动的特殊性，马克思举了裁缝的例子：一个裁缝的具体劳动可以生产出一件上衣，但生产不出这件上衣的交换价值；作为交换价值的抽象一般劳动“属于一种社会联系，这种联系不是由裁缝缝出来的”①。

通过马克思对上述三个观点的阐述可以看出，交换价值的所有规定都来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对交换价值的分析也就是对私有制的分析；因此，交换价值概念的辩证发展也就是私有制现实发展的逻辑再现，对交换价值完成形态（即资本）的逻辑演绎也就是对私有制最高形式（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理解。“第一分册”只阐述了交换价值的抽象形式，即以私有制社会关系为前提的交换价值；对交换价值完成形态（即资本）的阐述，是在“1861—1863 年手稿”中才完成的，马克思在那里详尽叙述了自己为自己创造前提的“资本一般”。

明确了交换价值的规定之后，马克思提出了商品的一般概念即“商品一般”：“对象化在一种特殊使用价值中的一般劳动时间”②。“商品一般”是从最普遍的商品存在中抽象出来的，代表了商品的共性；与此同时，“商品一般”又是抽象的，它的全部规定都来自对现实商品的分析，因此并不能提供比现实商品更多的东西，不能实现对商品世界的真正理解。用黑格尔的术语来讲，“商品一般”所达到的只是“无概念的必然性”，还只是知性思维所得到的知识。古典经济学就是停留在了这样的知性思维上，古典经济学“通过分析来把它们（指不同形式的收入源泉——引者注）还原为它们的统一性，因为它（指古典经济学——引者注）是从把它们作为已知的前提出发的”③。通过合理地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没有将“商品一般”当作对现实商品世界的认识，而是通过分析“商品一般”概念的内在矛盾来寻求对商品的真正理解，由此便过渡到了对商品二重性及其内在矛盾的分析。

2. 商品的二重性及其内在矛盾

将交换价值规定为一般劳动时间之后，马克思再次回到了关于商品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29.

② 同①441.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60.

二重性的讨论，从而指出了商品概念的第一个困难：如果仅仅从商品的概念出发，商品的二重性——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构成了一个互为前提的矛盾体。商品一方面作为使用价值是“特殊使用价值”，另一方面作为交换价值又是“一般等价物，因而是每个人的使用价值、一般使用价值”①，这是商品概念中所包含的矛盾。

> 商品的交换过程，应该既是这些矛盾的展开，又是这些矛盾的解决，可是这些矛盾在交换过程中不能通过这种简单的方式表现出来。……我们首先遇到的困难是：商品要表现为交换价值，表现为对象化的一般劳动时间，就要先作为使用价值来转让，交给别人，而它们要作为使用价值来转让，反过来又以它们作为交换价值的存在为前提。②

例如，1码麻布之所以被称为商品，是因为麻布生产者将它想象成了可以交换其他使用价值的东西，麻布本身必须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才能与他人交换，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前提；但同时，当麻布生产者将1码麻布当作商品时，他实际上是将生产这1码麻布所消耗的特殊劳动当作了“**一般**劳动时间”③、当作了与麻布自然属性无关的交换价值，用这1码麻布可以交换到等量的其他特殊劳动生产出来的商品，交换价值又是使用价值的前提。因此，“商品一般”中的双重属性实际上是互为前提、互为条件的，商品概念的普遍确立要以这个矛盾体的解决为前提。

马克思提出商品的二重性并不是要以此为基础说明商品经济行为，而是要通过商品概念的辩证发展来探寻这一矛盾体得以实现的前提。这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的根本差别。对于商品而言，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实现都需要首先以对方的实现为条件，两个规定互为前提，构成了“一个相互矛盾的要求的总体”④。简言之，交换价值的实现要以使用价值的交换为前提，而使用价值的交换又要以交换价值的存在为前提，这个矛盾只有进入交换过程才能得到展开和解决。在商品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41.
② 同①437.
③ 同①436.
④ 同①437.

的交换中，一种商品以另一种（或另几种）商品的使用价值来计量自己的交换价值，“把无限多种的使用价值当作自己的等价”①：如果1码麻布＝1/2磅茶叶、1码麻布＝2磅咖啡、1码麻布＝8磅面包、1码麻布＝6码棉布，那么这1码麻布的交换价值就体现为“1/2磅茶叶、2磅咖啡、8磅面包、6码棉布”，或“1/8磅茶叶＋1/2磅咖啡＋2磅面包＋1½码棉布”②，或其他等价的数学形式。在交换完成之后，商品概念的矛盾性得到了部分解决，商品范畴的二重性摆脱了抽象性，获得了现实的存在。

3. 一般等价物与商品概念的实现

不过，交换价值在商品交换中还是没有真正地实现自身，由此便出现了“商品章”中的第二个困难：商品的交换价值没有实现为一般劳动时间，而只是实现为特殊使用价值中的具体劳动。基于对交换价值的分析，马克思认为，商品应当“通过自己特殊使用价值的转让而表现为一般劳动时间的直接化身”，“取得一种直接用一切使用价值作自己的等价物来表现自己的能力”；但是在商品交换中，“对立着的只是特殊商品，只是体现在特殊使用价值中的私人劳动”③，交换价值只是表现为另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尽管商品的二重性实现了自身的现实存在，但交换价值在交换前却仍然只是一种纯粹的想象：一方面，“一般劳动时间本身是一个抽象，这个抽象本身对于商品来说是不存在的”；另一方面，“在这里，出发点……是私人的特殊劳动……一般社会劳动不是现成的前提，而是变成的结果”④。也就是说，商品之所以被当作商品，是因为商品生产者将它想象成了可以交换任何商品的一般商品，但在现实中这只能是一种想象，只有交换完成之后他生产商品的个人劳动才能转化为一般的社会劳动。

> 这样就产生了新的困难，一方面，商品必须作为对象化一般劳动时间进入交换过程，另一方面，个人劳动时间作为一般劳动时间的对象化，本身又只是交换过程的产物。⑤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33.
② 同①432.
③ 同①438.
④ 同①438.
⑤ 同①438.

例如，1 码麻布、2 磅咖啡、1/2 磅茶叶、8 磅面包可以相互交换，意味着它们分别对象化着等量的一般劳动时间；但是，对于麻布生产者而言，这个一般劳动时间只是一种想象，他认为自己的 1 码麻布能够换来 2 磅咖啡或 1/2 磅茶叶或 8 磅面包，至于他能够换来什么，完全取决于偶然性的因素。因此，在商品交换中，只有特殊商品和特殊商品的交换，“劳动时间可以说只是潜伏在这些商品中……商品只是被**想象**为一定量对象化一般劳动时间”①。商品要获得自己作为交换价值的现实形式，就必须使自己二重化，将自己设定为与自己不同的东西，表现为其他商品，也就是将自身的交换价值表现为“一个无限多的等式的总和”②：

1 码麻布＝2 磅咖啡
1 码麻布＝1/2 磅茶叶
1 码麻布＝8 磅面包
1 码麻布＝6 码棉布
1 码麻布＝其他等等

在这个等式的序列中，1 码麻布的交换价值表现为想象中的其他商品，因此还只是一种理论的抽象。“只要把上面的等式系列倒置过来，一个特殊商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存在就从单纯的抽象变为交换过程本身的**社会**结果”③：

2 磅咖啡＝1 码麻布		1 磅咖啡＝1/2 码麻布
1/2 磅茶叶＝1 码麻布	或	1 磅茶叶＝2 码麻布
8 磅面包＝1 码麻布		1 磅面包＝1/8 码麻布
6 码棉布＝1 码麻布		1 码棉布＝1/6 码麻布

如果其他所有的商品都用一定数量的麻布来计算自己的交换价值，那么“对象化在麻布本身中的劳动时间就直接变成在一切其他商品的不同量上均等地表现出来的一般劳动时间”④。通过换算为一定量的麻布，不同商品的交换价值表现为不同量的同种物品（即麻布）；一般劳动（或一般劳动时间）就摆脱纯粹的抽象性，在具体的物上体现出了自身的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2 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38-439.
② 同①439.
③ 同①439.
④ 同①440.

定性，即同质的可计量的劳动。商品生产者只要将他的产品换成一定量的麻布或其他一般等价物，也就实现了商品的交换价值，将自己的特殊劳动转化为一般劳动。一般等价物可以全面地交换到其他商品，也就意味着其他商品可以通过一般等价物来实现自己的交换价值。例如，咖啡生产者只要将他的 2 磅咖啡换成 1 码麻布，就已经将自己生产咖啡的特殊劳动转化成了一般劳动，因为其他商品生产者也愿意用他们的产品来交换麻布，咖啡生产者用这 1 码麻布可以很容易地交换到他所需要的商品。“一切商品都用一种特殊商品来计量它们的交换价值，这种分离出来的商品就变成交换价值的最适当的存在，交换价值的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存在”①。

随着一般等价物的出现，商品自身的矛盾完全解开了，马克思再次回顾了商品辩证发展的逻辑过程。最初，商品表现为“商品一般”，即“对象化在一种特殊使用价值中的一般劳动时间”②；“商品一般”一方面是商品的本质规定，另一方面也蕴含着本身无法克服的矛盾。为了克服自身的矛盾，“商品一般”将自身的性质赋予一种特定的商品，并将其设定为一种独立的商品与其他商品发生关系，这种特定的商品就是一般等价物。商品概念将自身二重化为两个相互对立的范畴：商品和一般等价物。一般等价物也是商品，但它是具有一般性的商品：

> 这个分离出来的商品除了它作为特殊商品所具有的特殊使用价值以外，还获得了一种一般使用价值。它的这种使用价值本身是形式规定性，就是说，是从它在交换过程中由于其他商品对它的全面行动所起的特定作用产生的。③

一般等价物的使用价值也随之二重化了，它的使用价值一方面要满足人的自然需要，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还要满足“从交换过程本身产生出来的一般需要”，满足由社会关系产生的一般需要，即纯粹作为交换价值的一般劳动时间。通过设定一般等价物，普通的商品“作为**特殊**商品同一个作为**一般**商品的特殊商品对立起来”④，凝结在普通商品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40.
② 同①441.
③ 同①441.
④ 同①441.

中的一般劳动时间就表现为一定量的一般等价物。以一般等价物为中介，商品生产者把他们的商品都当作交换价值来对待，茶叶商将他生产的茶叶想象成一定量的麻布，面包商也将他的面包想象成一定量的麻布；通过与一般等价物交换，商品生产者相互之间把各自的劳动也理解为一般的社会劳动，茶叶和面包的生产者都将对方的劳动看作生产麻布的劳动。

综上所述，“第一分册”中“商品章”的内容就是对“商品一般”的逻辑叙述：“商品一般”是商品的抽象的一般规定，通过在商品交换中设定一般等价物，“商品一般”克服了自身的抽象性，并将自身的规定性在现实中实现出来。只有完成了这个逻辑过程之后，商品概念才能克服自身的矛盾，全面地展现商品背后的形式规定和社会关系，而不是将商品单纯地理解为一种特殊的物。上述从抽象到现实的逻辑过程“不只有理论的、抽象的意义，而且同时反映出从直接的交换关系，即简单的物物交换的本性中产生出来的困难”①；在现实的交换中，如果没有一般等价物的产生，物物交换同样是不可能普遍化的。

4. 一般等价物向货币的过渡

作为商品交换的结果，交换价值采用了一般等价物的形态；不过交换价值在一般等价物中还没有获得自由的形态，“还直接和使用价值结合在一起”②。一般等价物可以是任意的商品，但并不是所有的商品都适合来做一般等价物。作为交换价值的现实形式，一般等价物应当具备一般劳动（时间）的所有属性，如可以任意分割、可以与任何特殊商品交换；但是作为商品，一般等价物仍然没有摆脱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二重性，可能无法实现交换价值的所有属性。一般等价物的使用价值可能无法任意分割，也可能不被所有人需要，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所以，随着交换的扩大，交换价值会在越来越高的程度上要求作为交换价值表现出来，摆脱使用价值的限制；最终结果就是出现一种完全符合交换价值规定性的商品，这种商品“可以任意分割”且分割之后“各部分是同质的”，也就是作为货币的贵金属，“贵金属最富于这些属性”③。因此，马克思认为：

---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5.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43.

③ 同②442.

> 货币既然不是思考或协商的产物，而是在交换过程中本能地形成的，所以曾经有过各种极不相同的、或多或少不适合的商品交替地执行过货币的职能。……如果说它们不是满足当前需要的物品，那么它们是财富的最重要的物质组成部分，这就使它们比其余的使用价值更具有一般性。……物物交换的逐步扩大，交换次数的增加，进入物物交换的商品种类的增多，发展了作为交换价值的商品，促进了货币的形成，从而对直接的物物交换起着瓦解的作用。①

从商品到货币的过渡是商品交换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交换价值必然会采用的现实形式。

在以社会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中，交换价值是由特殊社会关系产生的并已物质化了的社会属性，其本质规定都来自以私有制为特征的社会关系；商品和货币是交换价值不同程度的现实表现形式，从商品到货币的发展在理论上反映为交换价值不断实现自身规定的过程。因此，货币不是为了方便交换而选定的特殊的物，“货币的起源在于商品本身”②。在扬弃了一般等价物（商品）的二重性之后，交换价值采用了货币（贵金属）作为自身的物化形式，于是马克思的经济学也从“商品”的逻辑演绎过渡了到“货币”的逻辑演绎。

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明确指出，由商品出发的价值规定并不能用来分析现代社会的经济现象：

> 只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并且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产品才全面地采取商品形式，——这是因为全部产品都必须转化为交换价值，并且产品生产的各个要素本身要作为商品加入生产——产品才全面地成为商品。因此，商品的规律应该在不生产（或只是部分地生产）商品的生产中存在，而不应该存在于以产品作为商品存在为基础的那种生产的基础上。③

商品形式中的价值以及价值规律只是最抽象的规定性，是人们对历史现象的抽象，而不是发挥作用的现实规律。价值的具体规定性只有在其抽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42-444.

② 同①458.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77.

象性被完全克服的时候才能被呈现出来，在此之前，商品形式和货币形式的抽象价值理论都不能实现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认识，价值的抽象规律只存在于“不生产商品的生产”中。这种抽象规定与具体规定的矛盾和对立，是马克思“资本一般”理论的突出特点。政治经济学家仅仅是对价值的性质进行研究，因此无法区分价值的哪些性质是不发挥作用的抽象规定，而哪些性质是具有本质作用的具体规定。在他们看来，价值的各种规定都具有同样的有效性，并各自以自己的理解为依据互相攻击。马克思用“资本一般”理论的逻辑结构呈现了价值从抽象到具体的全过程，从而也就将价值的各种规定性区分开来；相应地，只有实现了具体规定的价值（即资本形式的价值）才具有现实的解释力，所有抽象的价值规定（即商品形式和货币形式的价值）都只能是空想和庸俗的观点。

二、简单流通与货币的形式规定

在“第一分册”的第二章“货币或简单流通”（简称“货币章”）中，马克思叙述了货币在商品简单流通中获得的形式规定。“货币章”的论述具有更加严密的辩证形式，分三个逻辑环节阐述了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以及“作为两个规定的统一体”① 的实在的货币，而且每一部分的阐述又分别包含着三个更为具体的逻辑环节。

1. 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

货币的第一个形式规定是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货币的全部规定都来自商品的物物交换，是商品所有者头脑中想象的一般价值形式。在进入具体叙述之前，马克思“为简化起见，到处把金作为货币商品”②。在“价值尺度”部分，货币的形式规定体现为金作为交换价值一般形式的逻辑演绎过程：（1）作为商品的金；（2）作为价值尺度的金；（3）作为价格标准的金。

作为货币的金首先是一种商品。它只是被当作一般等价物分离出来，成为一般劳动时间的直接化身；各种商品的所有者将各种特殊商品都想象为一定量的金，从而将彼此的特殊劳动当作一般劳动，将商品当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5.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58.

作对象化了的一般劳动时间。在这个规定上，货币与其他的一般等价物没有本质差别，只是体现为一个更长的等式①：

1 吨铁＝2 盎司金
1 夸特小麦＝1 盎司金
1 英担摩哈咖啡＝1/4 盎司金
1 英担钾碱＝1/2 盎司金
1 吨巴西木材＝1½盎司金
Y 量商品＝X 盎司金

金之所以可以与所有的商品进行交换，是因为它们都是商品，都是对象化在一种特殊使用价值中的一般劳动时间。商品与金的交换关系实际上就是相互作为一般劳动时间的化身彼此发生关系，而且“正是这个使商品彼此表现为交换价值的过程中的关系，把包含在金中的劳动时间表现为一般劳动时间”②。金（或其他贵金属）是最适合用来表现一般劳动时间的商品，因为它的物理属性恰好符合一般劳动时间的形式规定：一方面，金是“同质的东西，只能表现量的差别”；另一方面，金具有“使用价值的耐久性”，从而可以“经常处在交换过程中”③。当所有商品都通过金来表现它们的交换价值的时候，也就意味着金可以用其他一切商品来表现自己的交换价值；金因此成为一般劳动时间（即交换价值）的物化形式，可以作为一般劳动时间去交换任何特殊劳动的产品。以金为中介，商品生产者将彼此的产品都看作交换价值，同时也就“赋予金以一般等价物的或货币的形式”④。

当一切商品都按照一定量的金来计量自己的交换价值，那么金就获得了新的形式规定：作为价值尺度的金。当用金来计量商品交换价值的时候，“商品和金之间的真正尺度是劳动本身”⑤，商品和金的这种关系仍然是从物物交换中产生的。金作为价值尺度的特殊性只在于，商品不再用无限长的等式来想象自己的交换价值，而是用一个唯一的等式将自身表达为交换价值，也就是表达为价格。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59.
② 同①.
③ 同①442.
④ 同①460.
⑤ 同①460.

> 商品的交换价值，这样地用一种独特商品，或者说，用商品同一种独特商品相等的唯一等式，作为一般等价同时也作为这个等价的程度表现出来，就是**价格**。价格是商品的交换价值在流通过程内部借以**表现出来**的转化形式。①

通过将自己的产品想象为一定量金，商品生产者就可以很容易地将商品理解为有价格的使用价值，从而将自己的特殊劳动想象成生产金的一般劳动。不过，作为价值尺度的金只是一种想象的货币，只是“作为一定量劳动时间的名称”②。也就是说，商品生产者为自己的商品设定价格，只是在观念上完成了从特殊劳动向一般劳动的转化；至于这种观念的货币、想象的货币能否在交换中实现自身、获得等量的金，完全是“偶然的事情”③。交换价值是对象化在商品中的一般劳动，商品生产者在观念中设定的价格将这个交换价值想象为一定重量的金。在采用了价格来表现自身之后，交换价值就只是一种形式规定，而不是现实的一般劳动；相应地，作为价值尺度的金只是一个待实现的等式。只有将商品顺利转让之后，价格才可以转化为真正的金，特殊劳动才可以转化为一般劳动，也就是说，交换价值才真正实现了自身；但是，商品并不一定都能实现自身的价格，商品转让也存在着失败的可能。④ 因此，在商品的交换价值转化为价格之后，作为货币的金实际上已经被二重化了：作为商品，它代表着对象化在金中的劳动时间；作为价格计量尺度，它只是“一定的金属重量”⑤。作为前者的金是价值尺度，而作为后者的金是价格标准。

在商品的交换价值体现为价格之后，作为货币的金就摆脱了其物的属性，成为作为价格标准的金。随着金变成价值尺度而交换价值变成价格，商品就不再以劳动时间来计量相互的交换价值，转而将自己和其他的商品都看作“用金来计量的同名量”⑥，金就从价值尺度转化为价格标准：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60.

② 同①462.

③ 同①463.

④ 马克思认为，价格与交换价值的差别“潜在地包含着由于产品是商品而产生的全部矛盾”，即“私人特殊劳动必须表现为它的直接对立物即抽象一般劳动才取得社会效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64）。这些内容在“第一分册”中没有展开。

⑤ 同①465.

⑥ 同①464.

> 商品价格彼此作为不同金量而进行比较，这样就结晶为一种符号，这个符号表示想象的金量并把这个金量表现为可除部分的标准。作为价值尺度的金和作为价格标准的金，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规定性，两者的混淆曾经引起各种最荒谬的理论。……当金作为交换价值同作为交换价值的商品发生关系的时候，它是价值尺度，而在价格标准中，金的一定量成为金的其他量的单位。①

作为价格标准的金只是以重量为单位的象征性的符号，而不是现实的作为商品的金。例如，1 吨铁的价格是 2 盎司金，这 1 吨铁不用现实地转换为 2 盎司金就可以拥有价格，通过这个价格，1 吨铁就表现为 2 单位的 1 盎司金。商品在观念上转化成金量之后，也就是价格形成之后，只要作为价格标准的金属重量保持固定的比例，金的交换价值就已经无关紧要。例如，1 夸特小麦的价格是 1 盎司金，那么只要保证 1 吨铁换来的名义上的“2 盎司”金可以购买到 2 夸特小麦就可以；至于这 2 盎司金是否真的有 2 盎司重，实际上是无所谓的。因此，“金属重量的货币名称就和金属的一般重量名称在历史过程中脱离了。……商品价格或商品在观念上转化成的金量，现在用金标准的货币名称来表现了”②。

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的三个逻辑环节是“实际流通的理论上的准备过程”③。在“商品章”中，马克思已经指出商品在进入流通之前会遇到两个困难。因此，商品在进入流通之前，必须先克服自身概念的矛盾性，“替自己创造出它们彼此在观念上作为……一定量对象化**一般**劳动时间而**表现出来**的形式”④，而货币的不同属性就体现为这些表现形式的逻辑演进过程。这个过程的结果就是出现了作为价格标准的货币，商品从而变成具有一定价格的商品；商品因此也将自身的存在二重化，“实际上作为使用价值，观念上——价格上——作为交换价值”⑤。商品的二重化存在是流通的前提之一⑥，在克服了流通的理论困难之后，交换价值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64-465.

② 同①466-467.

③ 同①458.

④ 同①459.

⑤ 同①481.

⑥ 流通的另一个前提是“全面的交换行为和这种交换行为的不断更新的流”，也就是发达的分工和商品生产。

的辩证逻辑演绎从而也随之进入新的环节，即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

2. 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

货币的第二个形式规定是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货币的全部规定都来自商品简单流通，是与商品所有者对立的、象征性的一般价值形式。在“流通手段”部分，货币的形式规定体现为不同流通过程中的货币形式：（1）作为购买手段的货币；（2）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3）作为价值符号（铸币）的货币。

在商品流通中，货币获得了其作为流通手段的第一种形式规定，即作为购买手段的货币。在商品流通的直接形式 W—G—W 中，货币首先只是表现为“以流通过程为特征的交换手段，即**流通手段**”①。在流通过程中，商品进入流通时是具有一定价格的使用价值。对于流通而言，商品的价格具有双重的含义。例如，1 吨铁的价格是 2 盎司金，这“2 盎司金”一方面表达了 1 吨铁所凝结的劳动时间，另一方面也表达了 1 吨铁想变成金的“虔诚愿望”。只有变成一定量的货币，商品才能将它所包含的劳动时间转化为一般社会劳动时间；如果这个变体没有成功，那么商品就“不再是商品，而且不再是产品”②。商品所有者的任务就是将自己的商品让渡出去，完成从商品到货币（W—G）的“惊险的跳跃”③。商品投入流通之后普遍地将自身的价格实现为货币，“货币通过实现商品价格使商品流通”④，货币因此也获得了新的形式规定，成为作为购买手段的货币。

> 过去，由于一切商品都用金来计量它们的价值，金在观念上变成了一般等价物，现在，金作为一切商品向它全面让渡——卖 W—G 就是这种全面让渡的过程——的产物，变成了绝对可以让渡的商品，变成了实在的货币。但是，金在卖的过程中变成实在的货币，只是由于商品的交换价值在价格中已经是观念上的金的缘故。⑤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90.

② 同①483. 说商品不再是产品，是因为如果商品不能够顺利出售，它就丧失了自己全部的使用价值。商品对它的拥有者而言是“非使用价值”，商品的唯一价值就是被他人需要并完成交换。

③ 同①483.

④ 同①495.

⑤ 同①484.

在商品流通过程中，由于金是作为价格标准的货币，商品与金的交换不同于两种商品的物物交换。在作为简单商品进行交换时，商品和金都是劳动时间的特殊化身，两者的交换比例取决于各自的交换价值；而在商品流通过程中，商品同金交换是为了实现自身的价格，实现想象中的交换价值，因此金（作为货币）直接就是劳动时间的一般化身。

货币在这里虽然是流通手段，但实质上只发挥**“购买手段”**[①] 的作用，只是商品物质变换的中介。一件商品投入流通的目的，是以货币为中介购买另一件商品。例如，A 卖掉 2 夸特小麦，获得 6 镑，完成了商品小麦的第一形态变化，14 天后，A 用这 6 镑向 B 买了 8 磅咖啡，完成了商品小麦的第二形态变化；此时，B 看不出也不关心 A 的 6 镑原本代表的是什么商品，对于 B 来说，这 6 镑只代表商品咖啡转化为货币的第一形态变化。随着货币成为一般劳动时间的化身，“商品章”中提及的商品交换过程所包含的矛盾才真正被解决了：

> 只有通过商品的这种二重化，即商品分为商品和金，通过这二重的对立的关系，即每一极观念上是对极实际上的东西，而实际上是对极观念上的东西，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商品表现为两极的对立，商品的交换过程所包含的矛盾才得到解决。[②]

商品作为使用价值进入流通，它的交换价值表现为观念中的金（即价格）；金作为交换价值进入流通，它的使用价值是观念中的、与个人需求无关的一般使用价值。在商品流通卖（W—G）或买（G—W）的过程中，商品将自己二重化为商品和金的对立，从而将自身的二重性全面实现出来，克服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互为前提的矛盾。不过，商品矛盾的解决同时又导致了流通的矛盾：

> 我们把商品的第一形态变化即商品向货币的转化当作第一流通阶段 W—G 完成的结果来说明，同时也就是假定有另一个商品早已转化为货币，因而现在已经处在第二流通阶段 G—W 上。这样，我们就陷入互为前提的恶性循环。流通本身就是这种恶性循环。[③]

从商品的角度来看，流通（W—G—W）总是可以归结为 W—W，即以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93.

② 同①484.

③ 同①485.

货币为中介的物物交换；通过与货币交换，商品流通分解为卖（W—G）和买（G—W）两个相对独立的过程：一方面，商品向货币转化（W—G）是流通得以进行的前提；另一方面，商品能够实现向货币的转化，又要以业已存在的流通的结果（G—W）为前提。

流通虽然解决了商品的矛盾，但是自身的两个规定同样互为条件、互为前提，成为新的“相互矛盾的要求的总体”。例如，在前面的例子中，B的商品咖啡进入流通要以A的商品小麦转化为货币为前提，而且商品咖啡流通的前半段（W—G）同时也就是商品小麦流通的后半段（G—W）。在实际流通过程中，单个商品的流通过程需要以其他商品的流通为前提，“W—G—W这个流通，就表现为……无限错综的一团锁链”①。而且，卖（W—G）和买（G—W）之间的过程可以延迟甚至可能会断裂②，“实际的流通过程不是表现为商品的形态变化全过程……而是表现为许多偶然并行发生或彼此连接的买卖的集合”；这样，W—G—W的流通过程就分裂成无数个独立的卖（W—G）或买（G—W），流通过程本身的规定性就完全消失了。因此，我们在现实中看到的流通不是商品换成货币再换成商品的W—G—W过程总体③，而是“许多偶然并行的买和卖”，流通作为过程的规定性就被完全否定了④。不过，如果从货币的角度来看待商品流通，W—G—W表现为货币的不断转手；这样商品流通的总体性就被重新确立起来，商品流通同时也被转换为货币流通。

在货币流通中，货币获得了其作为流通手段的第二种形式规定，即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88.

② 商品所有者在将商品转化为货币之后，有可能不需要（或无法）马上购买自己想要的商品，也有可能将货币储存起来不再购买商品。马克思认为，商品和货币的对立是资产阶级劳动所包含的一切对立的抽象的一般形式；同时，买和卖在交换过程中的分裂也蕴含着商业危机的一般可能性。

③ 在W—G—W的形式中，还可以看到商品流通过程中人的不同地位：处在第二阶段（G—W）的货币所有者显然要比处在第一阶段（W—G）的商品所有者拥有更多的主动权，因为“商品流通……以与个人产品的单面性成反比的个人需要的多面性为前提……这里主动属于金或买者”。对于商品所有者而言，商品是没有使用价值的，必须将商品转化为货币才可能购买到满足自己需要的商品；在商品和货币的博弈中，商品的持有者注定处于弱势。但在单纯的买卖行为中，这种由流通过程造成的规定性“就变得无从认识了”，无论是买还是卖，商品和货币都是在同样的关系上彼此对立，商品所有者和货币所有者拥有同样的主动权。

④ 同①493.

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商品流通 W—G—W 的形式原本是从使用价值出发、以使用价值结束，商品所有者将自己的商品转化为货币，是为了获取新的使用价值；流通过程总体上就体现为部分商品通过与货币交换不断投入流通从而成为一般的使用价值，而另一部分商品通过与货币交换不断地退出流通从而实现自身特殊的使用价值。但是由于采用了货币作为购买手段，商品流通实际上被分割为卖（W—G）和买（G—W）两个相对独立的过程，商品不是直接从卖家手上交到买家手上，而是先转化为货币；商品之所以能转化为货币，是因为另一个卖家已经将自己的商品转换成了货币。因此买和卖实际上可以体现为同一种购买行为，因为卖家的出售行为和买家的购买行为实际上只是同一种行为的不同表述方式。如果从购买的角度看的商品流通，W—G—W 的形式就可以表述为“货币从买者手里转到卖者手里，再从已经变成买者的卖者手里转到新的卖者手里”①；那么，商品流通的不断更新就表现为货币的不断转手，“商品流通过程的运动就表现为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的运动，表现为**货币流通**”②。

货币作为价格标准和购买手段，只是商品流通的前提和中介；但是随着商品流通最终表现为货币流通，货币获得了新的形式规定，流通成为货币本身的属性和职能。

> 商品所有者把自己的私人劳动产品表现为社会劳动产品，是通过把一种物即金转化为一般劳动时间的直接存在，因而转化为货币，而现在，他们自身借以完成其劳动的物质变换的全面运动，就作为一种物所特有的运动，即作为金的流通，而同他们相对立。社会运动本身，对商品所有者来说，一方面是外在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只是形式上的中介过程，使每一个人能够用他投入流通的使用价值从流通中取回价值量相等的另一些使用价值。商品的使用价值在商品离开流通时才开始发生作用，而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的使用价值则是货币的流通本身。……货币在流通过程中的这种独特的职能，使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具有新的形式规定性。③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94.

② 同①495.

③ 同①495-496.

商品流通转化为货币流通，是商品生产的必然结果。货币流通不仅是个人实现特殊需要的中介，而且同时也表现为一种外在的强制、一种物的规律；这种强制和规律并不是货币作为物所拥有的自然属性，而是从经济关系中生长出来的社会属性，是人的社会活动的对象化。随着货币成为流通手段，它的规定性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

> 金作为流通手段的存在不是决定于它同个别静止商品的孤立的关系，而是决定于它在过程中的商品世界里的动的存在；决定于它用自己的位置变换来表现商品形态变化的职能，也就是决定于它用自己的位置变换速度来表现商品形态变化速度的职能。因此……流通中的实际的金量，就决定于它在整个过程本身中的职能存在。①

在商品流通中，货币只是实现商品价格的购买手段；货币流通赋予了金新的使命，表现为一定量的金代替商品进行流通，货币的使用价值就是货币的流通本身。流通中所需要的金量取决于三个因素：（1）待实现的价格总额（即商品的交换价值）；（2）货币流通的速度（即商品变化的平均速度）；（3）金（即货币）本身的价值。其中，前两个条件都“处于简单货币流通之外而只反映在简单货币流通中”②，在条件（1）（2）既定的情况下，“流通的金量就决定于金本身的价值”③。不过，金本身的价值是一个变动的量，会随着生产金的必要劳动时间而波动，同时也会随着流通过程中的磨损而变小。为了使货币流通不会因为技术困难而受到阻碍，真正地实现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货币获得了一种特有的形式，即变成了铸币。

在铸币形式中，货币获得了其作为流通手段的第三种形式规定，即作为价值符号的货币。最初，作为铸币的金和金块没有差别，只是从一种形状熔铸为另一种形状。随着流通的进行，铸币作为金会不断地磨损，但它“在每一次单独的买或卖中仍旧当作原来的金量起作用”④；也就是说，在法令的规定下，不足额的铸币被当作了足额的金块发挥作用，铸币“因为实践反而观念化”⑤ 为虚幻的金：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97.
② 同①500.
③ 同①501.
④ 同①503.
⑤ 同①504.

> 铸币是这样的金块，它以一定的花纹和形状表示它含有镑、先令等货币计算名称所指的金的重量。……作为铸币的货币，它的流通领域是由共同体的界限所限定的**国内**的商品流通，这是不同于商品世界的**普遍**流通的。①

然而，在发生磨损之后，“所有的金铸币或多或少地变成了自己的实体的单纯符号或象征”②；不过铸币所代表的虚幻的金会跟作为铸币实体的金发生冲突，因为“任何一种东西不能是它自身的象征”③。画的葡萄不能代替真的葡萄，分量不足的金铸币更不可能代替足额的金。④ 这个冲突的解决，就是用其他金属铸币（如银铸币或铜铸币）来作为一定量金的象征，并将其投入金铸币磨损最快的流通领域；这些辅币“自己的含银量或含铜量不是由银对金或铜对金之间的比价决定的，而是由法律任意确定的”⑤。不过，金属辅币同样也会磨损，因此总是还会遇到和金铸币一样的困难，“用一种象征性的货币来代表另一种象征性的货币将会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⑥。

经过上述演绎过程，马克思指出，辅币之所以被当作金铸币的象征，恰恰是因为它们的价值量较小；此外，由于辅币与金铸币的兑换比例完全是由法律确定的，所以辅币本身的价值实际上越小越好，“因而，相对没有价值的东西，如**纸**，可以作为金货币的象征来起作用”：

> 正如商品的交换价值通过商品的交换过程结晶为金货币一样，金货币在流通中升华为它自身的象征，最初采取磨损的金铸币的形式，而后采取金属辅币的形式，最后采取无价值的记号、纸片、单纯的**价值符号**的形式。……只有在［流通］过程中金货币本身才变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501.

② 同①505-506.

③ 同①506.

④ 在直接采用金属铸币作为流通手段时，国家一般会限定铸币的磨损程度，并将磨损的铸币回收重铸以保证铸币的足额。但是这样做其实并没有实质性的效果，私人可很容易地利用金名义含量和实际含量的差别来“从事各种各样的铸币伪造活动”，而政府实际上也在从事同样的活动。

⑤ 同①506. 马克思认为，象征性的货币（银或铜）的发行量取决于实现小额商品流通所需要的货币量。

⑥ 同①507-508.

成了它自己价值的单纯的符号，单纯的价值符号才能够代替它。①

在流通过程中，金货币起的作用“只是在过程内部对另一个商品代表一个商品的价格，或对每个商品所有者**代表金**”②。金货币可能确实以金的实体形式存在，却一直都只是作为一种象征、一种符号在起作用，而且一直受到（价值）磨损的困扰。因此，“强制通用的国家纸币是**价值符号**的完成形式，是直接从金属流通或简单商品流通本身中产生出来的纸币的唯一形式”③。作为流通手段，流通中的金量取决于商品的总价格；作为价值符号的转化形式，纸币的总价值取决于它所代表的金铸币量。不过，由于任意数量的纸币都可以通过流通而被吸收，单位纸币的价值“完全决定于它自身的量”④，以金铸币来计量商品价格因而也“随着纸票数量的增减而涨跌”⑤。

随着纸币的出现，作为价值符号的货币流通使简单货币流通的一切规律都颠倒了、消失了。⑥ 如果用纸币流通规律来研究货币流通，那么注定不能理解货币流通的内在规律。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虽然它只是作为观念中的金发挥作用，但这种职能完全取决于金的自然物质；如果换作以银来作为计算商品的交换价值，那么商品肯定会表现为完全不同的价格。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货币必须作为实在的东西与商品对立；但对于货币的这种职能来说，具体采用什么物质形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以一定的符号体现“观念上的数的比例”⑦。

3. 作为货币的货币

货币的第三个形式规定是作为货币的货币，也就是作为金的金。“作为价值尺度，金只是观念上的货币和观念上的金；作为单纯的流通手段，金是象征性的货币和象征性的金；但在它的简单的金属实体上，金是货币，或者说，货币是实在的金。”⑧ 通过否定流通、退出流通，货币成为一般价值形式的独立物质形式，同时也是一切物质财富的代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508.
② 同①510.
③ 同①510.
④ 同①513.
⑤ 同①515.
⑥ 同①516.
⑦ 同①515.
⑧ 同①518.

表。在“货币”部分，货币的形式规定体现为独立于一国流通过程之外的货币，即（1）退出流通的作为贮藏手段的货币；（2）非流通的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3）超出一国范围的作为世界货币的货币。

货币在作为流通手段时，其形式规定都是从商品流通形式 W—G—W 中得到的，铸币形式的货币是这个流通过程的结果；而从金的角度来看，货币就成为新的流通形式 G—W—G 的起点，即“货币换商品是为了再把商品换成货币”①。“货币章”的三篇至此就表现为三个不断上升的逻辑环节：“价值尺度”中阐述的商品物质形式变换过程是商品流通的实际内容，W—G—W 的流通过程是物质变换的形式规定，货币作为商品交换的中介实现了“流通手段”的形式规定；接着，“流通手段”中所阐述的“商品的形式存在本身却是第二过程 G—W—G 的实际内容”②，在 G—W—G 的形式中，货币成为价值尺度和交换手段的统一，商品体现为使货币变成货币的中介。G—W—G 和 W—G—W 是对同一过程的不同描述，但是从中可以看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形式规定。W—G—W 的两极是具有相等价值量的商品，它们的交换是实在的物质变换，即使用价值的交换；而 G—W—G 的两极是具有相等价值量的金，我们立即就会意识到这个过程本身是不现实的。G—W—G，即“为卖而买”的公式，本身就意味着货币进入流通的目的即实现货币数量的增殖。

> 人们在实践中不是为卖而买，而是为贵卖而贱买，货币换商品，是为了用这同一商品再去换数量更多的货币，因此两极 G 和 G，虽然质上并无差异，但是量上是不同的。这种量的差别是以**非等价物的交换**为前提的，而这里的商品和货币只是商品本身的对立形式，因而只是同一价值量的不同的存在方式。③

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货币的所有形式规定都来自商品的物质变换和商品的流通过程，最终被贬低为“纯粹象征性的纸片”④。货币要作为货币发挥作用，就必然要拥有新的规定性，成为“一个独立的、同它在两个职能上的存在不同的存在”⑤，使它成为不同于铸币的货币，“从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516.
② 同①517.
③ 同①517.
④ 同①519.
⑤ 同①518.

商品的区区帮手变成了商品的上帝”①。金变成不同于铸币的货币，首先是由于它作为贮藏货币退出流通，其次是由于它作为非流通手段而进入流通，最后则是由于它突破国内流通的界限以便在商品世界起一般等价物的作用，“这样，金就成了**世界货币**”②。

货币作为货币存在的第一种形态，是退出流通的贮藏货币。货币最初脱离流通，是因为商品的物质变换被分解为卖（W—G）和买（G—W）两个相对独立的环节，商品在转换成货币之后“可以在这里停留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③。实际上，只要出现只卖不买的情况时，“铸币本身就变成货币”，成为独立于商品流通的绝对购买力。这是流通手段转化为货币的第一种形式，“货币在这里实际上不过是**暂歇的铸币**”④，它的最终目标仍然是换成一定量的商品。不过，由于这些暂歇的铸币可以随时转换为商品，货币是过剩产品的最恰当的保存形式。

> 商品不是只能在金银的形式上被保存……然而金银却是在被保存形式上的财富。每种使用价值本身都是由于被消费，即被消灭而起使用价值的作用。但是，作为货币的金的使用价值，是去充当交换价值的承担者，是作为无定形的原料去充当一般劳动时间的化身。作为无定形的金属，交换价值取得了一种长久的形式。这样作为货币而静止下来的金银就是**贮藏货币**。⑤

随着商品流通发展，货币成为一般劳动时间的化身，金可以随时作为交换价值从商品流通中换取商品；这样，商品的所有者进行交换的目的就不再是为了直接获得另一件商品，而是为了将自己的商品保存为交换价值、保存为货币、保存为一般的购买力。因此，“交换价值从单纯的形式变成了运动的内容”⑥。货币只有在脱离了流通之后，作为非流通手段才变成了货币，货币随之也就变成了贮藏货币。货币只有作为交换价值的一般形式才能成为贮藏货币，但是由于贮藏货币不再投入流通，贮藏货币借以形成的活动就是一方面“通过不断重复的卖从流通中取出货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519.
② 同①543.
③ 同①486.
④ 同①520.
⑤ 同①521.
⑥ 同①522.

币”，另一方面不断地重复“简单的收藏、**积累**”[①]。通过将货币不断地带出流通过程（W—G）而不再购买新的商品，贮藏货币也实现了自身的持续增殖。[②]

货币作为货币存在的第二种形态，是作为非流通手段进入流通的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在商品流通中，货币所获得的各种规定都只是商品形态变化所包含的规定，因此货币并没有获得独立的地位。而当货币作为（贮藏）货币从流通中独立出来之后，商品和货币的关系就分裂开了；W—G 的过程就获得了新的形式规定，即货币所有者可以先获得商品，然后在约定的时间再支付商品的价格，货币此时就是作为执行一般支付手段职能的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和作为购买手段的货币有着本质的差别，后者只是作为想象的交换价值在起作用，是商品交换即商品生产者相互满足个人需要的中介；而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就是现实的交换价值，表现为商品交换的目的。

> 产品在流通过程中转化为货币最初只是表现为商品所有者的个人的必需，因为他的产品对他并不是使用价值，只有通过转让之后才对他是使用价值。但是，为了在契约到期时支付，他就必须先把商品出卖。所以，这种出卖，与他的个人需要完全无关，已经由于流通过程的运动变为他的一种社会必需。……作为终结行为的由商品向货币的转化……在货币贮藏上曾经仿佛是商品所有者的随心所欲的行为，现在却成了一种经济职能。[③]

买和卖在时间上的分离在简单商品流通中也存在[④]，作为购买手段，同样存在延迟支付的可能；但是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与作为购买手段的货币代表着完全不同的经济关系，货币作为购买手段只是商品生产的附庸，而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则是商品生产的唯一目的。而且，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扩展，不断压缩着作为购买手段和贮藏要素的货币的存在空间；随着支付手段职能的发展，“其他一切支付形式都渐渐地变为货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527.

② 与贮藏货币相适应的美德是吝啬，即尽可能地放弃自身的特殊需要，从而将尽可能多的使用价值都转化为一般的交换价值。马克思对这种肤浅的致富欲进行了极富讽刺性的文学描述，可惜与“资本一般”的逻辑关联不大，无法在此处充分展现。

③ 同①536.

④ 同①537.

币支付”，货币发展成为唯一支付手段的程度，同时也就是“交换价值在深度和广度上支配生产的程度”①。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重新以独立的形态进入流通，并在流通中体现为真正的财富形式，“而其他一切商品，正因为它们是使用价值，就在现金旁边表现为无用之物”②；商品流通的各种规律也随着支付手段的流通而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如“买和卖之间的区别”③、“流通中的货币量的规律”④ 等。

货币作为货币存在的第三种形态，是突破国内流通界限、进入国际流通的作为世界货币的货币。在作为流通手段的各个环节中，货币的重量尺度变成了象征性价值尺度，变成了计算价格的单位名称，变成了无价值的纸片；而作为国际货币，贵金属完全恢复了它原初的形式，“重新抛弃了那些由这种特殊领域内的交换过程的发展所引起的特殊形式”⑤：

> 充当国际交换手段和国际支付手段的货币的形式，实际上并不是货币的**特殊**形式，而只是货币作为货币的一种应用：是货币的职能，在这些职能中，货币最引人注目地以它的单纯而又具体的形式充当货币，充当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同时既不充当尺度，也不充当流通手段。这是货币的最原始的形式。只有在货币在所谓国内流通中能够作为尺度和铸币**分立出来**的同时，这种最原始的形式才表现为**特殊**形式。⑥

世界货币与铸币有许多差别，但最重要的差别在于世界货币获得了一种“无差别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上，金银本身始终是价值，并可以打上任何民族花纹。或者无论带有任何民族的花纹都可以以其直接存在方式充当交换手段和货币贮藏的材料，也可以变为商品。金银并没有被束缚在这些形式的任何一种上，而是根据流通过程的需要和趋势，采用其中每一种形式；但是它始终处于独立的形式中，而不被流通所吸收。“随着货币发展为世界货币，商品所有者也就发展为世界主义者”，“在商品所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538.
② 同①541.
③ 同①535.
④ 同①542.
⑤ 同①544.
⑥ 同①326.

有者看来，整个世界都融化在其中的那个崇高的观念，就是一个市场的观念，**世界市场**的观念”①。

在“1857—1858 年手稿”中，马克思将“货币的第三种形式”直接当作资本的现实形式，即“货币作为独立的对流通持否定态度的价值，这就是资本……它在自己同自己发生关系的价值形式上成为商品，进入流通”②。在“第一分册”中，马克思将“货币章”中的价值形式和“资本章”中的价值形式严格区分开来，在“货币章”，“所谈的只是从商品交换直接产生出来的那些货币形式，而不是属于生产过程较高阶段的那些货币形式”③。根据新的叙述逻辑，价值从货币形式到资本形式的过渡是通过彻底否定简单商品流通实现的。

4. 货币向资本的过渡

“货币章”的逻辑阐述以重新获得物化存在的货币（即“贵金属”）结束，“第一分册的叙述到此为止，从货币到资本的转化留待第二分册叙述”④。不过，马克思在写作“第二分册”（即“1861—1863 年手稿”）时并没有提及从货币向资本过渡的逻辑环节，而是直接从价值的规定出发开始了对“资本一般”的论述。所幸的是，马克思在为“第一分册”写作的手稿中保留了相关章节，其中包含了货币对流通的否定以及向资本过渡的相关内容。在笔记本 B″中，马克思以“向资本过渡”⑤ 为题从流通过程的总体上对流通本身进行了彻底的考察，叙述了简单流通的自我否定及其向资本流通过渡的必然性。

从简单流通的形式上来看，流通表现为等价物（商品和货币）按照其价值量进行交换，同时双方的规定性也相互替换；在完成替换之后，双方各自原本的规定性也就消失了。例如，货币一旦实现为商品，货币中的交换价值（对货币所有者来说）就消失了；同样地，商品一旦实现为货币，商品中的使用价值（对商品所有者说来）也就消失了。因此，通过简单的交换行为，每一方只有否定自身的规定才能实现另一方的规定性，“任何一方都不能在它过渡到另一规定时仍保持自己原有的规定”⑥。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547.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40.
③ 同①458.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5.
⑤ 同①365.
⑥ 同①367.

且，流通中的货币和商品都来自流通之外，简单流通“不包含自我更新的原动力”①，只是一种假象：

> 就流通本身来看，它是**预先存在的两极的中介**。但是它并不创造这两极。因此，流通作为中介的整体，作为全部过程本身，都必须通过中介才存在。**因而流通的直接存在是纯粹的假象**。流通是**在流通背后进行的一种过程的表面现象**。现在，流通在它的每一个要素上——作为商品，作为货币，而且作为两者之间的关系，作为两者之间的简单交换，流通——都被否定了。②

虽然这种假象具有古老的历史外表，但关于它的抽象却并不是从历史上产生的，而是从现代生产中产生的，简单流通是“资产阶级生产总过程的抽象领域”③。简单流通过程只有在流通已经成为自身前提的情况下才会成为现实的普遍抽象，简单流通中的各种矛盾恰恰证明“它是[B″－6]那个在流通背后进行的、从流通中产生又产生出流通的更深刻的过程即工业资本的要素，其单纯表现形式”④。简单流通只是第二性的、派生的流通形式，它只是另一种流通的抽象存在方式；它之所以能成为普遍的抽象形式，是因为第一性的、原生的流通形式（即资产阶级生产总过程）必然已经克服了流通的抽象性，将流通的抽象规定在现实中实现出来。

要理解“资产阶级生产总过程”，就要从简单流通过程自身的矛盾开始进行新的辩证逻辑发展。从商品流通 W—G—W 及其发展形式 G—W—G 来看，交换价值实际上已经获得了一种自在的独立性：交换价值在商品上作为货币来保存自己，在货币上以商品来保存自己。因此，交换价值实际上已经在作为过程的主体来发挥作用，只是没有表现出来。在简单流通的形式中，交换价值作为主体的保存和增长只是抽象的、形式上的，仍然不是独立地将自己作为价值的价值：

> 对于把自己固定为价值的那个价值来说，增长和自我保存已经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2 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67.
② 同①.
③ 同①370.
④ 同①370.

> 合而为一，它能保存自己，只是由于不断地越出自己在量上的界限，而这种界限是同它的内在的一般性相矛盾的。①

价值自我保存、自我增殖的规定是与它在简单流通中的一般性规定相矛盾的，因为价值的本性就是商品中凝结的一般劳动时间，代表了商品等价交换的尺度。然而，货币作为价值、作为财富的一般形式，它的唯一要求就是不断地增殖、不断地超出自己量的界限；只有如此，它才能使自己成为不同于使用价值的“自为的价值”：

> 作为最适当的交换价值从流通中产生并独立化，但又重新进入流通，在流通中并且通过流通而使自己永久化和自行增殖（倍增）的货币，就是**资本**。在资本中，货币失掉了自己的僵硬性，从一个可以捉摸的东西变成了一个过程。②

因此，价值的自为存在要求一种新的流通；在这种流通中，相互否定的商品和货币只是价值的特殊表现形式，流通的所有要素都从流通过程本身之后创造出来，价值在这种流通中保存自身并不断增殖。这两种流通在理论上的逻辑联结，就是从货币到资本的辩证发展过程。

“货币章”关于货币形式规定的辩证演绎结果是作为货币的货币否定了整个流通过程，说明简单商品流通只是一种虚假的、抽象的流通；这种流通想要确立自身的现实性，就需要克服自身的矛盾，从而将自身的抽象规定实现为更具现实性的流通。关于简单流通的演绎是从商品的二重性规定出发的。如果商品的使用价值在流通中起支配作用，那么流通将以使用价值的独立化而结束，流通的结果是商品成为消费对象。如果商品的交换价值在流通中起支配作用，那么流通将以交换价值的独立化作为结束，流通的结果是商品成为货币。显而易见，只有从交换价值出发，商品才可能以它的社会形式（即作为对象化的一般劳动时间）继续向前发展；而如果从使用价值出发，商品本身只能退出流通，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都随着物的消费而被彻底消灭。如果从交换价值出发来看待流通，流通就表现出来新的形式：

> 交换价值现在被规定为一个过程，而不再被规定为使用价值的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86.

② 同①387.

> 单纯的转瞬即逝的形式，即这种对作为物质内容的使用价值本身漠不关心的形式，也不再被规定为货币形式上的单纯的物；它被规定为通过流通过程而同自己发生的关系。另一方面，流通本身不再被规定为商品借以经历自己的不同规定的那种单纯形式上的过程，而是交换价值本身，而且是用货币计量的交换价值，应当作为前提本身表现为由流通所确立的东西，并且作为由流通确立的东西应当表现为流通的前提。①

因此，正如对简单流通的形式规定要从商品的二重性出发一样，对于资本（即自为的价值）的分析现在要从交换价值本身出发。以价值为出发点重新看待流通，那么独立的交换价值（货币）就获得了新的规定②：一方面，交换价值在流通中的存在是二重性的，一次存在于使用价值中，另一次存在于货币中，交换价值以这种方式来保存自身；另一方面，价值只有投入流通才能实现自我的保存和增殖，在这个过程中交换价值对体现交换价值的特殊使用价值漠不关心。这两个规定就构成了“资本章”——“1861—1863 年手稿”——的逻辑起点。

第二节　广义“资本一般”理论的第三个环节——狭义“资本一般”理论

广义“资本一般”理论的前两个环节“商品”和“货币”在“第一分册”中得到了系统而完整的论述。“第一分册”出版之后，马克思很快就开始准备整理写作“第二分册”，打算完成广义“资本一般”理论的第三个环节“资本”。从 1861 年开始，马克思为第二分册写下了二十三个笔记本的草稿，即“1861—1863 年手稿”。在“1861—1863 年手稿”中，马克思将第二分册的标题由“资本”改成“资本一般”，这里狭义“资本一般”理论特指广义“资本一般”理论的第三个环节。狭义“资本一般”理论包括三节，分别是“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和利润”；相应地，“1861—1863 年手稿”的庞大内容可以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2 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81.

② 同①380-381.

分为四类手稿：“资本的生产过程”草稿、“资本的流通过程”草稿、“资本和利润”草稿以及“资本一般”整体思路的整理稿。在过去的手稿解读中，研究者大多忽视了“1861—1863 年手稿”本身的文本结构，因此无法逻辑地呈现手稿的整体内容。实际上，“1861—1863 年手稿”的内容虽然散乱，但始终贯穿着马克思关于“资本一般”理论的思考；马克思写作过程中涉及的论题虽然庞杂，但始终没有脱离“资本一般”的写作提纲。作为广义“资本一般”理论的最终环节，“1861—1863 年手稿”——狭义“资本一般”理论——的逻辑内容是资本概念克服自身抽象性的辩证发展过程，这一逻辑过程的全体也就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生产方式的整体认识。

一、资本的生产过程

“资本的生产过程”是狭义“资本一般”理论三节结构中最成型的一节，也是“1861—1863 年手稿”中占据篇幅最大的一节。“资本的生产过程”这一节的写作可以明显地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马克思在 1861 年 8 月—1862 年 3 月写的第 I—V 笔记本（即第 1—211 页），内容是“资本一般”第二提纲中的前三个标题；第二阶段是马克思在 1862 年 3 月—12 月写的第 VI—XV、XVIII 笔记本，内容是马克思为这一节新增的“剩余价值理论”；第三阶段是 1863 年 1 月—6 月写的第 XIX—XXII 笔记本，内容是根据“资本一般”第三提纲对“资本的生产过程”的完善。上述三个阶段的手稿合在一起构成了“1861—1863 年手稿”中的“资本的生产过程”草稿（以下简称“生产草稿”）。从理论内容上看，“生产草稿”主要阐述了资本概念的矛盾及其二重化过程。

1. “生产草稿”的三个写作阶段

在“生产草稿”的第一个写作阶段，马克思按照“资本一般”第二提纲的思路写了“资本的生产过程”的前几个标题。“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草稿写在第 I—II 笔记本上，这一部分的成型程度很高，已经达到了付排稿的程度。第 II 笔记本没有用完，马克思留下了一些空白页用于以后的增补。① 完成“货币转化为资本”部分后，马克思另起了一个笔记本，在第 III—V 笔记本上写了“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

① 马克思后来用第 II 笔记本的空白页写了关于剩余价值生产的内容。

的草稿。这部分手稿的成型程度要远逊于前两个笔记本，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马克思在其中反复地斟酌自己的思路，经常对之前的内容进行总结；马克思经常脱离“资本一般”的理论逻辑，转而对经济学家的观点进行评述；“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写作都没有真正完成，马克思对这两部分进行了反复的增补。[①] 手稿的混乱显示出马克思在写作过程中遇到的困难，纯形式的逻辑演绎经常出现中断，从而不得不转向对经济理论和经济现象的具体考察。叙述的困难最终导致马克思在讨论“相对剩余价值”中的“机器”问题时彻底停下了“资本一般”理论部分的写作，转而另起一个笔记本，在第 VI 笔记本上开始写理论史评述的内容，“生产草稿”从而进入了第二个写作阶段。

在“生产草稿”的第二个写作阶段，马克思以“剩余价值理论”为标题写了第 VI—XV 和 XVIII 笔记本，含近 800 页草稿。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的前面加了一个序号“(5)”，表明这是“资本的生产过程”的第 5 个小标题。中间空缺的第 4 个小标题可能是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结合[②]，最初手稿写在对“绝对剩余价值”的增补中。[③]“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新增的历史批判部分，“资本一般”第二提纲中原本没有这个标题。马克思写作这一部分的目的是借助剩余价值的形式规定来批评经济学中关于利润理论的具体争论，以往的经济学家“不是纯粹地就剩余价值本身，而是在利润和地租这些特殊形式上来考察剩余价值”[④]。“剩余价值理论”部分的写作耗费了马克思巨大的精力和时间，所占篇幅比“1861—1863 年手稿”的其他部分加在一起还要多。“剩余价值理论”开头的两部分对“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的理论评述很有条理，可以看出马克思还在以出版为直接目标来进行写作；不过在“亚当·斯密”之后，马克思开始不断地插入关于“资本一般”其他部分的讨论，最终导致了篇幅的失衡。在“(c) 亚当·斯密”部分，马克思讨论了两个不属于“剩余价值理论”的问题：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如何购买“包含不变资本的商品”[⑤]，即不变资本在流通中的补偿问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13-259，395-407.
② 同①355.
③ 同①218-220.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7.
⑤ 同④85.

题，这一论题本来应当属于狭义“资本一般”理论的第二节“资本的流通过程”；“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以及资本的生产性问题①，马克思后来将这部分单独整理为“相对剩余价值”下的一个小标题“资本的生产性。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②。在“(h) 李嘉图”部分，马克思额外讨论了地租以及平均价格的形成③，这些内容属于狭义“资本一般”理论的第三节“资本和利润”。在完成了对李嘉图剩余价值理论的评述之后，马克思对于“资本一般”理论的成熟程度愈加自信，并很快就中断了“剩余价值理论”的写作，转而开始整理“资本一般”的整体思路。1862 年 11 月—12 月，完成思路整理的马克思才又恢复“剩余价值理论”的写作，在第 XVIII 笔记本的空白页上完成了“剩余价值理论”的全部内容，“生产草稿”的第二个写作阶段至此结束。

在“生产草稿”的第三个写作阶段，马克思从 1863 年 1 月开始根据新制订的提纲续写“(3) 相对剩余价值”的草稿。马克思从第 V 笔记本中断的地方继续写了“机器”的后续内容，第 V 笔记本用完之后又在第 XIX—XXIII 笔记本上持续为“资本的生产过程”的章节补充内容。马克思的这次补充明显没有达到付排稿的程度，章节的标题不清晰，而且内容也极其散乱；特别是第 XXIII 笔记本中完全没有标题，全部是各种材料的摘抄。这可能是出于两方面的原因：马克思此时意识到“第二分册”已经出版无望，所以在手稿写作过程中不再追求书稿的形式，而只是在重新整理自己的思路；马克思在 1863 年遇到了财政和健康的双重困难，饱受疖子的折磨，因此中断了写作计划。不过第三阶段手稿（第 XIX—XXIII 笔记本）的缺陷并不影响“1861—1863 年手稿”中“资本一般”理论的完整性，因为马克思在第 XV—XVIII 笔记本中已经对“资本一般”的整体思路进行过完整的梳理。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35.

② Karl Marx.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Manuskript 1861-1863) Teil 6// Marx-Engels Gesamtausgabe：II/3.6. Berlin：Dietz Verlag，1976：215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8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6.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91-418.

表 9　“资本的生产过程”草稿在“1861—1863 年手稿”中的分布状况表

	笔记本编号	页码范围	笔记本目录
第一阶段	第 I—V 笔记本	1—211	(1) 货币转化为资本 (a) 资本的最一般形式。(b) 困难。(c) 资本与劳动能力的交换。(d) 劳动能力的价值。(e) 劳动过程。(f) 价值增殖过程。(g) 资本主义生产 (2) 绝对剩余价值 (a) 应当把剩余价值看成只是同一定的，即用于工资的资本部分的关系。(b) 剩余劳动与必要劳动的比例，剩余劳动量。(c) 过度劳动的利益。(d) 同时并存的工作日。(e) 剩余劳动的性质 (3) 相对剩余价值 (a) 协作。(b) 分工。(c) 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
第二阶段	第 VI—XV 笔记本	220—890	(5) 剩余价值理论 (a) 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b) 重农学派。(c) 亚·斯密。(d) 内克。(e) 兰盖。(f) 布雷。(g) 洛贝尔图斯先生。插入部分。新的地租理论。(h) 李嘉图。(i) 马尔萨斯。(k) 李嘉图学派的解体。(l) 经济学家的反对派。(m) 拉姆赛。(n) 舍尔比利埃。(o) 理查·琼斯
	中断		
	第 XVIII 笔记本	1029—1065a	
第三阶段	第 V 笔记本	211—219	(3) 相对剩余价值 (c) 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h) [相对剩余价值和绝对剩余价值]。(i) [资本条件下的劳动的形式的和真正的前提]。(k) 资本的生产性，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劳动
	第 XIX—XXIII 笔记本	1066—1472	(4) 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 (a) 剩余价值向资本的再转变。(b) 所谓原始积累

2. “资本的生产过程”的辩证逻辑结构

“生产草稿”没有完成“资本的生产过程”的全部内容，不过根据已有手稿以及马克思在第 XV 笔记本上的思路整理已经足够勾勒出这一节的辩证逻辑结构。“资本的生产过程”是狭义“资本一般”理论的第一节，在这一节中，资本概念的内在矛盾得以初步展开，抽象性得到了初步的克服，从而实现为资本的一般性规定“产生剩余价值

的价值”①。“资本的生产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逻辑环节：“货币与劳动的交换”“剩余价值的生产”“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这一节的内容主要是“为了使资本的生产过程存在，就得假定存在着这一过程的条件”②，这些假定都是从价值的抽象规定中推演出来的。

“资本的生产过程”的第一个逻辑环节是“货币与劳动的交换”，在这个环节中，马克思展示了资本概念的内在矛盾。与商品概念类似，资本概念也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从最直观的表象来看，资本可以被定义为能够带来利润的货币，然而这样的定义与流通中等价交换的原则是相互矛盾的。古典经济学不加反思地认可了这样的资本概念，并以这样的观念出发构建资本理论。例如斯密只是将“等量资本平均说来提供等量利润”当作一个事实记录下来，“关于这个事实同他提出的价值理论的联系的问题，并没有引起他丝毫的内心不安”③。基于“资本一般”中的新方法，马克思没有将资本这个矛盾概念当作研究的基础，而是从资本概念的内在矛盾出发寻找矛盾自我克服的中介，也就是寻找资本实现自身抽象规定的现实前提。“货币与劳动的交换”分三部分辩证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货币与劳动的交换”的第一个部分是“货币的二重化存在”，包括三个小标题：“资本的最一般形式”“由价值的本性产生的困难”“与劳动的交换”，成型手稿写在第Ⅰ笔记本上。马克思对狭义“资本一般”理论的叙述是从作为资本的货币开始的。作为资本，货币投入流通的唯一目的是实现货币量的增加（即价值的增殖），然而简单流通并不具备价值增殖的可能，商品与货币的形式变换并不会改变它们所代表的价值量。为了克服资本概念的矛盾，货币必须将自身二重化为自己与反题的对立。作为对象化的一般劳动，唯一与货币对立（Gegensatz）的东西是“非对象化劳动，**活劳动**”④，因此货币的二重化也就是用一部分货币与劳动进行交换。货币与劳动交换的前提，是劳动已经成为一种商品。根据商品流通的规定，劳动成为商品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⑤：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9.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581.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70.
④ 同①39.
⑤ 同①41.

> (1) 劳动能力的所有者首先要能够支配自己的劳动能力，能够把它作为商品来支配。为此，他还必须是自由的劳动能力所有者。否则，他就不能把劳动能力作为商品**出售**。
>
> (2) 他必须亲自把他的劳动能力作为商品拿到市场上去出售，因为他的劳动已不能再以任何其他商品的形式……来进行交换，而他应提供出售的唯一商品，就是他的活的、存在于他的活的机体中的劳动能力。

也就是说，只有在丧失了独立从事劳动的现实可能之后，个人才会将自己的劳动能力当作商品来出售，否则个人就会利用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来自己生产商品；相应地，货币如果要转化为资本，就不仅需要与劳动能力进行交换，还需要占有劳动对象化的前提，即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因此，在劳动能力成为商品的社会关系中，“劳动能力表现为**绝对的贫困**……工人本身，按其概念是赤贫者”①。通过购买这样的劳动能力商品，货币的所有者才可能将自己的货币转化为资本，才可能将自己转化为资本家。

由此便进入了“货币与劳动的交换”的第二部分“劳动能力作为商品的二重性”，同样包括三个小标题：“劳动能力的价值”、“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这一部分是对劳动能力（Arbeitsvermögen）概念的形式演绎，也就是说明劳动如何成为一种可以购买的商品。在资本关系中，货币与劳动的交换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资本家与工人交换，购买劳动能力并支付给工人相应的工资；第二个阶段是资本家对劳动能力的消费，工人进入实际的劳动过程。在上一个逻辑环节，货币通过与劳动能力交换而变成了资本，但由此也同时导致了如何确定劳动能力的价值（即价格）的难题。商品将自身二重化为价格（价值）和使用价值是实现流通的前提，对于劳动能力同样如此。价值的尺度是劳动时间，但这样的规定并不适用于劳动能力的价值计量：劳动能力在出售之前只是一种纯粹的可能性，无法用时间来计量；而劳动能力在出售之后就变成了现实的一定时间的劳动，它自身不能作为自己的计量尺度。这时，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中的规定性已经不再适用了，劳动能力的价值计算遵循着一种新的规定。在简单流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4.

通中，交换价值是商品自身的属性，是流通得以进行的前提；而在资本的一般形式中，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完全是由资本的本性来规定的。在“劳动能力的价值”的标题下，马克思指出了劳动能力作为商品的价格（价值）的计量方法①：

> 劳动能力的价值归结为工人为了维持作为工人的自身，作为工人生活并且繁殖下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而这些价值又归结为由于生产那些维持和繁殖劳动能力所需的生活资料或使用价值而必须花费的一定的劳动时间，即耗费的一定量劳动。

也就是说，劳动能力的价值也就是资本能够不断地从市场上购买到工人的最低成本，即“工人作为工人而生活所需要的生活资料”②，劳动能力的价值也就是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工资。资本家在支付工资之后，工人就进入了具体的**“劳动过程”**③。劳动过程首先直接表现为特殊使用价值的生产，需要劳动能力、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三个要素的共同作用，共同组成一个中性的结果——产品。因此，从劳动的具体形式来看，“劳动过程本身与资本家购买劳动能力的行为没有任何关系”④。不过，在资本的一般关系中，劳动过程所有的三个要素都是资本家用货币购买来的，这些要素首先要作为交换价值在发挥作用；生产的三个要素都是货币进行自我增殖的中介，劳动过程同时也是“价值增殖过程”⑤。作为交换价值，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的价值都只是在生产过程中得到保存；而劳动能力的消费（即劳动）不仅保存了所有三要素的交换价值，而且还可以创造出额外的交换价值，即剩余价值。假设产品顺利地再次转化为货币，那么资本的一般形式 G—W—G 就克服了自身的矛盾“而会具有一定的内容”⑥，即投入流通的货币得到了更多的货币作为回报，而且这种价值增殖并不违背流通的本性。通过购买和消费劳动能力，货币将自身实现为资本，货币所有者将自己转化为资本家，由此就进入了下一个逻辑环节。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8.
② 同①.
③ 同①59.
④ 同①72.
⑤ 同①73.
⑥ 同①95.

“货币与劳动的交换”的第三部分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①：从物质方面看，资本的生产过程是一般劳动过程，它与其他社会生产形式下的劳动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从形式方面看，资本的生产过程是资本家为了实现货币的增殖而进行的生产性消费，劳动的所有要素都服从于资本家的致富目标。在这个意义上，劳动过程——包括工人和原料——都要受到资本的监督和支配，但这种监督和支配并没有对劳动过程本身带来实质性改变，马克思将其称为“劳动过程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②。执行上述职能的货币就是生产资本，马克思将生产资本确定为资本的一般形式③；相比之下，商人资本和生息资本都只是第二级的、派生的资本形式，需要在生产资本的基础上才能够得到说明。通过转化为生产资本，货币（一定量的预付资本）以购买劳动能力为中介而实现了价值的增殖。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可以分为“两个组成部分”④：第一个部分是资本家用货币支付预付资本来购买生产要素的购买过程，这是等价交换的简单流通行为；第二个部分是资本家对这些生产要素进行消费的生产过程，这个过程表现为与简单流通规律矛盾的价值增殖过程。因此货币要实现增殖，就必然要放弃流通而进入生产，由此便过渡到下一个环节——剩余价值的生产。

“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的生产过程”的第二个逻辑环节，包括三部分：（1）“绝对剩余价值”，成型手稿写在第 III 笔记本上；（2）“相对剩余价值”，成型手稿写在第 III—V 笔记本和第 XIX—XXII 笔记本上；（3）“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结合”，部分草稿写在第 XX 笔记本上。由于支付了货币用于购买劳动能力和劳动条件，货币的所有者转变为产业资本家。资本家可以对生产劳动过程进行规划和监督，并将劳动产品归为己有。作为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组织生产的唯一目的是获得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对剩余价值来源的说明。

“剩余价值的生产”的第一部分是“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在这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03.

② 同①104.

③ 同①114.

④ 同①116.

一环节，剩余价值体现为不断追加的可变资本和（扣除不变资本后）产品价值之间的差额。如果资本家在支付过预付资本后没有改变劳动的具体形式，而只是让劳动者按照资本家的意愿来从事生产，那么在这种形式下进行的资本主义生产就是绝对剩余价值生产。马克思将预付资本中用于购买劳动能力的资本称为可变资本，并将用于购买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的部分称为不变资本。在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中，必要劳动时间等于可变资本的价值量；因此，剩余价值的量直接取决于劳动时间的长短，而且剩余价值的增长就意味着不变资本也必须相应地增长。由此便产生了资本一般关系中的“二律背反”①，资本家要求尽可能地延长劳动时间，而劳动能力的保持则要求限制劳动时间的长度；这两种要求都符合商品交换的一般规律，它们的对立在现实中体现为“全体资本家即资本家阶级和全体工人即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②，直到国家政权将“每天的总劳动时间规定一定的界限”③。在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中，剩余劳动的来源是显而易见的，即各种形式的非等价交换：工人人数固定的情况下，剩余价值的量取决于劳动的时间长度，即“过度劳动”④；工作日确定的情况下，剩余价值的量就取决于同时劳动的人数，即“同时并存的工作日”⑤。资本追求价值增殖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因此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自然界限以及形式界限（即法定工作日）必然会成为资本增殖的障碍，剩余价值的生产由此转变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

“剩余价值的生产”的第二部分是“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在这个环节中，剩余价值的增长体现为可变资本的一定份额转变为新的剩余价值。在工作日和工人规模既定的情况下，剩余价值的进一步增长只能来自压缩可变资本在产品价值中的份额，即降低用于支付工资的那部分预付资本的价值量的比例。工资（即劳动能力的价值）取决于维持工人生产和再生产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而这些生活资料的价值的降低又取决于生产力的提高；因此，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中，剩余价值的提高取决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06.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72.
③ 同①207.
④ 同①207.
⑤ 同①208.

于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升，即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不断下降。马克思在“1861—1863年手稿”中详细地考察了“协作”①、“分工”② 和“机器”③ 形式下工人在生产中的不同状态，及其对剩余价值率的影响。资本家通过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力来缩短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从而降低工资的总体水平，使得“过去用于工资的那部分资本被游离出来”④ 成为剩余价值。与此同时，预付资本中不变资本的比例也会相应地不断提高，劳动的条件（即固定资本）日益表现为资本与劳动者直接对立。

“剩余价值的生产”的第三部分是“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结合”。在“1861—1863年手稿”中，马克思对这一部分并没有整理成型，只在第XX笔记本上写了一个粗略的草稿。马克思强调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是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统一，“资本的趋势在于同时以这两种形式来增加剩余价值”⑤。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只是剩余价值的不断增加，至于这种剩余价值来自绝对剩余价值生产还是来自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是没有差别的。因此，两者的区分只能在理论上进行，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这两种生产是混杂在一起的。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中，剩余价值的来源表现为产品价格与生产成本之间的差额，工资基金（即不变资本）只是生产成本的一部分。而且从工资的形式来看，资本家已经支付了一定时间内劳动的全部价格，不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关系在工资的形式中已经完全被遮蔽了，“不论在工人的意识中还是在资本家的意识中一切都表现为歪曲的形式”⑥。关于工资规律与剩余价值理论的形式差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进行了系统的说明，此处不再赘述。

“资本的生产过程”的第三个逻辑环节是“剩余价值向资本的转化”，包括两部分——“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和“生产过程的结果”。在剩余价值的生产中，新的剩余价值被生产出来，资本家通过无偿占有剩余价值而实现了货币价值的增殖。在“资本的生产过程”的最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89.
② 同①301.
③ 同①362.
④ 同①399.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603.
⑥ 同⑤621.

终环节，资本概念的内在矛盾被克服了，但同时也产生了新的矛盾：价值增殖了，但货币本身并没有增殖。

“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包括三个小标题：“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原始积累”和“韦克菲尔德的殖民理论”。剩余价值向资本的转化是生产资本的完成形式，它的全部价值（包括预付资本本身和增殖的部分）都来自劳动者的剩余劳动。相比之下原始积累是以非流通手段进行的货币积累，例如暴力掠夺、货币贮藏等等。这部分的三个标题在《资本论》中都有对应的篇章，此处不再详细展开。

作为“资本的生产过程”的最终环节，“生产过程的结果”在“1861—1863 年手稿”中没有直接对应的草稿。不过，马克思在第 XV 笔记本中对“资本一般”理论的整体思路进行了长篇的整理，从中可以推测出“生产过程的结果”这一部分的内容。作为“生产过程的结果”，一定量的预付资本——以购买劳动能力为中介——实现了资本的一般规定，即成为增殖的价值；然而，生产资本的增殖是通过退出流通而进入生产过程后才实现的，要将增殖后的价值变成货币，资本必须将生产的产品再次投入流通，由此便过渡到了“资本一般”的第二节“资本的流通过程”。

3. “资本的生产过程”与社会关系的演变

政治经济学是关于社会关系的研究，因此“资本一般”理论的各个环节都带有双重的理论任务：从理论上看，这些环节是“资本一般”辩证逻辑体系的展开过程；从现实上看，这些环节是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抽象表现。“资本的生产过程”中各个范畴的辩证发展同时也是对社会关系的理论呈现。不过，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资本的生产过程”都是“资本一般”理论中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对于广义“资本一般”理论而言，“生产草稿”中货币向资本的转化是整个理论的中心枢纽，因为马克思创立“资本一般”理论的目的就是从商品出发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形式进行完整的说明。在“资本的生产过程”部分，马克思用高度逻辑化的辩证结构阐述了现代社会中社会关系的演变，充分展现了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视角。

在简单流通过程的抽象观念中，人与人的关系是平等的。在最原始的物物交换中，人和人的交换行为体现了绝对平等的对立关系。生产者为了满足某种自然需要而出让自己的产品，在交换时生产者可以自由地决定交换什么以及用什么交换。马克思对商品关系中体现出来的社会关

系的历史性和抽象性做了如下表述：

> 商品所有者只是以商品监护人的身分进入流通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彼此以买者和卖者的对立形式出现……这种特定的社会身分，决不是来自人的个性，而是来自以商品这个特定形式来生产产品的人们之间的交换关系。……他们两者发生关系，只是由于他们的个人劳动已被否定，即作为非个人劳动而成为货币。因此，把买者和卖者的这种经济上的资产阶级身分理解为人的个性的永恒的社会形式，是荒谬的，把他们当作个性的消灭而伤心，也同样是错误的。这些身分是个性在社会生产过程的一定阶段上的必然表现。此外，资产阶级生产的对抗性质，在买者和卖者的对立上表现得还很肤浅很表面，这种对立在资产阶级以前的社会形式中也存在，因为它只要求人们彼此当作商品所有者来发生关系。①

随着分工的发展，“个人产品的单面性”与“个人需要的多面性”之间的矛盾会越来越突出；一般等价物和货币出现之后，商品流通中的“主动属于金或买者”②。一般等价物和货币之所以拥有更多的主动权，是因为它们可以满足“从交换过程本身产生出来的一般需要”③。也就是说，货币可以很容易地换成各种特殊商品，因而是所有人都需要的普遍的使用价值；这种对货币的需要不是自然的需要，而是社会创造出来的新的需要。不过，即使货币的所有者占据了有利的位置，但货币与商品交换行为本身仍然是平等的，交换行为本身只是商品形态的变化。货币的出现“决不是要消除这种平等关系，实际上它是这种平等关系的现实的表现”④。商品流通的简单形式代表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所有人道理想，自由、平等和所有权在那里全部都得到了实现；无论是斯密还是李嘉图，古典经济学家都将原始的物物交换当作商业伦理的理想状态。

在“货币与劳动交换”的具体关系中，人与人的关系被二重化了。货币与劳动的交换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资本家向劳动者支付货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89-490.

② 同①487.

③ 同①441.

④ 同①359.

币，第二个阶段是劳动者为资本家进行生产。在第一个阶段，工人和资本家作为平等的商品所有者进行交换，因此在这个阶段并没有压迫和剥削。在形式上，工人可以决定将自己的劳动出售给哪个资本家，同时也可以在工资水平和工作日长度等方面与资本家进行博弈。不过，一旦交换行为完成之后，这种平等的形式就消失了。资本家购买的劳动能力还只是一种纯粹的可能性，必须将其应用在具体的劳动过程中才能实现它的使用价值；在劳动过程中，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变成了“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关系”①，资本家作为劳动能力的所有者有权对劳动过程进行规划和监督，“劳动过程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②，工人根据劳动契约需要服从资本家的支配。在这种形式的关系中，工人还保有着有限的相对独立性，因为工人和资本家只是因为契约而变得不平等，而这份契约是劳资双方共同意志的产物。

在“剩余价值的生产”中，工人和资本家的不平等关系才被揭示出来。工人的劳动不是对象化为自己的产品，而是对象化为属于资本家的产品。随着产品中的剩余价值不断地转化为资本的积累，工人最终彻底丧失了独立劳动的可能，从而在形式上和实际上都不得不从属于资本的支配。劳动过程在实际上从属于资本“是在创造与绝对剩余价值不同的相对剩余价值的一切形式中发展起来的”③。在协作环节中，劳动者在资本家的组织下为了更快地生产某一种具体商品而一起劳动，劳动者和劳动条件及劳动产品的关系仍然是直接结合在一起的。在分工④环节中，劳动者“在资本指挥下通过直接的、不以商品交换为中介的协作生产同一使用价值”⑤，劳动者和其他劳动条件一样只是生产过程的要素之一，最终的商品表现为资本家的产品和所有物，与劳动者无关。在机器环节中，工人成为机器生产的附庸，劳动者不仅和最终的产品分离开来，而且劳动条件也以机器的方式与劳动者直接对立。机器不仅是资本家缩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17.

② 同①103.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8.

④ 协作和分工在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也会存在，其间的差别详见马克思在“1861—1863年手稿”中关于两类分工的区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03）

⑤ 同①303.

短必要劳动的手段，同时也是“镇压劳动追求独立的一切要求的手段”①。至此，工人的劳动沦为资本家为了组织生产而购买的商品，社会中只有资本家在生产，其他的生产要素——包括工人——都表现为被动的东西。经过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各个环节，生产力的不断提升使“**作为资本的劳动条件在作为雇佣劳动的**劳动面前**独立化**”②，从而使劳动者彻底丧失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只能依靠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来获得自己的社会身份。

从商品的生产过程来看，物的生产需要劳动能力、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的共同作用。在私有制的条件下，这三种生产要素归不同的个体或阶级所有，而商品的生产只有在三种要素齐备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因此生产过程首先表现为产业资本家的购买行为。在为生产而进行的购买行为中，只有资本家和工人——劳动能力的所有者——的交换是特殊的、产生剩余价值的交换；而且根据“资本一般”理论的逻辑环节，这种特殊交换的完成是商品生产的前提条件。基于私人占有的商品关系看似是一种自由的人类社会秩序，但它的前提是不平等，而且会将这种不平等不断地再生产出来。

“资本一般”理论的深刻之处在于，它揭示了商品交换中的自由平等和劳资关系中的支配剥削实际上是同一种关系的不同表现。虽然商品关系和资本关系看起来是相互对立的，但它们都是交换价值流通的产物。如果以物的交换来理解自由和平等，那么就必然会导致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和剥削。这样，现实的不平等只能通过原初状态或自然状态的平等去消弭，于是就会产生这样一个奇怪的理论现象：“**资产阶级社会的占有规律的真实性竟不得不被搬到这种社会本身还不存在的那个时代去**，而所有权的基本规律不得不被搬到还没有所有权的那个时代去。”③马克思的“资本一般”理论——特别是“资本的生产过程”——是对近代以来自然法传统的彻底批判，只是这一批判视角与“资本一般”理论一样被理论界长期忽视了。

二、资本的流通过程

“资本的流通过程”是狭义“资本一般”理论的第二节。在“资本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87.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22.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49-350.

的流通过程”中，克服了资本概念内在矛盾的产业资本将产品投入流通，并将剩余价值实现为货币。在“1861—1863 年手稿”中，马克思没有对“资本的流通过程”进行系统的阐述，也没有为这一节制订详细的提纲，只在有限的文本中提及了通过资本流通想要证明的结论，这为完整地呈现“资本一般”的理论细节制造了一定的障碍。不过“资本的流通过程”草稿（以下简称“流通草稿”）的短缺并不会影响“1861—1863 年手稿”中“资本一般”的核心逻辑线索。在“资本的生产过程”中，货币通过与劳动能力交换而转化为资本，并在生产过程中实现了价值的增殖。但是，增殖的价值必须再次进入流通才能将自身的价值量实现出来，获得更多的货币。为了将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货币，一般性的资本在“资本的流通过程”中衍生出了各种形态的特殊资本，共同构成了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

1.“流通草稿”短缺的原因

在“1861—1863 年手稿”中，马克思始终没有为“资本的流通过程”专门写作草稿。在第 XVIII 笔记本中重新制订“资本一般”的提纲时，马克思也只拟订了第一节和第三节的详目，没有为第二节专门拟订写作计划。“流通草稿”的短缺可能由以下三方面的原因造成：

首先，“资本的流通过程”在“1857—1858 年手稿”中已经有过较为充分的讨论。马克思在“1857—1858 年手稿”中极为重视“二重化”在分析资本概念时的作用，因此先后区分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生产资本和流通资本。相关的讨论在“1857—1858 年手稿”中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这些讨论后来构成了“资本的流通过程”的大部分内容。运用二重化的分析方法，马克思考察了资本二重化为生产资本和流通资本以及生产资本二重化为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逻辑过程。资本的一般规定是获取剩余价值，但为了实现剩余价值，资本将自身二重化为产生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和不产生剩余价值的流通资本。马克思将流通时间看作剩余价值实现的障碍和界限。

> 这个流通时间决不能增加资本所创造的价值，而只能形成**不创造价值**的时间，这样，它就表现为价值增殖的限制，它同价值增殖的关系，和它同劳动时间的关系一样［它对价值增殖的限制程度，可以通过它对劳动时间的限制程度进行测算］。……流通时间既不属于价值的生产费用，也不属于资本的生产费用；但它却是使资本

的自行再生产变得困难的条件。①

为了突破流通的界限将剩余价值实现出来，资本就必须特殊化为具有不同形式和目的的单个资本，这些单个资本由于各自周转时间的不同而拥有不同的剩余价值率或利润率。与资本的二重化类似，生产资本为了实现剩余价值也要将自身二重化，转化为实现剩余价值的流通资本和否定流通的固定资本。运用二重化的分析方法，马克思首先区分了预付资本中的固定资本和流通资本：

> 资本的双重的和矛盾的条件……只有靠如下情况才能实现，即资本分为两部分，其中一部分**作为成品进行流通**，另一部分则**在生产过程中进行再生产**，这两部分彼此交替着：当其中一部分回到P阶段（生产过程）的时候，另一部分则离开这个阶段。②

固定资本和流通资本的区分后来构成了“资本周转”的主要内容。在相互竞争的作用下，单个资本的利润率会逐渐趋同，形成平均利润。最终会出现直接要求平均利润的信用资本，“资本的必然趋势是**没有流通时间的流通**”③；马克思将这种资本看成是资本的完成形态，“这种扬弃的最高形式，同时也就是资本在与它相适应的形式中的**最终确立**，就是股份资本”④。以资本的二重化为中介，马克思在“1857—1858年手稿”中已经对“资本的流通过程”进行过细致的论述。尽管“1857—1858年手稿”中的资本理论与后来的“资本一般”以及《资本论》有很大的不同，但“资本的流通过程”部分基本上没有明显的变化。因此，“1861—1863年手稿”中没有成型的“流通草稿”，可能是因为马克思认为“资本的流通过程”可以直接使用“1857—1858年手稿”中的相应部分。

其次，“资本的流通过程”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作用不如“资本一般”其他两节那么重要。从经济学批判的角度来看，“资本一般”的第一节“资本的生产过程”是对古典经济学的整体批评，而第三节“资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50-51. [] 内容为引者加。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53.

③ 同②51.

④ 同②50.

本和利润”则是对庸俗经济学的整体批评。参照马克思制订的提纲，“资本的生产过程”标题下有两个历史批判部分，分别是“剩余价值理论”和“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理论”；“资本和利润”标题下至少有四个历史批判部分，分别是“生产价格理论”、“地租理论”、“利润理论”和“庸俗经济学”。从马克思的写作计划就能够看出这两节内容在理论批判方面的重要性。而“资本的流通过程”的主要内容是单个资本的运行及其相互之间的竞争，是一个过渡性的章节。其中的经济学观点大多数都沿用了古典经济学家的成果，不同之处仅在于做了概念上的区分。排除了经济学批判的功能之后，“资本的流通过程”这一节就只剩下了逻辑的作用，写作难度相对是最小的。此外，在整理思路时，马克思往往会通过批判某一经济学家的具体理论来推进自己的理论工作，相对脱离于经济学批判之外的“资本的流通过程”自然无法在“1861—1863年手稿”中占有大量的篇幅。因此，“1861—1863年手稿”中没有成型的“流通草稿”，还可能是因为“资本的流通过程”的理论批判性并不突出。

最后，“流通草稿”的缺失，是因为这一部分明显与雇佣劳动制度无关。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评有着直接的现实指向，就是驳斥为雇佣劳动制度辩护的庸俗观点，从而揭示现代私法保护下的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在对雇佣劳动制度的批评中，最重要的是揭示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经济关系，而“资本的流通过程”主要叙述的是单个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即使是对资本家相互作用的论述，“资本和利润”一节中关于平均利润的内容也要更重要一些。在“资本一般”理论的整体逻辑结构中，平均利润的形成是导致经济学庸俗化的重要环节。在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形成之后，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都会将利润看作与一定量的货币直接相关的东西，因而也就无法发现利润（即剩余价值）所代表的不平等关系。在“资本的流通过程”中，单个资本家实际上只是作为商品的所有者进行对立，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对于单个资本之间的交换和竞争而言完全无关紧要。因此，“1861—1863年手稿”中没有成型的“流通草稿”，也可能是因为“资本的流通过程”没有体现资产阶级社会中具有根本意义的阶级对立。

2. “资本的流通过程”部分的手稿分布

“1861—1863年手稿”中“流通草稿”的短缺，只是说在“1861—

1863 年手稿”中没有“资本的流通过程”的成型草稿。作为狭义“资本一般”理论中的三个环节之一，关于“资本流通过程”的讨论渗透在“1861—1863 年手稿”的许多地方。“1861—1863 年手稿”中与“资本的流通过程”直接相关的手稿至少有三处。

表 10　　与“资本的流通过程”直接相关的手稿在“1861—1863 年手稿”中的分布状况表

	笔记本编号	页码范围	笔记本内容（目录）
流通草稿	第 XV 笔记本	901—902	资本的各种形式
		907—910	资本的流通过程转变为连续的生产过程 W—G—W′
生产草稿	第 VI—VII 笔记本	272—299	年利润和年工资怎样才能购买一年内生产的，除利润和工资外还包含不变资本的商品
	第 IX 笔记本	379—419	
整理稿	XV	891—944	生息资本。现存财富同生产运动的关系 生息资本和商业资本同产业资本的关系。更为古老的形式。派生的形式 生息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上的发展。高利贷。路德等等 庸俗经济学

第一处与“资本的流通过程”直接相关的手稿是第 XV 笔记本中的两个插入部分。马克思从第 XV 笔记本的 891 页开始中断了“生产草稿”的写作，转而开始整理“资本一般”理论的整体思路，并为此写了 50 多页手稿。生息资本是这次整理的核心研究对象，不过马克思在其间插入了与生息资本并不直接相关的两部分内容。第一个插入部分是“资本的各种形式”①，马克思在其中列举了五种资本形式，其中第五种资本形式就是“流通过程中的资本”，即为了实现剩余价值而一直处在流通中的资本。第二个插入部分是关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相关讨论②，马克思在其中讨论了单个资本的流通过程如何转变为社会总资本连续的再生产，流通资本完成的只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商品物质变换。这两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22-324.

② 同①335-339.

个插入部分讨论的内容是连贯的，是“1861—1863 年手稿”中为数不多的专门讨论“资本的流通过程”的手稿。与《资本论》第 2 卷比较，这两个部分已经包含了《资本论》第 2 卷中第一篇“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和第三篇“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的核心理论线索。

第二处与“资本的流通过程”直接相关的手稿是“生产草稿”中第 VI 笔记本末尾开始讨论的“年利润和年工资怎样才能购买……包含不变资本的商品”①，以及第 IX 笔记本中讨论的“收入和资本的交换”②。在“剩余价值理论”部分中评述斯密的经济学理论时，马克思提示了三个需要重点考察的问题③：

> (1) 亚·斯密把剩余价值和利润混淆起来；
> (2) 他关于生产劳动的观点；
> (3) 他如何把地租和利润变为**价值的源泉**……

这些问题的理论内容很显然已经超出了“资本的生产过程”的范围。在讨论第一个问题时，马克思指出了“生产草稿”可能会遇到的一个“困难”④。在“资本的生产过程”中，整个资本都可以或直接或间接地归结为工资和利润（即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那么在生产过程中消耗掉的不变资本应当由谁的收入来补偿呢？实际上，马克思正是因为无法解决不变资本的补偿问题才中断了“生产草稿”第一阶段的写作。为了解决这一困难，马克思在第 VI—VII 笔记本的第 272—299 页以及第 IV 笔记本的第 379—419 页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从理论内容上看，单个资本流通中固定资本的周转和社会总资本再生产中不变资本的补偿都属于“资本的流通过程”部分。在开始这部分写作之前，马克思也做了提示：“被拉姆赛双重地考察的东西……对于单个资本来说，是在分析**同时也是再生产过程的资本流通过程**时，甚至必须加以考察的两个观点”⑤，这两个观点分别是以产品补偿产品的全国再生产过程和以价值补偿价值的单个资本家的再生产过程。为了制定不变资本在流通中的补偿理论，马克思在独立笔记本上摘录和评述了魁奈的《经济表》。马克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85.
② 同①283.
③ 同①62-63.
④ 同①85.
⑤ 同①84.

思不同意斯密对《经济表》的贬低态度，认为魁奈的《经济表》“是一种尝试：把资本的整个生产过程表现为再生产过程，把流通表现为仅仅是这个再生产过程的形式”，并将这个尝试称为“政治经济学至今所提出的一切思想中最有天才的思想”①。这个思路也就是《资本论》第2卷的核心思路，因此可以推测马克思在评述魁奈的时候已经对“资本的流通过程”的逻辑内容有了规划。

第三处与“资本的流通过程”直接相关的手稿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一般”理论整体思路的整理稿。除了“资本一般”三节内容的草稿之外，马克思从1862年10月开始在第XV笔记本上还写了一个“资本一般”整体思路的整理稿（以下简称“整理稿”），这个“整理稿”中也包含了许多关于“资本流通过程”的内容。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其他两节的内容草稿中，马克思每一次对“资本一般”理论的整体叙述，都会提及“资本的流通过程”。因此，虽然“流通草稿”的成型程度很低，而且与其直接相关的内容也很零散，但文本的短缺却并不会影响对“资本的流通过程”逻辑结构的整体呈现。

3. “资本的流通过程”的辩证逻辑结构

“1861—1863年手稿”中没有出现“资本的流通过程”的成型提纲，因此对这部分内容的辩证逻辑结构需要根据马克思的零散叙述来整理。资本的流通过程叙述的是“资本同资本的交换”以及“资本同收入的交换”，内容包括“资本流通、资本的再生产过程、资本在这个再生产过程中采取的各种不同的形式、资本流通同一般流通的联系”等等。② 此外，马克思在第XIII笔记本提示了这一节与其他两节的逻辑关联③：

> （1）资本的单纯的（直接的）**生产过程**……就是剩余价值的占有，因而也是剩余价值的生产。但是……这里不仅谈不上再生产出来的价值的**实现**，也谈不上剩余价值的**实现**。
>
> （2）只有在本身同时就是**再生产过程**的**流通过程**中，这一点才能显露出来。……我们不仅要叙述资本如何进行生产，而且要叙述资本如何被生产出来。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15.

② 同①.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581-582.

> (3) 资本的总流通过程或总再生产过程是资本的生产阶段和资本的流通阶段的统一，是把上述两个过程作为自身的不同阶段来经历的过程。

因此，“资本的流通过程”展现的是剩余价值的实现过程，即“资本一般”规定的矛盾在流通中自我克服。综合“1861—1863 年手稿”中有限的直接草稿，并结合“1857—1858 年手稿”中的相关内容，可以大体上勾勒出“资本一般”第二节“资本的流通过程”的逻辑结构。

“资本的流通过程”的第一个逻辑环节是“各种形式的资本”。在这个环节中，生产资本必须要将产品重新投入流通才能将增殖了的价值转化为货币，并再次购买生产要素进行再生产。因此生产资本的单个生产周期体现为一个货币流通过程：

G—W′	过程中的 W′。结果：W	W—G′
流通的第一个行为	W′的消费，W 的生产过程	流通的第二个行为

G—W′——	过程中的 W′——	W—G′——	G′—W′——	过程中的 W′——	W—G″等等
流通的第一个行为	W 的生产过程	流通的第二个行为	流通的第三个行为	W 的生产过程	流通的第四个和最后的行为等等

产业资本家将商品实现为货币之后又会再次购买生产要素（W′）来进行生产，生产由此实现为一个连续的过程。资本的生产过程同时也就是货币的流通过程，“我们就可以把表现为过渡点或终点的任何一点当做起点”①；相应地，这个过程也可以看作商品资本或者货币资本的循环过程。从货币本身来看，各种形式的资本流通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先买后卖或为卖而买的简单重复。对于货币而言，各种资本形式只是名称不同；货币进入流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通过买卖而获得利润；货币在资本流通中被确定为商品资本还是货币资本“取决于资本在流通过程中……所处的阶段”②。然而，对于单个的资本家而言，资本的形式区分就有了具体的意义，“资本的流通过程”由此进入了第二个逻辑环节。

“资本的流通过程”的第二个逻辑环节是“单个资本的周转时间”。为了保证生产的持续进行，货币的拥有者总要让自己的货币分成几部分同时或交替着行使商品资本或货币资本的职能。对于单个资本而言，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37.

② 同①335.

种资本形式之间的差别就不再是无意义的了。资本家需要将有限的货币合理地分配在各个环节上，实现为相应形式的资本；否则资本的生产就可能会中断，货币也因此会丧失资本的属性。单个资本家的货币“表现为……特定职能所决定的资本”①，资本的不同流通形式会对单个资本施加现实的限制。在生产过程中，预付资本“一部分只表现为流动资本，另一部分表现为固定资本”②；资本的这两个部分拥有不同的周转速度，它们的比例会影响实现剩余价值所需要的时间。在流通过程中，单个资本会在两个方面受到流通的限制：一方面，剩余价值的生产取决于货币资本是否能够及时地从流通中获得劳动能力和劳动条件；另一方面，剩余价值的实现取决于商品资本是否能够顺利地在流通中转换为货币。这两个限制的解决需要以其他单个资本的流通为前提，而且即使单个资本在流通中克服了这两个限制，它也同样需要在流通中消耗一定的时间。无论在生产中还是在流通中，各种资本的形式差别变成了对单个资本的现实限制。资本的流通过程抹掉了资本和劳动之间直接对立的关系，剩余价值率不再仅仅取决于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比例，“在这里同时还决定于**资本的流通时间**，所以似乎还加进了一种与劳动时间不同的要素”③。单个资本因为周转和流通的时间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利润率，资本流通在总体上看就是许多单个资本的偶然并行和相互补偿。各单个资本的循环“互为前提、互为条件”④，因此由这些单个资本流通（G—W—G′）组成的资本总流通就成为一个自相矛盾的总体。不过，如果从产品生产的角度来看，资本流通的自相矛盾的性质恰恰正是产品再生产的一般规定，从而体现为“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也就是“资本的流通过程”的第三个逻辑环节。

“资本的流通过程”的第三个逻辑环节是“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从社会总产品的方面看，资本流通的内在矛盾就被消解了，各种流通关系和交换关系都“表现为这个再生产过程的要素”⑤。通过以货币作为出发点看待资本流通的循环过程，各种职能的资本获得了各自的形式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23.
② 同①.
③ 同①340.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392.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15.

规定，但流通本身却变成了自相矛盾的总体，这样的总体不具有自我更新的可能，而完全取决于一些偶然的前提。不过，资本流通的内在矛盾可以通过自身来克服。资本流通是一个循环过程，不仅可以从货币出发，也可以从产品或产品的生产出发。如果从产品 W 或者产品生产过程出发，那么资本的流通过程就体现为产品生产过程的不断更新①：

(a) 资本流通的一般形式

G—W′——	**过程中的 W′**——	W—G′——	G′—W′——	**过程中的 W′**——	W—G″等等
流通的第一个行为	W 的生产过程	流通的第二个行为	流通的第三个行为	W 的生产过程	流通的第四个和最后的行为等等

(b) 产品的再生产

W—G——	G—W′——	**过程中的 W′**——	W
流通的第一个行为	流通的第二个行为	W 的生产过程	（过程的结果。W 的再生产过程）

(c) 生产过程的不断更新

过程中的 W′——	W—G——	G—W′——	过程中的 W′
（W 的生产过程）	流通的第一个行为	流通的第二个行为	（生产过程的更新，因而这个过程表现为再生产过程）

从（b）和（c）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整个资本流通表现为商品形态的变化，“W—G—W′表现为再生产过程中的真正意义上的流通阶段”②，一件产品（W′）的消费过程同时也是另一件产品（W）的生产过程。在简单流通的各个逻辑环节中，生产和消费一直都处在流通过程之外。在“资本的生产过程”环节，生产作为价值增殖的手段被纳入流通，成为流通过程自我更新的中介。在“资本的流通过程”环节，消费也被纳入流通之中，“商品的消费本身作为生产消费……构成实际的商品形态变化的一个环节”③。因此，资本流通中货币的增殖只是一种表面的形式，资本流通的实际内容是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即产品的不断消费和不断生产。在社会再生产中，一种商品被资本 A 生产出来，并成为资本 B 生产的原料；而货币的作用就是以自身为中介将资本 A 的商品提供给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37.
② 同①338.
③ 同①338.

资本 B，并补偿资本 A，使其重新获得货币以进行再生产。货币的各种资本功能只是维持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中介和工具，它们所有规定的实现都有赖于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顺利进行。

因此，单个资本家相互的竞争行为实际成为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工具，“各单个资本之间的相互作用，恰恰导致它们必须作为**资本**来行事”①，“作为社会总资本的一定部分相互发生关系”②。此时，剩余价值的量就不仅取决于“资本的生产过程”中剩余劳动和可变资本的比例，而且还要取决于“资本流通过程”中社会再生产所需要的时间，包括③：

（1）G 转化为 W′即 G—W′的速度；

（2）生产过程即过程中的 W′的持续时间；

（3）形态变化 W—G—W′的速度。

“流通时间表现为这样一种时间，在这种时间内［VI－33］资本再生产其自身从而再生产剩余价值的能力消失了”；“因此，资本的生产率——即资本创造剩余价值——与流通时间成反比，如果流通时间减少到零，资本的生产率就会达到最大限度”④。现实的资本（即作为资本的货币）要在流通中实现增殖，就必须将生产和消费都变成资本流通的手段和工具，从而获得自我更新的力量。只有在社会总资本不断增殖的情况下，单个资本的流通才是现实的。资本必然是“资本生产过程”和“资本流通过程”的统一，资本利润的实现也注定同时包含着“生产”和“流通”两方面的因素。狭义“资本一般”理论的逻辑演绎由此进入了最后一个环节——“资本和利润”或“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

三、资本和利润的形成

“资本和利润”是狭义“资本一般”理论的最后一节，是资本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在前面的各个逻辑环节中，“资本一般”理论的大部分内在矛盾都已经得到展开和解决。从广义“资本一般”理论来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2 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50.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2 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85.

③ 同②339.

④ 同①.

看，在“商品章”，马克思指出商品的二重性只是一种抽象形式，其代表的实际内容是简单流通，即商品（特殊劳动时间）与货币（一般劳动时间）的交换；在“货币章”，马克思指出简单流通也只是一种抽象的形式，其实际代表的内容是资本的流通，即货币在流通中的增殖；在“资本的流通过程”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资本流通同样是一种抽象的形式，它代表的实际内容是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从狭义“资本一般”理论来看，“资本的生产过程”解决了剩余价值的来源问题，即资本家回收的价值多于他支出的价值；“资本的流通过程”解决了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即“不同资本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在总再生产过程中互相补偿、支付和实现的方式方法”①。对于“资本一般”理论而言，现在只剩下一个最后一个未解决的困难：资本家的预付资本转化为各个阶级的收入，但新增的价值（预付资本的利润）由谁来支付？或者说纯形式的剩余价值如何再次转化为现实的货币？在“资本和利润”环节，马克思解决了这一困难，“资本一般”回到了自己的逻辑起点，成为现实的可以增殖的货币，标志着“资本一般”理论的最终完成。在上述矛盾解决之后，马克思也就完成了对价值自在自为性质的说明。资本成为资本的前提是雇佣劳动，而资本生产的结果是生产资料的集中，生产资料集中的结果是雇佣劳动制度，雇佣劳动制度的结果是资本生产的不断进行。因此，资本既是自己的前提也是自己的结果，表现为资本的价值是自在自为的，商品和货币形式的价值只不过是资本的特殊表现形式；相应地，关于商品和货币的规律都是虚假的表象，只有资本的规律才是真实发挥作用的规律。“资本和利润”的草稿（以下简称“利润草稿”）占据了“1861—1863 年手稿”中很大的篇幅，这一节的成型程度虽然远不及“资本的生产过程”，但是大部分内容都已经有了初步的草稿。

1. “利润草稿”的两次整理

“利润草稿”写在第 XV—XVIII 笔记本第 944—1084 页上，主要是在 1861 年 12 月—1862 年 12 月完成的，以 1862 年 10 月为界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创作阶段。根据手稿的纸张和标记推测，马克思本来打算同时写第三节“资本和利润”以及第一节“资本的生产过程”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21.

付排稿。第三节的初始付排稿写在两个单独的笔记本上，编号分别是“最终笔记本 I”和“最终笔记本 II”。马克思在 1862 年 10 月中断了“最终笔记本 II”的写作，并将这两个笔记本编入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系列笔记本，编号分别为 XVI 和 XVII。第 XVI 和 XVII 两个笔记本是第三节的直接手稿，但是这一部分手稿的成熟程度无法与第一节相比。从 1862 年 10 月开始，马克思再次在第 XV—XVIII 笔记本中不断地完善第三节的内容，并在第 XVIII 笔记本中提出了“资本和利润”的新提纲。

“利润草稿”的第一个创作阶段是 1861 年 12 月—1862 年 10 月写的最终笔记本 I 和 II，即后来的第 XVI 笔记本和第 XVII 笔记本的前 7 页。从最终笔记本 I 上标记的日期“12 月”来看，“利润草稿”和“生产草稿”几乎是同时开始写的。最终笔记本 I 共 49 页，马克思在这个笔记本的封面上制订了“资本和利润”的提纲①，并在前 20 页粗略地整理了七个小标题的内容。这次整理的成型程度并不高，标题的名称十分随意，各个小标题下的内容篇幅长短不一，有些篇章甚至只提示了几句话。② 在讨论完“利润率下降的一般规律”③ 后，马克思就停下了付排稿的整理工作，转而在笔记本后面的空白页上进行了庞杂的增补，增补的内容大多与“生产手稿”相关，提示了这两节之间理论问题的关联。最终笔记本 I 用完之后，马克思在 1862 年 1 月又单设了最终笔记本 II 继续进行内容的增补。④ 这个笔记本只写了 7 页就中断了，马克思对“资本和利润”的第一次整理至此结束。马克思草草结束第一次整理，反映出了“资本一般”理论此时所遇到的逻辑困境。在“1861—1863 年手稿”创作初期，马克思有两个理论问题还没有解决，一个是不变资本在流通中如何补偿的问题，另一个是平均利润理论中地租的问题。最终笔记本 I 和 II 中的增补内容绝大部分都与这两个问题相关。后来在写作“剩余价值理论”时，马克思通过批判斯密和李嘉图解决了上述两个问题，进而才重新开始整理“资本和利润”的逻辑结构，进入“利润草稿”的第二个创作阶段。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5-6.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17-418.

③ 同②450.

④ 同②503.

表 11　“资本和利润”草稿在“1861—1863 年手稿”中的分布状况表

	笔记本编号	页码范围	笔记本目录
第一次整理	第 XVI—XVII 笔记本	973—1028	(1) 剩余价值和利润 (2) 利润所表现的价值总是小得多 (3) 比例在数字上和形式上发生了变化 (4) 同一剩余价值可以表现为极其不同的利润率；同一利润率可以表现为极其不同的剩余价值 (5) 剩余价值与利润之比＝可变资本与总资本之比 (6) 生产费用 (7) 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利润率下降的一般规律 其他
第二次整理	第 XV 笔记本	944—973	庸俗经济学 商业资本。货币经营资本 插入部分（I）。资本流通中货币的回流运动。（再生产过程）
	第 XVII—XVIII 笔记本	1029—1084	插入部分（II）。单个资本的绝对量的增加，或生产规模的增大

“利润草稿”的第二个创作阶段是 1862 年 10 月—12 月写的几个笔记本。马克思在批判李嘉图的地租理论时就产生了结束“第二分册”的想法，表明他自认为对“资本一般”理论的思考已经基本成熟。在第 XV 笔记本的第 491 页，马克思中断了“剩余价值理论”的写作，转而以“生息资本”为中心系统地整理了“资本一般”理论的全部理论内容。① 第 XV 笔记本从第 944 页开始就是对“资本和利润”部分的再次整理，即“利润草稿”的第二次整理。这次关于“利润草稿”的整理完成了两个主要标题：一个是“商业资本。货币经营资本”，草稿写在第 XV 笔记本第 944—973 页、第 XVII 笔记本第 1029—1038 页和第 XVIII 笔记本第 1075—1084 页，共 50 页；另一个标题是“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货币回流运动”，草稿写在第 XVII—XVIII 笔记本第 1038—1074 页，共 37 页。这两个标题分别是“资本一般”第三提纲中“资本和利润”的第 8、第 10 个小标题；此外，“资本和利润”的第 9 个小标题“收入及其源泉”和第 11 个小标题“庸俗经济学”在第 XV 笔记本的系统整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02-410.

理中也有过专门的讨论。因此，“利润草稿”的第二次整理可以说已经几乎完成了“资本和利润”部分的全部理论内容。完成“利润草稿”的整理之后，马克思再次回到“剩余价值理论”的写作，在第 XVIII 笔记本余下的空白页上继续写“生产草稿”的后续内容。

2. “资本和利润”部分的逻辑结构

“资本和利润”是狭义“资本一般”理论的第三节，也是最后一节。在说明资本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时，货币只是被当作“价值表现”和“计算货币”①，被当作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手段和中介。狭义“资本一般”理论的前两节只是关于货币（资本）的形式分析；直到“资本和利润”环节，货币才恢复了它作为货币的身份，作为现实的货币（金）来体现自身。在“资本和利润”中，资本和利润都是现实的货币，而不再只是形式上代表价值量的象征。作为“资本一般”理论的最终环节，“资本和利润”是对现实中经济表象的彻底说明。在“资本一般”理论全部的辩证环节中，马克思从经济的表象（商品）出发，经过复杂而严谨的逻辑推演终于再次回到了对经济表象的解释。“资本和利润”可以区分为三个前后相继的逻辑环节：“生产价格的形成”、“生产价格转化为各种收入形式”和“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中货币的回流运动”。只有“资本和利润”环节的资本才是现实的资本，这里展现的资本运动才是资本的实际运动，即“以发达的、从自身开始并以自身为前提的资本主义生产为基础的实际运动”②。

“资本和利润”的第一个逻辑环节是“生产价格的形成”，包括三个部分：“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和“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在这个逻辑环节中，产品价值的各种形式规定转化为现实的价格。以价格为中介，产品以及凝结在产品中的剩余价值才能进一步转化为现实的货币。

“生产价格的形成”的第一部分是“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单纯从数量上看，剩余价值和利润实质上是同一种东西，利润的实体就是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和利润的差别“不过是按不同的方法**计算**”③，剩余价值按照可变资本来计算，而利润根据全部预付资本来计算。然而，如果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21.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582.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08.

从形式上看，“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不仅改变了数字的比例……而且也改变了形式本身”①。从剩余价值的形式上，可以明显地表现出来“预付资本不同部分之间的有机关系”②，可以看出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不同功能及其比例的变化趋势。一旦剩余价值被当作利润来看待，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差别就消失了，资本和利润的关系变成了货币与其自身单纯的数量比较：“资本是基本额，利润是这个基本额在一定的流通时间内产生出来的追加额”③。资本家不会从剩余价值的角度来看待资本，而只会从利润的角度看待资本。从利润的角度来看，利润表现为全部预付资本的产物，看起来像是预付资本的各个组成部分按照其数量所占比例获得相应的平均利润量，“利润使这全部资本的各个部分均等起来”④。这种利润的平均化不仅发生在单个资本家身上，而且也发生在社会总资本的生产过程中，由此便转入“生产价格的形成”的第二部分。

“生产价格的形成”的第二部分是“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在“利润草稿”中，马克思把平均利润又称为“经验形态上的利润”⑤ 或“经验利润”⑥，因为平均利润才是人们日常经验中所普遍接受的利润概念。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货币在作为资本进行支付时，资本家的头脑中会事先预期一个特定的利润率或利润量，这个利润量就是平均利润。从“资本一般”理论来看，平均利润是一种假象，“这个**假象**使资本家……确认，资本是一个与劳动**无关的**收入源泉”⑦。因此，在资本家的竞争中，一切规律都以颠倒的形式出现。单个特殊资本的利润不是由它支配的无酬劳动直接提供，而是先在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中变成总利润，然后再按照投入资本的数量平均分配给单个资本家；平均利润是全体资本家对“总剩余价值”的再分配，单个资本家根据支出的货币量获得利润，“等量的资本得到相等的利润，或者说，不等量的资本得到不等的利润”⑧。在总剩余价值的分配中，单个资本家创造的利润量是无关紧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40.
② 同①441.
③ 同①441.
④ 同①445.
⑤ 同①441.
⑥ 同①444.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73.
⑧ 同①444.

要的，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被进一步遮蔽了；在这种情况下，“计算总剩余价值分摊到各个独立资本上的份额时，不考虑资本同这个总剩余价值的生产在职能上的关系，而只是按照资本的量来计算”①。平均利润只与预付资本的货币量有关，而预付资本由哪些部分构成对于利润的计算毫无意义。随着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利润和剩余价值之间的形式差别变成了本质的差别，而且也会导致“商品的价格和价值之间的本质差别”②，由此便过渡到了“生产价格的形成”的第三部分。

“生产价格的形成”的第三部分是“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根据资本生产过程的形式规定，产品的价值由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三部分组成；其中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合起来就是资本家支付的预付资本，因此也可以说产品的价值＝预付资本＋剩余价值。然而产品价值或剩余价值无法直接将自身实现出来，产品价值的实现过程必然还要经历剩余价值向平均利润的转化。在现实的资本生产中，资本家不会去计算剩余价值的量，而是根据平均利润（经验利润）率来制定产品的价格，从而“按照这种生产费用的比例把同一产品量（指资本的产品即利润——引者注）……算归自己”③。从数量上看，按生产价格实现的利润肯定要低于产品本身包含的剩余价值。不过，生产价格的制定并不是资本家的自由行动，恰恰相反，生产价格是“作为某种已经形成的东西强加于资本家”④ 的。产品按照生产价格出售之后，资本家才真正地将剩余价值实现为货币，尽管这些货币与剩余价值生产的关系已经完全看不出来了。

“资本和利润”的第二个逻辑环节是“生产价格转化为各种收入形式”，包括三个部分：“商人资本”、“货币资本”和“收入及其源泉”。在这个环节中，资本生产所实现的利润进一步转化为各个社会阶层的收入。

“生产价格转化为各种收入形式”的第一部分是“商人资本”。“商人资本”是从流通的角度来理解利润，将利润看作商品的贱买贵卖，因而总是与“普遍欺诈这个含糊的观念联系在一起”⑤。从“商人资本”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2 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47.
② 同①.
③ 同①449.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2 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7.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2 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03.

的角度来看，流通中的利润来自商人对产业资本家或消费者的欺诈，相似地，资本生产的利润则来自对工人的欺诈。这种观点虽然是在用社会关系而不是用物来解释利润，但没有认识到剩余价值的性质。“商人资本”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资本形式，即通过进价和售价的差额实现货币量的增加。“商人资本”是一种派生的第二性的资本，在资产阶级社会形成之前，“商人资本”的利润主要来自流通之外，依附于其他的社会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形式下，“商人资本”的利润来自产业资本家利润的让渡，“商人资本”的形式才真正普遍化了。

“生产价格转化为各种收入形式”的第二部分是“货币资本”。“货币资本”即“生息资本”是直接从货币出发来解释利润的资本形式，这是资本的完成形式。由于单个资本和社会总资本的生产都需要以货币作为中介，货币本身也获得了新的一般性的使用价值：货币不仅可以换取满足直接需要的商品，而且还可以用来组织生产。产业资本家通过借贷获得货币来组织生产并实现利润，而借贷资本家根据平均利润（经验利润）的水平向产业资本家收取利息，利润从而进一步分解为产业利润和利息。马克思在“1861—1863 年手稿”中没有说明利润分割为产业利息和利润的比例，因为这个问题属于“资本的现实运动……而我们这里涉及的是资本的一般形式”①。在生息资本的形式上，货币可以在一定期间提供一定的利润，“资本作为利息的神秘的、自行创造的源泉……达到了完善的程度”②。生息资本直接表现了资本的一般性规定，即可以带来利润的货币，是“自动的物神”；它代表了资本的纯形式的规定性，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却又“没有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作中介”③。由于中介被抽象掉了，产生利润似乎成为资本的自然属性，资本因此表现为一种特殊的物，“物现在表现为资本，资本也表现为单纯的物，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全部结果则表现为物所固有的一种属性”④。随着利润成为资本的自然产物，地租也就表现为土地的自然产物，而工资则表现为劳动的自然产物，由此便过渡到下一部分“收入及其源泉”。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24.

② 同①304.

③ 同①304.

④ 同①305.

“生产价格转化为各种收入形式”的第三部分是“收入及其源泉”。马克思认为，“收入的形式和收入的源泉以**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表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①。在关于收入形式及其源泉的庸俗观点中，土地是地租的源泉，资本是利息的源泉，劳动是工资的源泉；相应地，地租、利息和工资分别是土地、资本和劳动的价格，产业资本家通过购买这些生产要素来从事生产。马克思称这种观点是“一种没有想象力的虚构方式”，是“庸人的宗教”②。根据“资本一般”理论的逻辑环节，地租、利润和工资都来自剩余价值的生产，各种收入都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在现实中，地主、借贷资本家和劳动者的收入都来自产业资本家的货币支付。为了消费或者再生产，地主、借贷资本家和工人将再次将货币投入流通，于是就过渡到了下一个逻辑环节“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中货币的回流运动”。

“资本和利润”中的第三个逻辑环节是“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中货币的回流运动”。“货币的回流运动”的手稿分两部分写在第XVII—XVIII笔记本上，马克思没有为这部分手稿拟订小标题。不过根据马克思的叙述结构可以推测出这部分手稿的内容：增殖之后的价值需要更多的货币（金），而流通过程只能实现价值的增殖却无法实现货币量的增加，因此资本的总生产需要再次将自身二重化。根据“1861—1863年手稿”的相关篇章，“货币的回流运动”大体上也可以分为三部分。

“货币的回流运动”的第一部分是“资本家、小店主和工人之间的流通”③。资本家、小店主和工人之间的流通是资本主义流通的抽象模型。在这种流通中，资本家用货币购买劳动能力，从而将货币转化为工人的工资；工人用工资向小店主购买生活资料，从而将工资转化为小店主的收入；小店主用收入从资本家那里进货，从而完成了货币的回流。在这个流通模型中，工人的收入（工资）来自资本家的预付，小店主的收入来自进价与售价的差额，而资本家的收入（利润）则是工资和产品售价的差额。从价值方面分析，这个流通过程就是资本生产的总过程的简单形式；然而，如果从通货方面分析，这个流通过程就是无法进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02.
② 同①.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99.

的，因为在这个流通过程中资本家手中的货币只会越来越少而不会增多，他“不得不通过另外的途径去获得”① 这一部分损失的货币。在现实的货币流通中，资本家的货币量不仅不会增加，反而会越来越少。现实资本流通与资本的一般规定性之间矛盾的展开，构成了“货币的回流运动”的第二部分。

“货币的回流运动”的第二部分是“**余额怎样实现为货币**”②。资本生产的剩余价值（即新增价值）要实现为货币，就意味着流通中需要投入新的货币。作为简单的货币回流运动，工人和地主会将他们的收入重新投入流通。然而，地主和工人的收入都来自资本家的支付，地租和工资再次投入流通并不会增加流通中货币的总量。因此，流通中的货币仍然全部来自资本家的预付，“不管在生产过程中价值如何增大，增大的总是最初由货币所代表的价值，而这种价值增大则绝对不会改变货币的量”③。由货币数量造成的困难将在“货币的回流运动”的第三部分得到解决。

“货币的回流运动”的第三部分是“以货币形式存在的剩余价值……怎样能再转化为**生产资本**”④，也就是“成为这个增大的价值的**现实货币表现**的那些通货应当从哪里取得”⑤。马克思认为，有一个特殊的生产部门将解决这一问题，这种特殊的生产就是金的生产。资本的总产品可以分为三个组成部分：（1）再生产不变资本的部分；（2）补偿可变资本的部分；（3）代表剩余价值的第三个部分。相应地，具有生产功能的资本也可以区分为三类：

> 第 I 类，生产生活资料；
>
> 第 II 类，为这些生活资料［的生产］生产不变资本和为这种不变资本［的生产］生产不变资本；
>
> 第 III 类——商业资本和货币资本，只是为前两类之间的运动起中介作用。

对于相应的三类资本家而言，剩余价值必须以流通或交换为中介才能实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03.
② 同①121.
③ 同①121-122.
④ 同①177.
⑤ 同①143.

现为货币。但金的生产者与上述资本家不同，“就全社会来说，金生产者的总产品不过是**剩余价值或剩余劳动的化身**”①。产业资本家的产品是生活资料或劳动资料，这些产品需要实现为货币才能继续进行产品的再生产；而金的生产者的产品是货币，这些货币需要换成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才能继续进行金的再生产。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总过程就可以区分为两类总产品的相互补偿，一类是生产资本的总产品，另一类是金生产者的总产品。在两者的交换或流通中，一方面，剩余价值被实现为现实的货币；另一方面，各方的再生产得以顺利实现。

3. 对《资本论》未完成内容的推测

“资本和利润”是“资本一般”理论的收尾环节。写完“利润草稿”之后，马克思又专门拟订了新的写作提纲详目，标志着“资本一般”理论的最终完成。除了历史批判的部分以外，“资本一般”的新写作提纲与后来的《资本论》有着极高的重合度。众所周知，《资本论》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结合“资本一般”理论的逻辑结构和新的写作提纲，可以大致推测出《资本论》未完成的内容。

在完成了“利润草稿”之后，马克思 1862 年底重新整理提纲时将广义“资本一般”理论中的“商品章”和“货币章”压缩成了一个小标题，作为狭义“资本一般”理论的导言②，从而形成了《资本论》的最初写作计划。结合“1861—1863 年手稿”的内容和这个写作计划，可以大体上推测出《资本论》的整体理论结构，进而推测出《资本论》未完成部分的理论内容。

恩格斯对《资本论》第 3 卷的整理停在“第七篇 各种收入及其源泉”③，而且这一篇的整理实际上也没有完成。“收入及其源泉”在“1861—1863 年手稿”中是“资本和利润”的第 9 个小标题，之后还有三个标题，分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中货币的回流运动”、“庸俗经济学”和“结论。《资本和雇佣劳动》”。其中，“庸俗经济学”是理论评论的部分，可以排除在《资本论》三卷结构之外；因此，《资本论》未完成的部分至少还要包括三个标题的内容：

第七篇　收入及其源泉（续）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76.

② 同①313.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921.

第八篇　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中货币的回流运动
第九篇　结论。《资本和雇佣劳动》

这三个标题中的前两个在“1861—1863 年手稿”中都有专门的草稿，并在马克思的“资本一般”理论中占据着重要的理论地位。缺少了这几部分，不仅《资本论》本身是不完整的，而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也是不完整的。

《资本论》缺失的两篇内容标志着狭义“资本一般”理论的最终完成。对于从货币出发的狭义“资本一般”理论而言，从货币一般规定出发的辩证逻辑演绎在“资本和利润”的最终章节又回到了货币本身，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也表现为货币不断增加的过程。狭义“资本一般”的逻辑起点是货币，货币进入流通的唯一目的就是实现增殖，但货币在简单流通中并不具备实现增殖的可能，这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第一个矛盾。货币通过与劳动交换克服了这个矛盾，从而成为生产资本，但同时又遇到了新的矛盾，即要实现新增的剩余价值就需要“在流通中找到等价物”①。生产资本将自身二重化为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进入流通，从而克服了货币转化为资本的第二个矛盾，在资本总的再生产中实现了各个资本使用价值和价值的补偿。不过，由此也产生了货币成为资本的最后一个矛盾：资本流通中的货币量完全来自预付资本，因此新增的价值量无法转化为现实的货币。为了克服这一矛盾，生产资本将自身二重化为从事商品生产的资本和从事金生产的资本，两类资本的交换也就是新增货币的实现过程。“资本一般形式”所产生的矛盾在最后这个环节才得到了真正的克服，货币才真正地转化成为资本。

《资本论》缺失的两篇内容同样标志着广义“资本一般”理论的最终完成。狭义“资本一般”理论（即“资本章”）是广义“资本一般”理论的最后一个逻辑环节，是对商品概念内在矛盾的完全克服。广义“资本一般”理论的第一个逻辑环节是“商品一般”，商品的抽象概念——“商品一般”——表现为“对象化在一种特殊使用价值中的一般劳动时间”② 这样一种自相矛盾的表述。通过将自身二重化为商品和货币的对立，商品克服了这一矛盾并进入简单流通，也就是广义“资本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21.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41.

般”理论的第二个逻辑环节“货币或简单流通”。简单流通既是商品流通也是货币流通，但现实的商品和货币都只有通过否定（退出）流通才能实现自己的规定，这就是简单流通的内在矛盾。商品退出流通之后就被当作使用价值消费掉了，实现了它满足个人需要的自然属性；而作为一般劳动的化身，货币退出流通之后就丧失了自身的全部规定性。因此，简单流通的内在矛盾同样可以表述为货币追求增殖与流通等价原则的矛盾。通过将自身二重化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货币转化为生产资本并解决了简单流通的内在矛盾，从而进入了广义“资本一般”理论的第三个逻辑环节（即狭义“资本一般”理论）。对于从商品开始的广义“资本一般”理论而言，商品二重性所导致的矛盾在“资本和利润”部分才被完全克服，商品才有可能成为现实中最普遍的物。

由于缺少了“1861—1863 年手稿”中这两个标题下的理论内容，《资本论》内在的理论线索（即“资本一般”理论）无法体现自身，从而给《资本论》的理论解读制造了巨大的困难。在《资本论》发行的三卷结构中，只能看到马克思对于各个具体问题的意见，而看不出这些意见背后的逻辑结构和哲学基础，因此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观点来猜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背后的哲学立场。从“资本一般”理论的视角来看，《资本论》三卷分别对应了“资本一般”的三个逻辑环节，《资本论》的结构本身就代表了马克思批判政治经济学时所获得的新观点和新方法。

第三节　基于“资本一般”的经济理论史评述

马克思在写作“1861—1863 年手稿”时延续了“第一分册”独特的双轨制文本结构，一部分文本正面进行“资本一般”的逻辑叙述，另一部分文本则对相关的政治经济学观点进行评述。“1861—1863 年手稿”因此明显可以区分为两个部分：第 I—V、XVI—XVII、XIX—XXIII 笔记本的内容是对“资本一般”理论的正面阐述，而第 VI—XV、XVIII 笔记本的内容是对经济学理论的评述，标题为“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以“剩余价值理论”为题系统地摘录了斯密和李嘉图的代表作以及当时与经济学相关的一系列热门著作，内容大大超出了“剩余价值理论”的范围。1863 年底重新整理“资本一般”的提纲时，马克思对

“剩余价值理论”标题下的内容进行了细化、拆分，共分为“剩余价值理论”、“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斯密和李嘉图关于利润和生产价格的理论”、“地租（价值和生产价格的区别问题）”、“所谓李嘉图地租规律的历史”、“利润理论”和“庸俗经济学”七个部分。前两个标题是“资本的生产过程”部分的理论史评论，后五个标题是“资本和利润”部分的理论史评论。由于马克思所运用的辩证方法具有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逻辑性，“资本一般”理论三个环节之间的观点往往具有本质的差别，因此分属于不同章节的理论史部分应当被区分开来分别考察。

一、关于价值理论的评述部分

在“资本一般”的整体逻辑框架中，作为插入性的历史批判章节，“剩余价值理论”部分主要是为了展示如何“纯粹地就剩余价值本身……来考察剩余价值”①，也就是单纯从形式的方面解释剩余价值的性质。在讨论斯密的经济理论时，马克思提示了三个需要考察的问题：“（1）亚·斯密把剩余价值和利润混淆起来；（2）他关于生产劳动的观点；（3）他如何把地租和利润变为**价值的源泉**”②。其中后两个问题明显已经超出了“剩余价值理论”的范围，事实上马克思后来也把第（2）个问题单列出来作为与“剩余价值理论”并列的历史批判章节，并将第（3）个问题作为“资本和利润”的历史批判章节。③ 归结起来，马克思在“资本的生产过程”部分打算写两个历史评述，分别是“剩余价值理论”和“生产劳动理论”。

价值理论的评述，主要批评的是这样一种倾向，即从各种现成的经济现象上来抽象价值，而不是从抽象价值的规定上来演绎价值的具体规定。在19世纪，经济学理论对资产阶级社会中经济关系的抽象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只存在于现代社会之中的资本，另一种是存在于一切社会形式中的价值；而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就是从价值理论出发解释资本的形成原理。由于资本是一种既成的现象，经济学内部的争论就主要集中在关于价值概念的界定方面。在价值理论上，政治经济学家就表现出了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7.

② 同①62-63.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312-313.

其方法论的共同缺陷：他们都把价值当作了一种客观存在的属性来进行研究，而没有考虑到价值本来只是人的一种观念，价值的客观性本身才是需要被说明的东西。马克思指出，价值本身是一种观念，而不是物本身具有的自然属性，通过对物的考察无法理解价值的真实含义；从具体到抽象的还原论方法无法认识价值的规定性，对价值的科学理解只有运用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逻辑方法才能实现。

马克思指出，对价值的研究应当从价值最抽象的规定出发，而不是从资产阶级社会中具体的经济事实出发。在“1861—1863 年手稿”中，马克思多次批评经济学不是从纯形式的方面考察剩余价值，而是在剩余价值的各种具体形式上（利润、利息和地租）来理解剩余价值。在“资本一般”理论中，剩余价值的全部规定都来自价值概念的形式演绎，而不是直接现实的唯物分析。通过“资本一般”理论的逻辑演绎，马克思揭示了价值或者货币量的增长只是一种假象，资本生产实现的真正结果是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降低，个人追逐私利的行动不自觉地完成了这一目标。相应地，资本生产的自觉目标（货币增殖）和不自觉的结果（成本下降）之间的不一致就构成了对经济危机根源的逻辑剖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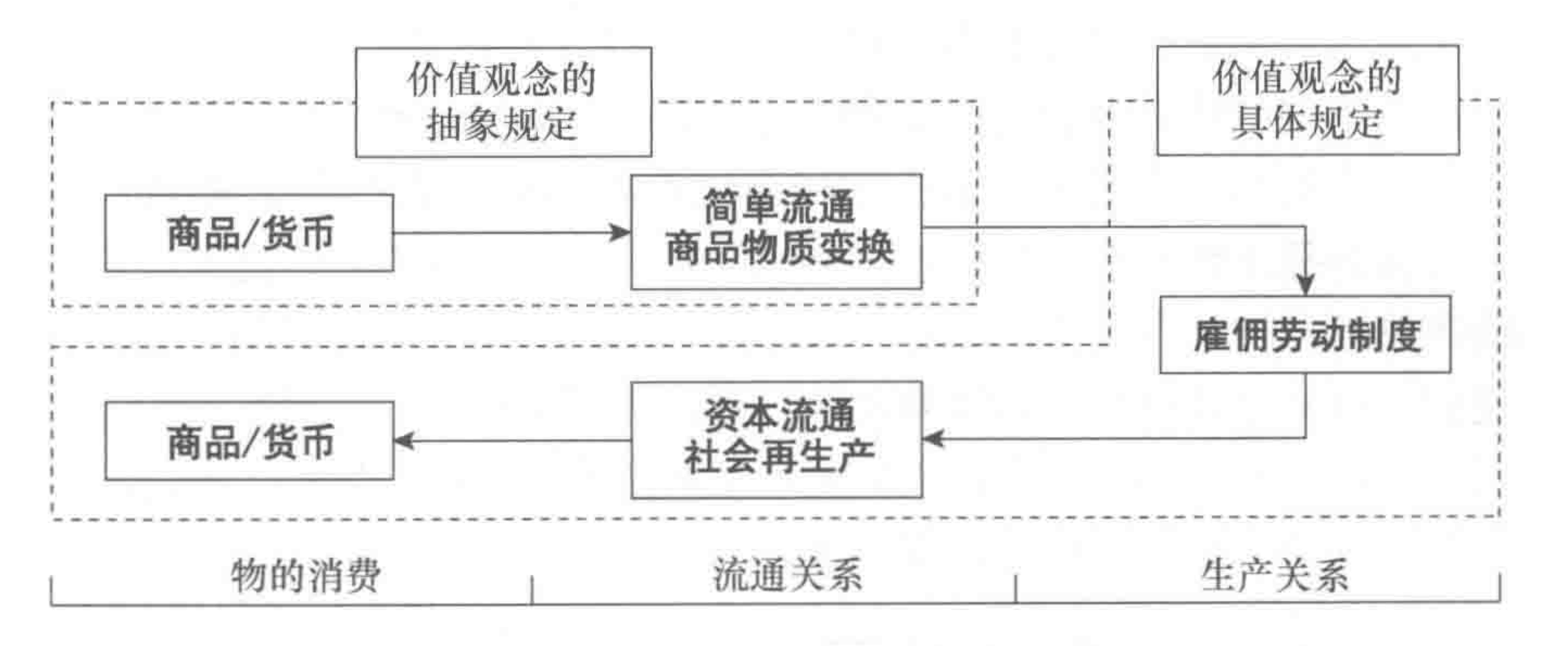

图 8　广义“资本一般”理论的辩证逻辑结构

经济学这种方法上的缺陷，就导致了经济学中关于生产劳动的庸俗争论，即“资本的生产过程”的第二个历史评述部分。生产劳动实际上就是创造价值的劳动，不同的经济学流派从经济事实中抽象出了不同的价值定义，于是就产生了不同的生产劳动定义。如果根据商品和货币来抽象，那么价值就是直接与使用价值纠缠在一起的“一般劳动时间”或

“对象化了的劳动时间”，那么创造价值的劳动就只能是工人的生产劳动。而如果根据资本生产和货币来抽象，那么价值就是增长的货币量，那么创造价值的劳动就是资本家组织生产的经营活动。如果根据一切自然物来抽象，那么价值就是使用价值，所有有用的东西都具有价值，所有产生作用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上述几种抽象都可以从经济现象的分析中得到论证，因此彼此间的争论不可能有结果。通过“资本一般”的逻辑叙述，马克思证明，经济学中关于价值的抽象都符合价值的规定，都能在价值概念的自我演绎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然而，价值概念在“资本一般”理论中的规定有“抽象”和“具体”之分，其中，只有价值的“具体规定”才构成了价值观念客观化的历史前提，而价值的“抽象规定”只是一种主观的想象。在“资本一般”理论中，马克思证明了雇佣劳动是价值通过自身运动而产生新价值的唯一可能，并在此基础上评述了关于生产劳动的经济学争论。

通过关于价值理论的历史评述，马克思证明了所有的价值形式只有采用了资本的形式之后才是现实的。“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货币（商品）自在地是资本（正像**劳动能力**自在地是劳动一样），因为，1. 货币可以转化为各种生产条件，并且实际上也只是这些生产条件的抽象表现，是它们作为**价值**的存在；2. 财富的对象的要素自在地具有成为资本的属性，因为这些要素的对立面——雇佣劳动，也就是使这些要素变为资本的东西——是作为社会生产的基础存在的”①。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形式中，价值才可能成为真正普遍的抽象，因此关于价值的争论不可能超出资产阶级社会的界限。资本生产和雇佣劳动制度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形式的本质理解，通过雇佣劳动工人，资本家的货币量才可能实现增加。工人的无偿劳动是剩余价值的唯一来源，工人所进行的雇佣劳动是生产劳动的唯一形式。

二、关于利润理论的评述部分

在“资本和利润”部分，马克思共列了五个历史评述部分，分别是“斯密和李嘉图关于利润和生产价格的理论”、“地租（价值和生产价格的区别问题）”、“所谓李嘉图地租规律的历史”、“利润理论”和“庸俗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25.

经济学”。马克思关于上述理论问题的评述混杂在题为“剩余价值理论”的内容之中，大部分没有单独的成型手稿。不过根据“资本一般”理论的逻辑结构，很容易就可以对它们做出逻辑的区分：关于剩余价值理论的评述部分讨论的是作为价值的财富从哪里来，或者说新增财富是由那些因素创造的；而利润理论讨论的问题就变得更加具体，即每个阶级的收入的货币从哪里来，或由谁来支付。根据马克思的叙述，关于利润的历史评述也可以分为两个论题，一个是关于生产价格理论的评述，另一个是关于地租理论的评述。

生产价格理论的经济学争论实际上是在讨论资本家的收入（即利润）从何而来。这个问题看起来与“剩余价值理论”重复了，但“剩余价值”和“利润”有着本质的差别。剩余价值只是通过价值概念辩证演绎过程展现了价值自我增殖的目的如何实现，但是现实中资本家的收入体现为真实存在的货币，而不是抽象存在的价值。资本家在资本生产中获得了现实的货币收入，而且这些货币收入显然不是由工人直接支付给资本家的。马克思通过“资本一般”理论证明了，所有阶级的货币收入，例如工人的工资、地主的地租和资本家的利润，都来自产业资本家的预付资本，也就是说产业资本家预付的货币提供了所有阶级的货币收入。那么矛盾在这里就产生了，产业资本家在经济活动中也获得了收入，体现为生产价格中高于生产成本的利润。如果各阶级的收入都来自产业资本家预付的货币，那么体现产业资本家利润的新增货币量从哪里来呢？剩余价值只是观念上的增殖，并不能提供现实的货币。马克思在“1861—1863 年手稿”第 XVIII 笔记本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解决，资本生产将自身二重化为产业资本生产和金的资本生产，两种资本生产的相互交换就解决了货币来源的困难，价值的抽象性在此时完全得到了自我克服，从而将自身的抽象规定性实现在资本生产之中。因此，产业资本家的预付资本提供了社会其他阶级的收入，而产业资本生产和金的资本生产的资本家之间的交换提供了资产阶级自身的利润，马克思在此基础上对各种收入理论进行批评。

关于“生产价格”的历史评述混杂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相关论述中，很难单独抽离出来。除了“生产价格”理论之外，马克思还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讨论地租问题以及由地租引发的经济学争论。需要注意的是，地租理论本身并不包含在“资本一般”理论的逻辑框架中，通

过价值概念的辩证演绎无法获得关于地租的任何形式规定。因此，在“资本一般”理论最初的计划中，马克思没有将地租问题列在提纲里。但是当“资本一般”理论的辩证逻辑发展到“生产价格”的环节，马克思就不得不讨论地租问题了。因为，尽管地租与价值无关，却会极大地影响生产价格。马克思在第 X—XII 笔记本系统地评述了斯密和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并将其作为价值和生产价格的区别而举的一个例证。① 简单说来，马克思试图证明，地租是地主对资本家利润的掠夺，而且地租将会随着生产力的提升而最终消失。马克思关于“利润理论”和“庸俗经济学”的评述内容写在第 XV 笔记本的末尾的 50 多页上，与其他整理思路的手稿混杂在一起，应该不是专门写的。

三、历史评述部分的逻辑线索

上述两个历史评述部分，是根据第 XVIII 笔记本上的提纲和“资本一般”理论的逻辑结构而区分开的。实际上，马克思在写作“剩余价值理论”部分的时候，没有严格按照“资本一般”理论本身的逻辑来写，而是对政治经济学中所有与“资本一般”相关的论题都进行了回顾。如果按照理论结构来呈现马克思的历史评述部分，将不符合“1861—1863 年手稿”的原始面貌。根据马克思写作“剩余价值理论”的过程，实际上可以将第 XIII 笔记本第 753 页作为分界线，将历史评述的内容切分为两部分：在前一个部分，马克思主要摘录和评述了三个版本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三个版本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以及其他一些零散的相关著作，完成了对斯密和李嘉图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在后一个部分，马克思摘录了马尔萨斯以及李嘉图学派开始解体后社会主义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的一些著作，完成了对空想社会主义和庸俗经济学的双重批判。

根据马克思自己的划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批判对象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1）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②；（2）以李嘉图为依据的无产阶级反对派，特指“李嘉图时期……从经济学家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312.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45.

前提出发的反对派”①，指称范围大体上等同于李嘉图社会主义思潮中的意见领袖；（3）庸俗经济学，代表人物有萨伊、巴师夏、西尼耳、罗雪尔等人，涵盖了当时持功利主义和历史主义立场的主要经济学家，他们的共同点是把“单纯的现象复制当做现象的观念”②。从“资本一般”理论的视角来看，上述政治经济学可以大致上分为两类：一类是批判性的经济学，包括古典经济学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学；另一类是非批判的实证经济学，包括功利主义和历史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分别对这两种经济学进行了评论，构成了历史评论部分潜在的逻辑线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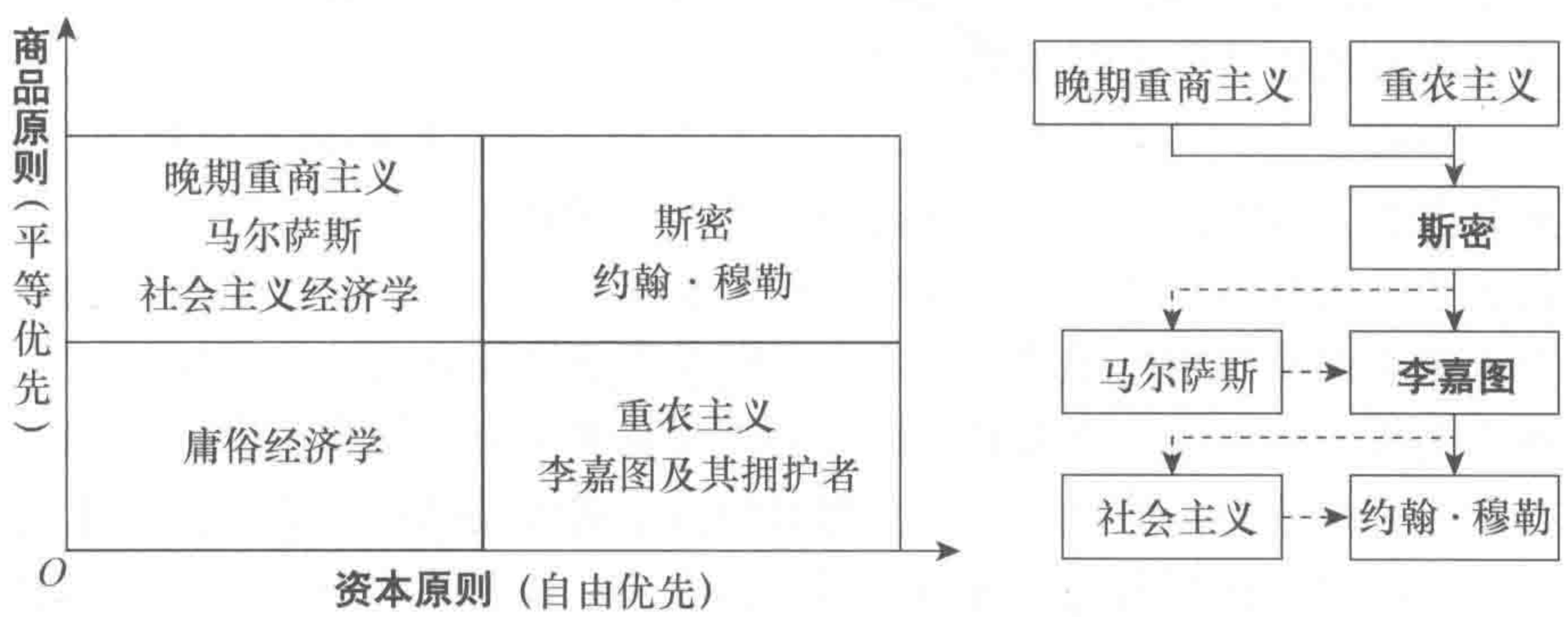

图 9　“1861—1863 年手稿”中提及的主要经济学立场及相继关系

按照马克思在“资本一般”部分的叙述，以商品为前提的经济学理论往往会将按时间计量的劳动价值理论作为理论的基础，而以资本为前提的经济学理论则往往会将一般利润率的存在作为理论的基础。马克思没有评述以货币为前提的经济理论，可能是因为马克思之前已经指出各种货币理论已经相当完备而且没有什么创见。古典经济学家发现了以商品为前提的价值理论和以资本为前提的利润理论之间存在着矛盾，但他们没有回避这一矛盾，并在理论上将这一矛盾保存了下来。古典经济学家并不惧怕上述矛盾所导致的道德困境，甚至尝试在理论中对矛盾进行论证或调和。因此古典经济学家虽然无法超越资产阶级社会的局限，但在理论上基本上都保持了诚实，承认资产阶级社会中所存在的不可调和的对抗。作为古典经济学的后继者，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认为从商品生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2 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09．

② 同①360．

产中抽象出来的劳动价值理论是唯一可靠的经济理论，否认了以资本为前提的利润理论，并把利润解释为资本家对工人产品的盗窃或抢劫。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的成员大多是社会活动家，专业的经济学家比较少，因此没有提出具有建设性的经济学理论，只是对现存秩序进行了道德上的批评。与之相对，庸俗经济学家则往往认为以资本为前提的利润理论是唯一可靠的经济理论，并指责劳动价值论只是一种基于道德观念的抽象预设。马克思所称的庸俗经济学家大部分是专业的经济学研究者，其中一部分是英国功利主义的经济学家，还有一些是德国历史主义的经济学家，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不对资本生产进行道德上的批评，只研究如何增加产品的有效供给并消除生产过剩。

简而言之，马克思在评述理论史的时候并没有按照篇章计划进行，而是大致上分了两个阶段来评述相关的经济学著作。商品和资本都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现实存在物，而且从这两种存在物上抽象出来的经济规律也确实是相互矛盾的；古典经济学家忠实地在理论中反映了这两种现实之间的矛盾，而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和庸俗经济学家则都是用一种现实去否认另一种现实。马克思对经济学的评述基本上就是按照上述思路来进行的：在第一个阶段，马克思评述了以商品和资本为现实前提的古典经济学；在第二个阶段，马克思分别评述了以商品为前提的李嘉图派社会主义和以资本为前提的庸俗经济学。

第四章 “资本一般”与古典经济学批判

在“1861—1863年手稿”全部二十三个笔记本近1 500页的草稿中，“剩余价值理论”占据了其中超过一半的篇幅；而且，马克思讨论的范围大大超出了对剩余价值理论史的梳理。因此，我们需要根据马克思本人写作“1861—1863年手稿”时的具体情况来重新结构这部分内容。马克思前期的写作基本上是围绕斯密和李嘉图的著作进行的，他摘录的著作包括三个版本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1776年伦敦版两卷集、加尔涅译的1802年巴黎版五卷集和麦克库洛赫编校的1828年爱丁堡版四卷集，以及三个版本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即1821年伦敦版、康斯坦西奥译的1819年巴黎版和1835年巴黎版修订版。关于这两部著作的摘录和评述有八个笔记本共500多页，最初考察以下三个问题：“(1) 亚·斯密把剩余价值和利润混淆起来；(2) 他关于生产劳动的观点；(3) 他如何把地租和利润变为**价值的源泉**”①。在讨论第一个问题时，马克思又插入了一部分内容专门讨论“研究年利润和年工资怎样才能购买一年内生产的、除利润和工资外还包含不变资本的商品”②，即不变资本的补偿问题。因此，除了作为主标题的“剩余价值理论”之外，马克思在评论古典经济学时的中心议题还有三个：不变资本的补偿问题、生产劳动的界定问题以及地租与价值的关系问题。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2-63.

② 同①5.

第一节　分工理论与生产劳动的界定

生产劳动理论是与价值理论密切相关的一个论题，生产劳动也就是创造价值的劳动，界定生产劳动要以界定价值概念为前提。需要注意的是，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严格来说并不算一个经济学问题，反而更加接近于道德哲学或现代的政治哲学。不过这也使得生产劳动的讨论大大超出了经济学的范围，成为各个学术领域争论的焦点。在讨论分工时，马克思就曾中断写作转而梳理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内容，认为只有弄清楚“资本自身的起源”问题之后才能接着考察“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问题”①。在斯密的经济学中，用于交换的商品是有价值的，因此生产商品的劳动是生产劳动；相应地，不生产商品的劳动就是非生产劳动。而马克思用“资本一般”理论证明了价值和资本实际上是同一种东西，生产价值的劳动也就是为资本服务的劳动。生产劳动只能证明资本的生产性，而不能证明劳动的生产性。根据“资本一般”理论，价值是一种终将被扬弃的观念，而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实际上是将价值观念客观化和永恒化了，进而也将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变成了生产的自然形式。

一、斯密对财富增长和分配的解释

斯密区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原初目的仅仅是论证有利于资本积累的自由经济政策；将生产劳动归结为生产物质商品的劳动，实际上是为了批评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的经济主张。不过，与“价值”概念一样，斯密的“生产劳动”概念同样存在着内在的悖论，给后世的经济学研究埋下了产生争执的种子。在 19 世纪之后的经济学讨论中，生产劳动总是与“公平收入”“合理价格”这类的平等道德概念联系在一起，并成为要求对资本家收入进行再分配的理论工具，大大超出了斯密原先划定的理论界限。

1.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增长动力

在 18 世纪，经济学仍然只是关于经济政策的研究，经济学的讨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55.

总是与国家财富、经济政策等话题结合在一起，经济学也因此被称为政治经济学。经济学原本是研究如何保障家庭财务安全的学说，相应地，政治经济学就被当作研究如何保障国家财政和经济顺利运营的学说。揭示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增长的动力，是当时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共同目标。斯密提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是为了说明资本积累是国民财富增长的真正动力，生产劳动的讨论始终和财富的界定结合在一起。

对于国民财富性质的不同理解决定了经济学家将哪些活动作为财富的来源，从而也决定了采用怎样的分配方式才是合理的。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开篇的“序论及全书设计”中提出了他理解的国民财富的性质：

> 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构成这些必需品和便利品，或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来的物品。①

根据斯密的说法，财富实际上就是供国民消费的产品和服务，而每年的产品和服务完全由当年的国民劳动提供。这个定义将斯密与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区分开来：重商主义认为财富就是金银等贵金属的积累，重农主义认为财富就是农业生产的产品，而斯密认为财富是一年内可供国民消费的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数量。在界定了国民财富的性质之后，国民财富增长的标准也就随之确定下来，即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数量的增加。一国的财富完全是由本国国民的劳动创造出来的，因此，提高劳动的生产力，增加单位劳动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就是增加国民财富的主要手段。斯密将劳动生产力的水平等同于分工的水平，专业化的细致分工可以有效地提高单位时间内的产量，而分工的发展又取决于市场的范围和资本积累的程度。生产力取决于分工程度，分工程度取决于市场范围，这都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斯密的开创性在于证明了资本积累是实现分工高度发展的必要条件，从而将资本积累变成了实现国民财富增长的主要动力。

相比之下，重商主义者从货币的角度来看待国民财富，国民财富也就是货币的储备量，利润的来源就是贱买贵卖。因此，从重商主义的立场来看，利润（剩余价值）的来源是各种形式的非等价交换，其中就包

---

① 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 郭大力，王亚南，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1.

括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非等价交换。重商主义的观点并没有因为古典经济学的批评而消失，“特别是在社会主义者中间，这种见解仍然阴魂不散”①。重农主义者从产品的角度来看待国民财富，国民财富的增长就是农产品总量的增加。重农学派认为地租是剩余价值的唯一形式，工人的工资和资本家的利润都是对地租的再次分配，资本家的利润是由于其监督劳动而支付的工资；在这个意义上，“后来那些用对劳动的监督工资来抹杀利润的经济学家，必然会与重农学派持有相同的看法”②。相应地，按照重商主义的观点，为了实现国家财富的积累，就应当尽量地压低国内的生产成本，例如由国家来间接干预甚至直接组织生产，或者压低工人的工资，等等；而按照重农主义的观点，国家财富的积累完全来自农业生产，政府应当减少对工商业的管控和扶持，从而减轻农业生产的负担，实现净产品积累速度的最大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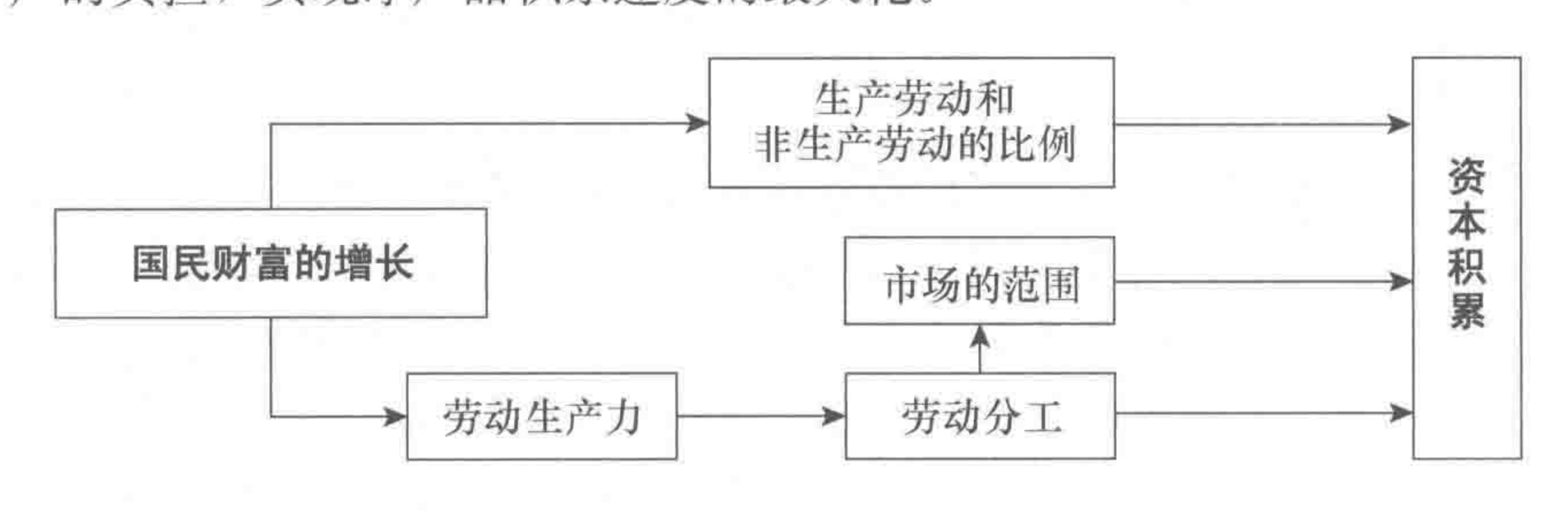

图 10　斯密对国民财富增长动力的解释

斯密重新界定了财富的性质，从消费的角度来看待国民财富；国民财富的增长既不是货币的增加也不是产品的增加，而是消费量的增加。相较于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斯密的经济理论将财富的标准从生产转变为消费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今天的经济学统计仍然延续了斯密的观点，以消费量来计算国家的经济总量。这种消费分为两种，一种是用于满足自然需求的直接消费，另一种是用于进行再生产的生产消费。因此，国民财富增长的衡量标准就在于社会是否可以供给更多的消费品，而财富增长的动力就在于资本家以盈利为目的的资本积累。资本积累也就是货币或产品的储蓄，斯密认为资本积累可以有效地消除分工遇到的自然界限，从而使单位时间的劳动能够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在原始的生产中，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3.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618.

每个经济单位（部落或家庭）首先需要生产维持生存所需的全部产品，之后才会有剩余产品用于交换，分工也处在非常低的水平。随着分工的发展，劳动者不再直接为自己生产维持生存的必需品，因此在从事分工劳动的过程中必须有一定量的资本来维持劳动者的生存。除此之外，分工带来的专业化需要连续生产来保障，而劳动工具的损坏和原料供应的中断会破坏这种连续性，需要一定量的资本来储存工具和原料。分工条件下的生产和消费是分离的，基于私利动机，资本家也会自觉地提高劳动生产力，生产更多的商品来增加自己的收入。澄清了关于财富性质的各种观点，以及斯密对于资本积累的辩护，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区分才可以被恰当地理解。

2. 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

斯密定义的财富就是满足国民消费的各种产品，根据这个定义，如果将货币投入商品生产领域，那么生产商品的劳动在总劳动中所占比例就会增加，从而可以为国民带来更多的消费品，最终实现了财富的增加；而如果将货币用于享受各种服务，那么货币就完全被消耗掉了，没有带来新的产品和财富，是一种浪费。斯密因此认为，“雇佣许多工人，是致富的方法，维持许多家仆，是致贫的途径”①。

在这个意义上，斯密区分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并以此来要求资产者应当拥有节俭的美德。因此，斯密做出如上区分的本意，是为了论证资本积累对于实现国民财富增长的必要性和有效性，而不是为了论证制造业工人对财富增长所做的贡献。斯密认为，制造业工人所进行的劳动是生产性的劳动，为国民提供了更多的消费品；而服务业人员所进行的劳动是非生产的劳动，只是满足了某些个体的需要，没有实现国民财富的增加。在一个经济体中，从事商品生产的劳动力越多，那么国家的财富也就越多。相应地，投入生产经营的货币越多，那么用于享受服务的货币就会越少。斯密因此说：“资本增加，由于节俭；资本减少，由于奢侈与妄为。”② 资产者应当克制自己的自然欲望，将积攒下来的货币投入生产，实现国民财富的增长。而且资本积累也会带来个人财富的增长，从而补偿资产者为了资本积累而做的牺牲。通过生产劳动与非

① 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 郭大力，王亚南，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303.

② 同①310.

生产劳动的区分，斯密证明了个人以货币量增加为目标的谋利行为有利于国家财富的积累和普遍利益的实现。

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界定也体现了斯密拒斥道德干预和政治干预的自由主义立场。在西方传统的宗教社会中，美德和信仰被当作最宝贵的东西，因此贵族和教会成员被当作更加高贵的社会阶层。斯密继承了英国自然法的传统，认为美德和信仰都不足以作为组织社会的原则。唯一增进人类幸福的方式，就是在分工基础上实现自然需要的互相满足。个体为了积累私人财产而从事的商品生产是人类幸福更加可靠的基础。斯密对生产劳动的界定很快就演变成了对非生产阶层的道德批评，地主、政府官员、教会成员都成为批判的目标。斯密认为，正如用于雇用仆人、享受服务的支出会损害经济发展，一部分政府的支出也是如此：

> 有些社会上等阶级人士的劳动，和家仆的劳动一样，不生产价值，既不固定或实现在耐久物品或可卖商品上，亦不能保藏起来供日后雇用等量劳动之用。例如，君主以及他的官吏和海陆军，都是不生产的劳动者。他们是公仆，其生计由他人劳动年产物的一部分来维持。他们的职务，无论是怎样高贵，怎样有用，怎样必要，但终究是随生随灭，不能保留起来供日后取得同量职务之用。……像演员的对白，雄辩家的演说，音乐家的歌唱，他们这一般人的工作，都是随生随灭的。①

斯密因此要求国民财富的再分配应当优先考虑资本家，而不应优先考虑工人、地主和贵族。因为，资本家将自己的收入用于储蓄和投资，即购买生产劳动；而工人、地主和贵族将自己的收入完全用于消费，即购买非生产劳动。与此同时，国家应当尽可能地减少支出，降低对商业生产的征税额度，制定有利于资本家进行资本积累的经济政策。

斯密区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目的是为资产阶级进行的资本积累辩护，批评作为非生产阶级的地主、贵族、教会成员以及政府官员。戏剧性的是，基于这一区分的批判很快就回头指向了资产阶级自身。19世纪初，社会主义者认为工人阶级是唯一的生产阶级，资产阶级与地主、贵族等阶级一样都是非生产的食利阶级。后来，坚持传统道德和信

---

① 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 郭大力，王亚南，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304.

仰的思想家也加入了批评斯密的行列，认为资产阶级的营利行为并没有天然的优先性，美德、秩序、艺术等等虽然没有生产出什么具体的商品，但是对于人类社会的存在和个人精神境界的提升发挥着比货币更为重要的作用。经济学理论内部对此进行了激烈的讨论，这些讨论构成了马克思介入生产劳动问题的窗口。

二、“资本一般”与资本生产性批判

按照马克思的写作计划，“资本的生产过程”共有两个历史批判章节，分别是“(8) 剩余价值理论”和“(9) 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①。根据马克思的提示，这两篇历史批判章节的侧重点不同，“剩余价值理论”部分要“纯粹地就剩余价值本身……来考察剩余价值”②，而“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则要呈现“资本在多大程度上是生产的”③。剩余价值的最现实的表现形式就是财富的积累，因此判断劳动是否具有生产性的标准就在于其是否实现积累。从“资本一般”的视角来看，所谓的生产劳动就是生产出新价值的劳动，所以生产劳动的生产性只不过是资本的生产性。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无法实现对资本生产的批判，最终也会沦为对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的辩护。

1. 生产劳动与资本的生产功能

与 19 世纪的社会主义者不同，马克思敏锐地觉察到了关于生产劳动的区分并不是在为工人阶级辩护，而是在为资本生产辩护。马克思认为，所谓生产劳动实际上就是使货币成为资本、实现增殖的劳动，因此它与劳动的产品是什么实际上没有任何关系，“**生产劳动**是对劳动所下的……同劳动的特殊效用或劳动所借以表现的特殊使用价值绝对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的定义”④。从这个意义上说，同一种劳动既可能是生产劳动，也可能是非生产劳动，它们之间的差别只在于是否为雇主实现了货币的增殖。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如此界定生产劳动，其最终结果只能证明资本才是真正具有生产性的；生产劳动生产出来的东西是属于资本家的新的价值（货币），即利润，它所证明的只是资本的生产性，而不是劳动的生产性。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313.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7.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55.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8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53.

“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的最初手稿写在第 VII 笔记本上，其中第 299—341 页的内容成型程度很高。在这一部分，马克思指出了斯密关于“生产劳动”界定的二重性，并在第 IX 笔记本第 417 页再次继续讨论了斯密的相关观点。在分析完斯密界定的二重性之后，马克思站在“资本一般”理论的立场上为斯密的观点进行了长篇的辩护，共占用了近 60 页的篇幅。不过这些内容并不是连续写完的，中间还插入了关于约翰·穆勒和“收入与资本交换”的一些内容。在第 VII 笔记本第 316 页，马克思就准备要讨论“反对亚·斯密……的论战”，并说为此需要简略地“考察热·加尔涅（斯密著作的译者）、罗德戴尔伯爵、布鲁姆、萨伊、施托尔希以及后来的西尼耳、罗西等人关于这一点的庸俗见解”①。在进入这些具体争论之前，马克思散乱地摘录了一些引文来提示古典经济学中有关“生产劳动”的相关观点，其中包括李嘉图、西斯蒙第、配第的简略论述。在分析加尔涅之前，马克思又插入了关于约翰·穆勒的长篇评述，这部分“本来应放到后面论李嘉图剩余价值理论的地方”②。这个插入部分有 30 多页，写在第 VII—VIII 笔记本上。马克思在第 VIII 笔记本第 347 页恢复了关于论战的写作，并依次评述了加尔涅和沙·加尼尔，旋即再次中断了关于生产劳动的讨论，转而以“收入与资本的交换”为题讨论了不变资本的补偿问题。在中断写作前，马克思提示了之后的内容，认为接下来“还要简略地考察一下**罗德戴尔**（在这之后，布鲁姆平淡无味的玩笑就不值得考察了）、（费里埃?）、**托克维尔**、**施托尔希**、**西尼耳**和**罗西**”③。在结束了“收入与资本的交换”部分的写作之后，马克思从第 391 页开始继续依次写了费里埃、罗德戴尔、萨伊、德斯杜特、施托尔希、西尼耳、罗西的相关内容。

表 12　“1861—1863 年手稿”中有关生产劳动的内容分布

笔记本编号	页码范围	标题
第 VI 笔记本	220—222	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
	222—243	重农主义
第 X 笔记本	422—437	插入部分。魁奈的经济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63.
② 同①168.
③ 同①282-283.

续前表

笔记本编号	页码范围	标题
第 VII 笔记本	299—314	斯密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 [插入关于约翰·穆勒的理论评述]
第 VIII—IX 笔记本	347—379	反对斯密的论战 热尔曼·加尔涅。沙·加尼尔 [插入“收入与资本的交换”] 费里埃。罗德戴尔。萨伊。德斯杜特·德·特拉西伯爵。卡·安·施托尔希。西尼耳。罗西
	[中断]	
	391—416	
	417—419	回到斯密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
第 XXI 笔记本	1316—1331	(k) 资本的生产性。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劳动

马克思精准地理解了斯密提出生产劳动的目的，并对斯密的混乱之处做了进一步的澄清和发展。首先，一种劳动是不是生产劳动并不能通过它的产品来进行区分。同一种劳动可能是生产劳动，也可能不是生产劳动，判断标准取决于它是否为雇主提供利润。有些生产商品的劳动同样可能不生产剩余价值，而有些不生产实物的劳动却可以为雇主带来利润。其次，服务不一定完全是享受的、非生产的，有些服务也是雇佣劳动的形式。雇佣劳动中的服务业同样可以带来利润，因而其实也是生产劳动。除此之外，有些服务还会强加给工人，劳动者还要为这些“强加于人的”① 服务而支付额外的货币；这些服务不仅不是享受，反而可能会加剧工人的悲惨境遇。

根据“资本一般”理论，古典经济学的缺陷就在于混淆了利润和剩余价值，因此无法将货币和价值区分开。这一缺陷同样体现在斯密的生产劳动理论之中。在第 IX 笔记本第 418 页，马克思对斯密的生产劳动理论进行了总结，并将其与重商主义（货币主义）的观点进行了简要扼要的对比，指出了斯密生产劳动理论的根本缺陷和不彻底性：

> 斯密所说的实质上同货币主义所说的一样。货币主义者认为，只有生产**货币**，生产金银的劳动，才是生产的。在斯密看来，只有为自己的买者生产**货币**的劳动才是生产的。所不同的只是，斯密在一切商品中都看出了它们具有的货币性质，不管这种性质在商品中怎样隐蔽，而货币主义则只有在作为交换价值的独立存在的商品中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8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57.

才看出这种性质。①

斯密定义了资本生产的目的就是货币量的增加，但总是把货币量与具体的物纠缠在一起，而没有意识到货币量只是价值量的一般化身。因此，斯密将生产商品的劳动称为生产劳动，只是因为他把所有的商品都看作潜在的货币；相应地，不生产商品的劳动被称为非生产劳动，也只是因为非生产劳动者提供的服务无法再转化成货币。

由于存在上述缺陷，斯密关于生产劳动的界定也存在着二重性，正确的观点和错误的观点纠缠在一起。第一种观点，即正确的观点是“生产劳动是雇佣劳动”②，它除了生产出工资的价值，还为资本家生产出利润（即剩余价值）；第二种观点，即错误的观点是“有一种劳动加到对象上，就能使这个对象的价值增加……因为它生产价值，可以称为生产劳动”③，或者“生产劳动就是生产**商品**的劳动，**非生产劳动**就是生产个人服务的劳动”④。

马克思认为，根据第一种规定可以正确地区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前者的劳动同资本交换，后者的劳动同收入交换”；“前一种劳动创造剩余价值；在后一种劳动中收入被消费了”⑤。因此，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完全是从资本家的角度来进行区分，而不是从劳动者的角度进行区分。从资本家的角度来看，劳动的生产性与它的产品的实用性、创造性没有任何关系，他只关心这样的劳动是否能够给他带来利润。如果个人预付货币购买劳动的目的是获取剩余价值（即利润），那么这种劳动对于他而言就是生产劳动；如果个人预付货币购买劳动的目的是获得使用价值，那么这种劳动对于他而言就是非生产劳动。也就是说，购买生产劳动使货币成为资本。从这种生产劳动的定义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生产劳动与资本生产的内在一致性，从而很容易就可以将“生产劳动”和“劳动的生产性”区分开来：生产劳动所实现的只是资本的生产性，而劳动的生产性是个体的自由创造，不应也不能由价值来衡量。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67.

② 同①136.

③ 同①139；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 郭大力，王亚南，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303.

④ 同①159.

⑤ 同①142.

但是，根据斯密的后一种规定就达不到这样的效果。按照斯密的第二种区分，生产劳动是“固定在物质的可以出卖的商品上的劳动”，而非生产劳动是“不固定在这种商品上的劳动”①。马克思认为，斯密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这种区分是庸俗的，是资产阶级狭隘眼界下的“自作聪明”②。了解了马克思的“资本一般”理论，就很容易看出这种区分的庸俗性，它实际上假定了劳动能力与劳动条件的分离。按照这样的区分，在个体与生产资料普遍分离的状况下，个人就应该将自己的劳动出卖给拥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这样才可以将自己的劳动固定在“可以出卖的商品上”，证明自己是一个生产者。相反，如果个体不为资本家劳动，不为资本家提供利润，那他就是非生产的食利者。如果我们接受了这样的生产劳动概念，实际上也就是接受了资本的生产性。在斯密的自由主义框架中，资本家的利润是符合道德的收入形式，工人作为社会个体就应当为资本家工作，从而为国民财富的积累做出贡献。

根据“资本一般”理论可以对斯密的第二种区分——错误的区分——提出进一步的批判。第二种庸俗区分实际上将是否创造价值作为了区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标准。价值的生产需要劳动能力、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的共同作用，但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关系中，生产的各种条件分属于不同的社会个体，是他们各自的私人财产。价值或商品生产过程首先表现为产业资本家的购买行为，只有在三种要素齐备的情况下价值才可能生产出来。如果将价值作为经济活动的目标，那么就只有产业资本家的劳动才真正具有生产性。马克思通过“资本一般”理论已经证明，价值和资本具有内在的同一性，资本是价值抽象规定的具体化，而价值是资本内在的规定性。以价值为判断标准的生产劳动归根到底也只能是资本主义生产秩序的另一种表达，因此不足以超越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关系。与英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讨论生产劳动的目的并不是要将资本家定义为非生产的食利阶层，而是以此为中介批判资本的生产性。

在李嘉图发展过的古典经济学框架中，资本的生产性并不在于创造新的价值，“它只是作为‘积累劳动’……才具有价值，它只是把它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23.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43.

这一价值加到它所加入的产品中去”①；然而资本的积累却可以使单位时间的劳动生产出更多的使用价值，资本在这个意义就具有了生产性。古典经济学将资本等同于被人改造的生产条件，如机械、厂房和生产基金等。斯密和李嘉图都认为这些生产条件是促进分工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可以使单位时间的劳动生产出更多的使用价值。因此，古典经济学对于资本的研究就是对这些“已被人类改造过的自然物”的研究，也就是这些自然物（劳动材料、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如何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并把这些自然物当作资本本身，进而认为是资本促进了生产。

在评述霍吉斯金时，马克思表明了他关于“资本的生产性”问题的立场。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率由于生产条件转变而实现的增长，原因在于“它们作为实际劳动的客观条件的属性”，而不在于“它们作为**独立地同工人相对立、同工人相异化的条件**、作为体现在资本家身上的活劳动**支配者**的那种**社会存在**”②。生产条件的改善确实可以提高劳动的生产率，但是体现为资本的生产条件不仅是提高生产力的手段，也是支配劳动者的强制力量。在任何形式的劳动当中，物本身都处于被支配的地位，是劳动支配的对象；除了劳动必须适应物的材料特性之外，这些物对劳动和劳动者不可能有任何的支配权，“否则它就不是合乎目的的活动即劳动了”③。因此，资本虽然表现为劳动的物质条件，但是它的规定性并不来自物质条件本身。“只有把资本看做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表现，才能谈资本的**生产性**，但是如果这样来看资本，那么这种关系的历史暂时性质就会立刻显露出来，对这种关系的一般认识，是同它的持续存在不相容的，这种关系本身为自己的灭亡创造了手段。”④“资本一般”理论揭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全部关系，资本生产一方面是发展生产力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生产资料不断集中的过程。当生产资料的集中程度达到极限的时候，资产阶级的社会关系就会扬弃自身，并将已有的生产力作为新的社会关系的物质基础。在新的社会关系中，价值将回归它本来的抽象性，仅仅作为个体交换时的单纯观念，不再具有调节生产的功能。届时，生产劳动和资本生产将一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个体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38.

② 同①239.

③ 同①239.

④ 同①239.

合乎自己目的的自由活动。

关于生产劳动还有一个问题没有提及，即“商业资本所雇用的工人在什么范围内是生产的，在什么范围内是非生产的”①。马克思提示，这个问题需要在“资本的流通过程”中才能得到解释，马克思没有为这一部分写作手稿。在完成“剩余价值理论”部分的写作之后，马克思恢复了狭义“资本一般”理论的写作，以“资本的生产性。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为标题讨论了资本的生产性和劳动的生产性的对立。资本的生产性在于两个方面：首先在于它是“**强迫进行剩余劳动**，强迫进行超过直接需要的劳动”的力量；其次在于“作为吸收和占有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般社会生产力（如科学）的力量（作为这些生产力的人格化）”②。因此，经济学中的生产劳动实际上就是实现资本生产性的劳动。

2. 斯密对资本生产功能的辩护

在斯密的经济理论中，“生产劳动”是最接近“剩余劳动”的概念。根据斯密的资本积累理论，生产劳动可以为预付资本提供利润，从而在不损害任何人利益的情况下实现财富的增殖，也就是提供剩余价值。如果将“剩余价值理论”和“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统合在一起考虑，那么由“生产劳动”引发的争论可以重新划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斯密对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的批评，二是一些“二流人物”对斯密的批评。③ 相应地，马克思在第 VI—IX 笔记本中关于“生产劳动”的讨论也可以分为相对完整的两个部分：第 VI 笔记本第 222—243 页、第 VII 笔记本第 399—314 页和第 IX 笔记本第 417—419 页是第一个部分，内容是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关于生产劳动的界定以及斯密相应的批评；第 VIII—IX 笔记本第 349—379、391—416 页是第二个部分，内容是“反对亚·斯密提出的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的论战”④。

从产品的方面看，生产劳动体现为生产商品或货币的劳动，也就是为资本服务的劳动。斯密在这个意义上是正确的，相比与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和货币主义是巨大的进步。“亚·斯密同重农学派相反，重新提出产品的价值是构成资产阶级财富的实质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又使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8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64.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22.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61.
④ 同③.

价值摆脱了在重商学派看来价值借以表现的纯粹幻想的形式——金银的形式。”① 从流通方面看，生产劳动就是参与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劳动。这也是斯密产生混淆的地方，他把简单流通和资本流通混杂在一起进行论述。

早期的重商主义实际上否定生产劳动的存在。重商主义站在简单流通的角度上对获利行为进行解释，将利润的来源归结为非等价交换，即“商品高于它的价值出卖”②。重商主义接受了经院哲学对经济行为的理论预设，认为经济活动本身并不具备自行增殖的能力，一方的获利总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因此在传统哲学中，经济行为总是由于其有损德行而遭到理论上的批评。由于得到了主权国家的掩护，重商主义者以经院哲学的基本观点最先完成了对经济活动的辩护，将通过贸易顺差获得货币利润解释为有利于国家的正当动机：

> 在重商主义体系中，剩余价值只是相对的：一人之所得就是他人之所失。……从一国总资本来看，在这个国家内部，实际上并没有形成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只有在一个国家同另一些国家的关系中才能形成。一国所实现的超过另一国的余额表现在货币上（贸易差额），因为货币是交换价值的直接的和独立的形式。③

重商主义将国际贸易当作利润的唯一来源，为了扩大贸易顺差就要压低工人工资并对国内生产进行规划。在重商主义的历史批判部分，马克思只用很短的篇幅评述了与斯密同时代的 J. 斯图亚特的理论，反而没有提及历史上重商主义的著名人物，如柯尔培尔、配第等。作为晚期重商主义的核心代表人物，斯图亚特对重商主义的观点进行了修正，认为除了由贸易产生的“让渡利润”之外，还有由于“劳动、勤勉和技能的**增进**”而产生的“**绝对**利润”④。斯图亚特关于绝对利润的论述抛弃了重商主义剩余价值来自抬高售价的错误看法，马克思因此将斯图亚特称为重商主义的“**合理的**表达者”⑤。除了在剩余价值方面的突破之外，斯图亚特在经济学上的贡献还体现在另外两个方面：首先，“他的关于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60.
② 同①11.
③ 同①41.
④ 同①11.
⑤ 同①13.

‘财富的天平在有关双方之间的摆动’的理论……对于考察剩余价值在不同阶级之间的分配，以及在按利润、利息、地租这些不同项目之间进行的分配，有重要的意义”；其次，“在对资本的理解方面……他指出了生产条件作为一定阶级的财产同劳动能力分离的过程是怎样发生的”①。值得注意的是，斯图亚特在思想史上的影响力远远不止于此，他的干预主义经济理论与后来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德国国家哲学有着直接的理论关联。

重农学派认为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是唯一的生产劳动，“只有劳动产品中包含的价值超过生产该产品时消费的价值总和的那种劳动，才是**生产的**”②。“1861—1863 年手稿”中关于“重农学派”的历史批判部分成型程度相对较高，除了重申“资本一般”理论的基本观点之外，马克思用大部分篇幅称赞了重农学派在剩余价值研究方面的重大突破：首先，重农学派关于“最低限度工资”的理论实际上已经触及劳动能力的价值确定问题，这是“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现代经济学的基础”③；其次，重农学派从生产领域研究剩余价值的起源，“这样就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奠定了基础”④。

> 重农学派在**农业劳动范围内**对剩余价值是有正确理解的，他们把剩余价值看成雇佣劳动者的劳动产品，虽然对于这种劳动本身，他们又是在它表现为使用价值的具体形式上来理解的。⑤

重农学派没有理解利润的性质，认为只有提供新产品的农业才真正地创造新财富，而将工商业的利润只看成是对地租的再分配：“利润只是一种较高的工资，这种工资由土地所有者支付，并且由资本家作为收入来消费”⑥。在重农主义者看来，资本家的劳动和工人的劳动都不创造财富，他们只是根据各自不同的劳动形式返还等价物；只有土地所有者是雇主，给一切生产部门的工人和企业主分配工资。后来的辩护论经济学采用了类似的立场对资本家进行辩护，将资本家的利润解释为监督劳动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2-13.
② 同①19.
③ 同①16.
④ 同①16.
⑤ 同①31.
⑥ 同①20.

而获得的工资。斯密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彻底的批评，指出资本家获取利润只是因为他们支付了预付资本作为生产基金和劳动基金。

即使如此，马克思还是充分肯定了重农学派在认识资本方面的远见。基于重农主义者对财富及其分配的解释，重农学派“对土地所有权的表面上的推崇也就变成了经济上的否定和对资本主义生产的肯定”①。既然工商业并不创造任何价值，那么就应该放弃对工商业的管制而只对农业征税，由此对生产劳动的界定也就过渡到了“自由放任，无拘无束的自由竞争，工业摆脱国家的任何干预、垄断等等”② 资本主义的要求。马克思最后总结道：“总之，重农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在于剩余价值的生产”；“他们的错误在于，他们把那种……使农业和畜牧业有别于制造业的**物质增加**，同**交换价值的增加**混淆起来了”③。在“重农学派”的末尾，马克思零散地摘录了很多人的著作，并提到之后“还要回过头来谈重农学派在分析资本方面的巨大功绩”④。不过“1861—1863 年手稿”之后的内容再没有专门提及这个问题，唯一相关的内容是独立笔记本上关于魁奈《经济表》的摘录和评述。因此可以推测，第 VI 笔记本和独立笔记本（即后来的第 X 笔记本）可能是同时写的。

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对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的批评，同时也伴随着对传统道德秩序的激烈的挑战。斯密将那些历来令人尊敬的职业从事者降低为仆从，并且将他们和丑角、乞丐归为一类。“某些最受尊敬的社会阶层的劳动，像**家仆的劳动**一样，不生产**任何价值**……他们是社会的**公仆**，靠**别人劳动**的一部分年产品生活”⑤。国家只有作为“管理和处理生产的资产者的共同利益的委员会”才是正当的，除此之外不应当有其他的强制职能；即使如此，国家的开支也必须“缩减到必要的最低限度”⑥。马克思认为，这样的观点具有历史的意义⑦：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6.

② 同①.

③ 同①36-37.

④ 同①41.

⑤ 同①363；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 郭大力，王亚南，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304.

⑥ 同①364.

⑦ 同①364.

(1) 它同古典古代的见解形成尖锐的对立，在古典古代，物质生产劳动带有奴隶制的烙印，这种劳动被看做仅仅是有闲的市民的立足基石；

(2) 它又同由于中世纪瓦解而产生的专制君主国或贵族君主立宪国的见解形成尖锐的对立……“富人不多花费，穷人就要饿死。”

斯密在论证资本积累的生产性的同时，也就证明了之前的各种所谓的高级阶级都是被豢养的食利阶层。

不过，马克思指出，“这是还具有革命性的资产阶级说的话，那时它还没有把整个社会、国家等等置于自己支配之下”①。一旦资产阶级占领了地盘，曾经的批判者就变成了被批判的对象。资产阶级不再作为生产劳动的代表同传统食利阶层对立，而是与生产工人对立起来。资产阶级也不再挖空心思促进生产、攫取利润，而是开始进行“有教养”的消费，从而进一步使精神劳动也越来越适应资本主义生产的形式。“一旦发生了这些情况，事情就反过来了”，斯密的理论反而就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学批判的对象，“这时资产阶级……力求‘在经济学上’证明它从前批判过的东西是合理的”②，以道德、教养、秩序等等借口来抵挡社会主义者对资产阶级的批评，由此就进入了19世纪围绕生产劳动的标准问题而进行的激烈争论。

3. 围绕生产劳动的标准而产生的争论

斯密关于生产劳动的划分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斯密之后出现了一批研究者反对斯密的划分标准，试图证明服务中的一些劳动也是创造价值的。马克思指出这些反对斯密的人无视斯密做出的第一种解释“即符合问题本质的解释”，反而抓住第二种解释，“把注意力集中在劳动的物质内容上……以此来使自己的论战变得容易些”③，因此不可能超越斯密的划分。马克思分析了引起这场论战的几个原因：

第一，有一大批“高级”劳动者，如官吏、军人、艺术家、牧师、律师等，决不愿意将自己和食客、家仆等寄生阶级混杂在一起。他们“依靠出卖自己的‘非物质’商品或把这些商品强加于人，而占有很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63.

② 同①365.

③ 同①159.

部分的‘物质’财富”①。“资产阶级社会把它曾经反对过的一切具有封建形式或专制形式的东西，以它自己所特有的形式再生产出来”，这些阿谀奉承的人的首要任务就是在理论上为他们存在的价值进行辩护，“事实上这就宣告了意识形态阶级等等是**依附于资本家**的”②。

第二，一些物质生产的当事人也被部分经济学家称为“非生产的”。例如，李嘉图认为土地所有者是非生产的，凯里认为商人是非生产的，社会主义者认为资本家是非生产的。马克思讽刺道：“脑力劳动者中间的许多人，看来都赞同这种怀疑观点”③。因此，这些被批判的生产阶级被迫与其他非生产阶级一起证明“资产阶级世界……是所有世界中最美好的世界；……**无所事事的人**也好，他们的**寄生者**也好，都应当在这个最美好的世界秩序中找到自己的地位”④。

第三，随着资本的统治的发展，尤其是自然科学被用作物质生产手段的时候，许多和物质财富没有直接关系的人类活动领域也日益依附于资本。于是，相应地就出现了政治经济学理论试图证明任何一个活动领域都应当被看作生产的，因为它们都可以通过或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提供利润，也就是为资本服务的、对资本家发财致富有用的劳动领域。上述说法在一般的意义上是对的，人本身是物质生产和其他各种生产的基础，因此任何对人产生影响的活动都会或直接或间接地作用在生产上。⑤ 然而，将这种观点运用在资产阶级的经济形式中，就是一种阿谀奉承和自我催眠，一方面将各种职能都描述成为资产者生产财富服务的人，另一方面将资产阶级世界描述成最美好的世界。在这种庸俗观点看来，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一切都是有用的或至少潜在地是有用的，而资产者的智慧就是发现它们的价值，并将其转化为现实的财富。然而这种说法对于那些从事雇佣劳动生产的工人来说，就完全是一种压迫和欺骗。因为在资产阶级的经济关系中，工人被当作生产者只是因为工资的价值低于他们加入产品的价值，而不是因为他们从事物质劳动。资本家获得了无酬劳动生产的剩余价值并将它们转化为货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61.
② 同①162.
③ 同①162.
④ 同①162-163.
⑤ 同①350.

币，从而可以按照一定的方式对这些货币进行分配。只有在雇佣劳动中，资本家才可以用一定量的货币购买到超过其价值量的劳动时间，从而在原有的价值量以外获得新的价值即剩余价值，使自己的所有物实现增殖。

除了以上三种情况之外，马克思在评述罗西时还补充了第四种为非生产劳动辩护的观点，即非生产劳动可以让生产者专注于自己的工作，“由于别人代替他们去完成价值较小的劳动，他们就能完成价值较大的劳动”①。从分工的角度看，这种观点是有现实依据的；在分工高度发展的情况下，每个人的私人劳动同时也是在代替他人进行劳动。但这并没有消除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这种区分本身就是分工的结果，“分工使非生产劳动变成一部分劳动者的专门职能，使生产劳动变成另一部分劳动者的专门职能”②。一般分工基础上劳动的互相替代仍然只是简单流通意义上的价值交换，并没有带来新的价值量，因此用分工来证明非生产劳动的生产性同样是无效的。从“资本一般”理论中价值的形式规定来看，一般的劳动只是生产出一定的商品或提供一定的服务，“因而值一个等价，但不生产任何价值”③，所以是非生产的；只有雇佣劳动才能生产出超出其价值量的价值，因而是生产的。由此就很好解释马克思为什么将雇佣劳动之外的各种劳动都看作非生产的，非生产者并不是不生产产品，只是他们创造的产品的价值直接等于他们获得的价值补偿；也就是说，非生产者的价值补偿只能来自他人现成的收入，而并不会增加总价值量。

后面的写作过程中，马克思继续分两批摘录了一系列“二流人物”的观点。在整理完约翰·穆勒的历史批判之后，马克思摘录了热尔曼·加尔涅④和沙·加尼尔的观点。第一次摘录⑤的内容很少，但马克思评论的篇幅很长，马克思在其中大量地复述了自己的经济学观点，并因此中断了摘录工作转而写了一个“收入与资本交换”的插入部分。在第二次摘录中，马克思依次评述了费里埃、罗德戴尔、萨伊、德斯杜特、施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59.

② 同①360.

③ 同①363.

④ 热尔曼·加尔涅（Germain Garnier，1754—1821），法国经济学家、政治家，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法文版译者，生平不详。

⑤ 同①219，240.

托尔希、西尼耳、罗西等人。[1] 马克思在评论罗德戴尔和施托尔希时分别对两个与非物质生产有关的重要问题进行了总结，一个是消费问题，另一个是精神生产问题。

首先，马克思讨论了消费的生产功能问题。马克思指出，“生产和消费是**内在地**不可分离的”，但是“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内实际上是分离的，所以它们的统一要通过它们的对立来恢复”[2]。产业资本的生产是为了生产而生产，作为它的对立面，另一方就要为了消费而消费。因此，经济学就可以将消费者的享受和挥霍也变成“生产劳动”。这种看法大部分是从经济学的基础上对有闲富人和开支庞大的“强大政府”进行辩护。抛开这些争论不谈，从“资本一般”理论的角度来看，作为劳动能力人格化的工人和作为资本个人化的资本家都不具备享受和挥霍的形式规定。资本和雇佣劳动制度的形式规定是价值的不断增加，也就是不停地生产，“工人的剩余生产是**为别人而生产**……产业资本家的生产则**应该是为生产而生产**”[3]。与剩余生产相对，必然有剩余消费。虽然将物质财富转移给地主、政客和教会等等阶级会减少产业资本家的物质财富，但只有这样做才能使资本家的致富欲旺盛不衰，从而“保存他的资本主义灵魂”[4]。消费的生产性的另一种表述是，只要满足某种需求的劳动就是生产劳动，也就是说，只要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就是生产劳动。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说，“**消费**使产品成为财富”[5]，将使用价值和价值混淆起来。在之前的论述中马克思已经强调过，任何的行为都可能会对人（即生产主体）产生影响，但是关键在于这种影响是否实现了价值的增殖。满足他人的需求、产生某种影响，都只是私人行为，只要它没有采用价值形式进入交换，那么就不属于经济学研究范围。

其次，马克思还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讨论精神生产的问题。马克思认为，将精神生产证明为产生财富的活动并没有给精神生产带来什么正面的评价，反而贬低了精神生产，将它变成了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意识形态。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本来就属于完全不同的领域，其中既有意识形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09，322，324，327，345，349，354.

② 同①344.

③ 同①343.

④ 同①344.

⑤ 同①361.

态的部分，也有不受物质生产决定的自由的部分，马克思举例说，“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①。将精神生产当作生产劳动，实际上就是用物质财富的标准来衡量精神生产，硬说“精神产品的生产或服务的生产就是**物质**生产”②。例如施托尔希对精神生产的生产性辩护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完成的，认为内在财富跟物质财富相比同样具有耐久性，因为精神产品不会因为使用而消灭，反而会因为运用而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因此，“内在财富也像一般财富一样，可以积累起来，能够形成资本，而这种资本可以用来进行再生产”③。马克思批评道，这不过是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之间最一般的表面的类比和对照。为了反驳施托尔希的观点，马克思提出了在一定物质生产条件下研究精神生产的三条原则：

> (1) 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这样就不能超出庸俗的见解。
>
> (2) 从物质生产的一定形式产生：第一，一定的社会结构；第二，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人们的国家制度和人们的观念由这两者决定。因而，人们的精神生产的方式也由这两者决定。
>
> (3) 执行社会职能的统治阶级的各种职业活动。这些阶层的存在以及他们的职能，只有根据他们生产关系的一定的历史结构才能够理解。

马克思认为，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够既理解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组成部分，也理解这种一定社会形态的自由的精神生产”④。精神生产者给社会带来的有益产品，正说明资产阶级社会中现实的深刻矛盾：医生生产健康，实际上是现实导致的普遍疾病生产医生；诗人和画家生产趣味，实际上是现实导致的普遍无趣生产诗人和画家；类似地，普遍不道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46.

② 同①347.

③ 同①347.

④ 同①.

德生产道德家，普遍迷信生产传教士，普遍的不安全生产君主。这些服务“都生产现实的或想象的使用价值”，都满足现实或观念上的某种需求。

除了施托尔希之外，精神生产的辩护者还试图证明斯密界定从事精神生产的“非生产者”的生产同物质生产者的生产没有不同，他们“直接生产的不是特殊种类的产品，而是物质劳动的产品，所以他们直接生产财富”①。在结束关于施托尔希的简短评述时，马克思列了四条论纲来反驳上述辩护者的荒谬说法②：

> (1) 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各种职能是互为前提的；
>
> (2) 物质生产领域中的对立，使得由各个意识形态阶层构成的上层建筑成为必要，这些阶层的活动不管是好是坏，因为是必要的，所以是好的；
>
> (3) 一切职能都是为资本家服务，都为了资本家“好”；
>
> (4) 连最高的精神生产，也只是由于被描绘为、被错误地解释为物质财富的直接生产者，才得到承认，在资产者眼中才成为可以原谅的。

总体来说，精神生产的生产性只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一些精神生产担负了调和资产阶级社会内在矛盾的社会职能，因此具有了社会性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一些精神劳动直接就是雇佣劳动，是资本家的物质财富的直接来源。

马克思对这些反对斯密的经济学家进行了讽刺，认为他们只不过是拼命证明自己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是有益的。“对奴仆、仆役的**颂扬**，对征税人、寄生虫的**赞美**，贯穿在所有这些畜生的作品中”；相比之下，“古典经济学粗率嘲笑的性质，倒显得是对现有制度的批判”③。马克思此处实际上凸显了斯密生产劳动理论在科学上的诚实，斯密的生产劳动理论并不是要证明哪些劳动具有生产性，而只是要证明资本积累具有生产性，即资本的生产性。相比之下，这些批评斯密的经济学家反而显得庸俗不堪。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48.

② 同①.

③ 同①362.

第二节 流通理论与不变资本的再生产

19 世纪中期，欧洲主要的工业国已经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不变资本（特别是机器）在资本投入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机器的普遍应用在理论上给劳动价值论制造了不小的困境，同时也为资本在生产中的主导地位提供了现实的辩护。机器和土地等固定投入在生产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相较而言投入在工人上的资金比例越来越小，劳动似乎已经不再是衡量价值的唯一尺度。按照原来的写作计划，机器的问题本应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中得到说明，但是马克思尚未解决不变资本的补偿问题就中断了第 V 笔记本的写作。后来，在批判斯密时，马克思耗费了大量篇幅来讨论不变资本如何在生产和流通中得到补偿，从而在“资本一般”的视角下对机器的作用进行了批判性的解释。这些内容主要写在第 VI 笔记本第 272 页到第 VII 笔记本第 299 页，马克思完成了关于生产劳动的评述之后，又从第 IX 笔记本第 379 页开始对不变资本的补偿问题进行了增补。

一、古典经济学对资本积累的辩护

在经济学中，资本积累意味着生产条件的改善。为了保证生产的顺利进行并提高生产的效率，资本家需要大量的货币投入，经济学据此对资本积累进行辩护。机器大生产普及之后，机器采购方面所需的资金投入越来越大，使得资本积累看起来越来越不可或缺。此外，机器大工业导致经济运行中出现了更多的社会问题，给经济学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在经济学中，机器和科技的运用为资本主义的未来带来了希望，造价昂贵的机器成为促进生产的重要力量，也成为抵抗利润率下降的唯一可能。在道德哲学中，机器则制造了巨大的人道主义困境，人在机器的强制下进行着过度的劳动，并沦为机器的一部分。上述问题成为古典经济学中机器理论的现实和理论背景。

1. 机器与资本积累的必要性

在斯密的经济学中，资本积累对于提高生产效率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通过资本积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有很多条，例如扩大市场、细

化分工、提高生产劳动在社会总劳动中所占的比例等等。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资本积累可以提供工资基金。工资基金指的是产品生产和销售过程中的工人的全部耗费，包括工人用于吃、穿、住等所有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耗费。资本家必须以产品或货币的形式将工资基金储蓄起来，只有这样才能让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成为可能。与曼德维尔等主张刺激消费的重商主义者不同，斯密认为通过节俭和储蓄实现的资本积累是实现繁荣和增长的关键因素。除了提供工资基金之外，资本积累基础上的机器应用是促进分工细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只不过机器以更加极端的形式将分工细化的趋势表现了出来。

机器代表了分工细化和专业化的高级阶段，同时也是通过资本积累实现经济利益的最佳例证。为了解释利润的不同来源，斯密区分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流动资本的利润来自其他人的收入，而固定资本的利润来自资本本身。通过流通来获取利润的方式普遍存在于各个历史时代，因此斯密所说的现代资本积累实际上主要指的是固定资本基础上实现的资本生产。斯密认为，用来购买机器的固定资本“不必经过流通，不必更换主人，即可提供收入或利润”①。通过固定资本的积累和机器的应用，资本家可以在不损害人和人利益的情况下获得利润。虽然资本家从事经济活动的自觉目的是在个人消费、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三个项目上分配自己的货币进而实现个人财产的增殖，而他不自觉的结果是为社会提供了更多的产品并降低了产品的生产成本。

斯密也注意到了机器应用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例如工人的劳动变成了毫无创造力的、简单重复的机械任务，人变成了机器的附属物；在机器生产的过程中，人可能会因为工作本身感到厌烦，甚至失去原本的人性。不过，斯密仍然相信高度发展的分工毫无疑问地增加了社会产品的供给，从而为社会共同福利的实现提供了物质基础。与此同时，机器的采用使得生产对资本积累的要求越来越高。只有保证足够的资本积累水平，才能避免高度分工导致的生产中断，同时也才能通过购买昂贵的机器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由此可见，机器的应用实际上为利润和资本积累的合理性提供了另一重辩护，产品价格的分配应当优先考虑资本家的资本积累，为资本家留出足够的利润，否则资本家就没有资金和动力去采

① 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 郭大力，王亚南，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257.

用更加先进的技术或购买更有效率的机器。

除此之外，机器的应用还是克服危机的必要手段。在古典经济学中，资本主义的危机实际上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危机是生产和消费比例失衡而带来的危机，古典经济学普遍相信这样的危机是正常的，而且可以通过自由竞争的自然秩序自动消除；第二种危机是由利润率下降规律所导致的致命危机。李嘉图和斯密都认为资本生产的利润率会不可避免地持续下降，并最终趋于零。为了保证必要的利润率，就必须在单位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商品。在利润率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对于单个资本家而言，机器以及新技术的应用被当作拯救保证利润率的唯一出路。

2. 李嘉图对机器问题的解决

机器大工业在斯密的时代还没有充分发展，因此斯密几乎没有考虑劳动价值论与机器生产之间的矛盾。然而在李嘉图的时代，机器生产已经成为普遍的现象，越来越多的产品由机器直接生产，而不是由工人直接生产。如何计算机械化生产的产品的价值，成为经济学家必须面对的问题。李嘉图试图运用劳动价值理论解决这一问题，将机器等固定资本的投入当作被储存起来的劳动。

为了解释产品价格的形成机制，李嘉图从不同的角度区分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李嘉图坚持彻底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固定资本就是储存起来的劳动。在资本生产过程中，固定资本的价值不断贬值并转移到产品身上。因此在一次流动周期中，产品的价格由三部分组成：流动资本的全部价值、固定资本的部分价值以及工人超出工资以外的劳动价值。李嘉图以严密的逻辑推理证明了，虽然机器可以生产出更多种类和数量的产品，但是机器本身并没有提供新的价值，产品的全部价值都是由以钟点计算的活劳动来衡量的。尽管这样的解决方案仍然无法被精确地计算，不过它大体上为劳动价值理论指出了一条出路，勉强地维护了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立场。

李嘉图的理论一经发表就在英国经济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令李嘉图始料未及的是，他的劳动价值理论被社会主义者加以演绎，反而成为对古典经济学最声势浩大的批评。英国的社会主义者认为，既然产品价格中的所有部分——固定资本、流动资本、新增劳动——都是由工人的劳动时间计算的，那么工人就是产品价格的唯一创造者。社会主义者据此要求，工人应当占有全部的社会财富，资产阶级对工人产品的无偿

占有是一种不平等的非正义行为。为了应对社会主义者的攻击，李嘉图之后的主流经济学家放弃了彻底的劳动价值理论，转而再次采用了生产成本理论来为资本的利润做辩护。

除此之外，李嘉图也关注到了机器应用带来的另外的消极后果，即技术性失业。在《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的第三版中，李嘉图增加了题为“论机器”的章节。在这个篇幅短小的章节中，李嘉图表达了对机器应用的担忧，即机器的使用可能会削弱社会对劳动的需求。随着机器的大规模采用和机器价格的上升，机器的采购可能会占用一定的流动资本，从而导致社会总资本中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比例的变化。如果流动资本固定化的现象持续存在，那么就可能会导致工人工资水平的下降甚至失业，但是李嘉图没有对此进行充分的讨论就草草结束了这一章节。

综上所述，古典经济学内部关于机器的讨论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首先，机器的成本是否应当由消费者的收入来补偿；其次，机器生产是否能消除危机的发生；最后，机器是否会导致人道主义危机和技术性失业。这些问题共同构成了马克思讨论不变资本补偿的理论背景。

二、“资本一般”与不变资本的补偿

无论对于维护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还是对于批评现代生产的社会主义者，机器的采用都是十分紧迫的理论和现实问题。除了“剩余价值理论”之外，“1861—1863 年手稿”过去被理论界重视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包含了马克思对于机器问题的讨论。马克思对于机器以及自然科学的解释同样需要在“资本一般”理论的整体框架下才能得到展示。

1. 机器问题在生产和流通中的表现

机器大工业生产中机器所带来的难题在“1861—1863 年手稿”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关于这一问题的关注几乎贯穿了手稿写作的始终。但是，机器问题在“资本一般”理论不同的环节中有着不同的表现，虽然相关的讨论都共同服务于“资本一般”的整体逻辑，但是仍然不能混为一谈。简单地说，马克思在“1861—1863 年手稿”中关于机器的讨论是在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两个不同层面上进行讨论的，马克思在“资本的生产过程”环节遇到了不变资本——特别是机器——的价值补偿问题，这个问题最终在“资本的流通过程”环节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

在“资本的生产过程”中，机器是“相对剩余价值”的最高阶段，即生产条件作为资本家的所有物与工人完全对立。由于无法解决机器价值与产品价值的关系，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只写了一半就中断了第一阶段的写作。然而这一困境在“资本的生产环节”是无法突破的，因为从单个资本家来看，机器是他最大的投入成本，必然要体现在商品的价格上。为了解决这一困境，马克思在系统地摘录斯密和李嘉图的著作时不停地专门对这一难题进行解决。在“资本的流通过程”中，机器问题讨论的是不变资本或固定资本的补偿，即购买机器的成本在资本周转和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相应地，马克思关于机器的讨论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马克思在“资本的生产过程”中讨论了机器的应用对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影响，由于无法解决机器价值的补偿问题而中断了写作；第二阶段，马克思在写作历史评述部分时专门讨论了不变资本的价值补偿问题，从而解决了第一阶段所遇到的问题；第三阶段，马克思在 1863 年初恢复了第一阶段的写作，完成了“相对剩余价值”标题下机器的后续内容。

表 13　　“1861—1863 年手稿”中关于机器问题的内容分布

<table>
<tr><th>笔记本编号</th><th>页码范围</th><th>标题</th></tr>
<tr><td>第 V 笔记本</td><td>190—211</td><td>3. 相对剩余价值
(c) 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td></tr>
<tr><td>第 VII 笔记本</td><td>270—299</td><td rowspan="2">5. 剩余价值理论
(c) 亚当·斯密
年利润和年工资怎样才能购买……包含不变资本的商品
收入和资本的交换</td></tr>
<tr><td>第 IX 笔记本</td><td>379—391</td></tr>
<tr><td>第 XIII 笔记本</td><td>732—752</td><td>(h) 李嘉图
李嘉图的其他方面。李嘉图这一节的结尾（约翰·巴顿）</td></tr>
<tr><td>第 V 笔记本</td><td>211—219</td><td rowspan="2">3. 相对剩余价值
(c) 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
分工与机器工厂。工具与机器。机器代替劳动</td></tr>
<tr><td>第 XIX—XX 笔记本</td><td>1159—1253</td></tr>
</table>

从手稿的写作状况来看，“剩余价值理论”中关于机器和不变资本补偿的讨论应当是计划外的写作内容。而且在整理过程中，马克思也

说：“不变资本的再生产问题，要在关于资本再生产过程或流通过程的那一篇里谈，但这并不妨碍在这里就把基本问题弄清楚。”① 马克思在评述斯密的价值理论时插入了拉姆赛② “对于亚·斯密称为‘全部价格的第四个组成部分’的……意见”，马克思认为拉姆赛理解的“固定资本”就是“不变资本”③。不过，由拉姆赛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整个资本（作为价值）都归结为劳动……有酬劳动等于工人的工资，无酬劳动等于资本家的利润”；那么，谁来补偿“在生产过程中消费了的、同时又是作为再生产条件的那种价值”④？简单地说，工资和利润都是通过产品的最终销售才最终实现的，但是机器等固定资本的支出应当由谁来支付呢？在19世纪出现过的一些通俗读物试图用机器的投入来为资本家的利润辩护，认为如果不给资本家支付一定数额或比例的利润，资本家就无法购买机器进行再生产。

如何理解机器所代表的经济形式成为马克思制定“资本一般”理论时所遇到的两个主要困境之一。由于“资本一般”部分特殊的逻辑结构，如果机器的运用不能在“资本一般”的辩证环节中被说明，那么“资本一般”部分的批判性就无法保证了。马克思因此用了相当大的精力来推算如何在不提高产品价格的情况下实现机器的价值补偿。

2. 机器的投入如何由资本互相补偿

为了方便讨论，马克思将收入形式简化为工资和利润两种，而不考虑利息和地租，因为货币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收入都来自利润的再分配。从单个资本的角度看，按照资本生产过程的形式规定，产品价格由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88.

② 拉姆赛（George Ramsay，1800—1871），英国经济学家。拉姆赛的主要理论成果是在他的著作《论财富的分配》中对李嘉图的价值理论进行补充和修正，其理论背景是19世纪20年代英国经济学界发生的一次关于李嘉图价值和资本理论的大规模论战。拉姆赛认为，雇主在生产中获得的总利润分为纯利润和企业利润两部分，雇主从事生产需要从工人、资本家和地主那里购买生产要素，因此需要向他们支付纯利润（工资、利息或地租），而余下的企业利润则归雇主本人所有；然而，供雇主进行再分配的新价值（即剩余价值）完全是由工人创造的，工资在总利润中所占的比例就成为政治经济学分配理论的主要研究对象。尽管马克思对拉姆赛的理论贡献做了客观的评价，但从后来经济学的发展来看，拉姆赛的理论几乎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论财富的分配》一书在1836年出版后默默无闻，很快就绝版了，直到1974年才作为“经济古典名著”在美国再版。

③ 同①83.

④ 同①85.

三部分构成，分别是可变资本、不变资本和剩余价值。其中可变资本构成了工人的工资，由工人的必要劳动来补偿；剩余价值构成了资本家的利润，由工人的剩余劳动来补偿，“一部分成为资本家的消费基金，一部分转化为追加资本”①。那么对于单个资本而言，问题就在于生产中已经消耗的不变资本的价值应当由谁来补偿。从社会总资本的角度来看，“无论在什么时候，总有一定的不变资本作为生产条件……永远属于生产”，但是“它必须再现在产品的价值中。……这一定量的劳动要作为决定产品价值的因素之一转移到产品价值中去”②。这里出现的问题还是一样的，如果以年为单位的话，每年新增加的工资和利润都是由工人的活劳动提供的，工资和利润的总额可能买不回产品的总额。

马克思举了一个例子，假定每码麻布都包含 2/3 不变资本和 1/3 新加劳动，那么工资和利润加在一起就只能买回总产品的 1/3。例如，织布厂的工人一天工作 12 小时，共生产 12 码麻布，这 12 码麻布价值 36 小时的劳动时间；这就意味着，工资和利润总共只能买回价值 12 小时劳动时间的产品即 4 码麻布，那么“其余 8 码又将怎样呢”③？从占有关系上看，这 8 码麻布是资本家的所有物，他如果要赎回自己的成本就必须在社会中找到新的购买者。马克思在这个例子旁边再次标记了福尔卡德和蒲鲁东的名字，说明在这里要解决的正是第 V 笔记本中断处所提出的问题。为了解决“8 码麻布难题”，马克思再次假定除了织布厂 A 之外还存在另外两个工厂，分别是制鞋厂 B 和屠宰厂 C，B 和 C 将所有的新加劳动时间的一部分用来购买 A 的 8 码麻布，这样 A 的困难就被转移到了 B 和 C。然而，“困难并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④，B 和 C 虽然补偿了 A 的不变资本，但是 B 和 C 的不变资本仍然需要其他的生产部门来补偿，这将是“一个美妙的无止境的演进”⑤。马克思以此来证明，“要用收入的价值补偿整个产品的价值是不可能的”⑥。如果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工资和利润都用于生活消费，那么不变资本的补偿就是无法解释的，由此就会落回到福尔卡德和蒲鲁东的论调之中。经过长篇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87.
② 同①.
③ 同①91.
④ 同①96.
⑤ 同①98.
⑥ 同①104.

的运算之后，马克思指出，“完全不问交换，只考虑这12码麻布如何在所有生产者——参加麻布本身或麻布各要素的生产的人——之间分配，这整个谜就能解开”①。

经过再次长篇的复杂运算，马克思给出了最终的答案：不变资本得到补偿的方式是将自己“不断地重新生产出来，并且有一部分是自己再生产自己”②。马克思在这里实际上区分了三种特殊资本类型：第一类是从事种植业的资本，其农业部分的不变资本由自己的产品来补偿，即“自己补偿自己”③，因此所有的收入（即工资和利润）在扣除机器的投入之外都可以用来消费；第二类是机器制造厂主和原料生产商，他们的产品作为生产资料“互相加入对方的不变资本”④，从而以实物的方式得到补偿；第三类是从事消费品生产的厂商，例如之前例子中生产麻布的织布厂，在第二类资本以实物形式相互补偿的情况下，“加入消费的最终产品的消费者就用不着补偿这种不变资本，因为它已经得到了补偿”⑤。

后来，马克思再次分别讨论了收入补偿机器投入的问题以及李嘉图在机器问题上的错误。机器的运用使资本家的利润有了新的辩护方式，经济学普遍地认为，在产品价格中应当有一部分作为资本家的利润，因为资本家需要额外的利润去维护和购买机器。而马克思的反驳方式是，证明机器等不变资本已经在生产过程中得到补偿，不必再在各种收入形式中进行价值补偿；“商品价值中只代表原料和机器的价值的那一部分，即只代表消耗了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的那一部分，决**不**会构成**收入**，**只是**补偿**资本**而已”⑥。而李嘉图“在考察纯收入时又犯了一个错误，即把总产品归结为收入，也就是归结为工资、利润和地租，而把应得到补偿的不变资本撇开不谈”⑦。李嘉图将机器的投入也算作产品价格的一部分，认为产品超出新劳动的价值就来自机器价值的部分实现。因此加入消费的最终产品的消费者就用不着补偿机器的不变资本，因为它在“互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10.
② 同①132.
③ 同①127.
④ 同①133.
⑤ 同①134-135.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2.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619.

相提供生产资料的不同生产领域之间……已经得到了补偿”①。在进入不变资本补偿问题的讨论之前，马克思在评述拉姆赛时批评了李嘉图在不变资本方面的错误。“当李嘉图谈到产品分为利润和工资的时候，他总是假定，预付在生产上并在生产中消费了的资本已经扣除。……李嘉图对资本的不变部分没有作任何进一步的分析，忽视了它，犯了重大的错误，特别是把利润和剩余价值混淆起来，其次在研究利润率的波动等等问题上也犯了错误。”② 在马克思看来，“一部分资本家生产的商品**直接**加入工人的消费；另一部分资本家生产的商品或者**只是间接地**加入工人的消费（就这种商品作为原料和机器等等加入生产必需品所需的资本而言），或者**根本不加入**工人的**消费**，因为它们只加入非工人的收入”③。不变资本的补偿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揭示了资本的价值量并没有全部转化为收入，而是部分地作为不变资本在资本之间完成相互补偿。在此之后，马克思在评论斯密、李嘉图、洛贝尔图斯和马尔萨斯的时候，都指出他们没有考虑到不变资本的问题，而直接把资本和各种收入形式对应起来。

总体上讲，资本家的预付资本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来购买劳动力，另一部分用来购买生产资料。在假定地主阶级不收取地租的前提下，预付资本中的可变资本构成了工人的收入，而不变资本则构成了不同部类的资本家之间的货币流通。马克思认为，不变资本的相互流通虽然不产生剩余价值，但是已经补偿了机器本身的价格。作为阶级，资本家预付的货币构成了各阶级的收入；作为个体，预付资本中用于固定资本支出的部分是相互补偿的。因此，不变资本的投入由资本家阶级内部互相补偿，而不用工人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收入来补偿，不会增加单个产品的价格。

3. 机器生产与资产阶级社会的规律

机器问题的争论也体现了古典经济学家在揭示资本主义生产规律时的二重性，他们一方面认为机器的使用有利于促进生产，另一方面又认为机器的使用会导致人道主义的危机。斯密和李嘉图都将资本生产视为促使机器应用的现实动力，因此机器生产的二重性在古典经济学中也就等同于资本生产的二重性。然而马克思认为，机器促进生产，发挥促进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34-135.

② 同①83.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9.

生产的功能，完全是因为它作为物的自然属性，与具体的经济形式没有关系；导致人道主义危机的不是机器，而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关系。

古典经济学中关于机器的讨论，是基于以下这样一个简单事实：机器的价格十分昂贵，但是机器的应用却使产品的价格更便宜了。机器生产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矛盾，恰好体现了斯密对于资本积累的辩护：资本家进行资本积累的目的是获取利润，但是资本生产在客观上实现了社会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的普遍下降。此外，在庸俗的经济讨论中，机器生产又构成了对利润的一种道德解释：虽然资本家用自己的储蓄购买机器是为了获取利润，但是这种行为客观上带来了社会福利的增加，个体消费者理应多支付一部分货币给资本家，用来补偿资本家放弃个人享受而进行的储蓄行为。总之，经济学内部总体上认为机器生产是促进财富增长的积极因素，并认为经济政策的制定应当鼓励新技术和新机器的应用，从而降低社会生产和交易的成本。

当然，在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的同时，机器的应用也会造成一些消极的结果。例如，斯密就已经关注到，机器生产中简单重复的劳动工序会损害工人的身体和精神，机器的大规模应用也会贬低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导致社会道德水平的下降。李嘉图后来也意识到，机器的大规模应用会导致流动资本的减少，从而造成劳动需求的下降和工人的技术性失业。不过，基于古典经济学一贯的二重性立场，斯密和李嘉图都相信机器所带来的财富增长是主要的，其消极结果虽然无法消除，但也并不会影响机器的积极作用；如果为了消除机器的消极结果而放弃机器生产，那才是真正的得不偿失。

基于“资本一般”理论，马克思对这样的二重性观点进行了批评。机器促进生产的功能来自它自己的自然属性，与资本没有必然的联系。在任何一种社会形式中，机器都可以发挥同样的促进生产的作用。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形式中，机器被赋予了一些额外的特殊功能；这些功能是资本的属性，而不属于机器本身。

作为自然的存在物，机器本身的功能显而易见。它利用自然力来提供能源，利用机械性来代替人工，从而节省了大量的人力。无论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还是非资本主义的生产中，机器都有上述功能。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中，机器又具有一些特殊的性质，而且机器工业从肇始之初就与资本主义生产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单纯对机器进行分析，那么

所有的属性看起来都是机器的自然属性；通过对机器的唯物主义分析将无法区分哪些属性是机器作为物的自然属性，而哪些属性是机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获得的特殊属性。前文已经提到，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的就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各种社会形式从物质材料上剥离出来”①，而剥离的方法就是他的“资本一般”理论。

作为资本，机器工业的第一种功能是降低生产生活必需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就通过降低必要劳动时间的方式提高了剩余劳动时间。通过“资本一般”理论的逻辑过程，马克思揭示了个体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使用机器的目的不是减轻工人每天的辛劳，而是为了缩短一个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② 机器的采用不是为了缩短工作日，而是为了缩短工人生产其工资必需的劳动时间。在“资本的生产过程”环节，马克思通过对资本概念的形式演绎展现了价值通过购买劳动能力实现增殖的两种可能，即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在绝对剩余价值生产遇到其界限③的情况下，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成为价值实现增殖的主要方式。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中，剩余价值或资本的利润来自必要劳动时间（即劳动能力价格）的下降。价格高昂的机器使产品变得便宜这种诡异现象，恰恰反映了资产阶级生产的本质规定。简而言之，机器作为自然物的功能，是在一定的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而机器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工具的功能，是降低工人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进而实现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因此，机器等固定资本的积累并不会直接带来利润，换句话说，不变资本不是剩余价值的直接来源。在“资本一般”的逻辑演绎中，机器提供的利润是通过降低产品成本的方式间接实现的。资本家通过使用机器而产生的剩余价值，并非来源于机器所代替的劳动能力，而是来源于机器使用的劳动能力。资本家通过机器生产获得利润，不是因为工人的生产效率提高了，而是因为归工人所有的那一部分产品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93.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63.

③ 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会遇到自然和形式双重限制，一方面工作日不可能无限地延长，另一方面任意延长工作日也不符合“资本一般”中对于劳动能力商品的形式规定。资本家要求尽可能地延长劳动时间，而劳动能力的保持则要求限制劳动时间的长度；这两种要求都符合商品交换的一般规律，它们的对立在现实中体现为全体资本家即资产阶级和全体工人即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直到国家政权将每天的总劳动时间规定一定的界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06.）

的数量（比例）变少了。[1]

作为资本，机器工业的第二种功能是提高生产资料的集中程度，从而为雇佣劳动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前提。机器生产的大规模使用，使得组织生产的成本越来越高，同时也就导致了个体更加难以获得足够的生产资料独自从事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在劳资的博弈中就更加处于不利的位置。工人进行罢工等形式的斗争一般是为了保证工资和劳动时间方面的利益，也就是要求限制剩余劳动时间，或者把部分剩余时间转移给工人自己。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对抗，原本只是一个阶级和另一个阶级、一部分人和另一部分人的博弈。但是，资本家一旦采用机器与工人对抗，机器也形成了“**与劳动相敌对的资本形式**”：机器一方面直接是缩短必要劳动的手段，另一方面成了资本镇压劳动追求独立的一切要求的手段。[2] 而且工人的处境会随着新机器的发明和应用进一步恶化，新机器的发明会导致以前的劳动成为完全多余的，会减少所需工人数量，使新的劳动比以前的劳动简化，使工人进一步沦为资本的附庸。简而言之，机器的采用把单纯的自然力（水、风、蒸汽、电等）也转化成了资本的力量[3]，工人所拥有的就只剩下单纯的劳动能力，只能将自己变成雇佣工人，屈从于资本的生产。

在第 V 笔记本中，马克思对此进行了大篇幅的讨论。马克思首先区分了资本家采用机器的两个因素：“**第一**：工人所处的、而且使得资本家有可能强制延长劳动时间的新条件。**第二**：促使资本这样做的动机。”[4] 关于第一点，即机器对延长工作时间的功能，马克思列举了两个原因。首先，劳动的形式变简单了，资本可以雇用更容易受资本支配的非熟练工。劳动难度的下降，使得“全国各地〈贫民习艺所〉”大量无家可归的儿童都成为雇佣工人的后备军。工厂主可以不依赖于技术工人，并以大量的工人后备军作为延长劳动时间的主力和筹码。其次，工厂可以雇用更加顺从资本专制的童工和女工，并将工作日延长到晚上。妇女的恭顺温柔的天性，竟成为她们受奴役和受苦难的根源。[5] 随着机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73.

② 同①387.

③ 同①366.

④ 同①376.

⑤ 同①376-377.

器的改进，工厂主的贪欲使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要求自己的工人付出比他们可能承担的更多的劳动。关于第二点，马克思做了三处说明：首先，对剩余劳动的贪欲是推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并不是机器的独特本性；其次，为了尽快收回投入在机器上的资本，同时避免新技术导致的旧机器贬值，资本家会延长工作日来尽量多地使用机器；最后，在较短时间内收回机器的价值后，资本家可以采用新的改良的机器并把旧机器廉价卖给其他资本家，双方都有利可图。

马克思特别强调，以上所述不仅适用于机器，而且“也适用于作为使用机器的结果和条件的全部固定资本”①。在简单协作和分工等初级的资本主义生产形式中，组织劳动不需要支出更多的货币，资本家通过它们来提高生产力不费分文。而现代生产的组织运行需要耗费大量的成本，这也使得个体作为社会成员显得更加孤立无援。科学、机器以及现代大工业是与资本主义内在一致的庞大系统，它们的自为的目的是增加利润，而自在的结果是生产资料的进一步集中。高度理性化的社会生产与高度科层化的生产社会实际上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它们一方面通过降低社会生产成本的方式提高利润，另一方面也在提高生产资料集中程度的同时消灭了人实现独立和自由的可能。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继承了斯密和李嘉图关于机器的忧虑，即机器所造成的人的异化以及技术性失业。但与斯密和李嘉图不同，马克思不认为机器的应用、科技的发展以及社会的合理化可以避免危机的发生，它们本身只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部分，因此不可能消除资产阶级社会的病症。

第三节 地租理论与平均利润的形成

在前两个问题的分析中，马克思都没有提及地租的问题。不过，作为收入分配中的一种重要形式，地租本身也是产品价格当中无法回避的一部分。如何解释地租的性质是劳动价值理论的另一个难题，即没有价值的土地如何拥有了价格。马克思原本打算在“资本一般”理论中不考察地租问题，然而由于一个偶然的契机，拉萨尔催促马克思归还洛贝尔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78.

图斯的书，马克思在对洛贝尔图斯进行评述时转向了对李嘉图地租学说的专门讨论。19 世纪，由于农业生产的利润率长期高于工业生产的平均利润，如何对地租的性质和作用进行界定始终是政治经济学争论的重点和难点。在阐述“资本的生产过程”和通过“资本一般”建构平均利润理论时，马克思都遇到了地租与平均利润相矛盾的难题。在笔记本 X—XIII 中，通过批评和超越李嘉图地租理论，马克思提出了与剩余价值理论相一致的地租理论，标志着“资本一般”理论体系的初步完成。

一、经济学中关于地租来源的争论

政治经济学代表了新兴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地租的存在则代表了传统的贵族、教会和地主阶层的利益。古典经济学中的地租理论往往都带有极强的现实导向，关于地租性质的争论也往往象征着新旧社会主导力量之间的理论角力。

1. 地主阶级获得收入的道德依据

在古典经济学的解释框架中，地租是地主阶级的收入，即产业资本家支付给土地所有者的货币。斯密和李嘉图都认为，产业资本家组织的商品生产是促进国民财富增长的积极力量，而地主阶级的经济功能似乎并不明显。因此，地租作为一种收入的合理性一直饱受质疑，关于地租的讨论也就成为经济学争论中的重要议题。

斯密关心的核心议题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增长的动力，相较而言，地租问题在斯密的经济学体系当中处于相对边缘化的位置。因此，斯密的地租理论远远没有它的资本积累理论那样严谨，至少提出过四种不同的说法来解释地租的来源：“（1）地主的需求；（2）垄断；（3）差异化的优势；（4）大自然的施舍”①。斯密认为，支付给土地所有者的地租虽然构成了产品价格的一部分，但是地租本身并不是价格的决定因素，“工资和利润的高低，是价格高低的原因，而地租的高低，却是价格高低的结果”②。也就是说，地租的来源实际上是产品价格支付过工资和利润之后的余额。斯密的这种观点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却指出了一个重要的经济事实，即土地所有者本身是没有生产功能的。地主的收益完全

① 兰德雷斯，柯南德尔. 经济思想史. 周文，译.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108.

② 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 郭大力，王亚南，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138.

取决于资本家的经营状况，当产品价格高的时候，资本家就必须将利润中更大比例的一部分作为地租支付给地主。尽管斯密相信土地所有者将会从经济的发展中获益，但是他的理论本身还是显示出了地主与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冲突。

与斯密相比，李嘉图对地租的批评更加直白。李嘉图根据劳动价值理论指出，产品的价格完全由耗费在产品上的劳动时间决定；劳动总时间不变的情况下，社会产品的总价格也不会变化。为了将产品生产出来，资本家需要预先支付一部分货币给工人和地主，来购买必需的生产要素；其中支付给工人的工资是一个固定的值，即维持工人生存的最低的工资①，而支付给地主的地租却会越来越高。土地资源是有限的，无法通过社会再生产进行补充；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空地的减少，地租的水平将会越来越高。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更高的地价，但是土地所有者自己的活动却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没什么贡献。从社会经济的整体来看，土地的总供给是一个恒定的值，因此土地所有者对经济增长没有贡献；相比之下，资本家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却要将自己收入中越来越大的部分作为地租支付给土地所有者。基于上述理由，李嘉图将地租当作一种不劳而获的收入，并主张对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征以重税。李嘉图的地租理论体现出了极强的前瞻性，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者也普遍相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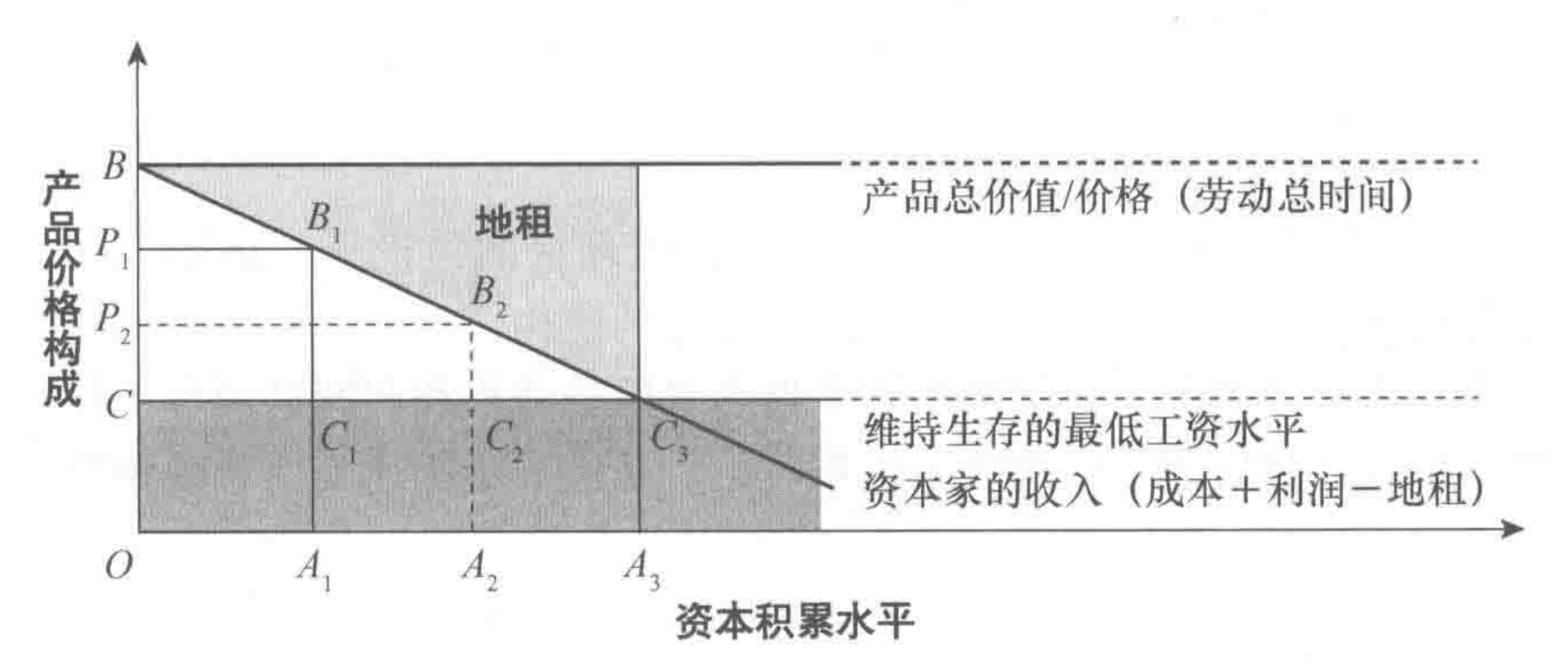

图 11 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简化图

① 李嘉图认为，工人的工资水平会一直保持在最低的水平上，这种说法又被称为“工资铁律”。李嘉图改造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对“工资铁律”的形成机制进行了解释：当工资水平上升的时候，工人群体的人口数量就会上升，从而加剧工人之间的竞争，直到工资水平重新回到维持生存的最低水平上。

“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地租并不是生产成本”①，土地租金的水平完全取决于其他的经济变量。马克思也认可了李嘉图在这方面的贡献，指出“李嘉图只解释了**级差地租的存在**，实际上否认**土地所有权**有任何**经济**影响”②。

面对古典经济学对地主阶级的批评，马尔萨斯为地主阶级收入的合理性进行了经济学上的辩护。斯密和李嘉图都将资本积累——资本家的储蓄和经营——当作促进财富增长的积极力量，然而他们都忽视了资本积累也可能导致经济上的失衡，即生产过剩或消费不足。马尔萨斯在1820年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引发了他与李嘉图的论战。马尔萨斯认为，在有效需求不变的情况下，一味地投资和储蓄必然会导致生产过剩并最终造成生产的停滞。在现代经济生活的三个阶级中，工人阶级拥有购买商品的意愿，但是缺乏购买的能力；资产阶级具有购买的能力，但是他们将自己的收入更多地用在了资本积累上，而不是用于购买商品；只有地主阶级既具有购买的愿望，又具有购买的能力，是真正的消费者。马尔萨斯据此主张，地主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就是只消费而不生产，通过不断消费来防止经济的衰退和停滞。

斯密、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地租理论共同构成了“1861—1863年手稿”中地租问题相关内容的理论背景。马克思全面考察了他们的观点，并最终将地租理论的历史评述部分列入了“资本一般”的提纲之中。

2. 级差地租与平均利润率的下降

在“1861—1863年手稿”中关于地租理论的讨论里，最引人关注也最艰涩的部分是马克思对级差地租理论的建构。级差地租理论最初是由李嘉图提出来的，李嘉图用这个概念来区分地租和利润这两种不同的收入形式。理解李嘉图的级差地租理论，是进一步阐述马克思地租理论的前提。

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实际上解决的是社会总产品在土地所有者和产业资本家之间的分配问题，因此他对地租的定义也与日常意义上的地租有很大的差别。在日常用语中，地租就是农业资本家支付给土地所有者的货币量。而李嘉图认为，地租是因为农业资本家对土地改进而带给土地

① 兰德雷斯，柯南德尔. 经济思想史. 周文，译.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136.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01.

所有者的额外收益，“地租总是由于新增劳动量的使用导致收益成比例减少而产生的”。这个定义看起来令人费解，既然新增的劳动量会导致收益递减，那么地主是如何从中获得额外收益的呢？这就需要先解释李嘉图对收益递减理论的理解和改造。

收益递减理论最早是法国经济学家杜尔哥和英国经济学家安德森先后发现的一种经济现象，指的是“当其他生产要素保持不变，一种生产要素稳定增加时，总产量的增长率终将变小”①。李嘉图在他的地租理论中接受了收益递减的设定，认为随着资本和劳动的持续追加投入，农业产品的增长率会越来越低。例如，假设将一个单位的资本投入一块麦田上可以产出 100 夸特小麦，按照收益递减理论，如果继续再在农田上追加一个单位的资本，那么农田的产量不会按照同样的比率增加为 200 夸特，而是增加为一个增长率更小的数字，如 190 夸特。因此假定收益递减的比例是 10%，那么随着资本的不断追加投入，第一个单位资本的产量是 100 夸特，第二个单位资本的产量是相对会小一些的 90 夸特，而第三个单位资本的产量是更小的 80 夸特。

为了解释李嘉图的地租理论，这里再次假设总共存在四块肥力不同的土地 A、B、C、D，一单位资本投入在上面的产量分别是 100、90、80 和 70。随着投入在 A 地块上的资本越来越多，单位资本的产量也就越来越低。当投入在 A 地块上的一单位资本只能获得 90 夸特的产量时，那么把同等的资本投入在 B 地块上就是值得的。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农业资本必然会不断地追加投资以产出更多的农产品，直到单位资本的产量降到 70 为止，此时农业资本家把资本投入在 A 地块和 D 地块的回报率是一致的。李嘉图认为，产品的市场价格是按照“在最不利的条件下连续进行生产的人……所必需的较大的劳动量”来计算的，因此农产品的市场价格是按照肥力最差的 D 地块来计算的；相应地，投入在 A、B、C 地块上的资本由于产量比 D 地块更多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回报，这些额外的产量就构成了必须支付给土地所有者的地租。例如，A 地块上共投入了四单位的资本，每单位资本的产量分别是 100、90、80 和 70 夸特，那么农业资本家应当支付的地租总量就是 (100－70)＋(90－70)＋(80－70)＝60 夸特。

① 兰德雷斯，柯南德尔. 经济思想史. 周文，译.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129.

表 14　　李嘉图级差地租理论示意图　　单位：夸特

	第一单位	第二单位	第三单位	第四单位	资本总量	总产量	地租
A 地块	100	90	80	70	4	340	340－(70×4)＝60
B 地块	90	80	70		3	240	240－(70×3)＝30
C 地块	80	70			2	150	150－(70×2)＝10
D 地块	70				1	70	0

根据级差地租理论，李嘉图指出土地本身并不产生价值，农产品的价值由农民的劳动提供；土地所有者收取的地租完全来自产业资本家的经营利润，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使他们拥有与资本家瓜分利润的先天优势。而且，随着劣等土地被耕种，地租的总额会越来越高，进而导致资本平均利润率的不断下降。在图 11 中，当资本积累处在 A_1 的水平时，资本的平均利润率是（B_1-C_1）；当资本积累发展到 A_2 的水平时，劣等土地的耕种就会推高地租的总水平，进而挤压资本的利润空间（B_2-C_2）；当资本积累到 A_3 的水平时，利润率就会降为 0，资本的利润就会全部被地主阶级占为己有。

总之，李嘉图认为，级差地租不断上升的结果是利润率的不断下降。因此，地主阶级实际上是生产的消极力量，李嘉图据此主张对他们课以重税，并鼓励自由的农产品国际贸易。在李嘉图历史批判部分的末尾，马克思专门讨论了资本积累和利润率下降的关系。① 按照斯密的观点，随着资本积累和竞争加剧，利润率会越来越低；而李嘉图对此进行了修正，竞争只会让利润平均化，真正使一般利润率下降的原因是农业生产率的不断降低导致的地租增加。马克思认可了李嘉图将地租归结为瓜分利润的思路，但是不认同李嘉图通过地租来解释利润率下降的理论模型。在马克思看来，地租会随着生产的发展而越来越低，利润率下降的原因在于资本本身的内在规律，而不在于地租水平的变化。

现代的经济学研究也认为李嘉图地租理论具有理论和历史的局限性，李嘉图“将注意力集中于亚当·斯密的经济体——其中，农业是中心，小生产者、小规模生产以及简单的生产技术是标准”，而没有关注“经济体开始从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向以工业为主的经济转变”②。斯密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2 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531.

② 兰德雷斯，柯南德尔．经济思想史．周文，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129.

提出的经济模型来源于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的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在“1861—1863 年手稿”中，马克思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斯密把‘产品的**全部**价值分解为工资、地租和资本盈利’，从而忘掉了**也**构成价值一部分的不变资本；这样，他的确把后来的**所有**经济学家，包括李嘉图，也包括洛贝尔图斯先生在内，都引入了‘**歧途**’。”① 李嘉图沿用了斯密的模型，导致他在理论中无法呈现机器大工业生产带来的生产成本下降和资本收益递增。

二、“资本一般”与地租理论的完成

“资本一般”理论的最后一个环节中，平均利润问题是最为棘手的理论难点，而地租理论是平均利润理论的一个例证。总的来说，地租理论不属于“资本一般”的逻辑结构，因为私人所有的土地和各种自然资源具有独占性，而不具有商品的性质。马克思因此说“土地所有者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却完全是多余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需要“土地作为**不属于**工人阶级的生产条件同工人阶级对立”②。资产阶级以可转让的私有财产为中介来支配工人阶级，获取工人的一部分产品；地主阶级则以不可转让的私有财产（土地）为中介来支配资产阶级，强制截留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收入。

1. “资本一般”与地租理论

马克思虽然制订了考察地租问题的计划，但能够实现理论突破具有一定的偶然性。拉萨尔催促马克思归还关于洛贝尔图斯的书，迫使马克思中断了斯密部分的写作，转而在独立笔记本上摘录、评述洛贝尔图斯关于李嘉图的著作。在评述过程中，马克思逐步制订了地租和平均利润的大致论纲，并马上转入了对李嘉图地租理论和平均利润理论的评述。

表 15　“1861—1863 年手稿”中有关地租问题的内容分布

笔记本编号	页码范围	标题
第 X—XI 笔记本	445—522	(g) 洛贝尔图斯先生。插入部分。新的地租理论 洛贝尔图斯。插入部分。对所谓李嘉图规律的发现史的评论。现在最后回过头来谈，也是最后一次谈洛贝尔图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65-166.

② 同①42.

续前表

笔记本编号	页码范围	标题
第 XI—XII 笔记本	522—523	(h) 李嘉图
	560—574	李嘉图的地租理论
	575—618	级差地租表及其说明
	619—636	亚·斯密的地租理论

“1861—1863 年手稿”的第 X 笔记本原本是一个独立的笔记本，开始写作的时间无法确定。在第 VI 笔记本写作“剩余价值理论”的前几个标题时，马克思基本上是按照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内容进行摘录和评述的。1862 年夏天，由于拉萨尔催促马克思寄还洛贝尔图斯的书，马克思放下了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转而开始在独立笔记本上摘录和评述洛贝尔图斯的著作《给冯·基尔希曼的社会问题书简。第三封：驳李嘉图的地租学说，并论证新的租的理论》。① 在评述洛贝尔图斯著作的基础上，马克思在“资本一般”的总体思路下逐步制定了自己的地租理论和平均利润理论，并对斯密和李嘉图的地租与利润理论进行了批判。马克思制定地租理论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1) 对洛贝尔图斯著作的评述；(2) 地租理论的制定；(3) 对古典经济学地租理论的评述。

马克思逝世之后，关于马克思是否剽窃了洛贝尔图斯的劳动价值论的争论一直是一桩学术公案。恩格斯后来在《哲学的贫困》德文第一版序言和《资本论》第二卷德文第一版序言等著作中多次否认洛贝尔图斯的指责并证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原创性。“1861—1863 年手稿”中关于洛贝尔图斯著作的评述，是目前保留下来的马克思与洛贝尔图斯对话的唯一文本。在阅读这部分手稿后，恩格斯专门讨论了马克思对洛贝尔图斯的批评。

马克思制定地租理论的第一部分，是对洛贝尔图斯著作的评述。由于洛贝尔图斯的著作本身就是对李嘉图的批判，因此马克思对洛贝尔图斯的评述也不可避免地与李嘉图的地租理论纠缠在一起。洛贝尔图斯②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7.

② 洛贝尔图斯（Johann Karl Rodbertus，1805—1875），德国政治活动家、经济学家。1848 年革命后，洛贝尔图斯曾入选普鲁士国民议会，担任“波罗的海地区工人阶级福利同盟”主席。洛贝尔图斯因其社会主义立场而在经济学界闻名，不过他的社会主义观点带有浓重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色彩，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先驱之一。

在德国坚定地宣传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成为与历史主义经济学对抗的代表人物。但是他的政治立场却退回了重商主义，主张各阶级通力合作，成为国家社会主义的最早倡导者之一。洛贝尔图斯认为，政治经济学“最逼切的任务，只是谋求劳动同土地和资本所有权之间的妥协”，因此主张各阶级和解，在现有秩序下共同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应当以一切可能的手段，保持劳动、资本和土地所有权这样一种社会经济阶级的划分情况，一切努力都应当只勇于改变劳动产品的分配”①。了解了洛贝尔图斯的政治立场，就很好理解他的经济观点。作为劳动价值论的倡导者，他试图用彻底的劳动价值论来解释地租的来源，但实际上是为地主阶级的生产功能做了辩护。

从第 X 笔记本第 458 页的下半页开始，马克思写道，“现在谈谈洛贝尔图斯先生”②，正式进入对《给冯·基尔希曼的社会问题书简》③ 的摘录和评述。这次评述异常繁复，充斥着各种计算公式和重复的评论。可能是因为意识到了手稿的混乱，马克思在第 484 页总结了自己的评述内容，整理出了洛贝尔图斯的六个谬误。④ 不过，对于理解马克思的评述而言，这六个谬误无关紧要；马克思直接指出了洛贝尔图斯的核心论断：“当原产品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卖的时候，它们的价值高于……生产费用加平均利润，因而提供一个**超额利润**，这个超额利润形成**地租**。”⑤ 洛贝尔图斯的谬误在于将产品的平均价格和产品的价值混为一谈，如果将上述观点的价值改成平均价格，“那对问题的理解就正确了”⑥。土地所有者的地租来自产品价格中超出平均价格的部分，而土地所有者之所以能够获得这部分价值作为地租，是因为他们对土地的所有权。洛贝尔图斯坚持劳动价值论，但是他对产品价值构成的分析不是从价值概念出发，而是从现实的价格出发；因此，洛贝尔图斯经常将各种东

---

① 洛贝尔图斯. 关于德国国家经济状况的认识. 斯竹，陈慧，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37.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42.

③ 《给冯·基尔希曼的社会问题书简》（*Soziale Briefe an von Kirchmann*）共有四封，其中前两封发表于 1850 年，一年后发表第三封，第四封于洛贝尔图斯逝世后才发表。马克思在“1861—1863 年手稿”中摘录的是其中的第三封。

④ 同②92-99.

⑤ 同②99.

⑥ 同②101.

西混淆在一起，“理所当然地从产品的单纯变贵得出了关于**剩余价值更多**的结论”①。

改造过洛贝尔图斯地租理论之后，马克思才对李嘉图的地租理论进行了评价。李嘉图的地租理论有两个误区：第一，“李嘉图只解释了**级差地租的存在**，实际上否认**土地所有权**有任何**经济**影响”；第二，“李嘉图……所谓农业生产率递减的论断”②。对于第一个误区，马克思认为地主的土地所有权是与私有制不同的所有权，强制资本家与他分享利润。这是因为李嘉图从错误的前提出发，“**如果**商品的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商品的平均价格就必定等于商品的价值**”③。为了保持价值的规定，就需要否定绝对地租，一方面“**最坏的**土地不能提供地租”，另一方面“**最初的耕地**不能提供地租”，否则整个价值理论就被推翻了。④对于第二个误区，马克思认为农业的生产率也会一直提高，只不过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农业生产率相对地低于工业生产率。这有多方面的原因，比如农业生产中的自然力难以用人力替代。马克思预测，“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这种不平衡必定开始缩小，就是说，农业生产率必定比工业生产率相对地增长得快”⑤。经过对李嘉图地租理论的长篇计算，马克思在第 XI 笔记本第 491 页认为“地租理论实质上已经讲清了”⑥，并开始有意识地插入关于斯密和李嘉图价值理论的评述。

在对洛贝尔图斯和李嘉图进行批评时，马克思再次展示了他独特的唯物辩证方法。李嘉图和洛贝尔图斯都是劳动价值论的支持者，然而他们对地租的分析却都遇到了无法克服的矛盾；最后，他们只能否认矛盾，或者将矛盾作为研究的前提。究其原因，他们都是从物和表象入手来研究经济现象的。在“资本一般”理论中可以很容易地理解，对同一个物或同一种现象的分析可能会得出截然相反的抽象，如果简单地用一种解释去否定另一种解释，就会产生像洛贝尔图斯和李嘉图这样的争论。李嘉图和洛贝尔图斯都是从劳动价值论出发对地租的性质进行说明，但却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洛贝尔图斯和李嘉图的争论焦点在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40.
② 同①101.
③ 同①.
④ 同①141-142.
⑤ 同①119.
⑥ 同①114.

于，商品的价格由劳动时间决定，那么不耗费任何劳动时间的地租是从何处来的。前文已经展示过，李嘉图用边际收益递减的方式解决了地租问题，认为对于社会生产而言地租是一个固定的值，因此不构成成本。在李嘉图的经济模型中，产品价格构成里没有地租，现实中的地租完全来自资本家收入的转移支付①；李嘉图否认绝对地租的存在，并认为地租的上升是必然的趋势。洛贝尔图斯则认为，地租有它的独立来源。洛贝尔图斯将产品价格由劳动价值决定作为唯一的出发点，从而将地租的产生解释为计算的错误，认为土地和种子等投入没有被计算进价值里面去；因此，地租不全是由利润提供的，除此之外它还有自己的自然来源。李嘉图试图将劳动价值论和“资本—利润”理论直接结合在一起，试图用劳动价值论直接解释地租的形成，从而得出了土地所有权没有经济功能和利润率下降的结论。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用劳动价值论直接解释地租必然会导致自相矛盾的结论。在马克思看来，地租的性质需要在“资本和利润”环节才能够得到说明，如果用简单流通的一般规律直接研究地租，就会出现李嘉图和洛贝尔图斯那样的混乱。在“资本和利润”环节，商品的价格不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而是资本家根据预付资本和平均利润率制定的。

在第X笔记本第452页，马克思转向了对李嘉图理论的批评。李嘉图认为，地租全部来自资本家的经营利润，“是超过（一般）利润的余额”②。李嘉图的理论错误在于他设定了两个错误的前提：（1）产品按照劳动价值进行出售，或者说商品的自然价格等于产品的价值；（2）“租地农场主的资本……同其他任何一个资本家的资本一样，只提供利润”③。马克思认为，农业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而不是规律。平均利润形成之后，才能形成资产阶级经济形式意义上的地租。土地所有权阻碍商品价值转化为平均价格，“不让竞争取得这种胜利”④，所以才能够截留一部分剩余价值作为自己的收入。

根据“资本一般”的逻辑结构，土地本身是没有价值的；然而在现实中，地租或土地价格在生产成本中占据的比例却越来越高。马克思也

---

① 参见“图11 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简化图”。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7.

③ 同②28.

④ 同②25.

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在手稿中试图用一贯的逻辑对此问题进行解决。如果按照价值理论直接对地租进行解释，就可能会出现洛贝尔图斯的地租理论，即将地租当作农业生产成本的计算错误。然而，洛贝尔图斯对李嘉图的批评恰恰是一种倒退。将所有投入都当作有价值的成本，价值概念也就丧失了本身的确定含义，而变成了一种完全抽象的东西。李嘉图的地租理论也有其合理之处，即揭示了地租收入与资本主义生产实际上是不相容的，这一点在李嘉图的经济学中只有含混的表述，而马克思将这一点鲜明地提出来了。

2. 地租作为收入形式的性质

对土地所有权的批评在 19 世纪的主流经济学界具有相当数量的支持者，他们的批评反映出了土地所有权是一种不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所有权。例如詹姆斯·穆勒“从地租理论作出了反对土地所有权存在的实际结论，他想或多或少直接地把土地财产变为国有财产”①。马克思对此进行重新解释：“绝对地租存在的前提是：一方面有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另一方面有土地所有权，这种土地所有权不仅在法律上存在，而且在实际上对资本进行抵抗，保护这个活动场所不受资本侵占，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把地盘让给资本。”② 简而言之，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地租作为地主的收入形式，是私有财产制度下对资本家的合法剥削。

资本生产的产品价格要转化为各阶级的收入，是“资本一般”理论的最后一个环节即“资本与利润”环节。其中，地租是最难说明的收入形式，因为土地所有者没有为产品支出任何劳动，却攫取了产品价格的一大部分作为自己的收入。为了说明产品价格和地租的关系，首先要了解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与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的差别。古典经济学认为商品价值等于商品的自然价格，而现实中的价格是相对价格。相对价格会随着供需而波动，而波动的中间线或平均值就是自然价格，也就是商品的价值。尽管价格是随时变化的，但是就一个时期的平均值而言，商品是按照自己的价值来出售的。“这就是亚·斯密的观点，尤其是李嘉图的观点，因为后者更明确地坚持真正的价值概念”，这也是过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商品价格的经典解释；可是，马克思自己明确地说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89.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36.

“这个观点是错误的”①。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下，竞争产生的平均价格是生产价格，“这种价格向每个领域的商品生产者提供同样的利润率”；因此，平均价格并不等于商品的价值，而只是体现了“等量资本提供等量利润”的庸俗规律。②

马克思在讨论完洛贝尔图斯和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后，对当时存在的关于地租的观点进行了总结：

> ［第一，］认为**地租**来自农产品的**垄断价格**……农产品的**价格**总是**高于**其**价值**。……［第二，］**李嘉图的理论：没有绝对地租**，只有**级差地租**。……［第三，］**地租只不过是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利息**。……这种观点不过是**从资本主义的立场出发**，以**利息**为名，把地租从李嘉图的抨击下拯救出来的一种尝试。**最后**［第四，］李嘉图认为，在不提供地租的土地上，产品的价格等于产品的价值……所以，李嘉图错误地认为，商品的价值等于商品的平均价格。

地租理论的混乱是由资产阶级社会中地租的特殊性质决定的。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形式中，“每一特殊部门的资本家的竞争，力求使商品的市场价格还原为它的市场价值。不同部门的资本家的竞争，使市场价值还原为共同的费用价格。”③ 投放在不同领域的资本，会拥有高低不等的剩余价值率；而竞争的结果，就是让等量的资本获得等量的利润。而且，即使剩余价值率［(剩余价值÷可变资本)×100%］是固定的，等量资本生产的剩余价值也会有很大的不同。马克思列举了三种影响剩余价值量的因素，分别是：(1) 资本有机组成部分的比例；(2) 资本的周转时间；(3)“真正生产期间的长度”④。其中最后一个因素，即与劳动时间相区别的生产时间，是农业和制造业的最大差别。资本支付货币购买了对工人一段时间内劳动能力的支配权，是为了在这段时间内生产出超过预付资本的货币量；因此，只有在资本和雇佣劳动制度下，劳动时间才能成为价值的尺度，劳动时间也就是生产时间。而在农业领域，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是不一致的，劳动会因为各种自然条件的变化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2.

② 同①22-23.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78.

④ 同①23.

而中断。在这个意义上，农业生产同雇佣劳动的基本条件是矛盾的，农业不可能是资本最先经营的生产领域，“只有通过［工业对农业的］反作用，资本才掌握农业，农业才工业化”①。与工业资本相比，农业资本的经营更加容易遇到生产的中断，从而导致剩余价值量的减少。各种不同的资本根据各自不同的情况产生不同的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而竞争的功能就是通过调节平均价格使等量的资本获得等量的利润。

> 认为各个资本的竞争是通过使商品价格等于商品价值来确立一般利润率的说法，是错误的。相反，竞争正是通过以下途径来确立一般利润率的：**它把商品的价值转化为平均价格，在平均价格中，一种商品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转到另一种商品上**，等等。②

也就是说，竞争的结果——平均价格——是对商品价值的否定和颠倒，而不是商品价值的实现。马克思的“资本一般”理论就是要证明“正**因为**商品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商品平均价格**决不能**等于商品价值”③。因此，地租看起来并不是超出产品价值的部分，而只是超出一般利润率的部分。

马克思为了说明地租的性质，先列举了几种可能的解释，这些解释实际上就是洛贝尔图斯对李嘉图的反驳。这些解释实际上都是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之上，就是假定产品的价格等于产品的价值。

首先，地租可能来自农业工人的工资低于制造业工人的工资，与产品的价格无关。通过压低工资来提高利润，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规律，无论在工业中还是在农业中都是这样。洛贝尔图斯认为，农业工人的生活必需品可以由他们自己生产的产品来补偿，所以他们的工资可能被压得更低。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中“剩余价值可以由于工资压到传统水平以下而增加”，压低工资通过制造相对的人口过剩就能实现，而不必靠提高生产力来增加相对剩余价值。“凡是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农业生产的地方，实际上都是这种情况。在这一点不能靠机器做到的地方，就靠把耕地变为牧羊场来做到。”④“工业的发展**以**农业中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之比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为前提**，就是说，以大批人从耕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64.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5.
③ 同②31.
④ 同②11.

地上被赶走为前提。”①

其次，在产品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地租可能来自产品的增加。投放在肥力较强的土地上的劳动，可以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从而使等量的劳动创造出更多的产品。李嘉图已经证明，农业产品的平均价格是由肥力最低的土地上的农产品价格决定的。马克思认为李嘉图的这一观点已经解释了地租的差别，即级差地租：地租的相对量的产生“不仅由于产品相对变贵（肥沃土地的产品的价格提高到它的价值之上），并且由于便宜产品按较贵产品的［生产］费用出卖”。然而，这个超出其价值的部分并不是由土地创造的，而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产生的”②。

对于李嘉图农业生产率下降从而推高地租的规律，马克思也进行了批判。李嘉图的说法客观地表述了一个历史现象，即“制造业（真正资产阶级的生产部门）比农业发展快……因而同工业品相比，农产品的价值以及地租都在提高”③。无论绝对剩余价值还是相对剩余价值，农业的剩余价值量都低于工业。从绝对剩余价值方面看，农业生产的劳动时间只能在很小的程度上延长，因为农业生产受到季节、气候和生长周期等多方面的影响。不过，由于农业生产需要雇用大量的劳动工人，农业资本的剩余价值率高于工业资本。此外，马克思认为“转而耕种**生产率较低的**土地，不一定证明农业生产率的下降”④。农业生产率会随着贫瘠土地的开发而降低，相反，农业生产率会随着科技的发展而提高，只是提高的速度可能没有工业领域那样显著。

农业产品的价格是按照生产效率最低的那个单位来出售的，“没有必要把任何创造奇迹的力量归于土地……**价值等于劳动，从而，超额部分等于价值，它不可能等于土地**”⑤。洛贝尔图斯对土地生产力的推崇以及对绝对地租的认可，实际上是重复了马尔萨斯的立场。马克思则要指出，所谓的绝对地租，也是由剩余劳动（无酬劳动）来支付的。在“资本一般”理论中，地租本身只是为了说明价值和生产价格的区别而举的一个例证。⑥ 因此，讨论地租问题时，首先要明确，地租影响的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19.
② 同①13.
③ 同①13.
④ 同①14.
⑤ 同①26.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312.

产品的生产价格，而不是产品的价值。从产品的价格来看，地租水平决定的是资本家要将多少利润让渡给地主，而不是产品价格本身。

3. 与资本对立的土地所有权

在前资产阶级的经济形式中，地租是通过非流通手段强制占有佃农劳动的一种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地租则是在平均利润率形成之后对剩余价值的再分配。马克思因此说：“现代土地所有权事实上是**封建的**，但是由于资本对它的作用而发生了形态变化，因而它作为现代土地所有权的形式是**派生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果。李嘉图把……这个事实也看成**历史上**最初的东西……这是一种误解。”①

如果“存在这样一些生产领域，那里的某些自然生产条件……不是掌握在对象化劳动的所有者或占有者资本家的手里，而是掌握在其他人手里”，掌握在土地所有者手里，那么土地所有者就不用理会资本家之间在竞争压力下形成平均利润的强制规律，因为资本家无法生产出土地、水、矿山等等自然条件。② 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对抗从一开始就是不对等的，单个资本家不仅要和土地所有者争夺剩余价值的分配份额，而且还要面对其他资本家的竞争。

> **在投资相等的条件下**，地租量不等，只能用土地的肥力不同来说明。**在肥力相等的条件下**，地租量不等，只能用**投资量不等**来说明。在前一种情况下，地租增加是因为地租对所投资本（也对土地面积）的比率提高了。在后一种情况下，地租增加是因为在同一比率下，甚至在不同比率下（如果第二笔投入土地的资本的生产率较低的话）地租量增加。③

土地是资本流通无法进入的领域，资本家因此无法和土地的所有者竞争，而只能和资本家竞争。

对于那些拥有土地、矿产等自然生产条件的土地所有者而言，资本家竞争的结果就是土地所有者可以将资本家利润中的一部分据为己有。马克思提示了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 （1）从封建土地所有制到另一种形式，到由资本主义生产调节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69.

② 同①38.

③ 同①40.

> 的商业地租的过渡；或者，另一方面，从这种封建土地所有制到自由的农民土地所有制的过渡；(2) 在土地最初不是私有财产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至少在形式上一开始就占统治地位的一些国家，如美国，地租是怎样产生的；(3) 仍然存在着的土地所有制的亚细亚形式。①

在讨论李嘉图的地租理论时，马克思指出了殖民地中土地所有权的不同形式。在第一种殖民地中，“他们的主要产品不会变成**商品**，不是用于买卖”②；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土地所有权在法律上是存在的，“但由于土地对劳动和资本来说是**自然要素**的关系”，并不存在产生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可能。而第二种殖民地，即种植园，一开始就是为了商业投机和世界市场，它是接种在奴隶制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是同一个人，土地不对资本进行任何抵抗，因此也不存在地主与租地农场主的区分。这两种殖民地的形式与绝对地租问题毫无关联，它们与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地租形式具有本质上的差别。

马克思反对李嘉图关于农业生产率递减的论断，认为应当“承认农业生产率的增长”，只不过“在资产阶级的基础上，农业**生产率相对地低于**工业”③。所以农业资本的有机构成比较高，剩余价值率也比较高。

> 地租（超额利润）的**差别**比较**固定**，这是农业和工业不同的地方。然而，下述情况，即平均的生产条件决定**市场价格**，从而把低于这种平均水平的产品价格提到高于该产品的**价格**，甚至高于它的**价值**的原因，决不是土地，而是**竞争**，是**资本主义生产**；因此，这不是自然规律，而是社会规律。④

在古代世界和中世纪，地主阶级是生产的组织者和社会生产职能的执行者，而“资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使农业服从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在土地所有权存在的条件下，资本就不得不把价值超过费用价格的余额让给土地所有者……这个差别是**历史造成的**，因此是会消失的”⑤。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9.
② 同①335.
③ 同①101.
④ 同①102-103.
⑤ 同①269.

马克思给出的绝对地租差别消失的理由有两个：首先，农业资本家会逐步取代农场主，从而对农业进行资本主义的改造，“土地耕种者变为纯粹的雇佣工人，农业大规模经营，即以积聚起来的资本经营”；其次，19 世纪化学、地质学和生理学等基础科学的发展，会极大地提高农业生产率，正如“大工业的真正科学的基础——力学，在 18 世纪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臻于完善”①。“地租是资本有机组成部分的比例的**历史性差别**造成的，这种差别一部分会趋于平衡，甚至随着农业的发展会完全消失。……**绝对**地租消失了……**级差地租**……随着价格和资本主义生产一起消失。保持不变的只是这种情况：**社会劳动耕种肥力不同的土地**……现在由土地所有者吞食的全部资本，会被用来使不同土地上的劳动均等化，并使农业上花费的总劳动量减少。”② 在肥沃土地上节省下来的劳动，可以被用来改良贫瘠的土地，而不是被土地所有者无偿地占有。“如果土地所有权被废除而资本主义生产保存下来，这种由肥力不同引起的超额利润也不会消失。如果国家把土地所有权据为己有，而资本主义生产继续存在，II、III、IV 的地租就会支付给国家，但地租本身还是存在。如果土地所有权归**人民所有**，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个基础，使劳动条件与工人相对立而独立化的基础，就不再存在了。”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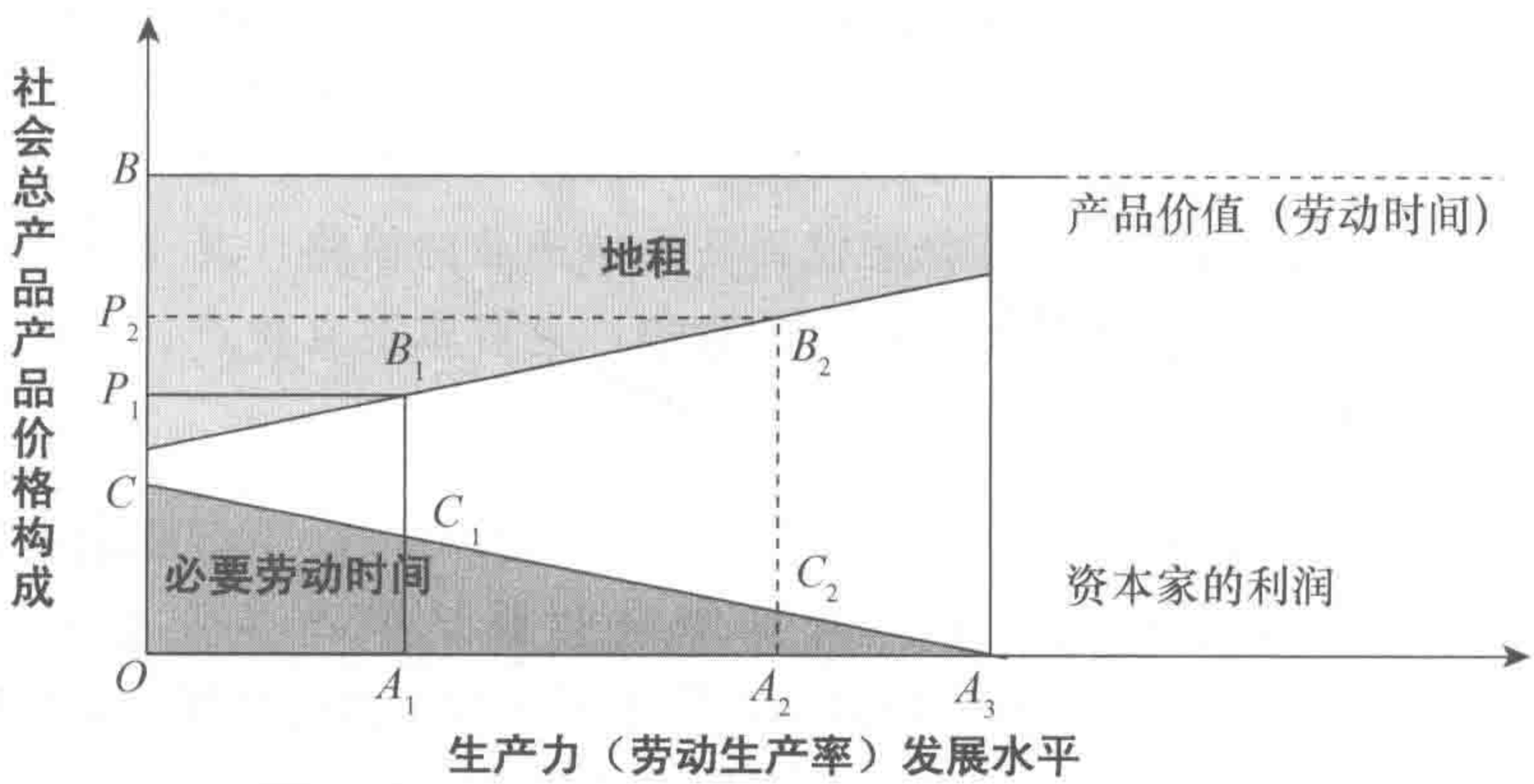

图 12　马克思的地租理论简化图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19.
② 同①114-115.
③ 同①112.

马克思对李嘉图地租理论的批判还同时夹带着对马尔萨斯的批评：一方面，土地的肥力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断提高，因而不存在被迫耕种劣等土地的问题；另一方面，级差地租的形成也不是因为劳动难度的差异，而是因为同等投资在不同土地上的产出有所不同。攻克了地租理论之后，“资本一般”就可以圆融地解释平均利润的形成。除此之外，马克思还指出了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地主阶级终将灭亡，当土地全部收归资产阶级国家所有，资本家只用支付租金时，就是资本主义的完成形式。

地租理论不属于“资本一般”理论的逻辑结构，因此相关观点的逻辑性并不像价值理论那样严整。土地所有权是一种不同于资产阶级所有权的私有权，土地的独占权导致了资本家内部的竞争，从而产生了地租。

> 土地所有权，就像资本一样，变成了支取无酬劳动、无代价劳动的凭证。在资本上，工人的对象化劳动表现为统治工人的权力，同样，在土地所有权上，土地所有权使土地所有者能从资本家那里扣下一部分无酬劳动的这种情况，表现为土地所有权似乎是价值的一个源泉。①

因此资本家内部对土地都具有一定的反感，并产生了将土地收归国有的愿望，马克思也据此将土地国有看作资本主义的完成形式。不过，马克思认为即使土地不收归国有，地租也会逐渐下降甚至消失。地租的存在，是因为农业生产率低于工业生产率。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这一差别将会逐渐缩小，从而降低地租的水平。地租理论的提出，标志着马克思解决了叙述“资本一般”理论时所遇到的全部技术困难。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40.

第五章 “资本一般”与庸俗经济学批判

在马克思生活的19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导致的社会问题已经到了无法忽视的严重程度。当时的思想界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理论对现实问题进行解释，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其中，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目的是发现生产的最优机制，进而设计与之相匹配的经济政策来实现产品种类数量的最快增长。因此，所有的经济学争论最终都会落在关于财富分配的经济政策上。不过，财富的分配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还关乎公平、正义等道德观念。当道德与经济发生冲突的时候，就出现了经济理论内部的分歧。在经济学内部，价值成为分配的主要依据，符合道德的分配也就是符合价值的分配。围绕价值的性质产生了两种针锋相对的理论，社会主义经济学坚持劳动是价值的唯一尺度，从而要求废除私有财产制度，主张工人收回全部劳动产品；而正统的经济学则放弃了基于劳动的价值概念，认为产品的价值由生产要素的价格构成，基于私有产权的分配原则与价值理论没有冲突，资本主义的生产秩序就是最合理的社会秩序。基于“资本一般”理论的辩证逻辑，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和庸俗经济学进行了双重的批判，认为双方所提出的都是无法实现自身承诺的虚幻理想；马克思在“资本一般”部分展现了各种经济观念自我扬弃的必然性，提出了超越资产阶级社会的独特路线。

第一节 古典经济学的解体与庸俗化

价值理论从创立之初就与分配问题绑定在一起，具有经济和道德的双重含义。斯密在价值理论上的混乱到了李嘉图那里得到了初步的解决，然而却导致了更加直接的道德困境。通过抽象逻辑推演，李嘉图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未来做出了悲观的预测。古典经济学所呈现的悲观未来让很多理论家无法接受，因此出现了为现实寻找出路的各种经济学流派。但由于这些经济学流派不再支持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古典经济学也随之解体了。马克思认为，分裂后的政治经济学已经丧失其原有的批判性，无论是反对派还是辩护派，都最终只能是对现有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

一、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困境

究其本质而言，斯密和李嘉图的价值论是一种自然权利理论，内在地包含着“公平价格”“合法收益”的道德概念。李嘉图之后，经济学研究的实证化趋势逐渐成为古典经济学的主流。实证经济学主张，经济学研究是（按照一定的逻辑规则）对经济学行为的后果的实证预测，除此之外不应在理论上给予经济行为任何的价值判断。基于功利主义的实证经济学抛弃了道德方面的追求，只对财富增长的动力进行实证的研究，认为只要是有需求且可交换的东西都是财富且都有价值。在阐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时，马克思就批评过这种经济学所体现的庸俗唯物主义立场。在“1861—1863 年手稿”中，基于完成了的“资本一般”理论，马克思再次从理论上分析了经济学最终走向庸俗化的原因，并梳理了古典经济学研究从科学走向庸俗的过程。马克思对斯密的评述，主要摘录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第五—八章；而对李嘉图的评述，则主要摘录了《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的前六章。马克思计划以“剩余价值理论”和“利润理论”两部分来结构关于李嘉图的历史批判，前者属于狭义“资本一般”理论的第一节“资本的生产过程”，后者属于第三节“资本和利润”①。在第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87.

XVIII 笔记本的提纲中，马克思为这两部分都列了单独的标题。

1. 斯密经济学的内在矛盾

从斯密为私有产权制度辩护之后，对于私有制的争论就再没有停息过。斯密也注意到了私人占有可能会导致社会的不平等，但他认为这种不平等反而有利于社会总产品的增加和社会福利的实现，生产的自由和平等只能存在于社会的原始状态。后来的政治经济学围绕斯密的论证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一部分经济学家主张生产效率的优先性，试图将经济学实证化从而排除经济学对于平等的道德追求；另一部分经济学家则主张经济学研究和经济政策需要兼顾社会公平，试图从理论和现实中提高工人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经济学家主张基于私有财产制度的资本主义生产秩序已经是最符合平等、自由原则的社会形态，拒绝任何形式的人为改造。“1861—1863 年手稿”中，马克思通过摘录和评述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对上述争论进行了理论溯源，并在“资本一般”理论的视角下对斯密及其引起的争论各方予以历史的批判。

马克思的历史批判部分以斯图亚特和重农学派开头，不过这两部分只是为评述斯密的经济学理论而做的铺垫。在写作“重农学派”的过程中，马克思就开始摘抄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段落并进行评述。除了转引的内容外，马克思在“1861—1863 年手稿”中所使用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有三个版本，分别是 1776 年伦敦版《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两卷集）、加尔涅译的 1802 年法文版《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五卷集）、麦克库洛赫编校的 1828 年爱丁堡版《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四卷集）。在“剩余价值理论”部分，马克思在简短地评述了重商学派和重农学派的理论之后就很快转入了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摘抄和评述。斯密的历史批判部分的理论密度很大，甚至可以看作马克思整个历史批判的总提纲。在评述斯密的交换价值理论时，马克思提到了斯密在分析交换价值规定时的摇摆不定：

> 亚·斯密……一方面认为**商品**的价值决定于生产商品所必要的劳动量，另一方面又认为商品的价值决定于可以用来买进商品的活劳动量，或者同样可以说，决定于可以用来买进一定量活劳动的商品量；他时而把第一种规定同第二种规定混淆起来，时而以后者顶替前者。在第二种规定中，斯密把劳动的**交换价值**当作商品的价值

尺度，实际上就是把**工资**当作商品的价值尺度……这里把价值当作价值的标准和说明价值存在的理由，因此成了循环论证。①

斯密的价值理论中确实存在着这种自相矛盾和摇摆不定。在斯密的理论模型中，原始状态下商品价值的尺度本来是劳动时间，而现实中商品价值又取决于生产的各种成本。如果按照商品价值来交换，那么每个人只能占有或支配与他的产品价值相等的劳动时间；然而如果按照生产成本来交换，那么用货币购买劳动力的资本家就可以占有或支配超过货币价值量的劳动时间。在前一种状态下，人和人的关系是平等的；在后一种状态下，显然就存在着不平等和剥削。斯密之所以会陷入这种自相矛盾的境地，是因为他只从物的方面进行分析，进而在商品的交换和流通中同时看到了两种流通形式的存在，一种是符合价值一般规律的简单流通，另一种是违背价值一般规律的资本流通；他最终决定用后一种流通作为解释现实的理论模型，而将简单流通变成了作为理论预设的原始状态。根据“资本一般”理论的逻辑结构，广义“资本一般”理论中前两个环节的抽象规定只是“作为商品的商品的规律”，一旦商品被当作资本或者被当作资本的产品，这些规律“就不适用于商品了”②。因此，将抽象形式直接运用在资本形式上必定会导致理论上的混乱。

马克思指出，“斯密著作中的上述矛盾以及他从一种解释方法到另一种解释方法的转变，是有更深刻的基础的”③。根据“资本一般”理论，斯密由于方法论的局限无法看到简单流通和资本流通实际上是同一种流通的不同表现形式，商品按照劳动时间进行交换的原则不仅没有被违背，而且被作为现实的原则普遍实现开来。通过将产品价格彻底解释为劳动所需的时间，“李嘉图揭示了斯密的矛盾”；但是李嘉图“没有觉察到这个更深刻的基础”④，而是直接用简单流通去解释资本流通。

为了呈现斯密理论中的矛盾，马克思在“1861—1863 年手稿”中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一篇的第五—八章进行了细致的摘录和评述，这四章的标题分别是：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6-47.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77.

③ 同①47.

④ 同①47.

第五章　论商品的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或劳动价格与货币价格
第六章　论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
第七章　论商品的自然价格与市场价格
第八章　论劳动工资

马克思指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一—五章“只是考察一般商品交换：交换价值、分工以及货币的性质”①。斯密从商品以及商品的交换出发，得出了商品流通的一般规律。但是，斯密发现这个规律在“资本和雇佣劳动的交换［VI—246］、对象化劳动和活劳动的交换中”立即失效了。② 斯密的理论无法将资本流通和简单流通整合在一个理论体系之内，这两种流通似乎建立在完全对立和矛盾的原则上；斯密最终通过区分生产的两种状态来解决这个问题，将按劳动价值交换的简单流通限定在不存在所有权的原始状态。马克思指出，斯密的理论中之所以会出现简单流通和资本流通之间的矛盾，是因为斯密直接从经济现象出发来抽象经济规律，并且把劳动本身直接当作了一种商品。“只要资本直接同劳动相对立，而不是同劳动能力相对立，这种矛盾就无法解释……但是，因为产品价值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分配’本身，是以商品交换——商品和劳动能力之间的交换——为基础的，所以这就自然引起亚·斯密的混乱。”③ 斯密在价值论上的不一贯导致他的价格理论、利润理论等都出现了逻辑上的混乱。

斯密认为，在原始状态的分工和商品流通中，资本和土地还没有成为稀缺资源，生产者按照产品所消耗的劳动时间进行交换。马克思指出，斯密在这里所说的原则实际上需要区分为两个相互对立的原则：一个是价值原则，解释的是商品价值的尺度，商品的价值“决定于它们所包含的劳动时间”；另一个是财富原则，解释的是人以价值为中介所拥有的权力，商品所有者的财富“由他所支配的社会劳动量构成”。在简单流通中，价值原则和财富原则是统一的。生产者在简单流通中支配的社会财富的数量等于他自己的劳动量，是绝对的按劳分配。人与人只是作为商品的生产者相互对立，从而将彼此的劳动看作同一种劳动，看作同一种社会劳动；“我的劳动的产品作为对等量社会劳动的支配权，决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3.
② 同①48.
③ 同①49-50.

定着我的财富”①。从《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第六章开始，斯密“从假定生产者只作为商品出卖者和商品所有者互相对立的关系，转到劳动条件所有者和单纯劳动能力的所有者之间进行交换的关系”。谈到资本积累之后的生产时，斯密认为商品已经不再按照其所包含的劳动时间来进行交换了，商品的价值“决定于这个商品可以支配即可以买到的……他人活劳动的量”②。在资本和劳动的交换中，价值原则和财富原则完全对立起来，甚至可以说财富原则取代了价值原则。

正是因为原始状态和文明状态的抽象区分，斯密在考察流通问题时被弄糊涂了，“他不懂得，这个矛盾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劳动能力本身成了商品，作为这种特殊的商品，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因而同它的交换价值毫无关系）是一种创造交换价值的能力”③。起初，斯密将利润来源解释为超出工资的额外劳动，马克思认为这是斯密高明的地方。不过，当分析利润的量的规定时，斯密就放弃了原本作为出发点的工资（劳动能力的价值），转而将利润看作“超出预付资本总价值……之上的余额”④。斯密认为，如果预付资本无法按照一定的比例获得利润，那么资本家就“没有兴趣雇用这些工人了”；马克思指出，“用资本家的‘兴趣’来说明利润……是庸俗的和荒谬的”⑤。以增殖为目的的生产是以资本关系为前提的，在这种关系中，生产的直接目的不是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是为生产剩余价值。斯密说的经济学只是复述了经济活动中等量的预付资本总是预期得到等量利润的现象，而没有意识到剩余价值与利润之间所经历的复杂的中介关系，“一下子就从一般形式的剩余价值转到同问题没有直接关系的一般利润率上来了”。不过，斯密在研究工资的自然价格时“又回到正确的价值规定上来”⑥。但是他在商品的自然价格问题上再次落入自相矛盾的循环论证当中，一方面用商品的自然价格来调节工资、利润和地租，另一方面又用工资、利润和地租的相加数来计算商品的自然价格。“李嘉图的主要功绩之一，就是消除了这种混乱。”⑦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2.
② 同①53.
③ 同①65.
④ 同①67.
⑤ 同①68.
⑥ 同①74.
⑦ 同①74.

李嘉图用一贯的逻辑解释了从简单流通到资本流通的转变，但是他“从来没有料到这里有问题”①。李嘉图并不认为资本流通有任何的不妥，也没有意识到资本流通与价值规律之间的矛盾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因此马克思说，斯密的伟大功绩正在于“他正是在第一篇的几章（第六、七、八章）中……总之，转到剩余价值的起源问题的那几章中，就感觉到已经出现了缺口；他感觉到……［简单商品交换的］规律实际上是失效了……**随着资本积累和土地所有权的产生**，因而随着同劳动本身相对立的劳动条件的独立化，发生了一个新的转变，价值规律似乎变成了（从结果来看，也确实变成了）它的对立面”②。《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一篇前八章关于商品价值的研究坚持了正确的理论道路，斯密“从商品价值推出工资和利润”；但是之后他“走上了相反的道路，又想倒过来从工资、利润和地租的自然价格的相加数来推出商品价值”③。因此，马克思认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之后的内容没有一个地方的分析是正确的。马克思又简短地摘录了一些内容来证明“亚当的混乱、矛盾、离题”④，之后就结束了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摘录和评述。

在经济学创立之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就已经发现了这个悖论。不过，古典经济学认为，这种贫富差距总体上有利于生产的发展（斯密），而且可以在分配环节加以调整（约翰·穆勒）。基于自然法的传统，斯密设想了一个自由生产、平等交换——也就是简单流通——的原始状态，并设计了一套理论来解释原始生产与现代资本生产的差异；斯密的结论是，即使对所有权的保护会扩大贫富差距，但仍然应当坚持这种有利于资本家的分配制度。约翰·穆勒接受了斯密的经济学论证并对其予以道德哲学的修正，认为现实的贫富差距应当用分配的手段来加以缩小，并以此来实现一个符合自由人性的社会。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者一直都承认，一方面“理想占有”和“现实占有”之间存在着差别，另一方面保护所有权会导致结果的不平等；只是他们认为，人类社会的自然秩序会将这种不平等引导向有利于社会总福利的方向。由此就很好理解，为什么古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5.

② 同①64. ［］内容为引者加。

③ 同①75.

④ 同①81.

典经济学会催生出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者的经济要求实际上是直接恢复简单流通中的占有规则。社会主义者将资本家的利润解释为对工人的欺诈。要求收回所有产品，是一种空洞的幻想。与社会主义者针锋相对，庸俗经济学的研究者认为现代社会本身已经实现了理想的占有规则。

因此，尽管这些混乱在古典经济学家看来是无关紧要的，然而却构成了经济学后来发展的重要议题。斯密只是没有意识到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与一般利润率的差别，将两者混淆在一起，从而产生了相互对立和矛盾的两种流通。马克思指出，斯密的观点“只有在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等同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在斯密的解释中，“资本的积累通过降低商品价格的方法迫使**任意规定的**、本身没有任何内在尺度的利润降低……利润纯粹是一种名义上的附加额”①。而庸俗经济学则直接连这两者之间的差别也抹杀了，试图直接否认简单流通与资本流通之间矛盾的存在。在庸俗经济学中，“粗俗的经验主义变成了虚伪的形而上学，变成了烦琐哲学，它绞尽脑汁，想用简单的形式抽象，直接从一般规律中得出不可否认的经验现象，或者巧妙地论证它们是同一般规律相一致的”②。

2. 李嘉图与斯密的经济学

斯密的价值理论在19世纪初成为经济争论的共同理论基础，斯密经济学的内在矛盾也随之困扰了经济学很多年，价值理论甚至成为各种干预主义者的理论武器。为了继续论证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李嘉图提出了彻底的劳动价值理论来解决价值理论的内在矛盾。在价值理论上，李嘉图的贡献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把价值变成了纯经济学的范畴，剥离了它的道德含义；另一方面是在价值的基础上对经济学进行了演绎，将经济学变成了纯逻辑的演绎体系。在李嘉图的引领下，经济学变成了一项纯数学的工作，这种研究方式成为经济学庸俗化的中介。

表 16　　“1861—1863 年手稿”中关于价值和利润的内容分布

笔记本编号	页码范围	标题
第 VI 笔记本	243—273	(c) 亚·斯密
第 XI 笔记本	523—560	(h) 李嘉图 李嘉图和亚·斯密的费用价格理论（批驳部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531.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6.

续前表

笔记本编号	页码范围	标题
[中断]		[关于地租的长篇讨论]
第 XII—XIII 笔记本	636—666	李嘉图的剩余价值理论
	666—673	李嘉图的利润理论
	673—732	李嘉图的利润理论。对这个理论的批判（从资本的基本形式得出危机）

马克思转入李嘉图理论评述部分的写作，显然是由于在洛贝尔图斯的启发下解决了地租问题，从而也初步解决了平均利润的难题。在写作“剩余价值理论”下李嘉图的章节时，马克思没有直接谈李嘉图的剩余价值理论，而是“从分析李嘉图的利润理论开始”，虽然利润理论“属于第三篇的历史附录”。马克思在讨论地租理论时从总体上评述了斯密和李嘉图的价值理论：

> 斯密起初是从事物的**内部联系**考察事物，后来却从**它们在竞争中表现出来的颠倒了的形式**去考察事物。他天真地把这两种考察方法交织在一起，没有觉察到它们之间的矛盾。相反，李嘉图为了把握**规律本身**，有意识地**抽象掉了**竞争形式，抽象掉了竞争的表面现象。应该指责李嘉图的是，一方面，他的抽象还不够充分，不够完全，因而……一开始就同样受到对各种具体关系的考察的限制；另一方面是，他**直接**把表现形式理解为一般规律的证实或表现；他根本没有**揭示**这种形式。就第一点来说，他的抽象是极不完全的，就第二点来说，他的抽象是形式的，本身是虚假的。①

在第 XI 笔记本，马克思对于李嘉图理论中经济学内容的批评基本上重复了地租部分的观点，因此应该是对之前手稿的一次整理。其中比较关键的是，马克思分析了《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的结构，并指出了李嘉图方法的根本缺陷。“李嘉图的研究方法，一方面具有科学的合理性和巨大的历史价值，另一方面，他的方法在科学上的缺陷也是很明显的”，而这种缺陷就体现在他著作的“非常奇特的、必然谬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15.

误的结构”① 上。《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共三十二章，马克思将它们分为三类②：

表 17　　马克思对《政治学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的内容分类

<table>
<tr><th>原理部分</th><th>附录部分</th><th>独立部分</th></tr>
<tr><td>第 1 章　论价值</td><td colspan="2">第 20 章　价值与财富：它们的特性</td></tr>
<tr><td>第 2 章　论地租</td><td rowspan="2">第24 章　亚当·斯密的地租学说
第28 章　论富裕国家与贫困国家中黄金、谷物和劳动的相对价值
第32 章　马尔萨斯的地租学说</td><td rowspan="6">第21 章　积累对于利润和利息的影响
第26 章　论总收入与纯收入</td><td rowspan="3">第8—18 章　论赋税，农产品税，地租税，什一税，土地税，金税，房屋税，利润税，工资税，农产品以外的其他商品税，济贫税
第22 章　出口补贴和进口禁令
第 23 章　论生产补贴
第 29 章　生产者支付的赋税</td></tr>
<tr><td>第3 章　论矿山租金</td></tr>
<tr><td>第4 章　论自然价格与市场价格</td><td>第30 章　论需求和供给对价格的影响
第19 章　论贸易渠道的突变</td><td rowspan="2">第 7 章　论对外贸易
第 25 章　论殖民地贸易</td></tr>
<tr><td>第 5 章　论工资</td><td>第 31 章　论机器</td></tr>
<tr><td>第 6 章　论利润</td><td></td><td>第 27 章　论货币与银行</td></tr>
</table>

马克思认为，“李嘉图的理论完全包含在他这部著作的前六章中”，余下的部分是对理论的“实际运用、解释和补充”③。马克思专门指出，“第二十七章《论通货和银行》在这本书中完全是孤立的，它只是李嘉图在他较早的论货币的著作中提出的观点的进一步发挥，部分地是这些观点的修正”④。

马克思后来没有专门再论述李嘉图的货币理论，不过根据马克思的提示可以推测出他的批判思路。在第 XI 笔记本第 523 页，马克思在总结完地租争论中的错误观点之后简短地提示了李嘉图在货币问题上的错误：

> 李嘉图的出发点是商品的相对价值（或交换价值）决定于“**劳动量**”。……这种“劳动”的性质，并没有得到进一步研究。……因此，李嘉图不了解**这种劳动同货币的**联系，也就是说，不了解这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84.

② 同①184-185.

③ 同①185.

④ 同①185.

种劳动必定要表现为**货币**。所以，他完全不了解商品的交换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和商品必然要发展到形成货币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他的错误的货币理论就是由此而来的。在他那里，从一开始就只谈论**价值量**，就是说，只谈论各个商品价值量之比等于生产这些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之比。①

李嘉图以斯密的劳动价值理论为出发点，但是他试图直接用价值来解释价格，没有看从价值到价格之间所经历的中介过程，从而使货币理论完全独立于价值理论之外，成为一个孤立的部分。在“第一分册”中，广义“资本一般”理论的前两个环节展现了从商品概念必然产生货币的逻辑过程。李嘉图只关注价值量的规定，试图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强行解释产品价格的构成，从而得出了他经济学的大部分结论，也使货币成为一个孤立的部分。在完成《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和《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中地租相关部分的摘抄后，马克思再次指出，“李嘉图不知道**价值**和**自然价格**有其他的差别，只知道自然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因此，在价值没有变动的情况下，由于贵金属的价值发生变动，自然价格也会变动。但是自然价格的这种变动只关系到价值的货币计量或货币表现”②。

马克思先对《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前两章的内容进行了总结。李嘉图的价值理论首先要解决的是斯密理论中“价值—工资”的循环论证，从而进一步证明商品价值决定价格的规律不会受工资水平的影响。李嘉图的价值学说试图用一贯的逻辑解决经济现实与价值规律之间的矛盾，但是他承认矛盾的同时也承认了矛盾的前提。为了对现实进行解释，李嘉图从现实出发引入了许多假定，例如工资、资本和利润的存在，“还假定了一般利润率、由流通过程产生的资本的各种形式，以及‘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的区别的存在”③。在《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的前两章，这些假定还没有发挥实际的作用，因此这两章的“基本观点一致、简单、集中、深刻、新颖和洗练而给人以理论上的满足”：

> 李嘉图的全部著作已经包括在它头两章里了。……李嘉图著作的这两章包含着他对以往政治经济学的全部批判，包含着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81.

② 同①418-419.

③ 同①186.

> 亚·斯密的贯串其全部著作的内在观察法和外在观察法之间的矛盾的断然决裂，而且通过这种批判同时得出了一些崭新的惊人结果。①

如果说李嘉图的方法体现在前六章，那么李嘉图的理论内容就只体现在前两章。从第三章开始，李嘉图就只是“在这里或那里堵塞漏洞，补充一些更确切的规定，其中大部分按理在第一章、第二章中本来就应当谈到”②。例如马克思指出李嘉图“在第一章《论价值》中已经假定了第五章《论工资》和第六章《论利润》中应该从《论价值》那一章引申出来的那些规律”③。之后马克思较为详细地摘录了《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的前两章“价值论”和“地租论”，进一步阐述了李嘉图方法的特点。

在摘录“地租论”的过程中，马克思再次指出，“李嘉图的错误，总的说来是由于他在这里**不加批判地**对待亚·斯密而产生的”，即认为“如果一种行业生产的商品不能用自己的价格抵补把它们生产出来并运到市场的全部费用（包括普通利润在内）……资本就有离开这个部门的趋势”④。马克思批评李嘉图对于地租和利润率的错误论述“都是由于他没有区分**剩余价值**和**利润**而造成的，总之，是由于他像其余的政治经济学家那样粗暴地、缺乏理解地对待**形式规定**而造成的”⑤。这个错误来自斯密，“斯密在阐述了［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内在联系之后，突然又被表面现象所迷惑，被**竞争中表现出来的事物联系**所迷惑，而在竞争中，一切总是表现为颠倒的、头足倒置的”⑥。

李嘉图清醒地意识到斯密价值理论中的循环论证，并对此进行了专门的批判。然而，李嘉图还是接受了斯密关于“自然价格”的设定，李嘉图批判斯密之后，“斯密又用**自然价格**把李嘉图引入了迷途”⑦。马克思为此又摘录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一篇的第七—十一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87.
② 同①186-187.
③ 同①213.
④ 同①232.
⑤ 同①239.
⑥ 同①240. ［］内容为引者加。
⑦ 同①240.

章，说明了斯密犯错的地方。根据狭义“资本一般”理论的第三个环节“资本和利润”，在竞争当中产品的生产价格“作为由工资、利润和地租的既定平均率决定的某种既定的东西而出现”①。斯密由于观察到了这种现象才离开了商品价值，转而去研究各种生产要素的平均回报率，并最终用生产要素构成的成本价值论取代了劳动价值论。李嘉图的理论本来是要推翻斯密前后不一致的说法，确立劳动价值论的解释力；但由于李嘉图不是从形式规定出发对价值进行前后一贯的逻辑演绎，他从现实的经济表象出发还是“接受了这种说法的**必然的**……后果——**把价值和费用价格等同起来**”②。

李嘉图最大的错误就是“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离开剩余价值的特殊形式——利润（利息）和地租——来单独考察**剩余价值**”③。李嘉图把利润看作资本主义生产中产品总价格的一部分，资本的所有组成部分都是劳动时间的转化形式，在新的生产中资本家支付工资和地租后，再扣除其他成本，就是自己的利润。在这个公式中，李嘉图不可能区分出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因而也无法从纯粹的形式上说明剩余价值的性质。

马克思从第 XII 笔记本第 650 页开始再次摘录《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以整理李嘉图的价值理论。由于这一部分只是重复了之前的内容，不再专门叙述。虽然批评了李嘉图理论中的内在矛盾和方法论缺陷，马克思还是赞扬了李嘉图在经济学理论上的卓越贡献。在“资本一般”的视角下，李嘉图理论所揭示的内在矛盾恰恰是通往科学的价值理论的必要中介。“李嘉图的冷酷无情不仅是**科学上的诚实**，而且从他的立场来说也是**科学上的必要**。因此对李嘉图来说，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究竟是毁灭土地所有权还是毁灭工人，这是无关紧要的。如果这种进步使工业资产阶级的资本贬值，李嘉图也是欢迎的。……如果说李嘉图的观点整个说来符合**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这只是**因为**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符合生产的利益，或者说，符合人类劳动生产率发展的利益，并且**以此为限**。凡是资产阶级同这种发展发生矛盾的场合，李嘉图就**冷酷无情地**反对资产阶级，就像他在别的场合反对无产阶级和贵族一样。”④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61.

② 同①.

③ 同①419.

④ 同①127-128.

3. 古典经济理论的庸俗性

古典经济学对于价值的界定在经济学上是有局限的，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现代经济学称之为“相对价格理论”——主要强调生产成本对于自然价格的决定作用，选择性地排除了需求和供给对于价格的影响。因此，产品的价格被归结为产品生产的成本（斯密），生产成本又进一步被全部归结为劳动的消耗（李嘉图），劳动时间就成了计量相对价格——交换价值——的标准。除此之外，劳动价值论从创立之初就遇到了诸多理论难题，如“钻石—水”的价值悖论，复杂劳动计算的循环论证，等等。为了解决这些悖论，李嘉图虽然将劳动时间作为价值的尺度，并将价值作为价格形成的基础，但是他反对将价值作为财富的尺度，并认为财富是一个人“所能支配的必需品和奢侈品”①，即使用价值。价值理论以及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区分由此变成经济学当中争论的难题，并最终导致了李嘉图学派的解体和经济学的庸俗化。

在讨论“李嘉图学派的解体”之前，马克思整理了斯密和李嘉图的价值理论与利润理论。斯密只是记录了等量资本提供等量利润的事实，然而丝毫没有关注“这个事实同他提出的价值理论的联系的问题”②。而李嘉图“把利润和剩余价值直接等同起来”，试图解决“商品的**价值规定**同等量资本提供等量利润这一现象的关系”③。但是，李嘉图的价值理论是有缺陷的，在价值理论方面把价值和生产价格混淆起来了（商品按照价值出售），在资本构成方面没有区分出资本的有机构成（同样数量的资本可能有不同的利润率）。李嘉图的理论没有解决价值理论的这两个矛盾，或者价值理论的两个例外：一个是平均利润的形成问题，即等量资本支配的不同形式和程度的无酬劳动都提供等量的利润，李嘉图将其表达为工资对相对价格的影响；另一个是流通时间对利润实现的影响问题，即无酬劳动时间实现的利润与流通和生产时间的长短无关，李嘉图将其表达为资本周转速度对相对价格的影响。

李嘉图的竞争理论实际上觉察到了“价值和费用价格之间存在差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55.

② 同①70.

③ 同①73.

别……尽管只是作为规律的**例外**”①。在评述马尔萨斯的时候，马克思还指出“提出**相对**工资的观点是李嘉图的最大功绩之一”②。相对工资的核心是将工资的价值看作产品价值中的一个部分，因此工人劳动时间的一部分再生产出了自己工资的价值，而另一部分则生产出归资本家所有的利润的价值。马克思在批评托伦斯的时候对价值和生产价格之间的差别和联系做了彻底的解决：“虽然大多数商品的费用价格必定偏离它们的价值，从而它们的‘生产费用’必定偏离它们包含的劳动总量，但是，不仅这种生产费用和费用价格由商品的价值决定，并同价值规律相符合（而不是和它相矛盾），而且甚至生产费用和费用价格的存在本身，也只有在价值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才能理解，没有这个前提，它们的存在就是不可思议的和荒谬的。”③

为了将价值和价格统一起来，李嘉图对价值理论进行了严谨的逻辑推理，开启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他从他所处时代的经济体中进行抽象，构建了基于演绎方法的一种分析”④。经济学的实证化就是研究物（商品/货币）的运行规律，将规范因素排除出去，也就是将经济规律当作了人的自由的自然界限。经济学实证化标志着经济学的成熟。在李嘉图之前，经济学中已经存在用数学模型对社会经济进行实证化研究的因素，例如配第的《政治算术》和魁奈的《经济表》都是用数据和算法对经济活动中的各种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斯密对实证倾向的反感延缓了经济学实证化的趋势，但是没有阻止实证经济学最终成为主流。斯密的反实证倾向妨害了他理论的逻辑严整性，“斯密实际上只是接受了重农学派的遗产，对财产目录的各个项目作了更严格的分类和更详细的描述，但是对于运动的整体未必叙述和说明得像《经济表》大体上描绘的那样正确，尽管魁奈的前提是错误的”⑤。马克思十分重视经济学中的数学模型，在“1861—1863 年手稿”中，正是在数学推算的帮助下，马克思才解决了不变资本在资本流通中的补偿问题。马克思因此高度评价魁奈的贡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74.
② 同①30.
③ 同①86.
④ 兰德雷斯，柯南德尔. 经济思想史. 周文，译.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122.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15.

献，并认为斯密对魁奈的批评“失之过稳”（ein unbescheiden bescheidner Ausdruck）。①

从道德方面对经济学进行攻击在19世纪中叶成为主流，将经济学实证化会减轻经济学本身的道德困境。实证与规范、数学模型与道德追求之间的矛盾在李嘉图的理论中还只是以相对温和的冲突形态表现出来。为了消解（以获得利润为目的的）资本生产和（以满足国民需求为目的的）产品生产之间的冲突，李嘉图在理论上放弃将价值作为财富尺度：如果价值是财富的尺度，那么财富就可能会因为商品的稀缺而增加，这与古典经济学的道德追求相悖；如果财富只是物的使用价值，那么它就不会因为商品数量的减少而增加。解决了这个矛盾之后，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果就是制造商品的充裕，从而增加财富。在否定价值作为财富内容的同时，李嘉图也就否定了货币与资本的必然联系，导致他“在考察资本的生产过程时也就完全忽略流通过程，——而流通过程却包含商品的形态变化，包含资本转化为货币的必然性”②。李嘉图把财富等价于产品的使用价值，实际上是将“资产阶级财富的特有形式只看成某种不触及这种财富内容的表面的东西”③，因此他也否认在危机中爆发出来的资产阶级的矛盾。

古典经济学在创立之初所表现出来的二重性及其在道德问题上的游移不定，正是其科学态度的表现。然而随着经济学的发展，李嘉图之后的经济学家试图将道德问题实证化、自然化，实际上是在掩饰现实当中的实际问题，为非道德的制度做辩护。在李嘉图之后，一部分经济学家坚持对经济现实的道德批评，发展出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另一部分经济学家则在功利主义的影响下走向了对经济现象的实证研究，发展出了庸俗经济学。古典经济学中所谓的李嘉图学派因此而彻底解体。

二、围绕李嘉图的经济学争论

在李嘉图的影响下，古典经济学进入了崭新的理论阶段。围绕李嘉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15；Karl Marx.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Manuskript 1861-1863) Teil 1//Marx-Engels Gesamtausgabe：II/3.1. Berlin：Dietz Verlag，1976：656.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55.

③ 同②.

图经济理论而进行的争论构成了19世纪经济学的核心线索。在李嘉图的经济理论中，社会产品的总价格即总收入都是通过工人的劳动时间计量的，然后再在地主、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分配。李嘉图的收入分配理论一方面彻底否认了高贵的地主阶级的生产功能，另一方面道破了现代生产中工人的不平等地位。这种分配理论虽然保持了逻辑的内在一贯和严谨缜密，但是很难被日常的道德观念所接纳，“由此引起庸俗的慈善家们对他的一片叫骂”①。在李嘉图之后，经济学内部产生了持续的争论，马克思重点摘抄了其间的三部分相关著作，分别是马尔萨斯的著作、李嘉图学派解体时期的著作和约翰·穆勒的著作。

表18　“1861—1863年手稿”中关于李嘉图学派解体的内容

笔记本编号	页码范围	标题
第XI笔记本	495—515	对所谓李嘉图规律的发现史的评论
第XIIII—XIV笔记本	753—781	(i) 马尔萨斯
第XIV笔记本	782—790	(k) 李嘉图学派的解体 托伦斯
	791—805	詹·穆勒。普雷沃
	806—839	几部论战著作
	840—850a	麦克库洛赫
	850a—851	韦克菲尔德。斯特林
	851	约·斯·穆勒
第VIII笔记本	314—347	

1. 马尔萨斯的价值理论

马尔萨斯是李嘉图最主要的理论对手，同时也是对李嘉图理论最有力的批判者。与李嘉图注重逻辑演绎的方法不同，马尔萨斯更加关注现实中的经济困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口的增长给英国的食物供给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与此同时，低收入群体的日益贫困的现状也没有任何改善的迹象。不过与乌托邦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不同，马尔萨斯认为“贫穷与不幸并不是社会制度与政府制度的结果，这些制度的变革不会消除社会的罪恶”②。因此，马尔萨斯反对以社会改革的方式来解决经济问题，这也是理解马尔萨斯经济学理论的出发点。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619.

② 兰德雷斯，柯南德尔. 经济思想史. 周文，译.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118.

马尔萨斯最经典的学术观点就是他的人口理论。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建立在两个假定之上：第一，食物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而食物供给只能以算术级数增长；第二，性爱是人类必然存在的需要，并导致人口数量按照几何级数增长。按照上述假定，食物供给的增长速度无法满足新增人口的需要，马尔萨斯认为这才是现实中贫困与不幸产生的真正原因。如果要解决人口增长与食物供给之间的矛盾，就只能控制人口的增长速度，例如通过延缓结婚年龄来降低出生率或者通过战争和瘟疫等灾难来提高死亡率。然而这些措施只会导致更加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也不能从根源上消除人口与食物的冲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马尔萨斯的论证本身存在着许多漏洞。首先，马尔萨斯没有严肃地考虑过降低出生率的技术手段，对人口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断言令人怀疑。其次，马尔萨斯也没有考虑技术改进对于增加食物的实际影响，对食物按照算术级数增长的断言也并不可信。其中后一个逻辑漏洞成为马克思批评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主要理由。

除了著名的人口理论以外，马尔萨斯对经济学的影响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根据马尔萨斯人口理论而衍生出来的“工资铁律”（The Iron Law of Wages）。马尔萨斯的理论证明了，穷人的收入水平不可能普遍地提高，任何尝试提高低收入群体福利水平的尝试，都会因为其导致的人口过度增长而失败。工人的工资水平因此只能维持在一个最低的水平上，这一观点深刻地影响了李嘉图的工资理论、价值理论和利润理论。其次，马尔萨斯在 19 世纪 20 年代率先提出了“有效需求”（The Effective Demand）的概念。马尔萨斯认为古典经济学将资本积累作为经济增长动力是不充分的，在缺乏有效需求的情况下，过度的资本积累必然会导致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马尔萨斯根据劳动价值理论指出，消费不足的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从工人的角度来看，工人的收入不足以买回他所生产的产品；从资本家的角度来看，资本家的收入要用于储蓄和投资，也无法买回生产的产品。工人和资本家的收入都不足以产生足够的有效需求，这种情况下的资本积累和资本生产必然会导致经济的停滞。马克萨斯推论，为了保证社会生产的有效需求，有必要维持一个只消费不生产的阶级，即收取地租的地主阶级，其他非生产阶级——如教师、仆人、公务员等——也可以发

挥类似的作用。马尔萨斯“直接为‘非生产劳动者’和纯粹的寄生者辩护”① 为他引来了许多恶名，李嘉图和马克思都对这样的观点进行过坚决的批评。马克思就指出，地主阶级的特殊性在于，他们不参加商品生产却通过法权或强权占有商品或货币，他们不必出卖什么就可以成为消费者和买者。因此，资本的增殖不是因为这些阶级的存在，这些买者只能被解释成卖者的一部分商品的共有者，他们购买商品只是通过交换把一部分产品还给商品的所有者和生产者。②

马克思认为马尔萨斯抄袭了安德森③的经济理论，而且马尔萨斯只保留了其中“符合地主利益的……实际结论”，并“利用这个理论去反对无产阶级”④。马尔萨斯对经济的未来持悲观预期，并认为地主阶级的存在对于维持利润率是极为重要的。在论及无产阶级时，马尔萨斯“为了生产而把工人贬低到役畜的地位，甚至宣布要饿死他们并强制他们当光棍”；而在论及贵族阶层和资产阶级时，马尔萨斯就“竭尽全力企图为了现有统治阶级或统治阶级集团的特殊利益而牺牲生产的要求”⑤。马克思将这种自相矛盾的立场称为科学上的卑鄙和犯罪，一方面以生产的名义来贬低工人，另一方面又以道德的名义来贬低生产。马尔萨斯的理论的两个论据，一个是“华莱士关于人类繁殖的几何级数同幻想的动植物的‘算术’级数相对立”的观点，另一个是“安德森的地租理论”⑥。前一个论据被达尔文驳倒了，因为达尔文发现了动植物同样“依照几何级数高度繁殖”⑦；后一个论据被安德森本人驳倒了，“安德森根本没有研究他的地租理论同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关系”⑧，他所论述的主要是地主阶层和工业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冲突。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63.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4.

③ 安德森（James Anderson，1739—1808），苏格兰农学家、政论家和经济学家。安德森是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杰出人物、爱丁堡哲学会的成员、苏格兰犁的发明者。在关于《谷物法》的争论中，安德森主张取消限制谷物贸易的关税保护政策，鼓励谷物的进出口贸易，并坚信农业技术的发展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率从而消灭地租。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26.

⑤ 同④129.

⑥ 同④131.

⑦ 同④131.

⑧ 同④135.

在第 XI 笔记本评述洛贝尔图斯的过程中，马克思加入了一个插入部分讨论安德森的著作《谷物法性质探讨》。安德森为地租的存在给出了一个有趣的论证。安德森认为，“地租的高度和地租的存在只决定于现有各种等级土地的肥沃程度的差别”①。在肥力最低的土地上耕种，它的产品只能补偿生产成本；在肥力较高的土地上耕种，它的产品就会有一个额外的数量（premium）。为了保证各种肥力的土地都能得到耕种和改良，就必须对肥力较高的土地征收地租，拿走它的额外产出。根据安德森的理论，地租存在的基础是农业技术低下导致的土地肥力的不平衡，而不是因为土地本身具有的生产力。这也就意味着，地租的上升和下降完全是由历史造成的，没有自然基础；随着农业技术的改进，贫瘠土地的生产效率会得到持续的提升，“不同等级土地的**肥力的不平衡**，能够越来越**趋于平衡**”②，从而地租也可能随之降低甚至消失。安德森认为，由农业资本家来经营农业注定无法降低地租，因为农业资本家在租赁土地期间不会改良土地；对于短期租赁而言，土地改良只能抬高生产的成本而带不来更多的收益。安德森主张推行一种“理性农业”，将非理性的资本主义生产从农业中排除出去，由农场主来对土地进行长期经营和改良。安德森为地主阶级的生产功能做了极为有力的辩护，并且自己经营了一个颇为成功的农场，马克思因此将安德森称为“实践的租地农场主”③。

简而言之，马尔萨斯也坚持价值理论，但是推导出了与斯密和李嘉图截然不同的结论。“斯密著作中的天才的东西，到马尔萨斯著作中怎样变成了攻击李嘉图观点的反动的东西”④。马尔萨斯认为，资本与劳动的交换遵循的规律与商品交换的规律不同，“分配的规律不完全取决于同交换有关的那些规律”⑤。马尔萨斯直接指出了雇佣劳动和资本的交换是一种不等价的交换。李嘉图“始终是以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进行分配的成品为前提，没有去考察导致这一分配的交换即中介过程”⑥，交换过程显然是非平等和非等价的。马尔萨斯试图“把**商品的价值**和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25.
② 同①.
③ 同①123.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5.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1.
⑥ 同⑤12.

品作为资本的**价值增殖**等同起来”①，所以在理论上认为商品的价值本身就要超过其包含的劳动价值，也就是说商品的价值里已经现成地具有利润，由此才能论证地主阶层作为绝对消费者存在的必要性。产品的价格需要被抬到它的生产成本（价值）之上才能实现利润，如果只存在资本家和工人，那么产品的价格将无法实现。资本家之间通过过贵地出卖商品从而获得利润，如果所有的资本家都实现一般的利润率，那么利润应当从哪里来呢？工人的工资只够买回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而不足以支付利润，只能买回他们产品的一部分，可见“除了工人本身以外，还必须有其他需求和其他买者，否则就不会产生任何利润”②。马尔萨斯据此推测，保有一个只买不卖的非生产阶级对于生产来说是必要的，社会生产需要过度消费的奢侈者和寄生者。马克思因此批评说：

> 马尔萨斯在反对李嘉图时用来作为出发点的，一方面是剩余价值的产生问题，另一方面是李嘉图把不同投资领域中费用价格的平均化看做价值规律本身的变形的方式，以及他始终把利润和剩余价值混淆起来（把两者直接等同起来）的做法。马尔萨斯并没有解决这些矛盾和概念的混乱，而是从李嘉图那里把它们接受过来，以便依靠这种混乱去推翻李嘉图关于价值的基本规律等等，并作出使他的保护人大为愉悦的结论。③

马尔萨斯的支持者认为，“产业资本家应当把他的一部分产品让给只从事消费的阶级……好让这些阶级再拿产业资本家让给他们的东西在吃亏的条件下和产业资本家进行交换”；“否则资本家就会失去对于生产的刺激，而这种刺激恰恰在于，资本家取得高额利润，大大高于商品价值出卖商品”④。马尔萨斯的经济学说是对劳动价值论最庸俗的运用，“用夸夸其谈的辞藻来表达的不过是肤浅的见解”⑤。

马尔萨斯代表了利润解释的另一种可能。李嘉图和马尔萨斯都认为“工人不应占有自己的产品，这样工人才不致失去对于劳动的刺激”⑥，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3.
② 同①18.
③ 同①8-11.
④ 同①20.
⑤ 同①29.
⑥ 同①20.

然而他们对工人创造的产品价值构成有着不同的解释。马尔萨斯认为工人的工资就是产品的价值，但是为了获得利润，商品的价格必须高于其价值。高于工资的这一部分价格，就需要“只从事消费的阶级”来提供。“资本代表**追求抽象财富的欲望，追求价值增殖的欲望**，但是，这种欲望只是由于有代表**支出欲望、消费欲望、奢侈欲望**的购买者阶级存在，也就是说，有那些是买者而不是卖者的非生产阶级存在才能实现。”① 因此，经济行为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资本家同工人的交换，“他们的资本已得到补偿后同第二类交换时出卖实际的剩余产品”；第二类是资本家之间的交换，他们的收入完全来自“涨价”；第三类是非生产的消费者，他们“按照商品的名义价值付款，但自己不出卖商品”②。前两类交换显然是不产生利润的，第三类买者——非生产的消费者——“在社会上代表为了消费而进行的消费，正像资本家阶级代表为了生产而进行的生产一样；前者代表‘挥霍欲’，后者代表‘积累欲’”③。由于非生产的消费者的存在，资本家的积累和生产不会过剩；非生产的消费者只形成需求而不形成供给，可以抵消资本家积累所造成的供过于求。那么，非生产的消费者从哪里来呢？首先是土地所有者，他们无偿地获取地租作为消费来源；其次是依靠税收和其他贡赋生活的国家和教会成员，“维持庞大的军队，支付大量年金，征收供养牧师的什一税，举借大量的国债，以及不时进行费用浩大的战争”④。

根据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和资本理论，资本主义生产会同时导致人口过剩和生产过剩。马尔萨斯认为，“处于生产之外的那些阶级的过度消费……是医治这两种过剩的灵丹妙药”⑤：一方面，工人人口的相对过剩可以通过非生产者的供养而得到消除；另一方面，财富享受者各种形式的过度消费则可以消除资本家的生产过剩。“马尔萨斯企图根据亚·斯密观点的弱点建立一种对立的理论来反对李嘉图根据亚·斯密观点的优点建立的理论”⑥。马尔萨斯与同时代的经济学家相比更加强调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危机，公开承认人口过剩和生产过剩的必然发生。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9.

② 同①49-50.

③ 同①50.

④ 同①51.

⑤ 同①53.

⑥ 同①53.

但是他突出危机的目的是证明“工人阶级的贫困是必要的”，而且“养得脑满肠肥的僧侣和官吏是必不可少的”①。在马克思看来，马尔萨斯对李嘉图的批判是一种历史的倒退，资本主义生产虽然会生产出贫困和不平等，但是同时也会生产出未来社会的物质条件。对资本主义生产的道德批判和怀古并不能产生实际的效果，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在于发现社会关系的内在规律并预见人类社会的未来。

2. 古典经济理论的解体

根据“资本一般”理论，李嘉图经济理论的内在矛盾在于混淆了生产价格和价值，“认为商品的交换价值的变动与花费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无关，它是因流通过程中产生的资本构成上的区别……引起的”②。李嘉图的混淆导致工资变成了纯粹的分配问题，而与产品价值构成无关，实际上已经把劳动价值论推翻了；生产价格与各特殊生产部门所使用的劳动量无关，而只与预付资本的数量有关。马尔萨斯抓住了李嘉图理论与劳动价值论的实质矛盾，但是他没有解决这个矛盾而只是将这个矛盾复述了一遍，“把这些现象用语言表达出来，冒充为解决问题”③。马克思的这个批评是对当时争论双方的双重批判，“他们试图通过经院哲学的枯燥乏味的各种定义和区分，把互相矛盾的一些现象胡说成直接同普遍规律一致，以便在推论中避开这些现象，不过这样一来，基础本身也就不存在了”④。

李嘉图的经济学理论试图证明，“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分离丝毫没有改变——除了某些例外——商品的价值规定”⑤。托伦斯⑥延续了李嘉图的观点，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的价值包含这三部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58.

② 同①26.

③ 同①26.

④ 同①26.

⑤ 同①77.

⑥ 托伦斯（Robert Torrens，1780—1864），英国皇家海军军官、政治经济学家、议员、《环球报》（*The Globe*）的所有者和重要撰稿人。托伦斯是“政治经济学俱乐部（Political Economy Club）”的创始人之一、19世纪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先驱，提出了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原理（比李嘉图早两年）和最优关税理论（比约翰·穆勒早十一年）。托伦斯在19世纪20年代获得了《环球报》的所有权，并将其改造成一份持边沁立场的激进政治报刊，在英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此外，托伦斯还对英国关税改革和殖民政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市的托伦斯河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他一般被当作李嘉图学说的庸俗化者，以及通货主义的支持者。

分：消费掉的固定资本的价值、原料的价值和工资的价值。然而这样就会落入马尔萨斯所设的陷阱，利润将无从产生。托伦斯认为利润是从流通中产生的，从而开启了以“有效需求”来解释价格的思想传统：“有效的需求在于，消费者通过直接的或间接的交换能够和愿意付给商品的部分，大于生产它们时所耗费的资本的一切组成部分”①。马克思当时显然没有意识到这种观点后来会成为经济学的主流，只是将它作为争论的细枝末节来对待。李嘉图和马尔萨斯都认为商品价值（生产费用）中已经包含着利润，只不过关于这部分利润由谁来补偿，两人有着不同的观点。托伦斯则直接否认了生产成本中具有利润的部分，并认为利润来自市场的有效需求。马克思区分了计算生产费用的三种情况：对于资本家而言，生产费用是他的预付资本，也就是为了制造商品所支付的价格；对于商品而言，生产费用是它的价值，也就是商品本身包含的全部劳动时间；而真正的生产费用，即“本来意义上的（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意义上的）**生产费用**”，是生产价格＝预付资本的价值＋平均利润的价值。② 根据马克思的“资本一般”理论，平均利润是各特殊资本作为社会总资本相互发生作用的产物，并没有否定商品价值由劳动时间计量的一般规律，“不管商品的费用价格等于、小于或大于商品的价值，**只要商品的价值**没有生产出来，就是说，只要生产商品所必要的已实现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总量没有花费在商品上，商品是决不能生产出来的”③。

詹姆斯·穆勒被马克思称为“第一个系统地阐述李嘉图理论的人”，同时也是开启了李嘉图学派解体的第一人。④ 马克思对詹姆斯·穆勒的批评主要集中在方法论方面。在詹姆斯·穆勒的经济理论中，“一般规律同进一步发展了的具体关系之间的矛盾，不是想用寻找中介环节的办法来解决，而是想用把具体的东西直接列入抽象的东西，使具体的东西直接适应抽象的东西的办法来解决”；“这里实质上不可能解决问题，而只能是用诡辩的方式消除困难，就是说，只能是搞**经院哲学**……靠改变事物的正确名称来达到这一点”⑤。马克思认为，詹姆斯·穆勒开启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81.
② 同①85.
③ 同①86.
④ 同①88.
⑤ 同①92.

这种庸俗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加速了李嘉图学派的解体。詹姆斯·穆勒将生产中消耗的所有时间都计算为产品价值的来源。在评述詹姆斯·穆勒的过程中，马克思提到了李嘉图理论的另一位支持者普雷沃，认为他的论断表明了“李嘉图的观点以及李嘉图所接受的马尔萨斯的观点虽然能够解释利润率的波动，但是不能解释利润率为什么（不断）下降而无回升”①。

之后马克思又摘录了1820—1830年间英国经济学界关于李嘉图理论的几部论战著作，“事实上都只是围绕价值概念的确定和价值对资本的关系”而进行的争论②，在此之后又依次摘录了麦克库洛赫、韦克菲尔德、斯特林的著作。马克思最后总结，李嘉图学派的解体可以归结为两点：

（1）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与价值规律相一致。

（2）一般利润率的形成。把剩余价值和利润等同起来。不理解价值和费用价格之间的关系。

从詹姆斯·穆勒的评述之后，关于李嘉图学派的手稿内容就只是观点重复和带有文学色彩的批判，此处不再一一列举。

3. 复归古典传统的约翰·穆勒

约翰·穆勒是最后一位具有代表性的古典经济学家，标志着经济学上古典时代的结束。19世纪中期，经济学在功利主义的影响下显示出越来越实证化、数理化的倾向，力图在学术讨论中排除情感和道德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约翰·穆勒主张恢复斯密的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传统，“超越纯粹政治经济学的领域，进行更为宽泛的思考”，进而“合乎情理地建立起了将政治经济学原理应用于实际的坚实的基础”③。约翰·穆勒主张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应当充分考虑非经济因素对于经济运行的影响，从而在经济学研究中重新确立自由和道德的地位。

约翰·穆勒认为自己在经济学上唯一的重要贡献，是他对生产规律和分配规律所做的区分。生产是人类有目的地改造自然并获得产品的实践活动，然而人类的目的能不能实现并不取决于人自身，而要受到众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15-116.

② 同①116.

③ 约翰·穆勒. 政治经济学原理. 金镝，金熠，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1.

客观因素的共同制约。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并获得产品，就必须对生产本身的规律进行研究，并在生产实践中服从这种必然性。因此，“财富生产的规律和条件，带有自然科学的真理所具备的性质”①。然而，“财富的分配却并非如此，它纯粹是与人类制度有关的问题”②。只要产品被生产出来了，那么就完全可以根据人的意愿来对它们进行分配。生产和分配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领域，在生产领域，人必须服从经济规律的必然性，不能用情感支配自己的头脑；而在分配领域，分配的原则完全取决于特定的社会形式和制度安排，人可以对分配的原则进行变革，使其更加符合人的道德诉求。

约翰·穆勒的关于生产规律和分配规律的区分，是对此前正统古典经济学和功利主义经济学的批评。19 世纪的正统经济学在社会改革问题上一般都持较为保守的态度，认为通过政府立法、再次分配等方式改善大众收入水平和道德状况的改革都不会有实质性的作用，反而会因为违背经济规律破坏生产的效率。按照这种保守主义的经济立场，生产和分配都是由客观的规律支配的，即使某些个体遭受着贫困和不幸，也不应当绕过客观规律对他们进行特殊的照顾。受到妻子哈丽特·泰勒的影响，约翰·穆勒坚信人类社会在未来可以达到一种符合情感和道德的良性秩序；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就是设计一种更加符合平等和正义理念的分配方式。约翰·穆勒认为，在不违反生产规律的前提下，经济活动中的许多消极现象可以通过积极的社会改革来缓解甚至消除。例如，约翰·穆勒提倡生产者之间的联合，从而改善工人的生活水平，并提高他们工作的主动性；约翰·穆勒还提出应当通过晚婚和节育等措施来降低人口的出生率，从而抵消农业收益递减的影响。简而言之，约翰·穆勒大体上主张一种社会生产效率优先、个人分配兼顾公平的社会分配方案。约翰·穆勒支持古典经济学中资本生产利润率下降的预测，但是他不认为利润率下降会导致社会发展的停滞。随着经济增长的放缓，社会将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改善福利水平和实现自由发展等目标上，人的发展在那时将在财富分配上获得更为优先的地位。

按照通常的观点，约翰·穆勒的经济学是对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全面

---

① 约翰·穆勒. 政治经济学原理. 金镝，金熠，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160.
② 同①.

提升，同时融合了边沁的功利主义、孔德的社会理论以及泰勒的社会主义观点，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的经济学、政治学和道德哲学。然而在马克思看来，约翰·穆勒的观点相比李嘉图是一种倒退。通过“资本一般”理论中的平均利润理论，马克思证明了“生产形式”和“分配形式”实际上是一致的：“利润、分配形式，在这里同时又是生产形式、生产的一个条件、生产过程的一个必要的构成要素”；马克思因此批评约翰·穆勒“把资产阶级的生产形式看成绝对的，而把资产阶级的分配形式看成相对的、历史的、因而是暂时的，是多么愚蠢”①。约翰·穆勒关于生产和分配的区分虽然解决了当时经济学研究与经济现实严重脱节的问题，但马克思认为，上述区分无益于现实问题的解决，反而将生产过程导致的社会问题当作自然规律认可下来。马克思将约翰·穆勒的经济学著作称为“折衷主义的、混合主义的纲要”②。在马克思的“资本一般”理论中，现代社会中的贫困和不幸都是由资本生产导致的，因此这些社会问题也会随着资本生产的自我扬弃而消除。通过社会改革来消除社会问题只是治标不治本，人类的自由和解放只有在扬弃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新社会当中才能真正实现。

在价值理论上，约翰·穆勒也尝试对李嘉图的学说进行修正和发展。约翰·穆勒认为价值的作用是确定相对价格，而且正是因为价格会不断变动，所以我们才需要探寻价值形成的机制。约翰·穆勒据此否定了李嘉图寻找价值绝对尺度的努力，并指出价值（价格）由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并在竞争中达到一个相对均衡的状态。一件物品如果要成为商品，需要首先满足两个条件：它不仅要具有（满足需求的）效用，而且必须难以直接获取。根据上述标准，约翰·穆勒划分了三类商品，并对它们的价值决定机制分别进行了解释。第一类商品是供给绝对受限的产品，例如艺术品、自然资源以及垄断商品等，商品的价格由需求和供给共同决定，即取决于供给方和购买方的双方博弈，而商品本身没有确定的价格标准。第二类商品是工业制造业的产品，工业产品的生产和销售都处在竞争当中，商品的价格将在竞争中形成并最终在它的生产成本上达到均衡，即商品的价值等于生产成本。第三类商品是农业产品，农业产品的价格取决于最差的生产条件下的农业产品的生产成本；与工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87-88.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

产品不同，农业产品的价格会随着生产的发展越来越高，而不像工业产品那样基本稳定甚至越来越低。马克思并不同意约翰·穆勒所做的区分，并基于“资本一般”理论对约翰·穆勒进行了批评。在约翰·穆勒的价值理论中，“一般规律同进一步发展了的具体关系之间的矛盾，不是想用寻找中介环节的办法来解决，而是想用把具体的东西直接列入抽象的东西，使具体的东西直接适应抽象的东西的办法来解决。而且是想靠**捏造用语**，靠改变事物的正确名称来达到这一点。……这种手法在穆勒那里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它比反对者的一切攻击更严重得多地破坏了李嘉图理论的整个基础”①。

约翰·穆勒区分了不同商品的价值形成机制，不过他没有将劳动列入商品的行列。约翰·穆勒放弃古典经济学中的工资理论，恰好体现了他的人道主义追求。古典经济学认为，工资水平是一个固定的量，由工资基金数量和劳动力规模共同决定，因此任何尝试提高工人待遇的尝试都终将是徒劳的。约翰·穆勒试图论证工人的工资可以通过与雇主的谈判来提升，不过约翰·穆勒始终没有完成提升工资水平的经济学证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进一步批评约翰·穆勒试图为李嘉图的理论做辩护，但实际上却“从一开始就推翻了这个学说”②。

第二节 庸俗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经济学

在李嘉图分配学说的影响下，研究者关于利润的争论使李嘉图学派进一步分裂为社会主义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继承并片面地发展了古典经济学的自然权利理论，要求彻底的劳动价值理论。然而，价值自身的真正实现就是资本主义本身，社会主义者只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表达了资本主义的理想，基于劳动价值论的改造路线只能是一种空想。从“资本一般”的角度来看，这些非批判的经济学几乎没什么理论贡献，与古典经济学相比甚至是一种理论的倒退。通过将利润归结为剩余价值，马克思揭示了李嘉图学派分裂的原因，并完成了对反对派经济学和辩护论经济学的双重批判。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92.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80.

表 19　“1861—1863 年手稿”中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的内容分布

笔记本编号	页码范围	标题
第 X 笔记本	438—441	(e) 兰盖
	441—444	(f) 布雷
第 XIV—XV 笔记本	852—860	(1) 以李嘉图理论为依据的无产阶级反对派 复利：根据复利说明利润率的下降 所谓积累不过是流通现象（储备等等是流通的蓄水池）
	861—863	(2) 莱温斯顿。结尾
	863—890	(3) 和 (4) 霍吉斯金
第 XVIII 笔记本	1084—1086	
第 XV 笔记本	920—923	庸俗经济学

一、作为反对派的社会主义者

古典经济学认为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是必要的不平等，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必然会出现的牺牲，而社会主义者则要求工人有完全平等的经济地位。但经济学的社会主义者同样是从物和生产的方面认识资本关系，没有将这种形式的对抗看成从生产关系中生长出来的对抗，而只是将其视为基于个人私利的阶级冲突，将不平等解释为资本家或资产阶级的贪婪。社会主义者主张对社会进行有意识的控制，从而实现某种道德诉求，例如平等、公平、正义等等。社会主义的要求可以追溯到重商主义甚至更早的某些经院哲学观点之中。社会主义经济学认为个体可以通过自我的设计超越现实的不平等，但是其设计的出发点却是从商品生产中抽象出来的价值观念，因此不可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这种平等的要求不过是试图恢复商品交换的自由和平等，而商品关系的现实形式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本身。所以经济学的社会主义者的愿望实际上也是资本主义的愿望，都会遇到“资本一般”理论所揭示的商品生产规律的局限，从而沦为对现实秩序的辩护。

1. 古典经济学的道德诉求

古典经济学的论证并未被所有的思想传统普遍地接受，当时的社会改革者对古典经济学的批评构成了理解社会主义的理论线索。在经院哲学的道德解释中，以货币为追求的是私人利益，人总是要为普遍利益的实现而放弃一些私人利益。而古典经济学证明，以货币为追求的个人活

动可以带来财富的最快增长。古典经济学基于个人利益的道德诉求在18世纪遭到了重商主义者的强力阻击，重商主义复活了经院哲学的一些道德命题，成为极具影响力和煽动力的一种经济学说。重商主义的观点后来在法国和德国被发扬光大，并传回英国，成为英国社会主义的重要来源。

重商主义者是古典经济学最早的批判者。古典经济学对于个人私利和自由竞争的辩护在18世纪遭到了重商主义者的强烈反对。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一书中，晚期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J.斯图亚特①对自由竞争进行了系统的批评。马克思极为重视J.斯图亚特在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认为他通过区分绝对利润和相对利润科学地发展了重商主义的基本观点，是重商主义的“科学的复制者”② 和“**合理的**表达者”③。绝对利润“仅仅是由劳动生产力的发展造成的更大的使用价值量”④，是财富绝对的增加；而相对利润是“由于商品**高于**它的价值出卖而产生的”⑤ 货币量，也就是单个资本家在（即制造业者）所获得的利润。J.斯图亚特认为国内的自由竞争所导致的只是相对利润的不断让渡和“财富的天平在有关双方之间的摆动”⑥，并不会创造真正的利润或带来新的财富。因此，自由竞争从根本上看就是造成浪费的阶级冲突，特别是劳动者的自由竞争只会给国家和个人带来痛苦和悲剧，自由竞争最好的结果也只能是出现一个劫取公共财富的掠夺性的垄断者(predatory forestaller)。J.斯图亚特提出由国家来塑造合理的经济秩序

---

① J.斯图亚特爵士（Sir James Steuart Denham，4th Baronet，1712—1780），原名为James Steuart，苏格兰重商主义的领军人物，坚定的苏格兰民族主义者，斯密的亲密朋友和主要理论对手。《政治经济学原理探究》（*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是J.斯图亚特的代表著作，基于温和重商主义的著作对政治经济学进行了系统而完整的阐述，可能是第一部系统论述经济学的英文著作，也是苏格兰经济学家写的第一部以“政治经济学”为题的著作，标志着成熟的经济学理论开始形成。与支持“不干涉主义（Laissez-faire）”的斯密相反，J.斯图亚特是“官房主义（Cameralism）”的有力倡导者，两人的针锋相对的经济学观点差异预示了后来经济个人主义（economic individualism）和经济社会主义（economic socialism）在阶级问题上的根本分歧。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1.

③ 同②13.

④ 同②11.

⑤ 同②12.

⑥ 同②12.

并促进真正的生产：在国内的经济秩序中，国家从自由竞争所造成的混乱中将经济重新组织起来，通过在各个行业中组织卡特尔（cartel）——同业联盟——来避免行业内部以及各行业之间的有害竞争；在对外的国际贸易中，外贸公司也同样应该获得国家支持的独占协议，以此来降低贸易的成本，提高在国际上的竞争力。J. 斯图亚特的利润理论是对其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立场的辩护，同时也是对自由竞争的“自然秩序”的批评，在更高的理论水平上捍卫了重商学派的干涉主义政策。

马克思高度评价了 J. 斯图亚特在经济学上的贡献：在对剩余价值的理解上，J. 斯图亚特“关于‘财富的天平在有关双方之间的摆动’的理论……对于考察剩余价值在不同阶级之间的分配，以及在按利润、利息、地租这些不同项目之间进行的分配，有重要的意义”①，与 J. 斯图亚特相比，“重商主义体系事实上否定绝对剩余价值的形成”②；在对资本的理解上，J. 斯图亚特“指出了生产条件作为一定阶级的财产同劳动能力分离的过程是怎样发生的”，历史地考察了现代生产产生的原始条件和演进过程，“虽然他把这个过程看做大工业的条件”③。J. 斯图亚特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凸显了现代经济活动中个人、阶级和社会之间的分裂，并否认基于个人自由的自然秩序可以弥合这些分裂的可能。相应地，与重农学派相反，J. 斯图亚特的利润理论不认为利润是自然秩序下自由竞争的产物，从而也就在经济学上否定了自然秩序的逻辑优先性和自由放任政策的合理性。

J. 斯图亚特的经济学认为自由竞争的市场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可以释放个人的自然欲望，另一方面也会带来经济混乱和阶级冲突，特别是工人内部的竞争造成了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为了达到市场均衡并避免外部风险，国家有必要对人口、就业、供给等经济活动进行干预，通过一种合理的计划专政（a rationally planned dictatorship）将经济上彼此对立的阶级整合为均衡的社会整体。批评市场竞争和强调国家作用的 J. 斯图亚特经济学在德国理论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黑格尔法哲学、历史主义法学和历史主义经济学的重要思想来源。斯密在《国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2.

② 同①42.

③ 同①13.

论》中对J.斯图亚特的重商主义观点进行了猛烈的批评，J.斯图亚特在英国经济学研究中的影响力随后也逐渐被斯密所取代。凯恩斯主义兴起之后，J.斯图亚特才又重新得到理论界的重视。

因此，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对立从政治经济学创立之初就已经存在，表现为重商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经济学争论。经济发展带来了社会利益分化和阶级对立，并引发了众多的社会问题。重商主义主张对经济进行调节，从而将各阶级的矛盾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把阶级整合为一个合乎理性的社会整体。自由主义则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认为阶级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将阶级化约为独立的个体。个人的奋斗和积累将会带来社会福利的增加。由于重商主义和经院哲学在道德观念上具有的内在一致性，晚期重商主义复活了经院哲学中的道德因素，构成了对资本主义进行道德批判的主要力量。重商主义对自由主义的经济批评被社会主义者继承下来，演变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的经济主张，社会主义者继承了重商主义的很多观点，对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就是基于理性推理或道德动机的经济干涉。

2. 李嘉图社会主义的兴起

“1861—1863年手稿”中对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历史批判部分写在第XIV—XV笔记本和第XVIII笔记本上。在此之前，马克思还在独立笔记本（第X笔记本）上摘录了两个与社会主义相关的人物——兰盖和布雷——的著作。马克思首先摘抄了站在地主阶级立场反对启蒙自由主义的兰盖的著作。① 兰盖并不是社会主义者，他“维护亚细亚专制主义，反对文明的欧洲形式的专制主义，他捍卫奴隶制，反对雇佣劳动”②。不过，正因为他反对雇佣劳动，兰盖在某些方面察觉到了现代社会的潜在矛盾。兰盖认为“法的精神就是所有权”，“法律的存在是为了‘批准〈对私有财产〉最初的夺取’，并‘防止以后的夺取’”，因此“法律可以说是一种反对人类最大多数〈即无产者〉的阴谋”③。在资产

① 兰盖（Simon-Nicholas Henri Linguet，1736—1794），法国保守主义法学家、政论家。1766年，兰盖在著名的“François-Jean de la Barre案件”中为la Barre辩护并因此成名，次年写了《民法论》猛烈地抨击孟德斯鸠的法学理论。此后，兰盖投身新闻事业，反对启蒙理性和自由主义，数次因观点过激而流亡和入狱。在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期（1793—1794），兰盖公开支持路易十六，被革命党逮捕并处死。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17.

③ 同②417-418.

阶级社会关系中，所有权的结果就是富人占有的财富越来越多，无产者需要为生活而工作，而工作的过程也就是为富人增加财富的过程。这样一种社会关系是“所有权、建立在所有权基础上的法律以及不可避免的奴隶制的根源”①。马克思关于布雷著作的摘录没有完成，根据“1861—1863 年手稿”编者的判断，马克思摘录布雷著作的目的是说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货币流通”② 的问题。第 X 笔记本的前 23 页原来不在马克思的写作计划之中，内容相对散乱，评述也很简略；不过，由于兰盖和布雷多少都与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讨论有些关联，马克思后来将这两个标题也编了序号，作为“剩余价值理论”的组成部分。

按照马克思的写作计划，“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著作家都不包括在历史的评论之内”，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部分提到的社会主义著作家“不是本身站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立场上，便是从他们自己的立场出发去同资产阶级经济学作斗争”③。在第 XIV 笔记本，马克思再次重申了这一观点：“在政治经济学上的李嘉图时期，同时也出现了反对派——共产主义（欧文）和社会主义（傅立叶、圣西门）”，但是“这里要考察的只是本身从经济学家的前提出发的反对派。……所有这些人实际上都是从李嘉图的形式出发的”④。因此，“1861—1863 年手稿”中提到的“社会主义者”并没有包含马克思对于社会主义的全部评论，而仅仅涵盖了经济学领域内反对古典经济学并持社会主义立场的研究者。马克思在“1861—1863 年手稿”中提到的经济学的反对派实际上只涵盖了以古典经济学为出发点的社会主义者，即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

马克思在这一部分的开头说明了这些持社会主义立场的经济研究者的主要贡献，即“直接把剩余价值……看做‘**剩余劳动**’，即工人无偿地从事的劳动”⑤：

> 如果说李嘉图和其他经济学家的兴趣仅仅在于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把它说成是生产的绝对形式，那么，这本小册子及其他这一类著作，则是要掌握已被揭露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以便从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18.
② 同①393.
③ 同①417.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09.
⑤ 同④209-210.

工业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来反对资本主义生产。

这些经济学研究者的共同特点是将资本的利润解释为资本家对工人产品的无偿占有。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抓住了李嘉图理论中的一个悖论，即一方面“劳动是交换价值的唯一源泉和使用价值的唯一积极的创造者”，另一方面“**资本**就是一切，而工人算不了什么，或者说，工人是资本的单纯的生产费用”；社会主义者从中推导出了激进的观点，认为“**劳动**才是**一切**”，“资本**不过**是对工人的诈骗”①。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都是以李嘉图的经济学为基础的，因此他们只是发展了李嘉图经济理论中将资本和劳动直接等同起来的观点，但是并不理解李嘉图的这个观点意味着什么，“即使是他们中间最出色的人物……也把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一切经济前提作为永恒的形式接受下来，只是希望消灭既是［这些前提的］基础而同时也是［它们的］必然结果的资本”②。

《根据政治经济学原理得出的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这个小册子即使在当时也很少有人知晓。据《全集》中文第二版编辑的考证，这部匿名著作的作者是英国人迪尔克③。马克思也知道这本小册子“不是理论性论著”，而只是“对经济学家们用来解释当时的贫困和‘国民困难’的虚假原因所提出的抗议”④。马克思认为，迪尔克是从劳动时间的长短来考察剩余价值的，因此考察的是“剩余价值的原始形式，即**剩余劳动**形式”⑤。迪尔克所做的工作只是利用李嘉图的理论结论来“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反对资本”⑥。古典经济学的主流观点认为，资本积累有利于生产的发展，而工资水平的提高将导致利润率的下降从而不利于积累。迪尔克根据通俗的人口理论推导出了与经济学家不同的结论，认为资本积累必然导致利润率的下降，“资本增加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是资本价值的减少”⑦。随着资本的积累，如果人口保持不变，那么工资会由于工人的稀缺而提高；如果人口增长，那么工资会因为食物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33-234.

② 同①234.

③ 迪尔克（Charles Wentworth Dilke，1789—1864），英国自由主义政论家、文学作家。迪尔克因戏剧评论和经营 *Athenaeum* 杂志而在文学界留名，他的经济学观点几乎不为人所知。

④ 同①226.

⑤ 同①231.

⑥ 同①227.

⑦ 同①211.

等生活必需品的稀缺而提高。资本积累必然会导致高工资，从而使利润率不断地降低。迪尔克只是延续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但在逻辑方法上完全采用了经验直观的方式。李嘉图认为利润的降低是因为农业生产率的降低，工资水平总体上来说是一个常数。而迪尔克认为利润率的降低是因为全体工人可被剥削的总量是有限的，随着资本的积累，单位资本分得的剩余劳动就会越来越少，体现为利润率的降低。迪尔克以这种方式证明了利息不可能以几何级数持续增长，马克思将此看作迪尔克的“功绩”①。迪尔克认为，“一个国家只有在不为资本支付任何利息的时候，只有在劳动 6 小时而不是劳动 12 小时的时候，才是真正富裕的”，因为“财富就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②。马克思给予这个命题极高的赞誉，并对自由时间的思想进行了再次阐发。根据迪尔克的观点，剩余价值就是超出必要劳动时间的无偿劳动，因此要求取消剩余劳动的方式也就是要求缩短劳动时间，“把**缩短**生产者的**劳动时间**和取消为**剩余产品的所有者**进行的劳动宣布为最终目的”③。莱温斯顿只看到了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形式，而没有看到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形式，而“缩减必要劳动是延长属于资本所有的劳动时间的一种手段”④，迪尔克的要求并没有解决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矛盾。

马克思摘录的第二个小册子是《论公债制度及其影响》，署名作者是莱温斯顿⑤。与迪尔克不同，莱温斯顿把工作日当作了既定的前提，观点更加接近于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即“由于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而归资本所有的剩余产品”⑥。莱温斯顿的主要观点是“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资本**，或者说，**财产**”；财产在莱温斯顿看来就是对他人劳动产品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12.

② 同①228.

③ 同①231.

④ 同①231.

⑤ 莱温斯顿（Piercy Ravenstone）并非真名，而是英国某位保守的社会主义者所用的笔名，笔名的使用者可能是普勒（Richard Puller，1789—1831）或其父老普勒（1747—1826），目前尚未有定论。作为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莱温斯顿以发表匿名小册子的方式参与了 19 世纪 20 年代的经济学争论，对资本主义持有保守的批判态度。他的著作因被马克思提及而受到学术界的注意，其中关于剩余价值的论述被当作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来源之一。

⑥ 同①231.

的占有，而“这种占有只有在**生产劳动**发展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而且只可能是与生产劳动发展的程度相适应”①。莱温斯顿被经济学家的概念所束缚，将生产劳动理解为生产必需品的劳动，而将非生产的劳动即消费和享受当作资本或财产发展的结果；他因此认为，如果没有资本和财产，“工人的必需品便会生产得极其丰富，但不会有奢侈品的生产”②。马克思将莱温斯顿称作“禁欲主义者”，莱温斯顿承认资本主义生产对于发展劳动生产力方面的巨大功绩，但是仍然抨击资本主义生产所导致的奢侈欲望和不平等，并主张通过废除私有财产制度来恢复平等；“如果一切人都是平等的，那么谁也不会为别人劳动”，“生活必需品将会有余，而生活奢侈品将会绝迹”③。马克思批评了这种禁欲的社会主义，认为这是将社会发展的对立的形式和社会发展的内容本身混淆起来：古典经济学中也存在这样的混淆，只不过他们“为了这种对立的成果而希望这种对立永世长存”；经济学的反对派——从相反的一极出发——犯了同样的错误，“决心为了摆脱对立而牺牲在这种对立形式上产生的成果”④。

马克思接着摘录了霍吉斯金⑤的两个小册子《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和《通俗政治经济学》，打算“依次考察这两部著作”⑥，不过马克思在第 XV 笔记本上只摘录了第一部著作就中断了写作，后来在第 XVIII 笔记本上用很短的篇幅摘录了第二部著作。霍吉斯金写作《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的目的是证明“资本的非生产性”。霍吉斯金批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34.

② 同①235.

③ 同①236.

④ 同①235.

⑤ 霍吉斯金（Thomas Hodgskin，1787—1869），英国经济学家、社会主义者、《经济学人》杂志创始人之一。在马克思提及的小册子的三位作者中，霍吉斯金是唯一一位具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霍吉斯金大学期间追随边沁和詹姆斯·穆勒学习，深受功利主义的浸染。但在关于工人联合合法化的议会争论中，霍吉斯金抛弃了詹姆斯·穆勒和李嘉图的功利主义传统，转而支持雇佣工人的政治和经济要求，并批评资本主义和私有财产制度。1823 年，霍吉斯金与 J. C. Robinson 等人一起创办了 *Mechanics Magazine*，并撰文倡议成立 London Mechanics Institute（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的前身），London Mechanics Institute 成立后很快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重要宣传阵地。霍吉斯金的社会主义观点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1832 年改革法案颁布之后，霍吉斯金成为自由贸易的倡导者，退出了社会主义的争论。1843—1857 年，霍吉斯金参与了《经济学人》杂志的创办并持续为其供稿，观点彻底蜕变为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⑥ 同①238.

评的对象主要是托伦斯和马尔萨斯，因为他们将“劳动是价值的创造者”庸俗化为“资本是价值的创造者”。在李嘉图的理论逻辑中，资本和劳动是同一个东西，然而李嘉图理论后来演变成为对资本积累的辩护。在古典经济学中，资本被划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

霍吉斯金认为，“通常被认为是由流动资本的积累产生的一切结果，都是源自**熟练劳动的积累和储存**……不要任何流动资本也可以完成”；工人人数与其说“取决于流动资本的量”，不如说“取决于允许工人消费的并存劳动的产品的量”①。被称为资本的物在生产中发挥的作用被认为是资本造成的，“就像这些物在自己的人格化中，在对劳动的独立性中所具有的作用一样”②。因此就会出现相互关联的两种资本主义批判范式：一种认为只要被称为资本的物“不再以这种**异化的形式**和劳动对立，它们就不再能够产生这种作用”；另一种认为“**资本家**作为资本家只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是与劳动相对立的具有自己的意志、具有人格的劳动产物”，然而在这种人格化背后是“剥削阶级的欺诈和利益”③。归结为一点就是说，那些成为资本的物是好的，对于生产具有促进的作用；资本的弊端是因为它变成了私有财产、变成了资本家的所有物与劳动对立，而资本家的目的只是骗取或榨取工人的劳动成果。所以英国的社会主义者才会提出“我们需要的是资本，而不是资本家”④这样的口号。马克思批评这种观点说，“如果他们排除了资本家，他们也就使劳动条件丧失了作为**资本**的性质”⑤。资本家追逐利润增殖的动机并不是出于他们的特殊利益或者普遍人性，这种思维方式是从现实关系中产生的，只是现实生产关系的表现。根据“资本一般”理论，追求利润是商品生产或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的唯一合理目的，而交换价值本身与商品的物的属性“完全无关”⑥。

马克思接着评述了霍吉斯金关于固定资本的观点。霍吉斯金认为，“固定资本之所以有用不是由于过去劳动，而是由于现在劳动，它给自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76.

② 同①.

③ 同①276-277.

④ 同①277. 这个口号来自布雷《论劳动不平等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25）

⑤ 同①277.

⑥ 同①277.

己的所有者提供利润不是因为它被积累，而是因为它是获得对劳动的支配权的手段”①。马克思认为霍吉斯金在这里“终于正确地抓住了资本的性质”，固定资本是“被生产出来的生产力，是这种资本在大工业中获得发展的条件下，由**社会**劳动为自己创造的手段”②。不过这种生产力采用了与工人对立的形式。

在固定资本的讨论中，马克思再次提及了利润率下降的问题。霍吉斯金认为，“任何劳动，任何生产力，任何才智，任何技术，都不能满足复利的压倒一切的要求”③。简单利润计算的只是剩余劳动的量，而复利的计算需要以不断增加的资本为基数。利润率的下降并不意味着工人被剥削的程度降低了，而是因为资本所使用的劳动总是有限的。因此，“不断有一种平衡创造出来”，劳动生产力的界限必然会拒绝资本家对复利的要求，资本家只能放弃复利而“允许工人有生存资料”④ 以保证最低的体力，以便能够继续将产品中其余的部分全部占为己有。霍吉斯金的思路只考虑了人口的规模，但是马克思仍然认为霍吉斯金的见解可以归结为“资本一般”理论所阐述的“一般规律”：

> 剩余价值即对工人的剥削增加了，但是同时利润率下降了，因为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减少了……在劳动的年产品中，一个较大的部分会在资本的名义下为资本家所占有，一个较小的部分会在利润的名义下为资本家所占有。⑤

在霍吉斯金的评述中，马克思否认了斯密和约翰·穆勒的理论追求的现实性，认为利润率的下降既不意味着对工人剥削程度的降低，也不意味着工人的地位有所改善。

马克思最后评述了霍吉斯金关于资本的总观点。霍吉斯金认为，资本“和**并存劳动**就是一个东西”，生产资本“和**熟练劳动**也是**一个东西**”；因此“资本和工人人口完全是一个意思”，而资本家是“在各种工人之间从事压迫的中介人”⑥。在资本家阶级被消灭之后，资本主义的生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78.
② 同①.
③ 同①284.
④ 同①447.
⑤ 同①295.
⑥ 同①298.

产方式同社会劳动的异化形式将一起消失。马克思对霍吉斯金著作的摘录篇幅巨大，不断地重复着“资本一般”理论中的逻辑内容。不过马克思评述的逻辑十分简单，即分析各种表现为物的生产条件在雇佣劳动制度下所代表的社会关系是什么。在对古典经济学进行评价时，霍吉斯金还主张区分与“自然价格”不同的“社会价格”：“**自然价格**（或**必要**价格）意味着自然为生产某一商品而要求于人的总**劳动量**”，“在现代社会情况下，无论生产任何商品需要多少劳动量，工人要获得和占有商品，他必须付出的劳动，总是大大超过他从自然界购买它所需要的劳动。对工人来说，这样增加的自然价格就是**社会价格**”①。霍吉斯金的区分实际上已经将资本流通和简单流通区别开来。

在“资本一般”的视角下，劳动价值论和“资本—利润”公式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体两面，反对派经济学家否定一面、肯定另一面的追求注定是徒劳的。货币制度（或交换价值制度）本身就是自由和平等的制度，而这种制度的充分发展也必然会转变成自己的反面（劳动力商品的出现）；因此，马克思认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背离等价交换的原则，反对派经济学的社会愿景只不过是一种虔诚而愚蠢的愿望。

3. 空想的社会主义经济学

李嘉图的理论具有极高的内在一致性，然而这种一致性却成为反对他自己的理论武器。李嘉图的理论与社会主义并没有理论上的渊源，李嘉图的直接理论目标是反对《谷物法》，鼓吹自由贸易理论，因此甚至可以说李嘉图的理论直接就是反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兴起的真正原因是当时存在的社会问题：一方面是工人境遇的恶化和工人运动的兴起，另一方面是工厂法案引发的大讨论。

李嘉图的经济理论说明了产品的总价格完全由劳动的总量决定，这个结论演变为工人要求全部收入的现实诉求。李嘉图的经济学给社会主义者提供了新的理论武器，出现了资产阶级内部的社会主义者。所谓的李嘉图社会主义主要是一种大众理论，因此长于情绪鼓动而缺乏精致的理论推理。保留下来的相关的著作大多是一些小册子，对经济学本身的推动作用不大。然而，在当时工人运动和经济危机的双重背景下，社会主义成为正统经济学研究不得不回应的一股力量。反对派经济学的出现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5.

具有现实和理论的双重背景：在现实中，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的兴起使得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拥有了群众基础；在理论上，古典经济学中难以克服的悖论也导致了自身的动摇和瓦解。在处理劳动价值论和“资本—利润”公式之间的矛盾时，反对派经济学的研究者采用了否定“利润”的方式来坚持劳动价值论，想要实现一种没有利润的、“真正”自由的和平等的制度。

古典经济学明确地承认“理想状态”和“现实状态”之间的差别，并将理想状态界定为自然状态，以此来为现实的社会问题辩护。马克思的广义“资本一般”理论解释了古典经济学的这种矛盾。在广义“资本一般”理论的整体逻辑框架中，作为物的商品和货币出现了两次：一次是在抽象形式的简单流通之中，一次是在资本形式的资本流通之中。在简单流通阶段，占有规律表现为“劳动和对自己劳动成果的所有权”①。马克思将简单流通称为“资产阶级生产总过程的抽象领域”②，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简单流通在人类社会各个阶段都普遍地存在过，是一种历史的抽象；另一方面，简单流通在理论上是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的矛盾总体，因而只能是一种无内容的形式抽象。在简单商品流通中，劳动体现为占有的基础，劳动者以劳动的方式占有一件产品，并以这件产品为中介换取其他人的等量劳动：“**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所有权**，在流通中成为**占有他人劳动的基础**。”③ 因此，简单流通中的占有规律是一个人按照自己商品的价值量占有等量的社会劳动即社会财富。在货币出现之后，货币作为一般劳动的象征成为占有关系的物化形式。通过将自己的劳动产品转化为货币，生产者实现了占有一般劳动的现实形式，并进一步可以用货币去换取其他生产者的劳动产品，实现第二级的占有。简单流通阶段中展现的占有规律实现了经济学中关于所有权、自由、平等的三位一体追求，完全是基于私人财产的自愿的互利交换。马克思指出，占有规律的这种理想表现只是一种幻觉。基于所有权、自由和平等的占有规律只是现代商品生产的抽象形式，这种抽象形式的存在需要以资本的生产过程为前提；而一旦进入资本的生产过程，上述占有规律的理想表象就全部失效了。因此，“古典经济学家……都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48.

② 同①370.

③ 同①348.

喜欢把这种**来自资产阶级社会本身**的见解称为一般规律，但却把这种规律的严格的现实性限定在还**不存在所有权**的黄金时代”①。理想的占有规律既不存在于现代社会，也不存在于远古时代；它只是现代社会的美学假象，因而只能存在于理论家假设的自然状态之中。

空想社会主义要求消灭“现实状态”，直接实现“理想状态”，与之针锋相对的庸俗经济学家则试图证明“现实状态”直接就是“理想占有”。马克思认为这两种看似对立的观点实际上是一致的，都只是关注到了流通的表象即“简单流通”，然后就将这种流通中平等的占有规律当作追求的目标，其结果只能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同形式的辩护。占有规律在简单流通中的表现完全来自简单流通中的抽象规定，在简单流通扬弃自身进入资本流通——货币通过购买劳动能力从而转化为资本——之后，占有规律就发生了变化。通过组织生产，货币所有者可以将劳动产品占为己有，从而使自己的货币实现为更大的货币量。也就是说，占有货币的资本家能够支配超出其货币价值量的财富（即社会一般劳动），“一定量对象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所支配的活劳动量，大于该商品本身包含的活劳动量”②。在“资本一般”的最后阶段，也就是在现实的资产阶级经济形式中，“资本家……——作为阶级——实际上占有全部货币财产”③。古典经济学家也承认理想占有规律与现实的冲突，即“商品的价值决定于它们所包含的劳动时间，商品所有者的财富由他所支配的社会劳动量构成”④；但是他们将这种矛盾的存在当作给定的自然规律或社会前提，甚至认为由这一冲突引发的贫富差距对于促进生产效率和增加社会福利反而是有益的。还有的经济学家认为，理想占有规律与现实的冲突可以用再分配的方式解决，从而在结果上实现平等的占有关系。根据马克思的“资本一般”理论，在普遍商品生产的前提下，任何恢复理想占有规律的尝试都是徒劳的。从理论上看，简单流通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总体，它的普遍存在必须以资本流通的普遍实现为前提，也就是说，对平等的追求必然会导致不平等的结果。从现实中看，根据“劳动能力”的形式规定，个人福利的提高也会遇到现实的界限，即不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49.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8.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43.
④ 同②52.

可能将福利提高到每个人都能够自己组织生产的程度。

马克思对占有规律的分析是对庸俗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最直接的反驳。庸俗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虽然在理论上针锋相对，但它们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都希望在经济活动中普遍地实现等价交换原则。庸俗经济学试图证明“从表面到更深处时产生的那些矛盾，实际上不过是一种假象”，现实中的经济参与者都根据他们的占有物获得了相应的收入（即“土地—地租，资本—利润，劳动—工资”的“三位一体”公式）；而空想社会主义者“不理解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的形态和理想的形态之间必然存在的差别，因而愿意做那种徒劳无益的事情，希望重新实现理想的表现本身”①。通过对庸俗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批评，马克思再次展示了“资本一般”理论的批判性，用占有规律的转变彻底超越了此前经济学关于等价交换原则的道德说教。

二、庸俗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

经济学总体上研究的是生产的秩序，而不是道德秩序，然而经济问题无法跟道德问题完全割裂开来。通过实证的方式论证一种生产的自然秩序，同样也是在论证一种道德秩序，只不过这是一种无道德的道德秩序。经济学往往引导人放弃虚妄的道德追求，而只遵循生产的最优秩序来生活。与生产的效率相比，道德在经济学中只能处于次要的位置。这种论点最终无疑会变成对现实的辩护，要求人放弃自我，转而去遵循资本生产的现实规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批评了这些论调的“庸俗”。马克思认为，人终究可以超越现实的束缚，成为自在自为的存在，成为只遵循自我规定的自主和自决的个体。人实现自在自为的途径就是扬弃价值，与之相反，庸俗经济学将价值自然化、实证化为一种自然的规律。

1. 古典经济学的预定和谐理论

对庸俗观念的批判贯穿了马克思一生的理论事业。庸俗经济学——类似于马克思早年间批判过的德国意识形态家——将经济理论和经济现实中的各种表象复制为关于这种表象的观念，并以这种观念为基础整合出一套无原则的折中主义理论体系。因此，庸俗经济学实际上只是用学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63.

术的话语将经济事实复述了一遍，然后就沾沾自喜地认为自己已经完成理论与实际的结合。

古典经济学从创立之初就存在理论上的巨大张力，它一方面论证了自由社会的优越性，另一方面却向人类展示了一个悲观的未来。持乐观立场的经济学家不断地试图证明可以用前一个方面消除后一个方面，在古典经济学早期表现为预定和谐的教条。斯密的经济学中已经出现了对现代生产的二重化分析，并在总体上论证了人类社会的乐观未来。然而，经济现实呈现出来的困境显然超出了斯密理论的解释力。对自由市场的批评来自重商主义、经院哲学甚至经济学自身，生产的过剩、工人的贫困以及道德的沦丧都成为困扰经济学的现实问题。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困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古典经济学中的个体只能以私人利益为目标，追求普遍利益的传统道德哲学被全面抛弃；其次，根据古典经济学的分配理论，工人作为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却承受着相对贫困的不平等待遇；最后，古典经济学认为资本生产的利润率会不断下降，最终导致生产的停滞。古典经济学所呈现的这些理论困境，实际上构成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忠实反映和理论批判。

古典经济学一方面将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解释为生产的自然形式，但是另一方面实际上又证明了这种形式难以为继。由于古典经济学中利润率下降规律的存在，以及经济危机的反复发生，政治经济学内部也出现了分化，产生了为自然秩序辩护的经济学，例如萨伊的经济学表达了对资本生产的自然秩序和资本主义未来的乐观预期。萨伊认为，资本生产本身就会创造出源源不断的需求，因此资本生产不会导致产品过剩，财富可以一直增长，从而实现社会的普遍富裕。萨伊实际上贯彻了斯密的生产成本价值论，是将价值概念庸俗化的第一个阶段。马克思将萨伊的理论当作庸俗经济学的开端：

> 正当经济学本身由于它的分析而使它自己的前提瓦解、动摇的时候，正当经济学的反对派也已经因此而多少以经济的、空想的、批判的和革命的形式存在的时候，庸俗经济学才开始流行开来。

政治经济学中出现了一个学派，他们“把单纯的现象复制当做现象的观念的因素”，从而“作为经济学的特殊表现形式从中分离出来”①。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60.

萨伊“把亚·斯密的不一贯的说法和错误的意见化为十分一般的词句，来掩饰他自己的陈腐的浅薄见解”①。经济学越是发展，它的材料就越是与它的前提相对立，“直到最后在学术上的混合主义和无原则的折中主义的编纂中找到了自己至上的表现”②。萨伊经济学的理论目标是消除斯密理论中的二重性，但是结果却将经济学研究引向了庸俗化。

庸俗经济学的研究者否认古典经济学所遇到的悖论，他们既否认劳动价值论也否认“资本—利润”公式；他们信奉“土地—地租，资本—利息，劳动—工资”的“三位一体”公式，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肢解为一些相互独立又漠不相关的因素，从而证明古典经济学遇到的悖论只不过是一种假象。在庸俗经济学家看来，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都已经得到了应有的补偿，等价交换的原则已经得到了贯彻，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就是永恒和谐的经济制度。在“资本一般”的视角下，地租、利息和工资都是劳动价值的转化形式，三者之间的分配比例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导致的社会问题和阶级对立；庸俗经济学将三者分别看作三个独立的财富源泉的产物，实际上是在掩盖现有制度的根本弊端。

庸俗经济学面对困难的解决方法是“**避开**困难，不是面对应当解释的**特殊区别**，而是相反地用某种关系取而代之，这种关系表明的却是和这种区别相反的东西，因而无论如何也**不**表明这种区别”③。例如在解决资本的困难时，庸俗经济学的解决方法是将资本和商品直接等同起来。产业利润被当作资本家劳动的产物，相对于货币资本家而言，产业资本家被当作“劳动者，不过**是作为资本家的劳动者，即作为对他人劳动的剥削者的劳动者**”④。马克思指出了用经济学来理解资产阶级社会生产的困难之处：

> 社会生产过程的任何前提同时也是它的结果，而它的任何结果同时又表现为前提。因此，过程借以运动的一切**生产关系**，既是它的产物，又是它的条件。我们越是在过程的实际外部表现上来考察这一过程的形态，这一过程就越是在条件的形式上固定下来，以致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81.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61.
③ 同②384.
④ 同②367.

这些条件似乎是不取决于它反而对它起决定作用的东西，而过程参加者们本身的关系对他们来说表现为物的条件、物的力量、物的规定性，尤其是在资本主义过程中，任何要素，甚至最简单的要素，例如商品，都已经是一种颠倒，并已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物的属性，表现为人与这些物的社会属性的关系。①

经济现实与经济理论的“异化形式使古典的，因而也使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家感到困难……而庸俗经济学却正好是在价值的各个不同部分相互对立的**异化**中才感到十分自在”②。庸俗经济学只是从表象上来理解经济，最多只是用学理化的语言将普通观念重新说了一遍。资本、土地和劳动被当作相互独立的来源，它们的联系仅在于可以共同作用于生产，从而产生产品。它们可能会在产品的分配上发生冲突，然而竞争的结果是“大大增加了产品的价值，以致每一个都获得了更大的一份，所以它们的竞争本身只不过是对它们的协调起激励作用的因素的表现”③。货币所有者是“法律上的资本所有者”，产业资本家是“经济上的资本所有者”，利息实际上不过是“对于待完成的剩余劳动的一部分的要求权”④。

2. 功利主义和历史主义经济学

庸俗经济学的第一种形式是古典经济学中具有预定和谐论倾向的一些经济学家的观点，这种形态的庸俗经济学主要是为了消除古典经济学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悲观预期。这些经济学家尚未发觉价值理论本身会带来的问题，认为供给永远不会过量，作为购买愿望的价值永远高于作为生产成本的价值。

庸俗经济学的第二种形式，是功利主义的经济学，这一派经济学家是边沁影响下的古典经济学的一批批评者。马克思并未使用功利主义这一概念，但是马克思所列举的经济学家主要是深受功利主义影响的学者。道德和实证的冲突在 19 世纪初越来越尖锐，经济学内部的自然权利传统遇到了困境，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出发点反而成为反对自己的道德基础。在这样的背景下，以边沁为首的功利主义经济学家开始系统地放弃作为自然价格的价值概念，同时也就抛弃了自然权利理论，只研究现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67-368.

② 同①362.

③ 同①363.

④ 同①369-370.

实的价格形成机制。功利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主流范式，推动了数理化的进程。他们针对价值理论带来的困境，认为价值本身是一个无用的预设；相应地，社会财富的分配不是一个基于自然权利的道德论题，而是一个只与财富生产相关的实证论题。功利主义经济学试图演绎出一套与道德无关的逻辑模型，并以此来指导现实经济政策的制定。

马克思为这个阶段举的例子是巴师夏，“一个职业的调和论者和辩护论者”①。马克思认为巴师夏完全没有参与经济学的研究，也没有丝毫的贡献，只是剽窃古典经济学中有用的观点，而把其他不合口味的内容都消除掉。巴师夏还只是单纯的辩护论者，并没有为自己的理论多加粉饰，加上理论的外衣。经济学的发展和经济现实的冲突使经济学面临着越来越严峻而现实的挑战，而这些新形式的庸俗经济学家“力图通过强制的方法以空谈来摆脱反映对立的思想”②。19 世纪中叶，英国主流经济学发生的功利主义转向，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回应社会主义而提出的。庸俗经济学认为财富的生产与道德无关，资本获取利润是促进财富增长的基本动力，因此工人挣得工资的同时就应当为资本家多劳动一段时间以创造利润。马克思将这种观点称为粗鄙而无原则的折中主义，因为庸俗经济学的这种观点认可了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支配是合理的。

庸俗经济学的第三种形式是历史主义的经济学。德国在欧洲一直以重视传统、信仰和道德而著称。在英国自由贸易理论和法国社会主义思潮的冲击下，德国的思想传统遭到了极大的威胁。经济学用数学的方式设计社会，而社会主义用哲学来设计社会，传统的道德因素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被边缘化了。在遭到数学和哲学的双重批判之后，道德就只能在历史之中找到自己最后的藏身之处，德国的历史主义因此也习惯于用历史来为过去的残余物辩护。历史主义与经济学的结合就产生了历史主义经济学，把存在的一切都当作有价值的。马克思对历史主义的观点进行了更加言辞激烈的批评。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过去的东西并不一定具有合理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新的东西就一定具有合理性；对于道德的追求，不是为了维护现状，而是为了人的真正解放。

由于哲学和经济学都将道德排除在理论之外，历史主义的经济学对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61.

② 同①.

以往反传统、反道德的经济研究方式提出了批评。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是罗雪尔，他将萨维尼的历史主义方法移植到了经济学领域，提出经济学研究的目标不是指出经济的理想状态，而是记述和展现经济事实发生的过程。罗雪尔认为，世间万物皆有价值，都为财富的生产做出了贡献。“照罗雪尔的看法，自然本身就具有价值”①，马克思将这种研究方式称为庸俗经济学的完成形式。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将“教授形式”的历史主义经济学当作庸俗经济学的最后形式。马克思在第 XI 笔记本上讨论安德森的地租理论时就批评过罗雪尔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庸俗性质，认为他对历史文献的评介充斥着“粗暴歪曲历史的错误”②。历史主义的经济学虽然也考察历史和理论，但“不是要发现矛盾，而是要寻求完备”，是要“扼杀［XV—922］一切体系的精神，到处抹去它们的棱角，使它们在一本摘录集里和平相处”③。这种庸俗的经济学“完全以同样的方式超然耸立于社会主义者的空想之上”④，试图用学术的语言消除现实中存在的矛盾，或证明现实中的冲突只是一种假象。在马克思看来，罗雪尔的经济学研究并不是要发现现代社会运行的内在机制，而是直接运用各种现存的理论资源来粉饰现实，“这类著作只有在政治经济学作为科学已走完了它的道路的时候才会出现，所以它们同时也就是这门科学的坟墓”⑤。

尽管庸俗经济学的三种形式是相互批判的，但它们在价值理论上采用了相似的立场。它们普遍将价值的存在当作物本身的自然属性，从而将价值变成了所有自然物都具有的某种普遍性质，即被需要的或有效用的东西。它们否认了体现为资本形式的价值所具有的特殊性，这样的理解方式在将价值范畴客观化的同时，也就将资产阶级的社会关系自然化了。

第三节 “资本一般”与未来社会的逻辑构想

在方法论上，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以及庸俗经济学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44.
② 同①134.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61.
④ 同③362.
⑤ 同③362.

家都犯了同样的错误，即从现存的经济事实出发来抽象一般的经济规律。不过，方法论批判并不是最终目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真正对象是各个经济学流派所设想的理想社会状态或社会改革方案。古典经济学家尽管也存在方法论的缺陷并普遍相信自由市场的力量，但是他们并不惧怕从经济现实中抽象出来的冲突、危机和不平等，并且试图在理论中承认并解决这些问题。与古典经济学家相比，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和庸俗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就简单得多。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认为资本家的贪婪天性是导致经济危机和工人贫困的原因，他们的社会改革主张实际上是要求消灭资本家，同时保留雇佣劳动制度。庸俗经济学家则恰恰相反，他们往往认为用传统的道德规范来评价现代经济运行过程是无效的，或者说，现代的生产秩序本身就是最符合人类理想的社会状态。马克思不同意上述任何一种观点，以现实为前提的抽象观点不可能超越现实本身，因此全部的政治经济学都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尽管它们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理论对立。在“资本一般”部分，马克思展现了在怎样的生产方式中财富观念与经济现实会偶然地重合。根据马克思的推论，财富观念与现实生产过程的一致是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一种幻象，以现实生产过程为前提抽象出来的财富观念并不是对资产阶级社会或现代资本生产的认识，所以以财富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无法提出超越资产阶级社会的改革方案。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冲突不可能通过自我改良来根除；与此同时，由于财富观念和现实生产只是在某些特定条件下才能偶然地重合，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方式必然会在资本生产的持续进行中被自我扬弃。

一、资本生产与自由的限度

根据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立场，历史的出发点是在社会中生产着的个人或个人进行的社会生产。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具有强大的物质改造力量，不断地消除自然的强制性，并将其转化为符合人的目的的人化自然。正是因为资产阶级在为人类社会的自由性质而组织生产，资产阶级才变得难以替代并获得了支配工人的现实力量。然而，在迄今为止所有的生产形式中，社会的个人都或直接或间接地被划分成了相互对立的阶级，马克思据此认为真正属于人的历史尚未开始。根据“资本一般”理论，在人类史前史的发展过程中，以普遍的交换为中介，社会性生产或

生产的社会联系不断地在更大的范围内将自身实现出来，从而为人的全面解放积累着现实的基础。

1. 阶级社会与自由时间

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经常会批评资产阶级社会是非人的社会、是人类历史的史前社会。这样的描述往往会令人困惑。一切社会都是人组成的社会，一切的社会历史都是由人创造的历史，怎么会存在非人的社会和无人的历史呢？实际上，在德国的思想传统中，人具有多重定义：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Mensch）、作为人格的人（Person）以及作为主体的人（Subjekt）。作为人的人是这三者的全部同时实现，也就是获得了自我本质、以自己作为自己前提的自由的人；而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则是服从于外在标准的不自由的人，也就是非人。从康德开始，德国的思想家就普遍相信，让人成为人是人类改造社会的动力和目标，这一思想深刻地影响了马克思对自由和解放的理解。

在德国古典哲学的解释中，人首先要作为自然存在物才能生存，但是人生活的目标不仅仅是活下来。人要成为人，就是在生命中实现自己的目的，摆脱外部界限对自己的束缚，只按照自己的标准来生活。在自然界，动物和植物都不具有人格，因为它们都不能以自我为目的，而只能服从自己的自然规定，一方面以他物为自己存在的基础，自己同时也是他物存在的自然基础。如果人不能按照自己的标准来生活，而必须要屈从于各种被给予的、既定的规律和限制，那么人和动物就没有差别。在阶级社会中，被统治阶级只能服从于统治阶级的意志。被统治阶级的成员在阶级社会中只能接受自己既定的阶级地位，因此与服从自然规定的动物没有差别。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才将资产阶级社会称为动物的社会，而人类历史只有在消灭了阶级社会之后才会开始。

将人和动物区别开来的活动，首先是有目的的劳动即生产。生产是人和动物的差别，因此也是分析人和人类社会的出发点。在人类社会之中，人通过生产改变了自然的强制，从而摆脱了自然对人的束缚，逐步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实现了人本身的自由。而人实现自由的方式，就是在完成生产之后完全按照自己的目的来生活。在生产水平低下的情况下，人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在生产上，人类总体上是不自由的；但是一部分人可以通过他人的过度劳动来获得自己的自由时间，这也就成为阶级划分的标准，一部分人只负责生产，而另一部分人则只享受自由。自

由时间是使人成为人的空间，也就是人真正自由的基本保障。在通过有目的的生产消除了自然的自在性之后，人的自由才可能实现。马克思因此说，可以支配的自由时间“就是财富本身”：“一部分用于消费产品，一部分用于从事自由活动，这种自由活动不像劳动那样是在必须实现的外在目的的压力下决定的”①。劳动的作用只在于提供自由活动的时间和空间，劳动本身并不能成为目的，劳动所遵循的目的仍然是外在的必然性，体现为“自然的必然性”或“社会义务”②。

在资产阶级社会，资本替代了传统社会中某些阶级的生产功能，从而消灭了之前的非生产阶级，同时也消灭了与之相匹配的道德价值观。然而，资产阶级社会仍然是不自由的、非人的，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一部分人的自由发展仍然要以另一部分人的过度劳动作为基础，二是所有人作为孤立个体都要受到以物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规律的强制。因此，真正的社会劳动是“用于我自己”——而不是为别人——进行劳动的时间，它作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的基础，而取得一种完全不同的更为自由的性质，这种同时作为拥有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的人的**劳动时间**，必将比役畜的劳动时间具有高得多的质量”③。作为实现自由的手段，生产和劳动在资产阶级社会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生产发展带来的自由时间也就成为资产阶级社会存在及自我扬弃的现实动机。

在生产力不够发达的情况下，为了生产而结成的社会关系必然要表现为一种操控人的强制力量。在人类仍然遭受自然压迫时，人类社会本身会具有一种整体性，以此来抵御自然的风险。自然力对人的强制力是对人的自由最明显的限制，在处理自然与自由的关系上，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路。第一种思路是承认自然与自由的对立，从而将自由限定在非自然的人类社会关系当中。这种思路后来也成为自由主义的主流，康德在哲学上对这种思路进行了彻底的辩护。然而这种思路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这种自由的定义具有极强的主观任意性，容易陷入各种形式的相对主义。由此便出现了第二种思路，将自由和自然等同起来，从而论证一种自由的必然形式或自然形式，在这种形式的自由中，自由和自然的矛盾将得到和解。古典经济学和黑格尔哲学都对第二种思路进行了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30.

② 同①.

③ 同①231.

辩护，但是侧重点各有不同：尽管都强调自由和自然根本上的同一性，但古典经济学的观点是原本的自然就是自由，而黑格尔认为真正的自由才是自然。在马克思看来，由于没有充分考虑到生产与自由的关系，上述几种对自由的理解实际上都是抽象的。随着生产的发展，人类社会正在逐渐地实现自由，然而显然并未完全地实现。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人相对于自然的强势只能处于不自由的状态；部分人为了实现自由就必然要强制驱使另一部分人进行劳动，体现为人对人的直接强制。

作为阶级社会，资产阶级社会是特殊的，在这种社会形式下，个体不再直接面对自然的生存压力，也不再直接屈从于某个人或某个阶级的特殊意志，而是作为孤立的个体按照自由意志进行活动，实现了形式上的抽象自由。资产阶级社会以快速发展的生产力消除了自然的自在性，社会规律的强制性就成为人实现自主和自决的唯一障碍。马克思认为，社会规律对于人的压迫同样也是由社会生产力的低下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不可能实现普遍的真正自由，一部分个体不得不作为另一部分个体的自然基础，那些在天赋或财产上处于劣势的个体相对而言就会成为被牺牲的对象。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社会是非人社会的最后一种形式，个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只服从于“货币”或“价值”而不必服从于其他的个体意志，资产阶级对于工人阶级的剥削也必须以工资为中介获得工人在法律上的认可。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自愿或非自愿地服从于价值运动的抽象规律，生产的社会性或社会性的生产表现为与个人相对立的、必须服从的外在社会规律；无论工人或资本家，人在现实中都要接受社会规律的强制。

2. 自由个体与人类解放

资产阶级社会消除了自然的强制性之后，社会规律本身的强制性就成为人实现自主和自决的唯一障碍。个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根据法律大致拥有相同的权利而不必服从于其他的个体意志，然而这也造成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关系的内在矛盾：社会关系一方面成为个人实现自由的手段，另一方面也是个人实现自由的限制。① 这种限制在于，个人在资产阶级社会拥有的自由只是抽象的权利，必须和物结合在一起才有可能变成现实；然而作为自由中介的物却遵循着自身的运行规律，从而人的自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5.

由的实现也必须服从相应的物的规律。

资本主义的生产本身已经在创造着人类自由的空间，马克思在“资本一般”理论中对资本主义生产的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资本主义的生产并不是为个别人的生产，而是为全体人类的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非就是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①。阶级社会——包括资产阶级社会——之所以能够存在，并不是某些人的邪恶意志，而是因为人类的生产水平仍然没有达到足以实现自由的水平。那种将个人福利和人类福利对立起来的观点，是因为不理解“人类的才能的这种发展，虽然在开始时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但最终会克服这种对抗，而同每个个人的发展相一致；因此，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②。正如动物以植物为自己的自然基础一样，人类也必然要经历这样的时代，以牺牲个体利益的方式来为种族利益开辟道路。某些特殊个体或特殊阶层之所以能够获得支配和压迫其他个体和阶层的力量，正是因为人类的种族利益与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相一致，“种族的利益同时就是这些具有特权的特殊个体的力量之所在”③。也就是说，个体愿意接受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强制规定，并不是因为某些人的强力，而是因为作为类的个体确实在这种经济关系中获得了更多的自由。

劳动者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自由体现在两个方面：劳动者可以自由地选择将自己的劳动能力出售给谁，劳动者也有可能获得一定量的自由时间。也就是说，劳动者换工作将变得容易，从而不必和某种特殊劳动结合在一起。劳动者的自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对于资本而言，任何劳动都是创造财富的手段，因此劳动的特殊性质实际上是无所谓的；另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各种**平均劳动**……之间的质的差别事实上是会互相抵销的”，“从事**同一种**劳动的工人之间的**个人差别**……渐渐地消失，在分工和机器占统治地位的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中，它们被限制在极狭窄的范围内”④。资本家的自由也可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资本家可以自由地选择将货币投放在哪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27.
② 同①.
③ 同①.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62.

些领域。货币的拥有者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在社会分工中所扮演的角色，“分工在**形式上**是绝对偶然的，取决于商品生产者的自由意志和行动”；“如果说这种自由受到了限制，那么它受到限制并不是由于国家的影响或其他外界的影响，而是由于使商品成为商品的那些生存条件或特点”①。另一方面，资本家可以自由地支配他所获得的货币，从而实现自己的自由发展。资本家的货币并不一定要投入流通转化为资本，作为货币的所有者，他可以选择将货币转化为自由时间，以货币作为他自由发展的物质基础。

不过，一旦回到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资本家和工人的自由实际上就都消失了。他们的自由必须要符合“资本一般”的形式规定才可能实现，也就是必须要服从资本自身的逻辑。无论是工人还是资本家，他们作为个体都是自由的，拥有自我决定的权利；然而，他们一旦进入社会关系当中就会遇到种种限制，社会关系以物的形式决定了个体自由实现的可能和程度。

> **自由竞争**是资本同作为另一个资本的它自身的关系，即资本作为资本的现实行为。只有随着自由竞争的发展，资本的内在规律……才确立为规律，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才在与它相适应的形式上确立起来。……在自由竞争中自由的并不是个人，而是资本。只要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还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所必需的、因而是最适当的形式，个人在资本的纯粹条件范围内的运动，就表现为个人的自由。②

由此便回到了马克思在“导言”中所批评的孤立个人观点。每个人在现代社会中都拥有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谋划生活的权利，但是人们实际上都是以价值作为目标。人的这种抽象的自由只具有形式的意义，这种抽象自由必然要遵循价值本身的规律。在自由主义的传统中，人实现自由的基础是拥有可以自由支配的财产。私有财产看起来是对物的直接支配，然而这种支配只有在与他人交换的时候才有意义，人在支配私有财产的时候实际上也在接受他人对自己的支配。表面上看起来是人在支配物，但实际上是物的价值在支配人。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59.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2.

> 资本主义生产的当事人是生活在一个由魔法控制的世界里，而他们本身的关系对他们表现为物的属性，生产的物质要素的属性。但正是在最后的、最间接的形式上……资本的各种形态表现为生产的实际因素和直接承担者。生息资本在货币资本家身上人格化了，产业资本在产业资本家身上人格化了，提供地租的资本在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地主身上人格化了，最后，劳动在雇佣工人身上人格化了。它们作为这样一些在独立的个人身上……人格化了的固定形态，加入竞争和实际生产过程。竞争以这种外在化为前提。资本的这些固定形态，对于竞争来说，是合乎自然、在自然史意义上存在的形式，而竞争本身在自己的表面现象上[XV—929]只是这一颠倒的世界的运动。就内在联系在这种运动中的实现来说，这种内在联系表现为一种神秘的规律。政治经济学本身，这门致力于重新揭示隐蔽的联系的科学，就是最好的证明。……我们已经看到，亚·斯密起先把价值分解为工资、利润（利息）和地租，后来又反过来把它们说成是商品价格的独立的构成要素。在前一种见解中，他说出了隐蔽的联系；在后一种见解中，他说的是外部表现。①

价值本身是观念，它如何成为一种自在自为的、统治人的东西？马克思用他的“资本一般”理论证明了价值范畴实体化的前提，同时也就揭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形式。

在社会的表象上，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体表现为同样的孤立个体，他们只是按照不同的所有物而区分为不同的群体。一些人因为拥有（有待于实现为货币的）商品而成为商品所有者，例如正在为自己的产品寻找买家的产业资本家或个体生产者、准备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待业工人。一些人因为拥有货币而成为货币所有者，他们已经将自己的商品转化为货币，从而可以用货币去购买自己需要的商品来进行消费或生产。部分货币所有者没有直接购买商品，而是将自己的货币作为商品（即生息资本）来出售，从而转化为资本家。商品、货币和资本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因此个体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似乎完全取决于自己自由意志的选择。在商品流通过程本身，“工人和任何其他货币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75-376.

有者一样，按照同样的价格用这些货币购买商品……作为买者同商品的卖者相对立”①。

个体在社会生产之中达到孤立个体的抽象自由之后，唯一的限制就变成了“价值”观念对人的束缚。这样，剩下的理论问题就是如何超越价值的牢笼。但是，在现代资产阶级的经济关系中，工人和资本家都要受到资本运行规律的限制。工人在生产过程中被监督和贬低，服从于资本的统治。工人一方面为了生存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另一方面为了获得工资被迫作为他人的工具而进行劳动。资本家则在流通中相互竞争，并受到流通规律的限制。资本家一方面要担心自己组织生产的商品是否能够顺利地被市场接受从而转化为货币，另一方面也要担心是否能够及时购买到生产需要的各种要素。相比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和资本家尽管都已经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但是“资本一般”理论解释了这些自由实现的限度。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只是达到了以价值为普遍中介的自为的抽象自由，但还远远没有达到自在自为的、以自我规定为规定的真正自由。

马克思创立“资本一般”理论的初衷就是批评政治经济学将资产阶级社会中孤立个人的抽象自由当作终极社会理想。孤立个人的抽象自由使人摆脱了物资缺乏的自然恐惧和人身依附的意志强制，但却产生了一种新的自由界限——以物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关系。“资本一般”理论不仅实现了马克思的研究初衷，并在两个方面上完成了理论的论证：首先，这种以“物”为中介的自由会产生自身无法克服的不平等和阶级对抗；其次，“物”的规律本身蕴含着超越资产阶级社会的必然性。

二、资本生产的极限及扬弃

资产阶级社会是人类史前史的最后一种生产社会形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自为地提高生产力，另一方面也自在地走向自身的界限。价值的生产会不断地提高生产资料的集中水平，并降低生活必需品的生产成本。当这个过程达到极限的时候，利润也就无从产生，各种财富观念和经济概念的历史性就会展现出来，资本家也就会自己扬弃自己。届时，生产资料已经集中到不能更集中的程度，公有制自然而然地实现，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3.

社会在此基础上重建起消费品的个人所有制：个体每天只花费极少的时间用于生产，每个人根据自己的需要获得生活资料，其他的时间都用于从事自己的爱好，自由发展。在资产阶级社会自我扬弃之后，作为阶级个体和孤立个体的人也将被扬弃，直接的个人社会生产将在未来社会的生产形式中得到真正的实现。

1. 资产阶级社会的两种危机

通过“资本一般”理论，马克思揭示了资产阶级社会中个体自觉的目的和不自觉的结果之间的差别，从而指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极限。资产阶级的自觉目的是为了财富积累，而真实发挥作用的规律则是生产资料的集中和产品生产时间的缩短，两者之间的差别导致了危机的反复发生。根据马克思在“资本一般”理论中的叙述，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危机有两种：一种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形式危机，危机的原因是生产的无计划性造成的经济失衡；另一种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实质危机，危机的原因是资本利润按照复利计算，而剩余价值的生产却按照剩余价值率计算，随着资本积累程度的提高，利润率会越来越低。根据“资本一般”理论，马克思提出，资产阶级的形式危机可以通过经济政策得到缓解，但是实质危机却无法消除，并最终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的自我扬弃。

资本主义形式危机的原因在于以货币为中介的间接交换，在“资本一般”理论的各个环节，马克思都提示了这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这种类型的危机总的来说是因为间接交换所导致的比例失衡，即由于流通和生产的脱离，单个资本在生产时无法预知自己的产品是否能够顺利售出，因此难以避免生产过剩或产能不足的发生。马克思列举了危机的两种形式上的可能性。“危机的第一种形式是商品形态变化本身，即买和卖的分离。”① 在商品形式中，危机表现为交换中断的可能性，也就是生产和消费的脱节。这时就会将危机解释为以货币为中介的交换行为的必然结果。“危机的第二种形式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这里货币在两个不同的、时间上彼此分开的时刻执行两种不同的职能。”② 这时危机就表现为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价值实现手段的脱节，也就是个体对商品价格和收益进行了错误的估计。这就是货币危机的一般表现形式，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578.

② 同①.

不过“过分注意从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发展中产生的危机**形式**，是完全多余的”①。在这两种危机形式中，危机的发生完全是偶然的。

> 在商品流通中，接着又在货币流通中发展起来的矛盾，——因而还有危机的可能性，——自然会在资本中再现出来，因为实际上只是在资本的基础上才有发达的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现在的问题是要追踪考察潜在的危机的进一步发展（现实危机只能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竞争和信用中来说明），要就危机来自资本作为资本所**特有**的，而不是包含在资本作为商品和货币的单纯存在中的那些资本形式规定，来进行这种考察。②

政治经济学家对危机的理解大多只停留在这两种只具有抽象形式的危机上，因此误以为危机是商品生产的必然结果。政治经济学家不了解货币和商品的差别，也就不可能了解以货币为目的的生产和以商品为目的的生产之间的差别。

理解马克思对危机的解释，必须要以广义“资本一般”理论的整体结构为基础。作为狭义“资本一般”理论的第一个环节，“资本的单纯的（直接的）**生产过程**本身在这里不能增添什么新的东西。……并未增添危机的任何新的元素”③。在生产环节，只谈价值的生产，而没有谈价值的实现。在狭义“资本一般”理论的第二个环节“同时就是再生产过程的流通过程”中，“危机的萌芽……只能作不充分的叙述”；因为这个环节也还只是关于资本形成的纯形式的叙述，而现实的资本运动是从现有资本出发的。④ 危机的抽象形式只有在第三环节“资本和利润”中才能得到完整说明。“资本的总流通过程或总再生产过程是资本的生产阶段和资本的流通阶段的统一，是把上述两个过程作为自身的不同阶段来经历的过程”；“这里已包含危机的进一步发展了的可能性或危机的抽象形式”⑤。资本直接追求货币量，从而将生产和流通都当作实现利润的手段。然而这两个过程不一定能够一直顺利转化，这时危机就会发生，“危机就是以暴力方式恢复已经独立化的因素之间的统一，并且是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583.
② 同①581.
③ 同①581.
④ 同①582.
⑤ 同①582.

以暴力方式使实质上统一的因素独立化”①。资本生产只关心货币量的增加，因此必然要实现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在单纯的商品形态变化中已经显露出来的危机的**可能性**，通过（直接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彼此分离再次并且以更发展了的形式表现出来。一旦两个过程不能顺利地互相转化［XIII—713］而彼此独立，就发生危机。”②首先在商品和货币两个环节，已经存在危机的可能性。“危机的一般的、抽象的可能性，无非就是危机的**最抽象的形式**，它没有内容，没有危机的内容丰富的动因。”③

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危机来自随着积累程度提高而同时发生的利润率下降。资本主义生产的自觉目标是实现资本的不断增殖和积累，“整个积累过程首先归结为这样的**追加生产**……这种追加生产的尺度，是**资本**本身，是生产条件的现有规模……和追求资本化的无限欲望……正是以这个过程必须经常地、往往是强制地加以平衡的那种经常的比例失调为前提”④。随着积累程度的提高，资本的基数也会越来越大，因此利润率也就会越来越低，维持稳定的利润率在逻辑上根本不可能实现。马克思在“1861—1863 年手稿”中反复讨论的复利问题正是为了证明资本持续增长的不可能性。资本的利润体现为一个数学比例，利润的增长和资本积累就体现为“复合利润”而不是“简单利润”，“资本主义积累无非是利息再转化为资本”⑤，也就是复利。在一定的时期内，利润在数量上的增长是一个稳定的值，但是资本的利润并不是始终按照最初的原始资本来计算，而是根据积累起来的资本来计算。因此，利润率会不可避免地下降，“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减少了，也就是说，活的现在劳动同所使用的和再生产出的过去劳动相比减少了”⑥。这也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之处，资本的积累取决于“积累过程本身的规模和强度等等，即取决于**生产方式**”，而不是直接对他人财产的占有。⑦ 对于资本家而言，利润只能通过交换来实现，利润量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582.
② 同①575.
③ 同①577-578.
④ 同①559.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80.
⑥ 同⑤284.
⑦ 同⑤286.

不提高生产率的情况下是一个相对恒定的值。随着资本积累程度的不断提高，利润量的恒定就意味着利润率的下降。为了保证稳定的利润率，资本家就不得不继续通过追加投资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产品的成本。利润率的下降是资产阶级社会中经济危机的真正原因，资本家的努力经营只能延缓利润率下降的速度，但无法阻止这一趋势的不断加剧。

利润率的下降还会导致分配原则的变动，从而加剧危机的社会影响。资本主义再生产按照自我规定的不断重复需要一个前提——“劳动生产率不变”，或者至少“生产率的变化不致改变生产当事人之间的关系”①。也就是说，即使商品的价值量发生了变化，但是价值在生产当事人之间的分配比例不发生变化。利息和地租都是由产业资本家预付的剩余价值，因此利息和地租的量的计算需要预设一个稳定的利润率（即剩余价值率）。然而，马克思认为，这种维持“再生产的均衡性或等同性……是不会发生的”②。生产率的发展会改变生产条件，而生产条件反过来也会改变生产率。生产率的变化会导致剩余价值率的变化，并进一步导致利润的变化，从而改变产业利润、利息和地租的分配比例，使生产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偏离原来的再生产条件。从短期来看，这种偏离体现在平均利润的波动上；从长期来看，这种偏离会积累下来，引发危机，通过暴力在表面上恢复原来的关系，也有可能“极缓慢地作为条件的变化得到认可，并为自己开辟道路”③。危机的反复发生证明了利息、地租这两种收入形式的派生性，它们都是对产业利润的再次分配，“正是**危机**结束了生产过程所不断分解成的并不断再生产出来的各种不同要素的**独立性**的这种假象”④。

2. 资本生产和价值的历史性

资本主义实质危机的原因是剩余价值不可能无限地增长，或者说利润率会绝对地下降。“诚然，资本家的**愿望**是获取尽量多的东西。但是，我们的任务不是要谈论他的**愿望**，而是要研究他的**力量**。研究那股**力量的界限**以及**那些界限的性质**。”⑤ 通过“资本一般”的理论视角，马克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79.
② 同①.
③ 同①.
④ 同①380.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8.

思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极限。出于作为价值的资本的本性，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注定需要追求利润的不断增长。由于单位时间内的劳动不会创造更多的价值，因此利润的增加（剩余劳动时间的延长）只能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通过生产力发展降低工资（工人生活必需品价格）的实际价值——来实现。马克思由此得出了与斯密类似的结论，随着劳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资本从生产力提高中获得的利润会越来越少，并最终趋于零。当利润无法增加时，资本将无法积累，工人的工资也将被压到最低，此时社会革命将不可避免。

在“资本一般”部分的叙述中，马克思通过资本观念和资本生产之间的差别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发生危机的原因及其自我扬弃的必然性。马克思一方面解释了资本观念和资本生产在经验事实上的符合，即“等量资本平均来说提供等量利润”；另一方面也指出，从长远来看，资本观念和资本生产的背离必然会周期性地发生。在“1861—1863 年手稿”中，马克思多次以“复利”为题讨论了这种背离发生的机制。在资产者的资本观念中，资本的一般利润率是一个恒定的值，因此观念中利润的量“会按几何级数增长”，也就是会按照复合利润来计算，“不随资本量的增加而减少”①。但是，利润并不是由货币直接创造出来的，而是由雇佣劳动提供的，劳动不可能赶上复利要求，按照复合利润计算的利润率会随着资本积累程度的提高而不断地下降。资本观念与资本生产的经验符合必然会随着资本积累的进行而周期性地破裂，表现为资本的一般利润率会经常偏离人们的预期，“这种偏离或者是引起危机……或者只是极缓慢地作为条件的变化得到认可”，为进一步的偏离创造条件。②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方式来保证相对稳定的复合利润率，然而产品的必要劳动时间不可能降低为零，资本生产终究会有一天会无法保证恒定的利润率，资本观念指导下的资本生产届时将无法再继续实现资本观念的抽象规定。正如“封建主……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生而成为多余的东西”，资产者的资本观念在那时也会“转化为纯粹过时的和不适当的特权……迅速趋于消灭”③，“资本一般”概念所揭示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方式也就随之实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11.

② 同①379.

③ 同①301.

现了自我扬弃。

通过不断地提高生产力来增加利润，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独特规律。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生产力和劳动者都只是资产阶级经济关系实现自身规定的中介和工具。“资本本身就是矛盾，因为它总是力图取消**必要劳动时间**……但是**剩余劳动时间**只是作为对立物，只是同必要劳动时间对立地存在着。因此，资本把必要劳动时间作为它的再生产和价值增殖的**必要**条件。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又是工人阶级力量的发展——到一定时候就会**扬弃资本本身**。”① 基于“资本一般”所论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独有的发展规律，资本主义生产将终结非人的史前史并开创人的历史。在新的生产方式中，劳动者将直接接管已经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被集中起来的生产资料，除了为自己生产必需品外，每个人都不必被迫从事更多的劳动，从而可以在自己创造的自由时间中实现人作为人的全面发展。“这种颠倒的过程不过是**历史的**必然性，不过是从一定的历史出发点或基础出发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但决不是生产的一种**绝对的**必然性，倒是一种暂时的必然性，而这一过程的结果和目的（内在的）是扬弃这个基础本身以及扬弃过程的这种形式。”② 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到自己的极限之前，提前接管生产资料并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在“资本一般”的逻辑框架中，真正的自由只能在价值（资本）自我扬弃了之后才可能完全实现。

资本扬弃自身之后，除了自身的再生产所需的时间之外，所有人都不需要再进行更多的劳动；“这样，所有的人的物质财富都将降到工人的水平”，“但是所有的人都将有**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发展自己的自由时间”③。自由支配的时间是真正的财富，“这种时间不被直接生产劳动所吸收，而是用于娱乐和休闲，从而为自由活动和发展开辟了用武之地”④。资本生产的结果是利润率的不断下降，但是马克思认为利润率的下降恰恰是在为未来社会准备条件。利润率下降、社会成本降低和生产资料集中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然结果，是同一个过程的三种不同表现。利润降为零也就意味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资料的集中程度都已经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42-543.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44.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29.
④ 同③.

达到了极限，届时资本将会扬弃自身并成为新社会的物质基础。资本家就会成为无用的存在，人类社会通过直接接收被资产阶级集中起来的生产资料，也就完成了过渡。随着资产阶级社会扬弃自身，自在自为的价值实体也就不再存在了。价值回归了它本来的样子，变成了人的想象，不再具有统治人的力量。在新的社会形式中，集中起来的生产资料将归人类共同占有，社会将在此基础上重建消费资料的个人所有制。个体只用花费极少的时间就可以获得生活的必需品，因此可以将大量的时间转化为自由时间来实现自我的目的，人类作为个体在新的社会形式中获得了全面的解放，实现了全面自由的发展。

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道出了自己批判政治经济学的真正目标和对未来社会的构想：“政治经济学这门真正的科学是怎样结束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被看做仅仅是**历史的**关系，它们将导致更高级的关系，在那里，那种成为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基础的对抗就会消失。”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310-311.

综论　重新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叙述逻辑

马克思写作“1861—1863 年手稿”的目的，是完成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计划”的开篇“资本一般”。在解读完“1861—1863 年手稿”的文本细节之后，有必要在总体上回顾马克思在其中所完成的理论任务以及所运用的批判方法。通过对手稿的重新解读可以证明，马克思在“资本一般”部分运用了一种概念批判先于社会批判的特殊批判方法。在马克思看来，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前提的商品、货币和资本虽然表现为客观的存在物，但是本身已经蕴含着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认同；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任务，就是用辩证逻辑来揭示这些研究前提的虚幻性。也就是说，“资本一般”部分的理论任务是运用辩证法完成对各种经济学概念的无前提批判。它既不是以劳动价值理论为前提的辩证演绎，也不是以阶级立场为前提的道德批评，而是对商品概念、货币概念以及资本概念抽象性的批判，揭示这些经济概念存在所必需的现实条件。在“资本一般”的叙述逻辑中，商品概念存在的前提是货币观念被普遍接受，货币概念存在的前提是资本观念被普遍接受，而资本概念存在的前提是资本生产的总过程；相应地，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方式中，资本概念、货币概念和商品概念的抽象性才可能被克服，商品概念、货币概念和资本概念因此实际上都是现代资本生产过程的抽象反映。在马克思的创作计划中，完成对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批判，是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现实批判的前提，在“资本一般”部分的基础之上才可以继续分析竞争和信用等现实的资本运动。马克思在“资本一般”部分所运用的独特的

批判方法对于理解《资本论》的逻辑结构而言至关重要，可惜这一批判方法至今仍然极少被人关注到。

一、“资本一般”作为批判工具的有效性

在过去的手稿研究中，“1861—1863 年手稿”往往会被视为一部内容庞杂、逻辑隐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自考茨基版《剩余价值理论》出版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者一直在寻找这部手稿的逻辑线索，以深化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思想的理解。按照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范式，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可以划分为三个相对独立的理论环节：首先，运用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对人类社会的历史进行抽象，从而获得关于人类社会抽象的一般规律，即唯物史观；其次，将一般的唯物史观运用到资产阶级社会这一特殊社会形式上，以得到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科学认识；最后，再运用上述科学认识来批判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和观点，完成对政治经济学的超越。以往对经济学手稿——包括“1861—1863 年手稿”——的理论研究也往往围绕这三个环节进行，然而，马克思“1861—1863 年手稿”中几乎没有直接提及这三个环节中的任何一个，表现为理论和文本的脱节，给“1861—1863 年手稿”的解读制造了巨大的理论困境，使得学界对“1861—1863 年手稿”的研究水平长期停留在寻章摘句式的零碎评论上，无法对这部包含二十三个笔记本的庞大文献进行整体的逻辑梳理。

通过对 1857—1863 年间马克思经济学系列文本的整体回溯，本书认为，解读“1861—1863 年手稿”的困难并非是因为手稿内容的混杂状况，而是学界尚未关注到马克思在批判政治经济学时所运用的独特批判方法。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范式中，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般被当作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具体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方法是从现实利益和物质生产出发来理解社会关系，其批判的对象是从观念出发来理解社会的唯心主义观点。但是，政治经济学显然不属于唯心主义的阵营，唯物史观本身无法在哲学立场或研究方法上构成对政治经济学的有效批判。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对人类社会生产的一种抽象，将资本主义生产看作社会生产的一个历史阶段；而政治经济学是对人类社会生产的另一种抽象，将资本主义生产看作社会生产的自然形式。如果说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同判断只是抽

象结果的不同，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断定马克思的抽象优于政治经济学的抽象，或者说，马克思为什么相信自己的抽象超越了政治经济学的抽象。恰恰在这一点上，唯物史观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单纯对社会生产的唯物主义考察实际上无法证明哪一种抽象更具合理性：两种抽象都是人头脑中的观念，而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观念本身的存在要以现实的生产结构为前提，因此都不足以构成对现实的批判。当批评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时，唯物史观本身具有鲜明的理论特征，并实现了对德国观念论或唯心主义的有效质疑；但是在批评政治经济学的时候，单纯的唯物史观本身已经无法将自己与批评对象有效地区分开来，而只能表现为理论观点或学术立场的不同。对于政治经济学这一具体的批判对象而言，基于唯物史观的批判只能是基于不同立场的学术表达，而无法完成行之有效的理论超越。

要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有效的批判和超越，首先“必须解决与政治经济学本身无关的另外一个问题”，即“应该用什么方法对待科学”①。恩格斯在评述马克思的“科学的世界观”时曾说，“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做基础”，而黑格尔辩证法所具有的“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直接的理论前提”②。由此可以推测，马克思批评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立足点是政治经济学不够“科学”，而“科学”地进行经济学研究必须先“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③。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极其看重黑格尔辩证法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性，“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做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④。在“1861—1863 年手稿”中，马克思不仅没有赞赏政治经济学从物质生产出发的唯物主义立场，反而批评其研究方法是“粗俗的经验主义”⑤，批评其没有纯粹从形式上来研究剩余价值⑥。既然黑格尔辩证法对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

---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1.

② 同①602.

③ 同①603.

④ 同①603.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6.

⑥ 同⑤7.

重要性，那么对于马克思19世纪50、60年代经济学思想的研究就不应当还局限在唯物史观的狭隘视域之内；相应地，理解马克思对于辩证法的改造和运用就成为解读政治经济学批判系列文本——包括“1861—1863年手稿”——的必要前提。

马克思改造和运用辩证法，是因为政治经济学与德国思辨哲学以及蒲鲁东社会主义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在19世纪40年代的理论批判中，马克思的批判对象都是一些试图从观念和概念出发来改造现实的学说；相应地，马克思采用的批判方法是从现实利益和物质生产出发来揭示这些观念和概念的经济基础，从而证明它们不具备变革现实的力量。然而，上述唯物主义的批判方法在面对政治经济学时是无效的。政治经济学同样是从现实利益和物质生产出发的一种理论，它与马克思相左的地方主要在于将资本的生产当作了社会生产的自然形式并否认资产阶级社会将在危机中自我扬弃。对于马克思的批判而言，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在于经济学家们对社会生产进行了错误的抽象。“政治经济学从**商品**开始。……进入交换的产品……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在这个**物**中、在这个产品中结合着……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因此“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尽管“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①。相应地，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就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各种社会形式从物质材料上剥离出来并竭力把它们作为独立的考察对象固定下来”②。

在马克思看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产阶级的社会关系或社会形式，而政治经济学的缺陷恰恰在于无法将社会关系和承载这些社会关系的物区分开来，从而将资产阶级社会特有的社会关系也当作物所具有的自然属性。在现代社会生产中，商品、货币和资本等财富形式的承载物都具有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其中社会属性又可以区分为普遍存在于各种社会形式中的一般社会属性和只存在于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社会属性。但在现实的生产和交换过程中，上述属性都表现为物的特定性质，难以明确而直接地将其单独抽离出来。根据斯密所做的区分，产品本身具有某种可以满足人类需要的自然属性，即使用价值；随着分工的发展，产品在交换过程中获得了其一般的社会属性，即交换价值，从而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4.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93.

将自身实现为商品和货币；社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使得资本积累成为分工细化的必要前提，货币因而拥有了特殊的生产功能和社会属性，转化为资本。斯密据此将人类的经济形式区分为两种状态：一种是无资本积累或资本积累不需要成本的原始状态，生产的目的是满足需要和交换；另一种是以资本积累为前提的现代状态，生产的目的是获取利润，是生产的高级形式。单凭历史唯物主义或者所谓的“社会形态理论”不足以批评斯密对社会生产方式的抽象，因为斯密的经济学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采用了同样的唯物主义立场，它们之间的差别只在于结论有所不同。因此，马克思在批判政治经济学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这一困难体现在“1857—1858 年手稿”之中，并在 1858 年初开始得到逐步的解决，其成果体现在以“资本一般”为题的系列文本之中，即 1858 年写的笔记本 B′、B″和 C，1859 年出版的“第一分册”以及 1863 年完成的“1861—1863 年手稿”。

在“资本一般”理论中，马克思才提出了从物质对象身上剥离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科学方法，即对商品形式的、最抽象的价值概念（即一般劳动时间）进行辩证的逻辑演绎。在改造过黑格尔的辩证法之后，马克思发现这种从现实出发的研究方法恰恰是政治经济学的庸俗之处。在马克思看来，各种经济学观点的对立只是一种虚假的对立，而“资本一般”部分的理论任务就是运用辩证法揭示它们共同的现实基础，即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方式。“资本一般”部分包含商品、货币和资本三个环节，它们作为经济概念的抽象性依次递减。

马克思选择商品作为“资本一般”部分的起点，是因为商品是资产阶级社会中最普遍的存在物。由于商品在自然形态上表现为无限的差异，以商品为前提的经济学研究必然会抽象出完全与物质实体无关的“一般劳动时间”作为商品的共相，然而也正因如此，抽象的“一般劳动时间”无法在经济活动中表现自身，现实中的交换行为处处都是对“一般劳动时间”的背离。如果经济学以商品作为研究的前提，那么相应的经济学理论必然会变成以抽象价值理论来批判现实的空想学说。通过对商品概念批判性的辩证演绎，马克思证明了商品概念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抽象概念，商品观念的存在要以货币和简单流通为前提；也就是说，以商品为前提的劳动价值理论虽然可以提出对现代社会的批评，但却无法超越现实的货币制度。

在经济学研究中，也有一些理论是以货币为前提的。货币的抽象性要比商品弱一些，以货币为前提的经济学理论并不反思货币作为货币发挥作用需要怎样的现实条件，只研究货币作为计量单位和流通手段的具体问题。因此，各种货币理论几乎都没有抽象性，只是对现实中货币问题的忠实分析。然而，通过对货币概念和简单流通过程的辩证演绎，马克思证明了简单流通中的货币概念同样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抽象概念，货币概念在简单流通中所具有的规定性要以资本流通为前提；也就是说，如果货币无法在流通中实现自我增殖，那么货币连自身作为计量单位和流通手段的功能都没有办法保全。在这个意义上，以货币为前提的各种经济学理论看似是纯实证的研究，但实际上都蕴含着对资本主义生产的辩护并以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方式为前提。

在“资本一般”部分的最后一个环节，马克思批判了经济学的第三种前提——资本。资本在现实中表现为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的日常经验，它是历史最短的一种经济现象，但同时也是客观性最强的一种经济学前提。以资本为前提的经济学普遍相信资本家通过预付资本来获取利润是一种符合生产规律的经济行为，并在此基础上研究财富的分配问题。通过对资本概念批判性的辩证演绎，马克思证明了资本观念的存在要以怎样的生产方式为前提，而这些前提也就构成了对资产阶级社会生产方式的认识；也就是说，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方式下，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的抽象观念才可能与现实的物质生产达成概念与客观性的符合。以资本为前提的经济学研究实际上是用学理主义的语言重复了现实的生产过程，不可能在理论上提供超出现实的批判性内容。

综合以上三个环节，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经济学研究前提的“无前提”的批判，其批判方法是通过对经济学概念的辩证演绎呈现其不同程度的抽象性。以商品为前提的经济学最抽象、批判性最强，但这种经济学没有意识到商品规律的抽象性，这种抽象性的克服必须以货币流通和资本流通的实现为中介。马克思据此完成了对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的批判，将他们的社会改革方案归为空想。以资本为前提的经济学最具体、几乎没有批判性，这种经济学没有意识到资本观念与现实生产过程的符合需要怎样的社会生产方式作为中介，而是直接将资本观念当作了对现代生产过程的科学认识。马克思据此完成了对庸俗经济学的批判，指出资本观念与生产过程的符合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一种历史现

象，并解释了现实生产过程与资本观念周期性偏离——危机——的发生机制。

正如黑格尔在制定了辩证法之后根据其理性的实现程度重新书写了哲学史，马克思在制定了“资本一般”的逻辑结构之后也根据其理论前提的抽象程度重新书写了政治经济学史。无论经济学研究是以商品、货币还是资本为研究前提，它们的共同前提都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方式，它们对于经济规律的抽象都必须以资产阶级社会为中介才能获得客观的性质。马克思本人关注的并不是争论中的经济学议题，或者说，经济学议题相较而言只具有从属的地位。经济学家对各种社会问题提出了相互对立的解决方案，但是他们的要求并不能消除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危机。马克思在“1861—1863 年手稿”中所完成的“历史的评论不过是要指出，一方面，经济学家们以怎样的形式互相进行批判，另一方面，经济学规律最先以怎样的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形式被揭示出来并得到进一步发展”①。实际上，马克思的历史评述总体上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经济学之间的具体争论，二是根据“资本一般”理论对这些争论中的观点进行重新排序。

因此，在形式上，“资本一般”部分就表现为运用辩证法对价值概念的逻辑演绎过程，也就是价值概念克服自身的抽象性、获得全部具体规定的辩证发展过程，包括商品、货币和资本三个环节。“商品”是“资本一般”理论的逻辑起点，价值在商品中具有最抽象的规定性，但同时也是最无规定性的抽象，即一般劳动时间。“货币”是“资本一般”理论的逻辑中项，价值在货币形式中克服了无规定的抽象性并获得了新的规定性，成为通过流通来实现增殖的对象化劳动；价值在货币的形式上实现了自为的存在，不过它仍然是抽象的，还需要以人对财富的追求为前提。“资本”是“资本一般”理论的逻辑终点，价值在资本形式中克服了自己的抽象性，成为不依赖于人的自在自为的独立主体。在资本的形式中，价值既是自己的前提又是自己的结果：资本存在的前提是雇佣劳动制度，雇佣劳动制度存在的前提则是生产资料与社会个体的分离，而生产资料与社会个体的分离本身又是资本生产的结果。体现在商品和货币上的价值，都要以人的某种需求为前提，似乎可以通过人的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17.

动干预来消除；但体现在资本形式上的价值不再以人的需求为前提，价值在资本的形式中获得了自我创造、自我更新的能力，而个人基于自由意志的行动只不过是资本生产的中介和工具，价值由此获得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外表。

“资本一般”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评是一种整体的批评，体现了马克思理论批判的独特视角。政治经济学试图以“价值”来理解和修正“资本”，而马克思用“资本一般”理论证明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形式是各种价值观念存在的前提，从而实现了对政治经济学的整体批判。1857—1863 年构成了马克思一生中以“资本一般”为主题的独立创作期，马克思在此期间实现了方法论的突破，并完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最抽象的部分。“1861—1863 年手稿”是这一时期的收官之作，标志着马克思完成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批判或概念批判。

二、“资本一般”与《资本论》的逻辑结构

在传统的手稿研究中，“1861—1863 年手稿”一般被视为《资本论》的第二稿，马克思在其中制定了平均利润理论、地租理论等具体经济学观点。通过对“1861—1863 年手稿”的重新解读可以发现，这部手稿最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在于它与“第一分册”共同构成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计划”的开端——“资本一般”。与此相比，手稿中具体的经济学讨论只是从属性的次要内容，而且只有在“资本一般”的总体框架下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资本一般”部分的整体结构与《资本论》几乎完全相同，并且比《资本论》还要完整，包含了许多未被编入《资本论》的逻辑环节。

1858 年初，马克思根据经济学研究过程中获得的新方法重新规划了自己的写作计划，准备分六册出版自己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著作，分别是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其中资本这一册又包括四篇，分别是资本一般、竞争、信用和股份资本。在新的创作计划中，“资本一般”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开篇，同时也是其中最抽象的部分，包括商品、货币和资本（后改为资本一般）三个章节。马克思在“第一分册”中出版了“资本一般”的前两章，接着又在“1861—1863 年手稿”中完成了“资本一般”第三章的全部三个环节，分别是“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以及

“资本和利润”。按照马克思的构想，“资本一般”的两个分册应当在1859年一起出版；但由于第二分册迟迟未能完稿，极少有人知道马克思在1863年实际上已经完成了“资本一般”部分的全部内容。

1863年6月，由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出版合同搁浅，马克思重新规划了自己的经济学著作，计划以《资本论》为题分三卷四册的结构出版自己在“资本一般”部分所获得的批判成果。新的《资本论》计划延续了“资本一般”的核心议题和逻辑结构，只是在理论细节上做了完善和补充。在“1863—1865年手稿”中，马克思完善了“资本一般”理论第一环节“资本的生产过程”的理论结构，将原来的九篇结构整理为六篇，去掉了作为导论的“商品和货币”和作为理论评述部分的“剩余价值理论”“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同时马克思首次具体制订了狭义“资本一般”理论第二环节“资本的流通过程”的写作提纲，完善了“资本一般”的创作计划；此外，马克思还整理了“1861—1863年手稿”中关于狭义“资本一般”理论第三环节“资本和利润”的内容，留下了《资本论》第3卷的整体手稿。因此，尽管更换了著作的标题，“1863—1865年手稿”仍然是对“资本一般”理论的整理和完善。其中修改的内容只涉及一些细节讨论和术语使用，马克思再没有对自己的论证结构进行过实质性的改动，其中一部分甚至直接是从“1861—1863年手稿”中剪裁过来的。① 他在1866年给恩格斯的信中表达了对“资本一般”部分辩证结构的高度自信：“我亲爱的朋友，你明白，在像我这样的著作中细节上的缺点是难免的。但是**结构**，即整个的内部联系是德国科学的辉煌成就，这是单个的德国人完全可以承认的，因为这决不是**他的**功绩，而是全**民族**的功绩。”②

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实际上完成了广义“资本一般”理论的前两个环节和狭义“资本一般”理论的第一个环节。由于“资本一般”理论的前两个环节已经在“第一分册”中公开发表，因此《资本论》第1卷关于“商品”和“货币”的篇幅很小，只具有概述的性质。③《资本论》第1卷德文版出版之后，马克思又接着整理和出版了多个版本，不过这些调整仅仅局限在一些术语的使用上，都没有对“资

①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6卷.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95，115.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36.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

本一般”理论的逻辑结构进行实质性的改动。值得注意的是，《资本论》第1卷中的“资本的生产过程”环节并不完整。根据马克思在“1861—1863年手稿”里拟订的提纲，韦克菲尔德的殖民理论之后还有一个作为结论的章节“(7) **生产过程的结果**”①，马克思生前没有将其发表，手稿收录在“1863—1865年手稿”里②。

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承担起了整理和出版《资本论》第2卷、第3卷的重担。马克思为第2卷留下了八份手稿，包括1865—1870年的四部手稿以及1877—1881年的四部手稿，为第3卷只留下了一份手稿，即大体上在1865年完成的一部初稿。这两卷手稿的整理出版具有完全不同的处理方式，前者的难点在于手稿篇幅巨大、内容繁杂，而后者的难点在于字迹难辨、逻辑跳跃。为了整理马克思庞大的经济学手稿，恩格斯耗费了非常多的精力，最终大体上按照马克思的原意出版了这部三卷本的鸿篇巨制。恩格斯对《资本论》的整理完整地保留了马克思为了进行经济学批判而进行的艰辛探索，并将其体系化为一个可读的理论版本。不过，由于恩格斯将大量的精力耗费在文本的辨认和内容的整理上，它的整理原则存在着一点缺憾，没有完整地表达“资本一般”理论的逻辑线索。

“资本一般”理论的逻辑，可以为恩格斯的编辑工作提供必要的补充。首先，“资本一般”理论可以补充《资本论》各卷之间的逻辑衔接和过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正式出版的《资本论》各版本中都没有保留这一部分内容。其次，“资本一般”理论可以补充《资本论》第3卷未完成的内容，即第七篇“收入及其源泉”、第八篇“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中货币的回流运动”和第九篇“结论。《资本和雇佣劳动》”，其中恩格斯在《资本论》第2卷的整理中实际上已经用到了第八篇的内容。最后，“资本一般”理论可以证明将《资本论》第4卷命名为“剩余价值理论”并不贴切，“1861—1863年手稿”的历史评述部分至少涉及了七个单独的理论线索，而剩余价值理论只是其中之一。

恩格斯生前应当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对于马克思辩证方法的理解上有欠缺，因此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最想找到的手稿就是马克思关于辩证法的手稿。可惜的是，恩格斯最终也没能找到马克思正面阐述辩证法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313.

②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7卷.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14.

手稿，而马克思生前也只是说别人对他的方法理解很差①，但没有直接表明自己的辩证方法到底是什么。恩格斯对《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的整理出版几乎没有参考“1861—1863年手稿”，他的整理也没有按照“资本一般”的逻辑结构进行。恩格斯整理的《资本论》的结构与“资本一般”理论的逻辑结构存在着一些细微的差别，体现在对篇章安排的判断上。通过对马克思“资本一般”理论的重现，可以看出《资本论》本身还是对资本概念的考察。马克思虽然放弃了“资本一般”的称谓，但《资本论》本身就是“资本一般”理论的逻辑延续和整体呈现。重新研究“1861—1863年手稿”并阐发其中的“资本一般”理论，对于推测《资本论》未完成部分的内容具有不可替代的理论价值。相比于“资本一般”的逻辑结构，“1861—1863年手稿”中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评述反而显得只是一些次要的内容。

在传统的解释范式中，《资本论》往往被解读为一部带有浓重的经济决定论或历史决定论色彩的经济学、哲学著作；相应地，《资本论》的论证逻辑也一般被描述为从客观劳动价值论出发的辩证演绎，也就是通过呈现价值的各种转化形式来验证历史的铁的必然性，以及在此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分析。通过“资本一般”理论的重新发现，《资本论》的核心议题拥有了另一种解释的可能。《资本论》的叙述结构与“资本一般”部分几乎完全一致，由于《资本论》最终没有完成，“资本一般”部分的理论完整性甚至还要优于《资本论》本身。如果将《资本论》与“资本一般”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那么《资本论》的核心议题就发生了变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行的是概念批判而不是社会批判，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批判需要在《资本论》三卷全部完成之后才能进行。马克思进行概念批判的目的，是通过批判各种经济概念来揭示各种经济学理论的成立需要怎样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作为前提，从而将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关系从物质载体上剥离下来，实现对“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的科学认识。因此，以商品为前提的劳动价值理论不仅是《资本论》的理论基础，而且还是《资本论》的批判对象之一。

除此之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运用的叙述方法也可以在“资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

本一般”的整体框架中得到解释。在人们的日常语言里，马克思一般被描述为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和西方思想传统的彻底批判者，按照这种判断，他在《资本论》中所运用的具有浓烈思辨色彩的“叙述方法”就很令人费解。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曾用激烈的语言批判德国的先验思辨观念论，但在自己的成熟著作中却公开承认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并将自己的经济学理论呈现为“一个先验的结构”。在某些极端唯物主义者看来，这种方法的运用甚至可以说是马克思思维水平的倒退。通过“资本一般”部分的逻辑结构可以看出，马克思并没有将辩证逻辑所呈现的“先验结构”作为先于现实的一般规律，马克思运用概念辩证法的目的是揭示特定观念的现实前提。马克思所完成的是一种“无前提”的批判，而不是基于某一种抽象理论的逻辑演绎。

在“1861—1863年手稿”中，马克思完成了“资本一般”理论的逻辑框架，并且也完成了对政治经济学的整体批判。此后，马克思以“资本一般”的逻辑框架为蓝本开启了《资本论》三卷四册结构的写作。《资本论》中尽管没有直接使用“资本一般”这一概念，但是“资本一般”理论的核心议题和批判方法都被保留了下来。此外，由于《资本论》最终没有完成，马克思在1858—1863年间完成的“资本一般”理论实际上是他一生中对于自己批判方法的唯一一次完整运用。因此，在新的文本条件下通过重新研究“1861—1863年手稿”来挖掘马克思的“资本一般”理论，无论对于《资本论》本身的研究，还是回应西方经济学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批评，都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三、“资本一般”与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

《资本论》出版之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成为各种经济学说必须回应的共同议题，因此也出现了基于各种立场的反对意见。价值概念和资本概念仍然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和资本理论也是被西方经济学攻击的对象。现代西方经济学对于马克思经济学思想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过于抽象，缺乏现实的解释力；其次，马克思的经济学包含了过多的道德因素，损害了理论本身的科学性；最后，马克思基于经济学的预测并没有完全应验，已经丧失了对现实的解

释力。根据“资本一般”理论可以发现，这些批评之所以会产生，只是因为他们误解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核心议题和论证逻辑。由于没有理解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中所运用的辩证方法，到目前为止西方经济学的各个流派尚未理解《资本论》中的理论结构，对马克思的批评实际上都是无效的。

第一个批评，即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过于抽象，缺乏现实的解释力。“资本一般”理论证明马克思并不是一个“劳动价值论者”，将马克思归为劳动价值论或客观价值论的辩护者是对“资本一般”理论的极大误解。劳动价值理论是以商品为前提的经济理论，它是马克思“资本一般”部分最先出现的批判对象，而不是“资本一般”理论的前提。商品是资产阶级社会最普遍的存在物，就其自然形态来看表现为无限杂多的差异性；以商品为前提来抽象它们的共同点“价值”，所得到的结果必然是与物质实体无关的“一般劳动时间”。然而也正因如此，作为“一般劳动时间”的抽象价值毫无现实性，对这种价值的认识又不得不与各种商品的自然属性纠缠在一起。因此，商品不可以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前提，以商品为基础的劳动价值理论——和以资本为前提的平均利润理论一样——是马克思批判的对象。马克思在“1861—1863 年手稿”中明确地批评过劳动价值理论的缺陷，例如他批评李嘉图“完全不是从形式方面，从劳动作为价值实体所采取的一定形式方面来研究价值，而只是研究价值量，就是说，研究造成商品**价值量**差别的这种抽象一般的、并在这种形式上是社会的劳动的量”①。这实际上也是对所有价值理论的根本批评，以现存物为前提的经济学研究不可能获得关于价值的科学规定。价值是仅存在于特定社会关系中的抽象观念，对于价值的认识应当去研究产生这种抽象的特定社会形式，而不是将价值当作自然物所具有的属性。从劳动价值论或客观价值论的意义上理解价值，会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退回到重农主义的水平上，将马克思反对的观点混进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当中。按照重农学派的理解，“价值不是人的活动（劳动）的一定的社会存在方式，而是由物质，由土地、自然以及这个物质的各种变态构成的”②。由于马克思的“资本一般”理论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重农主义的庸俗观点构成了对劳动价值学说的解释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90-191.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9.

架，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制造了巨大的困难。为了避免将“资本一般”理论和重农学派混淆起来，马克思专门强调“在考察剩余价值时，必须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这里决不是以脱离交换的生产为前提”①。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对重农主义的批评同样可以用于那些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等同于劳动价值理论的经济学说：“它不是从流通中而是从生产中引出价值和剩余价值，所以它……必然以这样的生产部门为起点，这个生产部门一般可以同流通、交换脱离开来单独考察，并且是不以人和人之间的交换为前提，而只以人和自然之间的交换为前提”。这种解释必然会产生矛盾，“它最先用对于他人劳动的占有来解释**剩余价值**，并且根据商品交换来解释这种占有，但是在它看来……价值只是使用价值，只是物质，而剩余价值只是自然的赠予”②。

第二个批评，即马克思的经济学包含了过多的道德因素，损害了理论本身的科学性。“资本一般”理论证明，马克思也不是一个道德批判者，恰恰相反，马克思反对基于道德的批判，并且自觉排除主观因素对于理论研究的影响。西方经济学的这一批评，是因为没有理解“资本一般”中的独特批判方法，并误解了《资本论》的结构。在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中，理论的建构与批判总是与人的自由和解放密切相关；但是马克思并没有直接地以自由和解放作为理论的目标，而是以现实为基础寻找达到自由的可能路径，并批判那些以保全私有制为前提的社会改革方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确实运用了很多具有道德判断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这并不构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批判逻辑，而且马克思本人也在批评那些通过道德预设来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主义者。在“资本一般”的叙述逻辑中，马克思既没有将带有阶级立场的劳动价值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也没有将现实中对抗和不平等的原因归结为资本家的邪恶意志；马克思批判的方法仅仅是辩证地看待各种相互对立的经济学理论，并在这种形式的对立中揭示它们共同的现实基础，即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方式。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个体普遍以价值的实现和增殖作为自己的现实动机，并在日常经验中服从于价值的规律。马克思用“资本一般”理论证明了，尽管人们对于价值的理解千差万别，但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关系是价值观念存在的前提；因此，基于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1-32.

② 同①25.

价值观念的自由是被资产阶级社会所赋予的自由，根据价值观念提出的各种道德诉求——自由、平等和所有权——都不足以超越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关系。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生产水平低下是社会产生阶级划分的自然基础，人类真正的自由和解放只有在生产力充分发展的情况下才可以真正实现；在这个意义上，资产阶级社会虽然充斥着不平等的关系，但却一直在不自觉地为未来社会准备着物质基础，并将会在资本积累达到极限时扬弃自身。简而言之，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中的道德话语只是对资产阶级社会不平等关系的评论，但并不构成马克思“资本一般”理论的核心批判逻辑，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进行的是一种排除道德因素的“无前提”批判。

第三个批评，即马克思基于经济学的预测并没有完全应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丧失了对现实的解释力。“资本一般”理论证明，马克思在经济学批判中完成的并不是对经济现象的预测，而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形式内在规定的揭示。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所进行的工作与一般的经济学研究有着本质的不同。不过，这种批评在一定程度上也揭示了一个事实，马克思在“资本一般”理论中确实尚未直接论及现实问题。“资本一般”理论只是马克思“资本”理论的第一个环节，在“资本一般”理论之后的“竞争”和“信用”理论中，马克思才会对具体的经济现象进行解释；在资本部分之后，还有土地所有制和雇佣劳动两册来分析现实经济活动中的其他阶级，在此基础上的国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三册才可能对现实问题进行具体的阐述。马克思在“1861—1863 年手稿”中对此专门进行了说明，生产过剩“只是以资本的一般生产规律为条件：以生产力为尺度（也就是按照用一定量资本剥削最大量劳动的可能性）进行生产，而不考虑市场的现有界限或有支付能力的需要的现有界限”；生产的产品转化为货币“是通过再生产和积累的不断扩大，因而通过收入不断再转化为资本来进行的”，然而“广大生产者［的需求］却总是被限制在平均的需要水平上”①。“资本一般”部分所完成的只是对各种经济学前提的批判，这种批判只是从逻辑上阐述了资产阶级社会生产方式的具体规定和抽象形式；“资本一般”虽然可以证明各种经济学理论在何种意义上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生产方式的抽象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605-606.

映，但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状况还需要综合其他现实的资本运动才能解释。这也从侧面证明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三卷本只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抽象部分，对于现实经济的讨论还远远没有开始。可惜《资本论》最终并未完成，而且马克思也没有写作“六册计划”的后续内容，导致“资本一般”部分的理论功能被理论界长期误解。在“资本一般”部分，马克思运用辩证法的目的并不是基于某种前提去预测一个现实的未来，而是帮助读者拨开各种观念的迷雾去认识真正的资本，这也是《资本论》中叙述方法，即小写的“逻辑学”。至于马克思如何看待革命以及人类社会的未来即大写的“逻辑学”，则需要结合“资本一般”之后的现实分析来做进一步阐明，单凭“资本一般”和《资本论》还不足以完成这样的理论任务。

马克思的批判方法没有被人理解，无论是马克思的追随者还是马克思的反对者都没有吸收马克思在“资本一般”部分所进行的理论批判。作为马克思的追随者，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后来逐渐发展为纯粹的政治哲学。基于劳动价值论的经济理论和政治理论，一般偏重于平等和正义的实现，因此要求公共权力对经济的自然运行进行规制。而马克思所批评的庸俗经济学后来对《资本论》进行了长时间的批评，从 19 世纪末开始先后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主流。历史主义经济学主导了 20 世纪上半叶的经济学研究，而功利主义的经济学演化成为偏重于数学模型的实证经济学，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中坚力量。当代经济学虽然系统地放弃了劳动价值理论，但实际上是以另一种方式将价值客观化了。作为价格形成机制的价值，构成了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作为国家财富标准的价值，构成了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它们只是放弃了将劳动作为价值尺度的思路，但是并没有放弃价值观念，而是将其改造成了边际效用价值理论。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根据“资本一般”的批判逻辑，社会主义者基于劳动价值理论对马克思的辩护同样是不完备的，甚至是对马克思的根本误解，价值概念作为人的观念同样不具备客观性。作为马克思经济学的辩护者，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者实际上并没有理解马克思的思路。社会主义经济学从商品的价值量取决于劳动时间这个规定出发，然后研究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关系是否同这个价值规定相矛盾，或者说，它们在多大程度上使这个价值规定发生变形。然而，马克思在“资本一般”

部分的商品环节已经证明了以“一般劳动时间”为尺度的劳动价值论是抽象和非现实的。以劳动价值论为前提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不可能在现实中实现价值的抽象规定：如果坚持价值的抽象规定是普遍的真理，那么社会主义经济学就会成为空想式的道德批判；如果试图寻找价值抽象规定实现自身的具体途径，那么社会主义经济学就成为对资产阶级社会生产方式的间接辩护。由于没有重视马克思的“资本一般”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反对者和辩护者都没有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马克思逝世之后，效用价值理论和劳动价值理论之间的争论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然而两派经济学实际上都没有理解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根据马克思的“资本一般”理论，偏重主观的效用价值理论和偏重客观的劳动价值理论是同一种庸俗思路的两个方面。以价值存在为前提的任何研究，都不足以批评或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最终都会变成对资产阶级社会生产方式的辩护。马克思在“1861—1863 年手稿”中完成的这一工作长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导致了经济学领域对《资本论》的严重误解。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式仍然没有超出马克思的批判范围，还是将现存的商品、货币和资本当作研究的前提，试图从现象中分析出它们的价值规定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价值作为一种抽象观念可能具有多种规定，但是只有资本形式的价值才具有客观的现实性。作为资产阶级社会中的意识形态，经济学研究大多以价值的顺利实现为目标，然而这样的努力并不能实现人的真正的自由。根据马克思的“资本一般”理论，由于“价值”本身已经成为被社会普遍接受的信仰和意识形态，人们根据日常经验而提出的各种社会改革方案无法克服资产阶级社会本身所造成的对抗，只能加剧或者缓解对抗的激烈程度。价值观念存在的前提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方式，在价值观念指引下的经济活动一方面会将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关系再生产出来，另一方面也会在客观上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降低生活必需品的生产成本。生活必需品的生产成本不可能无限下降，当生产成本接近于零的时候，雇佣劳动就不再能为资本家提供稳定的利润率，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方式也就难以为继，价值观念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显示出自己的抽象性并扬弃自身。也就是说，资产阶级社会之所以难以跨越，是因为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尚不足以扬弃资本。按照马克思在“资本一般”部分所提示的思路，在完成了对资产

阶级社会的批判之后，经济学的任务就不再是研究如何通过人为组织生产来实现劳动价值或者通过放任经济活动来实现效用价值，而是研究如何通过发展生产力来消灭价值。消灭价值的客观性，让价值回归其作为观念的本来面目，是马克思在“资本一般”部分最为突出的理论贡献；但这一贡献和马克思所运用的方法一样不被后人理解，导致当代的经济学仍然以价值的存在作为研究前提。

马克思的“资本一般”理论并不完整，其中隐含着的古典主义情怀也可能会遭到现代哲学和经济学的批评，但是对马克思的批评不应当建立在误解之上。由于“资本一般”理论的缺席，过去关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争论都难以深入马克思的具体文本之中，而且为数不少的研究者都将马克思所批判的学说当作了马克思本人的观点。通过“1861—1863年手稿”以及“资本一般”的研究至少可以证明，马克思本人的很多思想至今仍然处在迷雾之中，有待后人去继续探索。随着 $MEGA^2$ 的出版，新文献的不断出现必将推动学界重新审视马克思与西方思想传统的关系以及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变革。

参考文献

一、“1861—1863 年手稿”的相关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6] MEGA^2：II/3. 1. Berlin：Dietz Verlag，1976.
[7] MEGA^2：II/3. 2. Berlin：Dietz Verlag，1977.
[8] MEGA^2：II/3. 3. Berlin：Dietz Verlag，1978.
[9] MEGA^2：II/3. 4. Berlin：Dietz Verlag，1979.
[10] MEGA^2：II/3. 5. Berlin：Dietz Verlag，1980.
[11] MEGA^2：II/3. 6. Berlin：Dietz Verlag，1982.
[12] MECW：vol. 30. London：Lawrence & Wishart Ltd，1988.
[13] MECW：vol. 31. London：Lawrence & Wishart Ltd，1989.
[14] MECW：vol. 32. London：Lawrence & Wishart Ltd，1989.
[15] MECW：vol. 33. London：Lawrence & Wishart Ltd，1991.
[16] MECW：vol. 34. London：Lawrence & Wishart Ltd，1994.

二、与论题相关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7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9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9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3]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4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6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9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三、与论题相关的其他经济学、哲学著作

[1]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 范扬，张企泰，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2] 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上下卷. 贺麟，王玖兴，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3] 黑格尔. 逻辑学：上下卷. 杨一之，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4] 黑格尔. 小逻辑. 贺麟，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5] 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下卷. 郭大力，王亚

南，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6] 李嘉图.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郭大力，王亚南，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7] 穆勒. 政治经济学原理：上下卷. 赵荣潜，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8] 穆勒. 论自由. 许宝骙，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9] 拉姆赛. 论财富的分配. 李任初，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10] 蒂堡，萨维尼. 论统一民法对于德意志的必要性——蒂堡与萨维尼论战文选. 朱虎，译.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

[11] 萨维尼. 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 许章润，译.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12] 萨维尼. 历史法学派的基本思想. 郑永流，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13] 聂锦芳. 马克思的“新哲学”：原型与流变.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14] 兰德雷斯，柯南德尔. 经济思想史. 周文，译.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

[15] 阿多拉茨基. 马克思年表.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16] 麦克莱伦. 马克思传. 王珍，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7] 张世英. 黑格尔辞典.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

[18] 吴彦. 康德法哲学及其起源——德意志法哲学文选：一.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

[19] 吴彦. 观念论法哲学及其批判——德意志法哲学文选：二.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

人名索引

阿什利　Anthony Cooper Ashley　244
安德森　James Anderson　249，282，283，310
巴顿　John Barton　237
巴师夏　Frédéric Bastiat　209，309
边沁　Jeremy Bentham　286，290，299，308
布阿吉尔贝尔　Pierre Le Pesant，sieur de Boisguilbert　208
布雷　John Francis Bray　63，69，171，292，295，296，300
布鲁姆　Henry Peter Brougham　218
达里蒙　Louis Alfred Darimon　38
德斯杜特　Destutt de Tracy　218，219，229
迪尔克　Charles Wentworth Dilke　297，298
杜尔哥　Anne Robert acques Turgot　249
黑格尔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9，12，19-21，24-26，28-30，32，43，45，50，105-118，121，124，125，128，129，133，134，139，142，294，313，314，328，330，332，337
霍吉斯金　Thomas Hodgskin　63，65，222，292，299-302
加尔涅　Germain Garnier　211，218，219，229，266
凯里　Henry Charles Carey　21，228
康德　Immanuel Kant　19，20，108，109，117，312，313
魁奈　François Quesnay　63，69，83，186，187，218，226，278，279

拉姆赛 George Ramsay 63，68，171，186，238，241
莱布尼茨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20
莱温斯顿 Piercy Ravenstone 292，298，299
兰盖 Simon Nicolas Henri Linguet 63，69，171，292，295，296
李嘉图 David Ricardo 6，14－16，34，38，40，46，57，62，63，69，71，81，90，92，96－101，103，104，111，132－134，137，140，141，170，171，179，193，194，203，204，206，208－211，218，221，222，228，235－238，240－242，245－261，263，265，267，269－288，290－292，295－300，302，310，311，331，338
李斯特 Friedrich List 30
路德 Martin Luther 27，185
罗德戴尔 James Maitland Lauderdale 218，219，229，230
罗西 Pellegrino Luigi Edoardo Rossi 218，219，229，230
罗雪尔 Wilhelm George Röscher 209，310
洛克 John Locke 111
马尔萨斯 Thomas Robert Malthus 14，63，171，208，241，247，248，259，263，273，278，280－288，300
麦克库洛赫 John Ramsay Macculloch 211，266，280，288
孟德斯鸠 Charles Montesquieu 295
穆勒，詹姆斯 James Mill 256，287，288，299
穆勒，约翰 John Stuart Mill 62，218，219，229，270，280，286，288－291，301
内克 Jacques Necker 61，62，69，171
欧文 Robert Owen 296
配第 William Petty 72，208，218，224，278
蒲鲁东 Pierre Joseph Proudhon 38，239，329
琼斯 Richard Jones 63，171
萨伊 Jean Baptiste Say 40，209，218，219，229，306，307
舍尔比利埃 Antoine-Elisée Cherbuliez 63，171
圣西门 Henri Saint-Simon 28，296
施泰因 Lorenz von Stein 28

施托尔希　Андрей Карлович Шторх　218，219，230-232

斯密　Adam Smith　6，14，15，34，35，44，46，57，61-63，79-82，84-99，101-104，111，133，140，141，169，171，172，179，186，187，193，203，204，206，208，211-224，226，227，229，232-235，237，238，241，242，245-248，250-252，254，256，265-279，283，285，288，293-295，301，306，307，317，323，329，330

斯图亚特　James Steuart　61，84，171，218，224，225，266，293-295

托伦斯　Robert Torrens　69，278，280，286，287，300

韦克菲尔德　Edward Gibbon Wakefield　57，71，178，280，288，335

西尼耳　Nassau William Senior　101，209，218，219，230

西斯蒙第　Jean Charles Léonard de Sismondi　40，208，218

休谟　David Hume　72，108，109，111

主题索引

拜物教　49，114，199

辩证法　9，12，14，20，43，45－47，53，105－108，110，113－116，118－121，124，125，128，129，131，133，134，142，326，328－330，332，335，337，341

必要劳动　157，171，176，177，181，189，205，239，243，244，298，323，324

剥削　31，32，34，35，88，101，102，180，181，256，267，298，300，301，307，314，340

不变资本　56，57，62，127，169，176，177，185，186，193，196，197，200，203，211，218，233，236－241，243，251，258，276，278，301，321

财富形式　44，46，47，51，52，90，117，118，128，163，329

产业资本　80，85，86，94，175，181，182，185，188，198，199，201，207，221，230，246，248，250，284，307，308，317，322

抽象劳动　139，141

等价物　36，95，104，125，137－139，141，143－150，153，160，161，164，179，202，225

地主　86，92，94，100－102，199，200，207，208，216，230，238，241，246－251，253，254，256，260，261，263，280－284，295，317

对象化 35，45，90，95，119，125-127，130，142-146，150-152，157，166，172，173，180，202，206，260，263，268，304，332

费用价格 63，257，261，271，276-278，284，287，288

分工 14，29，55，57，62，67，85，89-91，93，94，98，99，103，152，171，177，179，180，212-216，222，229，234，237，245，268，315，316，329，330

封建主义 84

服务 32，39，40，43，46，85，94，212，213，215，216，219，220，223，227-232，236

革命 20，26，31-34，37，38，129，227，233，252，295，306，323，341

工厂 38，237，239，244，245，302

工艺学 65

工作日 38，57，83，171，176，180，243-245，298

公社 91，141

共产主义 28，296

固定资本 39，42-44，53，54，56，82，177，182，183，186，189，234-238，241，243，245，287，300，301

谷物法 97，282，283，302

雇佣劳动 14，15，27-29，31，32，34，35，42，55，56，58，84，89，91-93，96，120，131，134，181，184，192，201，202，206，219，220，225，228-230，232，244，257，258，268，283，286，295，302，311，323，332，333，335，340，342

贵金属 14，84，147，148，150，163，164，213，274

货币资本 48，58，188，189，197，198，200，202，238，307，317

货币主义 219，223

级差地租 248，250，252，254，257，259，262，263

借贷资本 86，198，199

经济危机 15，33，36，38，56，205，302，306，311，319，322

精神 20-23，28，29，43，109，110，112，141，217，227，

230-232，242，295，310
具体劳动 24，140-142，144
绝对地租 254-257，259，261，262
绝对剩余价值 13，55，57，60，61，65，68，168，169，171，175-177，180，243，259，294，298
科学 9，12，22，34，49，50，82，83，116，117，123-125，131，136，171，205，223，228，232，236，237，245，262，265，272，276，279，282，289，293，310，317，325，327，328，330，331，334，336-339
空想 14，149，208，291，302，304-306，310，330，331，342
劳动生产率 80，93，94，222，233，234，276，322，323，342
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 16，97，101，133，134，137，209，210，296-298，310，311，331
历史主义 22，23，30，133，209，210，253，294，308-310，341
流动资本 42-44，53，54，82，182，189，234-236，242，300
流通资本 39，42，56，182，183，185
脑力劳动 228
奴隶制 28，227，261，295，296
贫困 27，34，35，38，80，173，252，273，280，281，286，289，290，297，306，311
平等 26，28，30，49，80，92，178-181，184，212，213，236，266，267，270，280，283，286，289，292，299，300，302-304，306，311，318，339-341
平均利润率 71，80，248，250，255，260
企业 225，238
人格化 122，175，223，230，300，317
人口 85，247，249，258，280，281，285，289，294，297，301
商品一般 138，142，143，146，147，202
商品资本 188，189，202
商业资本 48，58，64，74-76，185，194，200，223
上层建筑 106，232

奢侈 94，215，277，284，285，299

社会关系 12，30，36，45，47－50，54，80，87，92，114，117，120，121，123，124，129，130，135，138，141，142，146－148，173，178，184，198，222，261，286，296，302，310，313，314，316，318，327，329，330，336，338，342

社会总资本 128，182，185，186，189－192，195，196，198，224，236，239，287

生产一般 39，46，52，54，117，133

生产方式 9，29，39，45－48，50，78，95，96，105，106，116－120，122，129，134－137，139，168，180，243，246，251，255，256，261，264，302，306，307，311，318，321，323，324，326，330－332，339，340，342

生产费用 182，194，197，253，278，287，297

生产关系 37，45，49，78，106，114，118，122，123，135，137，199，222，231，292，296，300，307，325，336

生产价格 6，57，184，195－199，204，206－208，257，259，260，276－278，286，287

生产劳动 6，57，62，83，85，89，93，94，101，170，175，184，186，204－206，211－213，215－227，229－234，299，324，334

生产力 85，91，94，130，176，177，181，205，208，213，215，222，223，245，258，259，263，276，283，293，298，299，301，313－316，318，323，324，340，342，343

生活资料 29，30，42，43，53，85，91，94，96，173，174，176，199－201，222，319

生理学 92，119，262

生息资本 175，185，194，198，317

世界市场 31，32，54，164，261，333，340

收入形式 85，92，100，102－104，118，195，197－199，221，238，240，241，248，256，322

所有权 29，43，49，84，89，91，92，179，181，226，248，250，253－256，260－263，268，270，276，286，295，296，303，304，340

土地肥力 283
文明 80，91，94，103，141，269，295
无产阶级 19，24－27，29－32，35，36，208，276，282，292，297
物化 14，41，148，150，164，303
物质变换 127，154，156，160，161，185
相对剩余价值 13，55，57，60，61，65，141，168－171，175－177，180，181，233，237，243，258，259，298
协作 14，28，55，57，90，171，177，180，245
信用 53，54，135，183，320，326，333，340
研究方法 28，32，105，111，138，265，272，278，288，327，328，330
一般利润率 15，16，209，250，258，269，271，274，288，323
异化 40，94，117，222，245，246，300，302，308
意识 2，9，19，21，23，26，27，29－32，34，36，41，51，60，62，82，88，89，103，110，122，127，141，160，170，177，220，228，230－232，242，253，254，269－272，275，287，292，305，311，331，335，342
银行 38，84，273
庸俗经济学 6，14，58，92，96，102－105，133，184，185，194，201，204，208－210，264，271，279，291，292，304－311，331，341
预付资本 80，85，86，95，127，175－178，183，189，192，195－197，202，207，223，226，241，255，257，269，286，287，331
占有规律 48，49，55，57，181，303－305
殖民地 261，273
重农学派 61，62，82－85，87，93，171，214，223，225，226，266，278，294，338，339
重商主义 68，69，81－86，169，212－214，219，223，224，226，234，253，292－295，306
资本的有机构成 261，277
资本家 31，32，34，35，38，42，46，53，80，81，83－86，

89，91-94，96，100-103，127，173-177，179-181，184，186，188，189，191，192，196，197，199-201，206-208，210，212，214-217，220-222，225，226，228-230，232-235，237-245，247-250，254-257，260-263，267-271，276，278，280-285，287，292，293，296，297，300，301，304，307，309，311，314-318，321，322，325，331，339，342

资本周转　183，237，277

自由时间　298，312，313，315，316，324，325

总产品　99，189，200，201，239，240，248，266

总利润　196，238

租地农场主　83，261，283

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　聂锦芳　主编

第一卷　滥觞与勃兴
马克思思想起源探究　　聂锦芳 著

第二卷　“苦恼的疑问”及其解决
《莱茵报》-《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文献及思想再研究　　黄建都 著

第三卷　思想的传承与决裂
以“犹太人问题”为中心的考察　　李彬彬 著

第四卷　异化的探寻及其扬弃
“巴黎手稿”再研究　　刘秀萍 著

第五卷　思想的剥离与锻造
《神圣家族》文本释读　　刘秀萍 著

第六卷　在批判中建构“新哲学”框架
《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学研究　　聂锦芳 著

第七卷　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哲学的贫困》与《贫困的哲学》比较研究　　杨洪源 著

第八卷　“革命”的非模式化解读
1848—1852年马克思恩格斯政治文献研究　　彭宏伟　崔　爽 著

第九卷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1857—1858年手稿”再研究　　杨洪源 著

第十卷　“资本一般”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1861—1863年手稿”再研究　　王　嘉 著

第十一卷　资本社会的结构与逻辑
《资本论》议题再审视　　彭宏伟 著

第十二卷　求解资本主义的史前史
“人类学笔记”与“历史学笔记”的思想世界　　王　莅 著

ISBN 978-7-300-25476-0
9 787300 254760 >

定价：1980.00元（全十二卷）